沈志华 著

大国沧桑十讲

沈志华 演讲录

解读原始档案，重建历史事实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沈志华 著

大国沧桑十讲

沈志华 演讲录

解读原始档案，重建历史事实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沈志华 著

大国沧桑十讲

沈志华 演讲录

解读原始档案，重建历史事实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沈志华演讲录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志华演讲录/沈志华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08-3653-4

I.①沈… II.①沈… III.①国际关系史-欧洲、亚洲-文集②国际关系史-东亚-文集 IV.①D850.9-53②D83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5238号

沈志华演讲录

作　　者　沈志华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3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653-4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说明

从尘封的档案材料中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历史研究者的一项重大使命。只要有了史料，学术研究就有了基础。无论时间怎样流逝，世界局势如何变迁，关心历史的人总能通过这些材料走进真实的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沈志华教授认为，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构历史。重构历史必须从个案做起，先搞清楚基本的史实，再探讨其背后的理论问题，这样对历史的理解才能不断加深。

然而，档案材料是普通读者很难接触到的，学术研究的大部头著作也不便于日常阅读。此时就需要学者通过报告、讲座、演讲的方式，以最平实生动的语言，将研究成果的精华，普及给更多的历史爱好者。这种形式更加直观，更有利于我们掌握了解历史的方法，也有助于我们扩大观察历史的视野。

作为历史研究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沈志华教授近年来在中直机关及各大高校讲演数十场，就整个20世纪的中苏关系、中朝关系、朝鲜战争、苏联兴衰的历史启示等等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将其中有代表性的演讲实录整理归类，编选成书，以期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享给更多的大众读者。

最后，本书附录中列出了沈志华教授二十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如果希望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沈教授所掌握的档案与史料，以及他对于历史的更多深入看法，请阅读他的论著。

- 代序：在档案中找寻真实的历史
- 第一讲 斯大林与冷战的起源
- 第二讲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三讲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 第四讲 重新解读朝鲜战争
- 第五讲 苏共执政七十四年留下的历史启示
- 第六讲 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 第七讲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
- 第八讲 毛泽东两次出访苏联轶闻
- 第九讲 中苏同盟的破裂
- 第十讲 中苏同盟的建立及其后果
- 附录：沈志华主要学术成果

代序：在档案中找寻真实的历史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历史研究就是这样。极而言之，历史学的根基就是史料学。因为只要有了材料，学术就有基础了。正是因为从事俄语的人少了，研究苏联的人少了，你才需要花大力气去把那些特别重要的材料翻译出来，所以当时我就想着我得重写苏联史。以往的苏联史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太大，有很多不真实甚至是“虚假”的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是研究历史，你就不能人云亦云，你就得客观。

历史研究也不是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但是要把史实弄清了。要弄清史实，前提不就是这个档案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先做档案。只要档案在，迟早是有用的，你只要这些东西放在这儿。慢慢的，你不看他看，中国这么大，人有的是，总有人关注、有人研究。所以我觉得档案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你先把这些材料收集来，翻译出来，将来即使不懂俄语的人，他看这个也是有用的。

要读懂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特殊逻辑

沈志华： 说到社会主义联盟结构的问题，应该说，任何一个同盟内部都会出现分歧。这很简单，因为大家利益不一样，即使是同盟，但是还是各是各自的民族，各是各自的国家，理念不一样。但是凝聚同盟的一个核心是利益，利益就是可以分割的，可以让步的，可以谈判的。一旦发生分歧的话，大家坐下来谈，大不了你让我一点，我让他一点，最后解决分歧，同盟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不是讲利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是利益的话，中苏就不会发生分裂了，你看1959到1960年苏共中央内部讨论的报告，还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说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苏的团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如果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就要瓦解，都认识到了，但还是要分裂。

记者： 为什么呢？

沈志华： 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着两个矛盾的现象，这两个矛盾的现象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我们讲的是国家关系，讲的是国家关系机制，一个现象是国家关系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就是现代国家，不是说封建国家，从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角度讲，要不然联合国为什么要投票，一人一票，你美国也是一票，一国一票，它就体现一个基本的平等原则。至于能不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它原则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就不平等。

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原来不掌权，还有在野党，那个时候他们就

有了关系，叫党际关系，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党和党之间的关系通行一个什么原则呢？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不是这个道理？党纲上都有这一条，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都是这样，原来都是什么？原来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共产国际是一个国际组织，然后中国是它的一个支部，苏联是它的一个支部，它原来内部的关系是这么一种关系。

但是到了“二战”以后，一些共产党慢慢都掌权了，苏联、东欧，它就形成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党际关系又管着国家关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从40年代后期，从苏联、东欧，到50年代的中国、朝鲜、越南这几个亚洲国家，到整个60年代的时候，人们的理念都没转过来，首先是党和党的关系，中国跟苏联的交往，通过外交部也是一个渠道，但那是辅助的，主要是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它们俩的来往就像兄弟俩一样，缺乏现代国家关系的准则。

中苏之间闹矛盾，中越之间闹矛盾，中朝之间，苏联跟南斯拉夫，苏联跟匈牙利，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好的时候不分你我，一旦关系不好就是你死我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准则是模糊的，不明确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平等的概念。慢慢地过了十年，到70年代、80年代就明白了，所以在那个时期，社会主义同盟瓦解的时候，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就不存在了。

记者： 这个是不是也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苏联输出革命才有建国，越南实际上跟中国输出革命是有关系的。

沈志华： 对，跟这有一定的关系，不是根本性的，因为输出革命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你原来帮助过他嘛，你领导他好像是在情在理的，就像毛泽东说的，你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你们先走一步嘛。这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谁也没说是两个国家，你是老师，我是学生。所以党的关系向国家关系过渡的这一段时间内，也就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这二十年的过程当中，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上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专题研究的主题了。

苏联解体之后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重构历史事实

沈志华 ：那么，我为什么要从专题史入手呢？

其实这个我也是有很深的考虑的，因为整个历史要重构。我觉得从苏联解体以后，历史学家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新描述历史。我指的是现代史，不是说唐宋元明，那是另一回事，古代史研究原来也受影响了，不是说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少多了。那个文献都在那儿摆着呢，《二十四史》、古人的东西都在那儿。但是苏共的历史因为档案文献的缺乏而不知其真实面目，甚至有些都是被掩盖、歪曲的。

记者： 需要改写一下。

沈志华 ：也不能说是改写了，因为改写就是原来有一个东西，它给改了。实际上很多就是捏造的。所以苏联解体以后，大家都在争论谁的责任、为什么解体的时候，我认为不应该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事实都没弄清楚。我记得我从1993年回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以后，1994年我在深圳召开了一个苏联史的讨论会，那是我出的钱，但讨论的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记者： 基本史实不对。

沈志华： 基本没有谈史实，大家都是凭逻辑在那儿争论，全是认为戈尔巴乔夫叛变，根据什么呢？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这个党，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这个权力，他是共产党的叛徒，然后又追溯到赫鲁晓夫就开始叛变。几千万人的一个党，他一个人就能决定？这在逻辑上不通，再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听来听去都是逻辑，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讲不清楚，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我的一个想法是，现在争论这些没意义，大家可以开阔开阔思路，想想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讨论，这样开一次会就够了，大家畅谈畅谈，关键是回去干什么？你得踏踏实实坐下来看材料，把一个一个事儿搞清楚，从十月革命前开始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列宁当时的判断对不对？十月革命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武装起义？一党专政什么时候建立的，开始是不是这么想的？后来为什么取消立宪？你得把这些事的史实从头搞清楚，它自然就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在大家认同了基本史实的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争论。

比如说俄国布尔什维克怎么成功的？靠德国的帮助，怎么靠德国的帮助呢？如果大家从一个基本史实出发就会弄清楚，就是拿了德国人的钱，因为德国当时两线作战，这边要跟英法作战，那边要跟俄国作战，它为了避免军力分散，为取得一次大战的胜利，它就希望跟俄国单独媾和。当时临时政府没有一个党派敢拍这个板，你怎么能够单独媾和？你们原来是同盟，打一个敌人，私下媾和了，你这不是叛变吗？好，布尔什维克说我敢，只要我上台我就跟你单独媾和。德国人让列宁赶快回国，弄一个车厢把他们送去，给钱，回去闹革命，成功了。

这就签了《布列斯特和约》，那会儿我们学苏联史，我就老弄不明白，为什么列宁非要签这个《布列斯特和约》呢？党内都反对，从上到下没有人赞成，他非要签。为什么？他跟人家之前达成协议了。

就类似这样的事儿，你这点事儿你都不弄清楚，你说你争来吵去，吵什么呢？多了，就随便提一个，这苏联史里头，随便提一个事儿都没闹清楚，斯大林怎么死的，列宁怎么死的，别提了，简直就是谜团重重。为什么呢？就是原来他们把历史都给遮蔽了，苏联写苏联史是三卷本吧，《苏联通史》，国内都使用那个，苏联早给包装好了。所以我觉得搞苏联史，第一个任务就是重建历史事实、重构历史事实。

重构历史事实怎么做呢？必须从个案开始做起，就是你把一件一件

重大的事，方方面面的，军事的、外交的、文化的、宗教的、教育的，大家分工能够这样去做的话，最后才有可能构成一本通史。要把基本的史实搞清楚了，我们再来探讨背后的理论问题，这样对苏联史的理解才能不断地加深。所以我觉得先做专题史是必由之路，你只能这么做。否则怎么做呢？如果出版一本苏联通史，不是不可以，但肯定是比较肤浅的，比较表面化的，因为很多事儿都没弄清楚。

而且现在俄国本身的档案馆是紧缩了，但是它出的档案集还是很多的，材料还是很多的，这个是很有空间的。我是希望更多的人来研究苏联历史。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俄国又是个大国，又在你的隔壁，你又跟它那么近，过去跟它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理由不好好研究。

史实是攻不破的，专题研究一定要有立得住脚的证据

记者： 我们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本书中记述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始末，还有苏联“大清洗”之类的问题，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人性或者说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上，影响了苏联的声誉，或者说影响大家对它的看法。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以后，肯定会对中国人有所冲击。您认为有冲击的话会是在哪些方面？怎么保证在学术范围内？

沈志华：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你的目标，你要追求什么目的；第二个是效果，能不能从正面引导。

从目的来讲，我觉得我只是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我可以平实的语言表述它，你看我写的东西比较平和。我不主观地给它戴一个什么帽子，给人家盖棺定论。我就是费点苦功夫，把那些史料找到，然后把它们串起来，以来龙去脉告诉你怎么回事，其实毛泽东去跟斯大林谈判，到莫斯科就是这么回事。

史实是攻不破的，或者说我的努力让你攻不破。为什么我下这么大的功夫，就是这个目的。你看我最近写的这本书，我写完了，七十万字，其中大概有十几万字都是注释，每引一段他们之间的谈话我都做了考证，从哪儿来的，是谁说的，可靠不可靠。我觉得现阶段的苏联史就是要做好实证研究。

我觉得你把史实给它摆出来就可以了，大家都可以据此进行思考，其实最难的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你看我从1993、1994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发表了几十篇东西，基本上都是把一个事儿搞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最近我刚写完一篇“赫鲁晓夫和炮击金门”。苏联到底与1958年的炮击金门有什么关系，这个材料你就要到处去找，到处到档案里面去摸，把相关的东西搞清楚，最后我写这篇东西用了中国、俄国、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档案。现在发现你不这么找多方的档案去印证，真是搞不清楚这个事。

你把这个事写出来，它能说你写的不对吗？别人要想跟你争论，他也得去看看你看过的那些材料，那他就跟着你走了，他就进入这个实证

研究的领域范畴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更好了，所以我不怕，到现在没人来跟我争，因为他不愿意下那功夫。你能说我写的不对吗？你能说毛泽东没说这句话？你说斯大林没说这句话？都说了。

我说毛泽东是赞同批判斯大林的，原来大家都说中苏分裂是因为毛泽东反对批斯大林。我说不对，毛泽东心里高兴着呢：可搬掉了心里的一个大石头，谁压的我？就是斯大林，这个石头可被搬倒了，而且不是我们搬倒的，是苏联自己搬倒的。这话都是毛泽东自己在党内讲的，你说他没说过这个话吗？那你拿出证据来。我有证据，从哪儿引的，哪儿发表的，你可以跟我辩论。你辩论不过。我不是说你没这个本事，我是说你不愿意下这个功夫，你要真愿意下这个功夫，太好了，大家一块儿做学问，多好啊。

而且，从大环境来看，我也觉得现在历史学家多做实证研究是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何况从学术上讲，我们现在也不具备条件，基本史实还没弄清楚，你在瞎吵什么啊？

其实历史就是发现，你不断地去发现新的东西。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一个就是学术嗅觉，另一个就必须有站得住脚的核心史料。我现在有好多文章没写下去，就是我觉得缺核心材料。写着写着，或者有想法了，列一个大纲给扔那儿了，因为缺核心材料。

不合逻辑的历史事件就很可能有问题

记者： 您一般怎么选择某个研究选题？

沈志华： 我一般是先提出问题和提出怀疑，有些事你看不大合逻辑，可能背后就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做学问应该这样的，因为你不提出问题，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你没有一个问题意识，怎么可能深入下去？大有大的问题，小有小的问题，即使一个具体的史实也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原来都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国起草的，那时候我就想不可能啊，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外交经验，苏联又是老大哥，怎么会中国先弄出一个文本给苏联？按道理应该苏联弄个文本给中国，但是史书都是那么说的。

记者： 是。

沈志华： 我在研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时候，就特别关注这一个问题。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不光是这一个，就是举一个例子。后来我把俄国的档案都拿出来一看，苏联第一稿在1月6日就起草好了，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还在路上呢，等周恩来到了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已经改出七稿了，一稿改了给外交部，外交部又给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又给了斯大林，改来改去，给中国的时候是第七稿，这怎么能说是中国拿初稿给人家？

但是后来我想，因为《毛泽东传》上也这么说，他们文献也这么

讲，后来有人拿了一个毛泽东的电报出来，毛泽东的电报里头说，中苏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联改动不大。这就提醒我们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还要继续再深入往下研究。再往后研究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苏联把这个稿子给了中国，中国改了改，改了以后把改的稿子又给了苏联，苏联就没改，说“行，就这个了”。毛泽东的电报里面没说前面这个事儿，就说后面这个事儿，苏联拿了我们这个文本没怎么改，就通过了，那是人家给你的，你改动了一点，改动也不大，又给了苏联，苏联同意了。就是这么回事。

但你再进一步想，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的问题就大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过程，但他为什么前面的话不说呢？这就是毛泽东去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很多人不希望他去苏联。再一个，你到人家那儿，人家拿一个协议给你，说签字吧。这就更不得了了，中国共产党的脸面何存啊？所以不能说苏联起草了条约这个话，而说是我们起草的稿子。你就分析他的心理，把整个史实铺开，这样子事情就比较明白了。

这里没有价值判断，事实就是这样，他的压力很大，他不希望回国以后再面临一些问题。革命成功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还要领导全中国，再加上那会儿对苏联都不满，国内是这样的情形。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不论是苏联史还是中苏关系史，里边的问题非常多。

所以首先要有问题意识，然后你就要去小心做了，慢慢地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细。你看我的几篇文章能够感觉得出来，我对比各方面的材料，一点一点去抠，我甚至在研究波匈事件的时候，都是按分钟计算的，因为一个情报谁先得到是很关键的。是苏联人先得到还是中国人先得到，若中国得到，中国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的？发出来的时候是莫斯科的时间，还是布达佩斯的时间？在北京是几点钟？然后北京收到之后的处理还不一样，它电报先发到外交部，外交部先要解密，解密以后变成中文，中文还要再送中央处理，然后再回电。

所以你看档案的时候，你就不能看几月几日发出，那不行，你得看几月几日到。至于档案里细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原来外交部档案没公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有点问题，因为中国没什么反应，就是23到26日的时候，10月23日晚上出的事，到26日中国报纸上都没说，都是转载别人的。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会儿外交部的档案没公开，但是我就采访了很多人，特别是我采访夏道生。他当时在那儿，他说我没电报机，也没有长途电话，所以跟国内断绝通讯。他说我们发电报得到电报局去，电报局那天闹事儿就关门了，就这么简单。

记者： 所以一开始中国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个事。

沈志华： 一开始中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外交部档案开放了以后，我又去求证这个事，因为这毕竟是当事人口述的，在历史

研究当中口述材料一定要有文献来佐证，特别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后来我就发现果然是，24日凌晨，驻匈使馆发出电报，不错，写的是24日，他写电报的时候写好了，他一直发不出去啊，不是着急嘛。外交部什么时候收到的？27日收到的。这不就清楚了嘛，这就是文献和口述材料就能够吻合了。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据。中国不知道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一开始中国没有作出反应，这就是我做的一个结论。

后来中苏吵起来了，中国就说匈牙利都是我们的功劳，都是我们让出兵的，其实中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说一定要特别小心的求证，类似这样的。包括几点几分的时候，后来我做卡片的时候，都给标上几点几分收到，要不然很容易造成失误。从方法上来讲，我觉得做这个实证研究，我也有自己积累的一套方法，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很不错。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一般的历史研究者都会涉及到方法的问题。

做学问就得下苦功夫，史料还要有甄别分析

记者： 对，我也有这个问题要问。

沈志华： 面对浩瀚的史料，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觉得做研究能成功没有窍门。

第一，你得下功夫，谁也不比谁聪明到哪儿去，都差不多。我就是比别人下的功夫多一点，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工作十六个小时；你一天工作五个小时，我工作十三个小时。我比你多一倍的时间，那么你干一年，我等于干两年。所以第一要坐得住，要坐冷板凳，肯于下功夫，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搞历史的走捷径不行，历史不是想出来的，是看出来的。你得看材料，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怎么可能想出来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来，史实想不出来的，史实是看出来的。

所以它就需要你去看大量的材料，你不看，那你就蒙自己。如果实在没有，那就没办法了。至少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只要能看到的东西，我必定要把它找来看。就是人家都写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去看看。做学问要不下这点苦功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当然有人很聪明，东抄西抄点也行，不是不行，但是你做不真，做不实，迟早会做不下去。我可以随时举很多例子，你看张三写哪本书，你觉得这个挺重要的，抄下来了。其实看所有别人的著作，就是给你一个引导，就是给你指个方向，告诉你这儿还有这么一个材料，但是不是这个材料就是他说的这样，那可是两回事。

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原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不是别人理解错了，就是引用片面，有的可能犯小错误了。比如他页码标错了，你不看你也照标上，你倒是省事儿了，他的错误不就传染给你了吗？姑且不说什么道德的问题，至少他的错误像病毒一样传染给你了。如果大家都这样，还做什么学问，咱们就被“禽流感”传染完了，这是第一。

第二，方法得当。方法得当，你就事半功倍，方法不得当，你就事倍功半。我也自己总结出一套比较好的方法，我也比较得意。我这个方法也给我的学生们讲，我觉得搞历史就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能够让你理清史料的继承关系，来龙去脉。很简单，我就是做卡片。其实这是中国史学家的传统做法，我只是利用了现代的电脑技术。

这个操作起来很复杂了，但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利用排序功能，我把所有的卡片按同样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发的电报，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能有时间的，尽量详细，是上午还是下午，什么时候。你看了一百本书，都讲的是同一件事儿，或者一百件档案，最后你排序以后，它都集中到一块儿了，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史料从头到尾看一遍，你就知道他是引他的，他又是引这儿的，最终原始的档案在哪儿就找出来了。

再一个，你前后看就知道，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历史就是因果嘛，前因后果，一定是这样的，这是逻辑，所以你一看就知道。甲先说的这个话，然后乙后说的，那就是甲影响乙，不可能是逆向。所以你只要把这些相关的东西往一块儿一摆，能够理清楚很多事情，我好多材料都是这么考证的。

记者： 在具体的操作上，实际上就是做卡片了，老先生实际上有两个办法，是吧？一个是说，比如说我研究唐史的，我把相关的史料全都看一遍，边看的时候我边做这个卡片，然后分类，到时候军事一堆，政治一堆，这样的话回头拿出来再去写文章。另一种是说确定主攻方向了，我就想做军事，我就把材料捋一遍，跟军事有关的那部分，有可能有关的我再淘一遍。您是用哪种办法？

沈志华： 我是这样的，比较大范围内的东西，我涉及的范围比较宽，在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可能有关联的我会都看，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前后左右相互影响的，比如国内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同时国外发生了什么。像台海危机的时候，中东发生了一个事情，毛去解释这个问题，很多人讲毛泽东为什么炮击金门，为什么要打金门？1958年，这边“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热火朝天的，你这不是找事儿吗？毛泽东解释的是我们支援世界革命，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我研究台海危机，你只把有关台湾的问题都弄过来了，你得把当时世界上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回事都弄清楚。

把前后左右的事列到一块儿你就会发现问题，我就做出这个判断：毛泽东炮击金门不是为了支援中东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下命令是7月14日，这个是可以说他有这个想法，因为7月13日中东出事了，14日他就说现在可以炮击金门。

好像是这样，但是7月27日中东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下命令，我们不打了，然后8月23日他又突然下命令马上炮击。8月22日中东危机解除了，联大开会了，问题解决了，你倒来打炮了。所以你把这个

事儿的来龙去脉，把西方、东方发生的事儿都搁到一块儿，你会发现它不是这么回事，它另有原因，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只有一个解释，他想利用中东危机的时候，在台海进行炮击，心想着美国人顾不过来，他自己的舰队正在忙着呢，我们可以趁机把台湾打下来。他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他绝不会说打台湾支持中东，否则怎么危机到最紧张的时候你不打，等人家都解决完了，都平息了，你又突然炮击。

那我怎么做呢，我基本上在卡片库上都是按时间排的，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国内、国外的都在一起，都按时间排的。所以你看我这个库是按年、月、日，在电脑里头都排好了，我要研究的这段发生在什么时段，我先把这个时段中所有的材料都看一遍，不是看所有的书，那是看不过来的。比如说我看了一段这本书里的第几页到第几页讲了一个什么问题，我就记下来，最简单的卡片就是一个基本信息。当然有些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毛泽东说了一段什么话，他说的是什么，我整段话都给做下来，有的甚至是一个卡片好几页。

这样的话，你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了整个历史这个时段都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在这里挑出来跟这里有关联的内容，挑出来以后你就开始琢磨彼此的联系了，哪儿是因，哪儿是果，因我讲几条，果我再讲几条。然后你再把它分类，分完类，整个思路就出来了。我写苏联史那本书的时候，二千多万字的卡片我都做好了，而且我写十章，已经按十章内容都分好了卡片，十章里头第一节写什么，第一节的第一段写什么，我全给它排好了，排的很细，整个就全出来了，二千万字都按照章节结构全弄好了，剩下的就是坐那儿写作。

因为你第一遍寻找材料，第二遍按问题分类材料，第三遍按章节分类的时候，等于看了三遍史料，全在心里头，都知道了，而且思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就是研究。什么叫研究？最后写的那个不是全部的研究，那是到了最后写的时候，你怎么把你想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比较精练、生动，那是最后一道工序了，其实功夫都在前面那部分。我写东西，一般的像一篇论文，三万字左右，写一个星期就完了。而且你这个积累出来以后，将来你想写什么，你到你的库里头一看就很清楚了。

苏联的教训：不改革，崩溃就是一种必然

记者： 研究这么长时间苏联史，您是怎样看待苏联解体事件的？它的瓦解是一种制度性的必然，还是操作性的偶然？

沈志华： 从根本上讲是制度性的必然，但那个时间点上，发生这个事儿是操作的偶然性，应该这么解释，我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呢？苏联那样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记者： 您实际上的看法是它这个路是走不通的，本身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把解体的速度加速了。

沈志华： 对，如果不发生“八一九”事件，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早晚的事儿。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实际上，苏联这种体制的问题其实列宁早就看出来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搞“新经济政策”？你想想这个道理，就因为走不下去了，军事共产主义不可能。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战时经济体制，就是对应付战争很有效，动员力强，资源集中，令行禁止，中央一句话几乎全国的财力去干一件事，能不成吗？但是你几十年、上百年，和平时期都采用这种经济体制的话，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你搞军备搞了那么多，结果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苏联社会主义搞了三四十年了，还是平均四平方米的住房，老百姓能满意吗？

“二战”后，为什么改革的呼声那么高？就是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好，结果国门一开，苏联一百多万军队打到欧洲去，突然发现，原来资本主义比我们发达得多。比如匈牙利，我看到一些家书，人家回来写的信，说匈牙利的屋里还挂壁毯，那俄国什么人挂？沙皇那边挂壁毯，大知识分子家里头有钱的挂一个壁毯，老百姓对壁毯都是梦想。为什么朱可夫往回运红木家具呢？你想想，他打下德国，看到好红木家具，再想想自己家里，能不运吗？你想朱可夫都从德国往苏联运家具，说明什么？朱可夫何等人物啊。

后来还有好多的家书，来来往往的信，都说西方的资本主义，比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活水平要高多了。苏联80年代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它改革的冲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种民众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问题就在怎么改？咱们就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苏联改不下去，中国改下去了，就是它这个制度根深蒂固，所以我说是制度性的原因。苏联三次改革都失败了，还有一次机会没抓住，就是列宁搞那个，那是生命力最长的一次，也就五六年，为什么？因为是列宁倡导的，所以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能力很重要。

到了第二次，赫鲁晓夫的改革是最不彻底的，没有展开，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包括他个人的水平问题、苏联对党的认识问题，还有中国的影响在里面。

记者： 中国人的影响？

沈志华： 那当然了，苏联想改，比如发个奖金吧，中国说“奖金挂帅”，苏联说搞个物质刺激吧，中国说是“修正主义”，中苏分裂时批判苏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改革步伐。当时我们都看一本书，题目就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里头摆了大量的事实，说苏联居然有私人小商贩，老百姓可以做买卖，这还叫社会主义？现在年轻人听了可能都觉得是笑话，但是当时确实是这么批判的。

而且，就改革的领导者来说，还有一个个人威望的问题，赫鲁晓夫

本人在党内的威望不足，改革在受到国内外共同压力的情况下，就很难进行下去。当然，列宁的个人威望支撑着“新经济政策”搞下去了，但他缺少一个理论支撑，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来作为依据，同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党内也出现了分歧。

它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八九十年代改革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双轨制、价格差、贫富差距之类的问题。要么就走回头路，要么就突破这个，结果斯大林就选择了走回头路。而他为什么这么选择，又与党内斗争纠缠在一起。

第二次，赫鲁晓夫搞改革，认识确实比列宁深入了，但他个人的威望不行。他把握不住局势，党内地位都不稳固，就更不行了。再往后，戈尔巴乔夫他们搞的时候，理念是一次比一次更先进，但党内地位和威望却越来越不行了。

说“操作性上的偶然”，一些事情如果处理得稳妥一点，可能会把速度减缓一点，但是结果不会改变。你想想，同样的问题，七十年来反复地被提出来，不断地有人要求改革，苏联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我觉得，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有，从长远来看，不改革必然崩溃，早改革就损失小一点。

（2009年8月凤凰网·历史频道的专访）

第一讲 斯大林与冷战的起源

齐茂吉： 孙教授、王教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大陆研究冷战史的权威沈志华教授，来给各位开办一次讲座，那就是“斯大林与冷战的起源——来自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沈教授本身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因为经商的关系，他用累积下的资源，去莫斯科自费看档案。然后他解读了这段历史，又很会写书，他的解读又跟一般美国主流的学者对冷战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去解读历史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看档案史料，不仅要看档案史料，还有跟这个档案史料所发生的国家的相关档案史料，你都必须要加以比较，才能去还原一个历史的真相。今天沈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他第一手的解读，我相信对所有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沈教授。

沈志华： 谢谢所长，谢谢大家。关于冷战的起源，在历史学界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什么时候冷战发生的？这个争论就非常大；什么叫冷战？这个问题争论也很大，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至于冷战是怎么发生的？那争论就更大了。因为现在美国这二十年来，从苏联解体之后，逐步形成一个主流学派，他们也看了很多从俄国流到美国的档案。顺便说一句，后来我发现，在美国阅读俄国档案比在俄国阅读俄国档案更加的便利和省钱。俄国人不行，太爱钱了，很多档案都要用钱，俄国人才愿意拿出来。在美国20美分印一页，而且可以随便印。

但是我发现，美国学者对这些档案的解读很有问题，他们大多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看这场冷战，都是指责斯大林挑起的，美国是被动的。基本上以约翰·加迪斯为首，后来也有一些美国学者如梅尔文·莱弗勒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加迪斯的影响非常大，同意他的看法的人仍居多数。而我对于这个问题，也研究了十年，也看了各方面的数据，我也想写一本书，名称就是“斯大林与冷战的起源”，到现在还没写成，原因在于数据太多而现今仍不断的解密，在没有看完的前提下，断然不敢下笔。我在这想把自己一些想法跟大家交流一下，你们可以不同意或提出疑问，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要谈冷战的起源，必须要界定什么是冷战？冷战有哪些要素？否则这个争论大家对不上话口。这个冷战，首先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世界的格局，这个概念是确定的。现在很多人说美苏对立就是冷战，这观念是错误的，两国哪时候不对立？两国利益不一样，很早就对立了。所以有人说美苏冷战1917年就开始了。苏维埃夺取俄国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对抗，这就是对立了。这是不够科学的。所以何谓冷战，有几个要素：第一为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方是社会主义，另一方是资本主义。第二是它要形成一个集团，它不是几个国家的对立，而是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第三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没有发展到战争的程度。这三者综合起来，我们才把它称之为

冷战。那么接下来我们便以这几个标准来界定冷战，再来看冷战的起源及如何爆发的。

我对冷战爆发时间的基本观点为1947年的夏秋，也就是从当年的6月至10月，标志性的事件，美国这方面是从杜鲁门宣言的发表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而另一方面为9月底苏俄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接着我来解释一下，为何这么划分？战后美苏本来协议好合作，为什么又会走到对抗的地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苏联和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合、机会及条件，就是盟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是相当高兴的。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战场上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时候斯大林开始考虑战后的安排。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当年的5月，斯大林突然下令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共产国际，就是第三国际，为列宁在1919年建立，其目标为发动世界革命、培植各国的共产党。在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而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在战前，各国共产党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来活动的，共产国际其实在战前已经陷入了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它太服从斯大林及苏联的外交利益。例如，1935年希特勒崛起后，斯大林相当担心德国对苏联的威胁，所以斯大林开始跟西方接触；而在西方阵营方面，英法也同样担心德国崛起会对其造成威胁，于是便促成英、法、苏三国的谈判，准备建立一个集体的安全体系，来对抗德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下令，特别是英、法及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内容为你们必须与本国政府站在一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但是后来，斯大林与英、法产生歧见，彼此之间又存在不信任而最后使谈判拖延了很久的时间。斯大林当时有个想法，他知道战争即将爆发，为了保证苏联的安全，所以必须控制波罗的海三国、芬兰及波兰，这些条件，谁都不能给他，只有希特勒才能给他。所以在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开始进行私下的谈判，德国派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谈判，双方谈得相当顺利，同年便签订了秘密条约，其中包括了德国不干涉俄国攻打芬兰、波罗的海三国让予俄国及德、苏共同瓜分波兰的约定。

秘密条约谈好之后，苏联又透过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下达了不同于之前的命令，内容为法西斯其实也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大的冲击，是我们的盟友，最坏的就是你们英、法政府。所以各国共产党没办法，只好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开始发表文章，攻击本国政府。这个结果，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是相当被动的。当时有人批评：你们共产党就听莫斯科的吗？莫斯科说黑你们就说黑，莫斯科说白你们就说白。所以这样的结果连带性地造成共产国际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留下相当坏的印象。结果到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又指使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下达命令：还是德国人最坏，你们仍要与本国政府站在一起。

这种摇摆政策使得共产国际名声大坏，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本来在战争期间就想解散共产国际。但是斯大林其实没有想得很周全，一方面他必须透过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党，这是苏联的一个基本力量；另一方面，因为当时一旦俄国受到德国攻击必须撤离莫斯科，所以斯大林将共产国际迁到古比雪夫，而共产国际资源相当庞大，其组织包括党校、档案馆、间谍训练学校、爆破学校，等等。除此之外，共产国际也负责派往各国的发报员、间谍的事务，这两件事让斯大林对解散共产国际也有顾虑。但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取胜了，1943年1月，整个33万的德国人被苏联军队包围，而后来整个共产国际又迁回莫斯科，因为整个战争的趋势已经看出来了；5月，斯大林突然下令，解散共产国际，这个举动让大家都懵了！

为什么呢？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苏联一直在督促美国、英国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英国人就一直拖着不应，英国这个举动让德国对欧洲所有的军事压力都压在苏联身上，斯大林都快承受不了，德国的兵力基本来都来对付苏联。而在美国方面，罗斯福总统是比较看中斯大林的，也看中苏联这么一个大国的资源，希望能跟苏联建立起合作的关系。所以罗斯福是一直劝说丘吉尔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但是整个西方对共产主义就是有疑虑，西方国家认为一旦我帮苏联打败德国人，反过来你再来打我，而苏联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行世界革命之实。基于以上的想法，西方国家以丘吉尔等为代表的英法等等的国家，当然不愿意答应。所以斯大林宣布共产国际解散，就是告诉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后我们不再实行世界革命，这点是比较明确的。所以从斯大林的眼前利益来说，就是为了开辟第二战场。第二，从长远利益来看，就是为了战后的世界安排。因为战后苏联要与西方合作，不再实行世界革命，所以就不需要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了，有这么一个组织只是一个累赘。花钱不说，各国共产党每年向共产国际拿多少钱都已披露出来，除此之外，还包括西方的一些名作家，这些人都有跟俄国人拿钱的，一直延续到1958年。到那时候，连中国也给了，就是苏联给一半，中国给1/4，其他的1/4由东欧的共产国家去分摊，当然，这是后话。所以当时主要就是苏联，因为别国共产党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所以钱仍然从苏联的共产国际出，但是共产国际的名声又不好，还惹来西方国家的害怕和疑虑，所以到最后才由斯大林下令解散，这是斯大林做的第一个动作。

斯大林做的第二个动作，在1943年12月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会见，签订了“苏捷友好条约”，这是在“二战”期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为什么要签订这个条约？它很有启示性，因为贝奈斯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当时避难逃亡到伦敦，在丘吉尔的庇护之下。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斯大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43年要请贝奈斯到莫斯科来。现在整个会谈记录都已经公布，其目的就是斯大林要表现出：我是可以跟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合作的，并且是承认这些国家的存在的。而且斯大林还安排贝奈斯跟流亡到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见面，并且一方面跟这些共产党员说，将来你们要支持他；而另一方面也跟贝奈斯总统说，你也应该利用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也很有工作能力等等。

这个时候，斯大林其实在设计苏联和西方在战后相处的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联合政府的模式。这是苏捷条约对西方国家的一种姿态，而这个条约也的确给西方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西方国家原来一直认为共产党是洪水猛兽，一天到晚都想在这搞革命、在那搞颠覆。现在来看，斯大林的做法不一样了，他承认资产阶级领导人，而且认他当总统，让共产党员配合他工作，这就是一种姿态。

从1943年底到整个1944年，斯大林安排了几个外交部的负责人来设计在战后苏联的整个外交战略及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以伏罗希洛夫、诺维科夫、葛罗米柯等人为主成立了几个委员会。这些后来解密的档案，都有学者进行整理和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斯大林在战后一定要保持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特别是美国。为什么呢？第一是维持世界的稳定，只要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就可以维系世界和平，不再发生战争。

因为这个是当时的政治人物主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将来如何制止战争，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距离那么近，并把我们生活的地球破坏得相当严重。所以将来怎么制止战争，就是要消除国际上的冲突与矛盾，这个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在想如何去解决。而苏联的设计认为，将来要使世界和平和稳定就是要消除战争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具体做法就是要跟西方国家进行合作，不要再实行世界革命，这是斯大林在1944年主要的考虑。除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例如在战后，战败国及地区该由谁来控制、地缘政治的因素、国家安全利益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必须去解决。

那如何解决？这个时候，斯大林的想法跟丘吉尔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划分战后势力范围。所以才有1944年的“百分比协定”。什么是百分比协定呢？就是丘吉尔到了莫斯科见了斯大林，两人会谈，谈到战后欧洲势力划分问题，丘吉尔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都是百分比，例如匈牙利，西方50%，苏联50%；希腊，西方90%，苏联10%，等等。这些数据我不一定说得准，但是这个档案现在都在，把所有整个南欧、东欧都划进势力范围之内。之后丘吉尔把纸条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了也同意，当然后来艾登和莫洛托夫又把它细化、充实了。斯大林、丘吉尔两人做的这个交易当时是瞒着罗斯福的。丘吉尔说我可没跟罗斯福说这个事，斯大林说这纸条你就留着吧，原本丘吉尔是想把它烧掉的，所以现在这个东西确实还存在，我们的冷战史杂志（《冷战国际史研究》）把这个原件都刊登出来了。

那么这个百分比协定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二战”以后政治领导人对安全观念的思维模式，因为一战以后，就是划分势力范围，挤压战败国，把战败国及其所属的殖民地的资源重新划分。所以苏联在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初很想接手德、意的一些殖民地，但是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有一套全新的思维，就是其对战后的安排，跟苏联合作是肯定的，只要苏联放弃共产党的宣传，将来就可以好好的来谈合作，而不是使用战争的方式来消灭对方。但是将来世界怎么安排？因为原来很

多地区都是殖民地，除了欧洲之外，亚洲、非洲也有很多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战败国所属的殖民地以后归谁？斯大林和丘吉尔仍抱着原来势力范围的旧思维，罗斯福的想法则是全部解放，取消殖民地，这才有后来战后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民族国家独立运动，是因为罗斯福的想法而促成。

那么到了1944年底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思路，基本上已经取得一定的默契，接着也开了几个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及雅尔塔会议，最后形成了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斯大林得到了能保障苏联安全的保证，美国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例如把波兰的一块领土划给苏联，然后从德国划一块领土补给波兰；芬兰划一块领土给苏联，波罗的海三国归并苏联及外蒙古独立等等。这些都是美、苏两国策划好的结果，所以苏联就达到了目的，什么目的呢？苏联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罗斯周围建立一圈的安全缓冲带，所有跟苏联接壤的国家不能强大，更不能与苏联对立，斯大林认为如此下来，基本上苏联安全就得到保证了。这是苏联以往接受历次战争的教训，所以制定了这么一套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安全战略，因为如果有国家要侵犯苏联，必须先攻打苏联外围的国家，这样苏联就有准备应敌的时间，这就是苏联从历次战争中所累积的教训所得出的对外战略模式。

而苏联这样的要求，罗斯福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丘吉尔是有些意见的，而最后仍然没有办法，因为罗斯福站在斯大林那边。尤其在波兰问题的处理上是最明显的。苏联对波兰是相当看重的，希特勒攻打苏联，走的是波兰走廊；拿破仑进攻俄国，走的也是波兰走廊，所以苏联对波兰是最看重的，所以才会有“华沙起义”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苏联对波兰见死不救。当时是1944年10月，苏联红军已经打到华沙城下，波兰当时的状况是其临时政府流亡至伦敦，在波兰境内留了很多地下军，名为国家军。而国家军都是受伦敦流亡政府控制的，波兰流亡政府其实是想利用苏联红军进攻至华沙城下，然后再让国家军起义，一举消灭德军。于是丘吉尔便跟斯大林说这件事你得出手帮忙，而斯大林却不发一语，摆出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斯大林非常担心，如果波兰国家军得势，起义成功，之后必定将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请回波兰，如果这样，波兰就会依赖英国，而苏联就无法控制波兰了。

当时情况相当危急，波兰还在德军占领之下，国家军在情况不明之下发动起义，便派人通知苏联请求援助，哪怕只是炮火的支持也行。而苏联却隔岸观火，不动一兵一卒，最后德军调来6个师，一下子便把波兰境内的国家军全部消灭了。这就是斯大林要的结果。斯大林心里想，因为把你们消灭了，我才能扶植我的力量，而其扶植的力量就是波兰工人党。所以这边华沙起义失败，斯大林在卢布林建立起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卢布林政府”。

这个情况到了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就引起了英、苏两国争执。丘吉尔便跟斯大林说，波兰这个状况不行，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波兰。德国人攻打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英国都可以忍气吞声，

但最后打到波兰，英国无法再忍受而宣战。如果说波兰流亡政府英国要是无法将其送回波兰，英国的脸面何存？斯大林便跟丘吉尔说，波兰对于英国是名誉问题，但是对于苏联来说，却是安全及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如此，苏联必须控制波兰。接着斯大林便将卢布林政府迁回华沙。这个问题最后由罗斯福出面调解，以卢布林政府为主，吸收伦敦流亡政府的个别成员参加。这个提议后来也被斯大林所接受。总之，波兰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最后雅尔塔会议的结果，美、英、苏三国承认了东欧、南欧及中欧的一部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条件要苏联不得在这些地区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必须实行民主制度，举行选举，组成联合政府。这些条件都在雅尔塔会议得到斯大林的保证。果然，苏联军队所到之处，没有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现在有很多档案可以佐证我所提出的这些事实。

所以这些东欧国家在1944年到1946年之间建立的都是联合政府制度。当然，斯大林心里明白，东欧的这些联合政府，只是做个样子，如果不这么做，便会跟西方国家失去合作的基础。但是东欧这些国家还得受苏联控制，所以斯大林便跟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说，你们只要控制住两个部门就可以了，一个是公安部，另一个便是国防部。其他的部门例如经济部、教育部、农业部等部门，就让那些资产阶级的政客经营去。所以后来1944年到1946年这一段时间，东欧国家政府的组成大体便是按照斯大林所说的来组成。

在亚洲部分也是一样，当时苏联打太平洋战争，其中有一条，斯大林跟蒋介石做了个交易，只要你蒋介石签了这个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恢复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及外蒙古独立，我斯大林保证，第一帮助国民政府平息新疆的叛乱，就是1944年11月的“伊宁事变”（是苏联煽动的，当时民族军都快打到乌鲁木齐了），斯大林说，你只要签订了这个条约，新疆我一句话就给你平息了。第二，如果你蒋介石签了这个条约，苏联便承认蒋为中国唯一的领袖，苏联绝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第三是打败日本三个月后，苏联便从东北撤军，东北主权归还中国。当时蒋介石虽然对于斯大林所提出的条约内容，特别是外蒙古独立，有所不满，但因为苏联150万大军已经把东北占领了，在这个状况下，蒋迫于无奈只有接受，便签订了这个条约。之后，斯大林确实履行了他的诺言。

苏联当时是8月8日宣布，8月9日出兵，毛泽东8月10日下达命令，马上进攻上海、南京，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都在平原地区，而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大后方，一时无法赶到这些大城市。毛泽东不但要求新四军、八路军从热河到福建全面开始接收政权，之后还任命了上海、南京市长及华东五省的省长，这全是共产党任命的，当然这些后来都没实现。毛泽东以为，苏联一出兵，中国共产党至少能得中国半壁江山，而蒋介石的军队大部分都在四川、云贵、广西等西南地区，地处偏远，无法赶到。结果，毛泽东刚下达完命令，斯大林就来了电报说要毛泽东必须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要建立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电报就如同把一盆冷水泼在毛泽东身上，所以这件事后来让毛泽东50年代还一直耿耿于

怀。毛泽东曾说，当年要不是斯大林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

斯大林的意图相当明确，他跟美国保证，这些共产党是成不了大事的，我不支持他们，有他们在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这过程很复杂，我写了一篇文章《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里面叙述从1945年一直到1947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到底苏联在这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在这里就没时间细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阅一番。所以从上述这些事情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在欧亚大陆实行的政策都是联合政府的政策，这个时候斯大林在政策上表现了这一个趋向。

那么这里面与西方有没有矛盾呢？当然是有矛盾的，现在史学界讲了这几件事，第一为1946年的伊朗危机，伊朗危机是战后第一次东西方发生的冲突。伊朗危机是怎么回事呢？简而言之就是伊朗是产油的国家，“二战”后期赶走了德国人，被英国和苏联占领。当时苏联和英国保证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后撤军，但是在雅尔塔协议中没有谈到伊朗问题，这就给斯大林留了一个操作的空间。所以斯大林就跟伊朗人说，你能不能把北部的油田租给我。这个情形跟中国东北的情形是一模一样。斯大林在当时就跟蒋介石说，你能不能让我也参股东北的企业，大家一起合作，每人都投资50%，但不许别人参与。当然斯大林这个提议蒋介石是不愿意的。现在再回到伊朗这个问题上，伊朗国王当然不同意斯大林的提议，于是斯大林便煽动伊国北部的库尔德族人建立民主党，并争取自治。

斯大林的这个举动使得伊朗处境相当被动，于是国王便把此事告到战后新成立的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处理这件事情。当时苏联还真是很顾名声的，斯大林见事情一扩大，马上撤军，最惨的就是他所煽动的民主党。后来斯大林给民主党主席比雪华里写了封信，信中说明苏联即将撤军，以后是好是坏就看你们自己了。所以，你们在这里能看出来，斯大林其实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如果他能从中获取利益的话，一定不放过机会，但是又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可以牺牲别人，伊朗民主党便被他牺牲了。后来伊朗军队平复北部叛乱，而苏联全部撤军。

苏联从伊朗撤军的同时，也从中国东北撤军，都是一个形式，这是1946年的3月到5月。所以伊朗这个事情被美国的史学界认为是冷战爆发了。这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事件只能说明斯大林这个人有投机取巧的心理，他经常如此，如果能在某事上占到便宜，就占便宜，但如果遇到危险，便赶紧缩回去。第二件事情是土耳其危机，土耳其危机也是如此，因为俄国整个的对外军事战略，就是必须要有通往各地的出海口。俄国的北方战争就是为了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斯大林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也是为了这个。为什么沙皇俄国一定要取得旅顺港，就是要在太平洋地区有出海口，这也是苏联战后“亚洲战略”的核心。

再者，苏联的黑海舰队要能到地中海，必须要经过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海峡的形势很窄，很容易被控制。所以斯大林便要求土耳其必须把《蒙特勒公约》废除，并与苏联签订新约。而

在海峡上的港口，两国共管，港口的修建由苏联出资金和技术，土耳其只要尽到共管的责任便可。而土耳其的态度是不愿港口主权的被分割。于是苏、土便为港口起了争执，苏联便恐吓土耳其，而土耳其不甘示弱也硬碰硬，不久之后便一纸状告上了联合国。于是斯大林见事情又闹大了，便放弃了土耳其的港口。这也是被史学界认为是冷战起源的事件。

这两个事件是否为冷战的起源？我前述讲的冷战的构成因素在这两个事件都没出现。对抗了吗？苏联在事情扩大之后，每每采取退缩的动作。也没有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政策，更没有形成两大集团的对抗。所以1946年至1947年初是没有冷战的，因此伊朗和土耳其危机都不能说是冷战形成的理由。

接着，就是希腊危机，发生于1947年3月。这个希腊危机就更不能成为理由了，因为希腊危机其实是跟苏联毫无关系的。现在就披露的史料来看，当时苏联在欧洲实行联合政府政策的时候，在西方有法国、意大利及希腊等三个国家都是实行同样的政策，其做法就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进入政府担任要职。斯大林也针对这件事找了法国、意大利及希腊共产党总书记来谈。关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的事，斯大林还找戴高乐来谈，因为当时多列士是反政府的，后来被通缉，他就逃到苏联。斯大林后来找多列士谈，开口便说你们回去法国，把武器上缴，并且参加政府。但多列士说，我还被法国政府通缉。斯大林便又说，我已经跟戴高乐谈好了，把你们的通缉令给撤销，让你们回去负责共产党，与戴高乐组织联合政府。而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当时这三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掌握了很强大的武装力量，例如希腊在当时就有二十多万的军队，意大利比希腊更多，而法国甚至有多达五十万的共产党军队，交出这些军队，这些都是斯大林跟西方做的交易。

而希腊危机就是后来希腊共产党在1945、1946两年跟希腊政府起了冲突，共产党人后悔了，说当年如果不交出武装，现在就不用受这些委屈。于是过不久又把队伍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这在美国人的眼里必定认为是苏联在背后挑拨，其实根本不是。所以希腊危机更不能说明冷战如何发生了。但是伊朗、土耳其和希腊危机给了美国当政者一个很不好的印象，这是确实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乔治·凯南写了一封八千字的长电，基本理论为：其一为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要发展壮大，必然向外扩张，然后便历数俄国在历史上向外扩张的历史。其二为共产党就是一个扩张集团，说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它不扩张如何解放？而到了斯大林执政时，又有俄国人的传统又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斯大林是最具侵略性的。

这就是凯南的逻辑，而从凯南的逻辑出发，他又把伊朗、土耳其、希腊等几个危机点出来，这不正说明了上述的情况吗？所以美国很多的外交决策者都接受了乔治·凯南的理论，于是杜鲁门宣言及其代表的杜鲁门主义便应运而出，其基本思维就是美国要接管原来属于英国、法国的责任。原本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希腊内战爆发之时，希腊政府就跟英国人要钱要兵，但此时的英国无力援助，于是美国便想援助希腊。

但美国本身也有问题，因为美国一向秉持孤立主义，不愿意管除了北美大陆以外的事情。美国跟那些老牌的如英、法资本主义的殖民国家不同，并不靠经营海外殖民地来维持国家的强大。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孤立主义回潮，在国内就有希望美国回到北美洲，不要再插手欧、亚两洲的声音出现。但是也有其他的声音认为美国应该把眼光放远全世界，丘吉尔就是一个典型，“富尔顿演说”（即“铁幕演说”）就告诉美国人，欧洲现在不行了，你们不去，苏联人就去了。所以在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便针对这些事件发表宣言，这就是“杜鲁门主义”。

那很多人就认为“杜鲁门主义”就标志着冷战开始了，其实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杜鲁门主义”确实表明了美国政策性的倾向，也就是美国已经不信任苏联并且开始抵制苏联。因为苏联的屡屡向外扩张，美国便采取围堵的方式响应，这便是美国所谓的遏制战略。但这又回到我刚才所说冷战的标志是什么？是形成一种对立的状态，我们再回到杜鲁门发表宣言这个事件之后苏联如何反应。苏联的表现极其软弱，而斯大林也开始展开情报的收集，他从美国、英国得到的情报显示，杜鲁门宣言在美国是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所以斯大林也没有将此事看得太严重，甚至认为这是美国人因应选举所喊出的口号。还有那个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说是表明冷战开始，那就更没道理了。当时丘吉尔一演说完毕，斯大林的反应就是丘吉尔下台以后太郁闷，在发牢骚，要说让他说去，并不在意。所以丘吉尔那个“铁幕演说”，当时被传得沸沸扬扬，那都是记者的事，并没有对美、苏双方的决策造成影响。

就是在1947年5月，斯大林见了马歇尔，马歇尔当时是美国国务卿，斯大林特意跟他谈了一番话。斯大林话中的意思就是我理解你们美国，现在我们谈判遇到困难，主要就是德国问题，因为那时德国问题美苏两国争执很大，但是我相信事情总是有解决的方案，你们不要着急等诸如此类的话。斯大林当时在莫斯科仍然对马歇尔一片殷勤。所以到这个时候，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更没有形成两个集团。

但是接着就出事了，1947年3月是杜鲁门发表宣言，4月就发生了法、意两国的共产党被赶出政府，其他比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卢森堡等当地的共产党也在这个时候被赶出政府，这详细过程我就不说了。这件事情让斯大林开始感到威胁，因为联合政府是斯大林对外的基本战略及政策，而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就说明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要改弦更张的信号。再者，法、意两国共产党在处理这件事时，事先没有知会莫斯科，这让斯大林更受威胁，因为这件事显示出他已经失去了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所以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便萌生了一个念头，要重新组织共产国际。

这件事在1947年的6月4日发生，就是在马歇尔于哈佛大学发表演说的前一天，斯大林召见了哥穆尔卡，跟他说你要开始做个准备，我们预备要召集各国共产党来莫斯科开会，接着要办杂志、要重新组织共产党的组织，具体的做法，你们先设计。就我看到的史料显示，这个可能是

斯大林非常初步的想法，但后来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了什么事呢？就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演讲完毕后，美国马上动了起来。开始苏联人不明白，这“马歇尔计划”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便让那些经济学家去调查，并且针对“马歇尔计划”写成报告。后来苏联著名的经济学者瓦尔加及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都各自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钱多得没地方用，是资本过剩危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说明了资本主义因为没有投资的地方而造成资本过剩，所以它要拿到欧洲来。斯大林听取报告后便说，这件事很好，我们正缺钱。结果苏联组织了一百多人的代表团，还对东欧所有国家发出通知，说美国人要贷款给我们，大家都去申请，要得愈多愈好。于是，苏联及东欧各国满怀希望到了巴黎，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其实美国人对于苏联等国采取的行动早就设计好了，而美国后又特别跟英、法两国商议，说这贷款是不能给苏联的。因为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防范心理与围堵政策已经逐步形成，所以美国不可能再贷款给苏联，何况美、苏另外的谈判贷款谈了两三年之久，也没能谈成。

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岂会贷款给苏联？但是美国又不能说不给苏联，因为这个贷款便是以援助欧洲为目的，而苏联也是欧洲国家之一，那怎么办呢？所以英、法两国便想办法让苏联无法接受这笔贷款。这个巴黎贷款会议开了很久，苏联方面由莫洛托夫带队，经过一番曲折，莫洛托夫终于发现其实英、法等国存心不想让俄国取得贷款，就给斯大林打电报。也正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接到“克格勃”和法国共产党传来的秘密情报，其内容为英、法两国外长的谈话记录。斯大林从里面得知英、法等国存心不让苏联得到贷款，于是便让人打电报给莫洛托夫，命令他返回苏联，并拒绝再与英法等国商议贷款的事情。

当时苏联与各国共产党都撤回来了，第一轮谈判便没谈成。到1947年的7月，各方展开了第二轮谈判。因为当时苏联对贷款显得兴致勃勃，更何况是东欧的其他国家，有谁会不想要美国提供的这笔贷款？所以这些国家议会便纷纷开会讨论，通过各种的章程，以便争取贷款。因为当时这些东欧国家的体制还是联合政府，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在此时，苏联才发现问题严重了，于是便再通知东欧各国，谁都不许前往巴黎开会。第一次电报说你们还去，去了以后全部都投否决票，破坏会议之后你们就回来；后来又一琢磨，怕这些国家不可靠，于是便说干脆别去了。有的国家接受，有的国家便不接受，不接受国家的理由是我们本国的议会都通过决议，登了报了，怎能不去，这不是失信于人吗？于是斯大林恼了，便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总书记请到莫斯科开会，并质问说难道我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了吗？这时才听到捷共总书记说本国的外交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并不受共产党控制。斯大林这时听闻此事才意识到大事不妙，之前所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

特别是在英、美等国所提倡的“马歇尔计划”，有两点是斯大林最不能容忍的：其一是不给苏联贷款，但对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美国可

以给予贷款援助，这让斯大林疑虑西方国家是否要假借贷款，对亲附苏联的东欧国家进行挖墙角。其二是马歇尔贷款如果扶植德国的话，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国家想借着德国的力量来对付苏联，这让斯大林更加的害怕。此时各国共产党已成为一盘散沙的情形，不听莫斯科指挥，各行其是。这些原因，让斯大林下定决心重整共产国际，其组织名称改为共产党情报局。这就是到了1947年9月25日共产党情报局开会时斯大林的主要目的。

共产党情报局一成立，就标志着苏联集团的形成。北约当时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美英法德西方联盟已经形成，美英法在德国占领区的联合，就是信号，又来一个“马歇尔计划”。现在东方再加上苏联集团，日丹诺夫便做了非常著名的报告，报名内容说到现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反动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进步阵营。这份报告把两个阵营的分野划分得相当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冷战开始了。

接下来我还想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关于冷战的概念，主要是关于斯大林的冷战战略。经过1948年的柏林危机、1950年的朝鲜战争，所以一般人认为斯大林的冷战就是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这一点是错误的。朝鲜战争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研究朝鲜战争十几年了，斯大林在这件事上是有他的想法和目的，跟人们的猜测是不同的。有人甚至说斯大林第一步进攻朝鲜，下一步便是进攻日本，这都是错误的。就我的看法，斯大林的冷战战略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内线进攻，就是整合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势力。他在世的时候开了三次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第一次就批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第二、三次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跟铁托起了争执。为什么斯大林要这么做？都是为了内部的统一和整合共产党的势力。苏、南冲突的基本原因就是斯大林的冷战思想，铁托误解了，铁托以为既然跟资本主义国家闹翻了，我们便与他们对抗。

这件事从希腊危机显现出来，因为当时希腊共产党的军队势力很大，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却躲得远远的，对希腊共产党几乎是不闻不问，但匈牙利的拉科西和铁托却支持希腊共产党的行动。而苏、南冲突其实还有很多背景，但因为时间有限也没能多讲。我只讲一点，斯大林跟铁托闹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铁托想偷偷向阿尔巴尼亚派两个师的部队去援助希腊共产党。这事事先没知会斯大林，斯大林非常生气。当然斯大林也知道铁托的地位，不好当场骂他，这个关系很像斯大林跟毛泽东的关系，斯大林可以骂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毛泽东他就不好办。所以当时铁托这个事就是他拉着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陪绑，斯大林就指桑骂槐，表面上骂的都是季米特洛夫，实际上都是骂给铁托听的。所以最后他们就闹翻了。

大家可以从此事看出，斯大林的外线是防御性的。当时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例如匈共的拉科西就建议希腊共产党应当参加情报局会议，斯大林就不让参加。其他如中国等地正在闹革命的共产党，斯大林也不让他

们参加情报局会议，这反映出了斯大林一个内心的想法。从1948年到1952年，斯大林主要的作为都在整肃东欧内部，诸如消灭本土派，扶植亲苏的莫斯科派的行动，朝着“两党合并”、“一党专政”、“东欧全盘苏化”的三大目标迈进，逐步完成他“内线进攻”的战略目标。而在“外线防御”的部分，斯大林的目标就是尽量避免战争，逐步恢复并巩固本身的实力。因为斯大林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知道苏联在这时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经不起半场战争。这从他在“二战”之后不轻易介入其他共产党与他国之间的战争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越、法战争时，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屡次请求武器援助，并希望由苏联领导时，而斯大林却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可以看出斯大林的这种“外线防御”政策趋向。

今天，关于冷战源起的观念，要说的事情很多，我只是说了大概的脉络，因为这里牵涉到的故事太多。特别到后来怎么解释朝鲜战争、柏林危机，这些都是斯大林晚年所做的事情，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没办法详细说明，将来如果有机会再给大家做一番详细的报告，今天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

齐茂吉： 非常感谢沈教授今天这场精彩的演讲，沈教授的演讲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说到冷战，必须把冷战形成的因素和条件给界定清楚。沈教授非常明确提出了三个条件是形成冷战的因素：第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第二个是形成集团的对抗，最后是对立而没有发展成战争。以往我们在谈到冷战的时候，对冷战形成的因素没有下一个严谨的定义。

再者，沈教授今天演讲带给我们另一个启发为，以往在美国的主流学者在解释冷战的时候，都基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认为是因为苏联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不断地对外扩张，因此美国是被动地提出了“遏止战略”，遏止战略就是台湾地区一般所称的“围堵战略”。我想，这个观念是以往我们所欠缺的。台湾地区当局是亲美的，对于冷战的解释必定是遵循美国的看法。但事实上今天沈教授去看了很多俄国的原始的档案史料，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冷战形成的角色中，其实苏联才是处于被动的形势，这个观念是以往我们所没有接触过的。现在我们请孙教授来发表一些意见。

孙玫： 谢谢齐所长，今天沈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想借由沈教授的演讲来了解“斯大林与中共”及“抗战后的中国联合政府”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今天沈教授对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做那么详细的说明，我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相当明白。

沈志华： 谢谢孙教授的意见，拙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扩展》《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这两篇一起看，必定能再深入地解答你的问题。

王力坚： 我想请问沈教授，斯大林是基于什么原因发动了“大清洗”事件？是单纯为了巩固个人自身的权力？还是有其他内部的因素呢？

沈志华： 关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事件，是发生在“二战”前的30年代。这件事肯定给苏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斯大林他不这样做，他的政权就会不稳。不过，事情搞得这么大，也有其他原因。

我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专门讲反右派。因为原本毛泽东设想的右派就四百多人，后来发展成八百多人，到了青岛会议涨到了八千多人，又过了两年竟涨到五十五万人之多。你可以想象这件事的道理，一旦把武器交给群众以后就控制不住了。那时各阶层都在抓反革命——北京抓了八个，我们得抓十个；天津抓十个，上海得抓十五个。越来越多，雪球愈滚愈大，基本上共产党对于这种政治运动，最后都是这么形成的。开始的时候斯大林也不是不知道，把那十五个元帅都杀了，谁来领兵打仗。但是后来报上来的人数，连斯大林也懵了，而且都是反对他的人。所以斯大林一开始的目的原本只是想整肃反对他的一些政敌并借此巩固自身的权力，后来就控制不住了。

这个事件的源头是基洛夫遇刺案，掀起了“大清洗”的序幕。基洛夫是斯大林的对手，他的死亡被传与斯大林有关，但仍然没有实际的证据去证明这事是斯大林所为，谋杀基洛夫的凶手当场就被杀了，杀了凶手的人过了两天又被杀了。这也是后来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从“大清洗”事件开始的原因。那么这事件怎么提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就报了案，说跟他一起关在监狱里的一个人说斯大林和雅哥达亲自审问过这个凶手。然后那个凶手说是内务部让我做的，当场被打晕了。当时听到这件事，政治局委员都惊愕了，说明“大清洗”是斯大林亲自介入的。这些事实在我所看的俄国档案都有记载，根据史料的记载，后来被镇压的人竟多达几十万，这个情况我想也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

赖泽涵： 我想请问沈教授两个问题：（1）中国向苏联“一边倒”问题。（2）现在写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学者很多，请问他们两位的特色为何？两人的关系如何？

沈志华： 关于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问题，我对目前看到的史料有新的解读。总的说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矛盾很深，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斯大林，不倒向苏联，中共就立不住，但是一旦立住脚，就不需要追随苏联了。

现在有材料表明，毛泽东在中共确立最高领导权是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所以很多人都说是斯大林是非常欣赏毛泽东的，是他把毛泽东推上领导岗位的。但我看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毛泽东并不是斯大林选中的人，而是中共自己选中的。以前中共的领导人都是苏联挑选的，至少是听取苏联意见的。但是长征的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斯大林在那时并不了解毛泽东。斯大林其实比较熟的中共党员是那些莫斯科派的成员，就是在莫斯科学习过的或工作过的人。但是这些人如王明等人后来斯大林也信不过了。因为他们的老师米夫，在“大清洗”事件的时候，被斯大林镇压了。共产国际与中共恢复联系以后，毛泽东因为在

当时中共领导人群中的声望比较高，已经站住脚了，斯大林不过是承认了既成事实，认可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非斯大林有意的选择。

我们再来看斯、毛两人之间的接触。在这以后发生了几次大事，这些大事的共同点都是中共中央已经做成了决策，最后又被苏联当局给否决了：

（1）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受困西安，毛泽东本想杀蒋介石以绝后患，但斯大林当时希望中国堵住日本，免得日本转而攻打苏联。当时希特勒跟日本人说，请日本先打苏联，把苏联打倒后我们再平分全世界。所以斯大林反对西安事变，说张学良是大汉奸，你中共怎么能与他合作，更不能杀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其实苏联也起了很大作用。

（2）皖南事变：这次毛泽东下定决心集合全军之力决定跟蒋介石开战，斯大林又以“枪口一致对外”、“统一战线打日本人”的理由否决了毛泽东的决心。

（3）重庆谈判：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又被斯大林逼着与蒋介石展开和平谈判，毛泽东明知有危险，还是得冒着生命危险去重庆与蒋谈判。这三件事可以说明，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的关系其实很紧张，矛盾很大。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过要依赖苏联，更不可能向苏联“一边倒”。在1944年的时候，毛泽东原本是要依靠美国人，他对来到延安的美国观察组的谈话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我仔细地从头到尾琢磨了一番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他的谈话是循序渐进的，最初的谈话，毛泽东就讲一件事，“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就这么一个观念。后来美国人就解读他的话，并想毛泽东为什么老是强调这个，最后终于明白毛泽东是要强调是“中国人”。后来毛泽东跟美国人慢慢熟了，这话就都出来了，例如：苏联根本没那个能力，救不了中国，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共产党的朋友。这都是毛泽东跟美国人说的，他信不过苏联人，想到其实跟美国人合作也不错。特别是对蒋介石身边的特使史迪威很有好感，而史迪威也挺偏向于共产党的。

后来到了1944年底和1945年初，形势出现变化，美国还是看重蒋介石，史迪威不久后也被调走，驻华大使也换成赫尔利。赫尔利是坚持反共立场的，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毛泽东一看这情势，觉得美国人靠不住了，随后就在中共七大发表讲话，说其实苏联也是我们的朋友，将来国际主义一定会实现，苏联一定会帮忙我们的，这时是1945年的4月至5月。毛泽东说“虽然国际援助长期没有到来”，这就是毛泽东话中的怨气，接着又说，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来到，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就是说你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就得援助中共，因为我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话就是说给斯大林听的。结果斯大林非但没有援助，反而又给毛泽东泼了一盆冷水，就是重庆谈判。

苏联占领东北之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让中共接管政权，一会儿又把他们赶出城，一会儿让中共打蒋军，一会儿又缴械他们的武器，毛泽东就更生气了。苏军撤退的时候，马歇尔来调停国共内战，毛泽东这时态度又变了，让周恩来赶快见马歇尔，并跟马歇尔说，你的立场是相当公正的，我们愿意服从美国的领导。马歇尔说，听说毛泽东身体不太好，要去莫斯科疗养。周恩来听完赶忙说，毛泽东要我带话给你，如果他真的有病，也不会去莫斯科，而是要去华盛顿疗养，在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这表明，毛泽东如果有机会，还是想跟美国人合作。不过，这次毛泽东对于美国的态度就比较带有策略性了，是逼美压蒋，已经不像刚开始这么热诚了。

大家可以看周恩来和马歇尔的谈话记录，在其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是想靠美国人来压蒋介石的，这是带有很大的策略性的。但是在内战调停失败之后，毛泽东就彻底失望，彻底放弃美国了。所以中国内战对共产党来说是背水一战，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既指望不了美国人，也指望不了苏联人。从整个国共内战来讲，斯大林实际上没给中共太多的援助，比起美国人给国民党的援助，那差远了。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共能控制东北，因为这才与苏联的利益有直接关系，也符合雅尔塔协定。所以，在东北问题上，苏联还是积极帮助中共的。

毛泽东这个人的性格，大家要懂得掌握，他不愿寄人篱下，也不乞求别人，毛泽东是很讲面子的，那个时候毛泽东1946年为什么要打四平保卫战？明知道打不过有装备美式武器的新六军、新一军，毛泽东仍坚持让林彪去打，并跟林彪说我知道打不过，但你必须打，这是要打给莫斯科看的，如果你连一仗都不敢打，莫斯科凭什么援助你。所以毛泽东说，无论花多大代价，你也一定要打这仗，就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四平。其实这就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是要让他看我毛泽东敢不敢打，值不值得你苏联的援助。后来还是敌不过蒋介石，军队一路向北退，一直到了松花江。东北内战时，苏联帮了不少忙。

但是在1947年，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主要是军事上的，当然还有如民心等其他因素，但主要仍是毛泽东的军事策略设计得相当好，这一点蒋介石是远远不如他的。所以1947年战况逆转，这一逆转，毛泽东才开始给斯大林写信。因为从这个时候一直到1949年底，毛泽东认为凭自己打败蒋介石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点，万一美国人出面干涉，他就打不过了。所以毛泽东要取得一个保证，如果美国人援助蒋介石，你苏联人得援助我，这样才能够跟蒋介石继续打下去。所以毛泽东屡次要求去莫斯科，但是斯大林就是不让他来。

后来一直到1948年5月的时候，这时候战争大局的趋势已经看出来了，毛泽东那时相当高兴，并说我现在终于可以去莫斯科了吧。本来斯大林同意让他来，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这事把毛泽东气坏了。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中、苏两党的领导人还没有通过话，他们对彼此都不了解。特别是到1949年初，这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想要与共产党和谈。这时蒋介石顶不住了，换李宗仁上台。李宗仁主张邀请美国、法国、英国

和苏联出面调停，举行国共和谈。毛泽东这时当然不愿意，而斯大林那时却有点担心。说你打到黄河美国人没管，打到长江美国人也没管，如果之后打过长江，美国人真管那怎么办？那时苏联人认为，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是不大了，但是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斯大林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内容说你应该和谈，但是只能由我出面来调停，就是怕美国人影响中共。毛泽东此时回信中口气相当强硬，根本就用不着和谈，解放军一跺脚就过长江了，还谈什么！这完全是国民党欺骗人的计策。他还替斯大林起草了一封给国民政府的回信，说苏联不干预别国内政，不参与调停。

这是我看到的在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里面，第一次直接顶撞斯大林的信，毛泽东直接写了这封信，而且口气非常强硬地把斯大林给顶了回去。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但从整体利益来说，这两个人谁都离不开谁，斯大林在此时还是不明白毛泽东究竟想干什么。斯大林的目的很清楚，涉及苏联利益的只有东北地区。大家看斯大林对中国的援助，从方式、内容看，都限制在东北地区，东北要什么，斯大林都给，所以他给林彪、高岗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只要出了东北，斯大林就不愿意管。因为毛泽东原来的设想是在东北组织一个自治政府，其他都归你国民党没关系，我就把热河到外蒙古、内蒙古和东北连成一片，东北达成自治就可以。所以国民党也是没想明白，当时就不应该坚持一定要消灭共产党，结果弄得自己被灭了。

这个时候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也别来莫斯科了，我派个使者过去，之后便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而在毛泽东这一方面，他其实很想依靠苏联，而且只能依靠苏联。因为他主要担心两点：其一，是希望有苏联作依靠，万一美国人出面干预，能得到莫斯科的帮助和支持。其二，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担心中共坐不稳这江山，因为共产党还没有经验和能力治理这个国家。从我看到的文献显示，当时解放军打上海，围堵了很久而不发动进攻。他不是不敢打上海，而是不敢进上海。因为毛泽东三十年在山沟里打转，搞土改分田地那是很有经验，但是进了大城市就没经验了，什么电灯、电话、广告及地下水道等等设施他都不熟悉，也不懂这些东西。

所以毛泽东对苏共代表说，让我进上海可以，你给斯大林打个电报，让他苏联专家来协助管理上海，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将来真的拿下那么大的国家该怎么管理。共产党这时跟国民党不一样，他们并没有一套能帮忙治理国家的人才，八路军里面管理人才不多，原来留下来的如日本及英美资产阶级的人，毛泽东这时又信不过他们。所以毛泽东在此时能倚靠的就是苏联了，他这时跟斯大林谈的问题就是希望苏联赶快派专家来，要不然等我们把全国都占完了都不知道该怎么管理，连发工资都不会。比如陈云在东北时，打下几个大城市后，却不知道工厂工资该怎么发，后来发现在大连造船厂里面，苏联人对于工资的发放有一套八级工资制，陈云知道后便照苏联的方式来办理。

在1949年初的时候，中、苏两国共产党一共谈了八天，中国共产党

把所有的计划想法都一股脑地告诉了苏联人，米高扬回去之后跟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很高兴，同意继续支持中共。这时斯大林虽然同意援助中共了，但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真正的想法，所以他一直在等斯大林表态，这样他才能在跟苏联合作的问题上，给全党、全国人民做个交代。这件事一直到了刘少奇访问苏联，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同年的6月26日，刘少奇到达莫斯科，随后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两人的会谈过程相当顺利，斯大林给刘少奇所有想要的东西，甚至连刘少奇没要的都给。

大家可以从两人在6月27日的会谈记录看出，此时斯大林急于想让中共知道他的立场的心态，连中共没有想到要的东西他都给。例如占领新疆，原来毛泽东是准备1950年才进攻新疆，斯大林对刘少奇说，新疆那么大，又资源丰富，你们还不快占领。刘少奇说，新疆太远，我们没有运输工具的协助，无法迅速占领。斯大林说没问题，我给你们提供汽车和飞机，协助你们占领。刘少奇又说，但是去新疆的一路这时还有马步芳的骑兵占据着，当年西路军就曾经在马步芳的手下吃过亏。斯大林立刻回答说没问题，我给你派两个团的飞机，炸弹一扔便全散了。

后来中共的一个先遣军进新疆，都坐着苏联的飞机，后续的部队也是坐着苏联的汽车到了哈密之后，再分散占领整个新疆的。6月28日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电报，相当兴奋，立刻提笔写下《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向苏联一面倒”。

齐茂吉： 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沈教授对朝鲜战争的解释如何？

沈志华： 对于朝鲜战争这个问题，我过去也是研究了十几年。对于朝战的看法，过去也是有比较传统的观念，朝战怎么打起来的呢？主要来说就是中国出兵、苏联出钱及利用金日成在北朝鲜的力量，组成了“三国同盟”。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依据档案文献的史料，我现在提供大家几条比较大的线索。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朝鲜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朝鲜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结论是达成四国共管。后来英国因为无力派兵而退出，而中国蒋介石方面也因爆发国共内战而无力介入。

直到1945年底，在莫斯科会议上才确立以“美苏联合委员会”来处理朝鲜问题。1948年美苏冷战爆发之后，两国冲突愈来愈大，美国于此时退出美苏委员会，并把朝鲜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而联合国也成立“朝鲜问题委员会”来处理此事。苏联到这个时候就被尴尬地晾在那边，美、苏至此脱离接触。

两国脱离接触之后，美苏两国的对外政策都是希望彼此不要在亚洲跟对方发生直接冲突。所以苏联军队在1948年底单方面从朝鲜撤走了，美国这时也陷入尴尬，也宣布撤军。可是当时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不愿意，并希望美军帮其建立一支国防军再撤军，美军依约帮南朝鲜建立一支军队后，但又怕李承晚挟着军队北进，于是把具有进攻性的重武器都带走了，只留下一些轻武器，给南朝鲜维护基本的安全和治安。在苏联

方面，也怕北朝鲜冲动南下。对于朝鲜统一问题，美苏两个大国是采消极应对的态度的，反而是南北双方都想各自以武力统一朝鲜。

从1948年到1949年，整个朝鲜大体上是这个情形。金日成先是找毛泽东帮助，毛泽东的意思是等中国统一后才出兵帮金日成进攻南朝鲜，金日成碰了毛泽东的一个软钉子，只好又打道回府。不过，毛泽东也答应让中共四野中的朝鲜族部队回国，以防止南方的进攻。美军撤军后，金日成想马上发兵，进攻南朝鲜，制定了一个“瓮津半岛作战计划”，结果斯大林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给否定了。金日成又转而寻找毛泽东的支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请毛泽东兑现承诺，毛泽东心里想，我还有台湾问题没解决，又不好当面与金日成说，于是就打了电报给斯大林，请斯大林出面来负责说服金日成，别一天到晚老是想打仗，进攻南朝鲜。后来斯大林回电报给毛泽东说，关于朝鲜问题，我们的立场一致，说服金日成的工作我来做。毛泽东得到信息才放心不少。

接着关键性的问题来了，究竟朝鲜战争如何爆发的？这个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中国向苏一面倒之后，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之后，两国在政治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立场。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关于国家利益的问题，这其中又涉及外蒙古、东北的旅顺港及中长路问题，最后该如何解决？斯大林及毛泽东都在这些问题上彼此试探对方，以谋求自身最大的利益。

例如毛泽东曾经跟米高扬说，现在我们即将夺取政权，外蒙古在此时是否应该统一到内蒙古来。米高扬一听不对，认为外蒙古已经宣布独立了，中共怎么又提统一的事情。之后便写了电报跟斯大林报告这件事说，毛泽东现在正惦记着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后来回了电报给米高扬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如果要谈到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那么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来，而是内蒙古应当统一到外蒙古去。毛泽东一听，不敢再谈外蒙古问题。之后苏联倒是主动提了旅顺港的归属问题，说想把旅顺港归还给中国，毛泽东一听愣在那边，说你现在还给我做什么，别说海军了，我连游艇都没有，收回来如何防卫？还是你先占着吧。

在这些问题上，两人都很用心思，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后来中共派刘少奇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议如何处置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友好条约，斯大林不置可否，并向刘少奇说明，这件事情等毛泽东来莫斯科再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预备起程至莫斯科与斯大林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修改问题，斯大林就躲着毛泽东。毛泽东第一封给斯大林电报就写说，我这次前往莫斯科就是要谈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你看我带谁来谈比较好，我们要怎么谈？斯大林就不回电。毛

泽东一看斯大林不回应这件事，就接连让周恩来、王稼祥都写了电报给斯大林。毛请王稼祥给斯大林写的电报中说，如果你要谈中苏同盟条约，我就带着周恩来跟你谈；如你不谈，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究竟是我一个人去好呢？还是我跟周恩来一块去好呢？斯大林仍旧不回应。后来弄得没办法，毛泽东只好只身前往。

12月16日晚上一谈，双方各有坚持，会谈过程极不顺利。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去电请毛泽东回国，毛泽东坚持一定要谈出个结果才肯回国，于是便滞留莫斯科，闭门不出。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斯大林料想不到的事情，其一为美国的态度开始明朗，美国之前对于中国内战，是采取撒手不管的政策，你说上海、广州丢失以后，蒋介石为什么还是不想走，在大陆里边转圈子，就是等着美国人最后帮他一把。结果美国人最后也没伸手帮忙，他才不得不跑到台湾去。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开始反省之前的对华政策。美国一直有两种意见，军方支持蒋介石，国务院反对支持。12月29日，双方开会争论。军方高阶将领如麦克阿瑟、约翰逊及布莱德利等人都认为台湾不可再失去，如果台湾沦陷，将会危及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部署。但国务卿艾奇逊认为不对，你应该从政治上看问题，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所以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阻止中国与苏联走在一起，就是要拉拢中共。怎么拉拢，就是把蒋介石出卖了，让中共打台湾，美国不要管。

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接受了国务院的主张。但是，这个消息事先已经透露出来，这使得斯大林开始紧张，美国是否要借此事离间中、苏两国。其二为毛泽东滞留莫斯科不归，又闭门不出，说他每天就是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不久便有传言出现，英国的报纸就报道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后来斯大林就是基于这两件事的影响，同意与毛泽东废除旧约，另外签订新约。但是，斯大林在周恩来等人未到之时，组织了庞大的条约起草委员会。等周恩来等人到了莫斯科，预备要签订新约时，斯大林拿出来的新协议，就中国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核心内容看，仍然是1945年的中苏旧约。

毛泽东一看很不满，就让周恩来重新起草一个新协议，内容包括了收回苏联在东北的各项权利，苏联必须将中东路、大连无偿地还给中国，旅顺港最迟在1952年底也要还给中国等等。斯大林一看气疯了，说毛泽东也太狠了，怎么都全要回去了。但是经过苏联内部两天的讨论之后，1950年1月1日斯大林就答应了毛泽东所议新协议的内容。为什么斯大林接受中国这个条件呢？

原因还是跟美国有关，那就是1月5日杜鲁门发表宣言，1月12日艾奇逊发表演说，明摆着就是挑拨离间。美国人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地区发生战争，那是中国内部的战争，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事明摆着就是告诉毛泽东你要打台湾我不管。毛泽东当时也许还没看到，但斯大林一看就急了，美国这不是在挖我墙脚吗？毛泽东人还没走你就这么说。艾奇逊说得更狠了，中国真正的朋友是美国，你看我们美国什么时候侵略过中国，英法

联军也没我们，现在美国在中国连个租借地都没有，你中国为何会弄到现在这个地步，那都是苏联害的，你看你们的外蒙古和东北大片领土怎么失去的，那全是苏联造成的。

这些言论让斯大林非常生气，当然他也知道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做。在这个时候并不适合跟毛泽东起冲突，所以他只能让步。但是斯大林一让步，将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苏联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这个情形下，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只好搬到更北方的海参崴，或叫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个半不冻港，大家知道到冬天那港口周围都是冰，军舰出去还要靠破冰船在前面引导，这对于苏联来说是极不方便的，更危险的事情是苏联军舰要进入太平洋必须走日本海和对马海峡，必定会受制于日本和韩国。所以苏联的出海口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它的亚洲安全战略就无从谈起，于是斯大林开始找寻新的不冻港，最后他将目标锁定了朝鲜半岛的港口，想用朝鲜的港口来替代旅顺港。

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9月的时候，苏联外交部就给斯大林提过这个建议。当时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外交部所提上来的两三个报告，内容都说朝鲜的港口相当重要，一共有四个港，为仁川港、釜山港、元山港及济州岛，这四个港口如果我们能占两个或一个就够了。但当时苏联跟中国已经签了中苏同盟条约，占了旅顺港，再加上南北朝鲜以38度线为界，这事就没再提起。这时斯大林想起这事，便开始改变态度，支持金日成出兵攻打南朝鲜。而斯大林也利用苏联国防部窃取了美国的橄榄枝作战计划内容，内容为只要南朝鲜遭受攻击，美国展开撤退美侨及军队的行动。

斯大林在同意中国的协议草案后，立即通知苏联大使，表示同意金日成的主张，但要他来莫斯科详谈。1950年4月斯大林便与金日成见面，讨论攻打南朝鲜的问题，在会议中斯大林跟金日成说，这事你得跟毛泽东说一下。因为早在1949年的时候，斯大林跟刘少奇有一个“君子协定”，就是说以后欧洲共产党的事务归苏联管，而亚洲的部分就归中国管理。所以斯大林便要金日成去找毛泽东。5月3日斯大林给毛泽东打了个电报，电报内容说，跟你说一件事，最近金日成到了我这边，我们谈了一些问题，具体谈了什么，容金日成见面禀报。毛泽东接了电报也一头雾水，不知道斯大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后来在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展开会谈，讨论朝鲜战争的问题，两人在会谈过程中并不顺利。金日成说，我刚从莫斯科回来，斯大林已经同意我的计划了。毛泽东接着说，我也刚从莫斯科回来，斯大林没跟我说这件事。金日成又说，你走后我才去的。之后两人便吵了起来，于是暂时休会。当晚11点半，周恩来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说，你马上给斯大林打个电报，内容就是金日成说的事情是否属实，罗申于是连夜发了个电报，把事情转述给斯大林知道。第二天早上，斯大林回了个电报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鉴于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我同意朝鲜同志们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和中

共中央的讨论，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朝鲜的民族解放和统一就要推迟，具体怎么做，你们自己商量吧。

毛泽东接到电报一夜未眠，第二天再跟金日成谈，口气全变了。毛泽东说，金日成同志我并不是不想帮你，我原来想先解放台湾，等我把台湾解放了，接着挥师北上，帮着你打李承晚，这是轻而易举的。当然现在你跟斯大林商量好了，你要打你就先打，等你打完了我再打，你看需要什么东西，要人要枪我都给。金日成接着说，我想要的东西斯大林都给我了，说完便扬长而去，这一去便再无音信。所以毛泽东知道他要打，但他不知道金日成什么时候要打。毛泽东以为金日成怎么也得准备几个月吧。接着毛泽东这边就告诉粟裕加紧进攻台湾的准备，迅速拿出方案。在6月23日，粟裕拿出了进攻台湾的方案，但是后来这个计划已经推迟到了1951年。

中共这边加紧准备，但没想到金日成那头准备得更快，早在3月8日的时候，苏联就开始运送武器了；接着金日成还没到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就给金日成换了装备武器和增加顾问，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而且金日成还把进攻南朝鲜的计划提前了，原来苏联顾问拟定的计划是在7月发动，金日成给提前至6月25日，后来也经过斯大林批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美国的政策就变了，因为艾奇逊的政策前提是分裂中苏，但是现在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已经公布，美国一见无法离间中苏，政策便转向保护台湾，提出了派第七舰队护卫台湾、给国民党军事支持并派驻美军军事代表团来台等等具体做法。

不过，美国又得找个借口，得有法理的基础，证明美国人要管台湾，但如果台湾还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美国就无法介入，因为早先美国已经说过不干涉中国内战了，所以美国需要宣布台湾其实地位未定，得等对日条约签定以后才能给中国，这时如果台湾地位未定，美国就可以出兵台湾了。这些都准备好了，就在这时，6月25日，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介入，就实行了刚刚设计好的政策。这使得苏联和金日成都感到震惊。

7月3日，中共放弃攻打台湾，将粟裕从攻台前线总指挥调任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做好协助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的准备。此时恰好粟裕生病，不能前往，但军队的调配却不受影响，四野的十三兵团紧急调往东北，蓄势待发。但是中共出兵有一条前提，那就是苏联得出动空军，我们才出动陆军，一起跟美国人打这场战争。这是斯大林同意的，一旦北朝鲜受到威胁，中国出陆军，苏联出动空军来掩护。

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一开始相当顺利，仅仅四天便拿下汉城。但是金日成毕竟没经验，拿下汉城以后以为万事大吉，就给斯大林发电报说，现在我已经攻下了汉城，我请苏联顾问团进驻汉城，并准备开庆功宴。斯大林一见电报非常生气说，你只是把敌人赶走，但没有消灭他们，那几十万的南朝鲜军队还在，你不赶快追击，还有时间在这开庆功

宴！金日成听闻之后赶紧率领第一、第二军团沿着东西海岸线赶紧向南追击，但是到了洛东江，这事情就复杂了，因为这时候美国军队开始参与了。金日成想，如果让美国陆军一登陆，再加上南方战线愈短、北方战线愈长及美国飞机轰炸等因素，这战争就很难打下去了。

到了8月中旬，毛泽东建议中国立刻出兵，他跟金日成说，你现在打前面，后面我帮你守，要不然你就回来守，如果美国人从后方登陆，一旦登陆成功，你就前功尽弃了。金日成觉得很有道理，便透过苏联大使跟斯大林反映说，既然美国人能帮助李承晚，为什么中国不能帮助我，现在我想请中国出兵帮我守后方。结果斯大林透过苏联大使知道后便不答复，中间金日成又发了一次电报，斯大林又不答复。当时斯大林可能怎么想，他想占领南朝鲜的港口，如果让中国军队来这里把这场战争打赢了，这个企图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只要金日成有可能把这场战争打赢，他绝对不会让中国人插手，但是他的这个企图又不好明说，所以只好不表态。

一直到了8月底，斯大林见金日成真的急了，他也知道后方很危险，几乎没有防守的力量。大家也知道朝鲜半岛是一个狭长的地形，敌人随时是可以从两边包抄的。这时，斯大林才给金日成回了个电报，电报内容说，革命是会遇到困难的，我们当年遇到的困难可比你还多。在1920年代的时候，有十四个国家干涉俄国的革命，到最后我们都坚持过来了，你再坚持一下就不行吗。金日成一听到斯大林这些话便不敢再说了。

9月15日，麦克阿瑟登陆仁川一举成功。这仁川实在是很难登陆，我去过当地港口考察，那里的海水特别浅，军舰根本就靠不了岸。仁川港一年只涨四次大潮，军舰才能借此靠近附近的岛屿，并换小船登陆，不然等到退潮之时，船只必然搁浅。所以美国战争史书上说，仁川登陆成功的概率是1/5000。这极低的概率让麦克阿瑟给碰上了。美军7万人进攻，朝鲜只有两个营防守。美军成功登陆之后，接着兵分两路，一路包抄洛东江，另一路就包围汉城，把金日成的部队打散了。

9月17日，周恩来又找朝鲜大使说，现在我们出兵还可以帮你防守38度线，但金日成因惧怕莫斯科而不敢答应中国。10天后，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开会决议，向苏联要求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10月1日，斯大林给金日成回信，说明因为跟美国人约好不越过38度线，所以无法出兵，你们可以向中国求援。后来金日成赶紧向北京求援，而这时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的电报也同时来到。2日毛泽东就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回电，内容就说我们答应出兵，日期就定在15日。但是，中共多数领导人不同意，毛泽东的电报就没有发出去。

10月4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出兵的事，并召彭德怀进京。因为这个时候粟裕、林彪两人都病了，毛泽东见两人都不能用，于是便调彭德怀来商议。彭德怀当时晚来半天，当他进入政治局中开会时，觉得气氛不对，平常毛泽东开会都是谈笑风生，大家都畅所欲言，

但那天开会时大家都闷着头、不发一语。彭德怀那时实在不知道是讨论朝鲜战事，以为开会是讨论经济建设问题，要让他去开发大西北，就准备一大堆图纸来准备报告。

当天晚上住北京饭店，9点钟，邓小平来找彭德怀便说：老彭，出大事了，朝鲜发生战争，毛主席要参战，但是大家都反对，明天早上主席在丰泽园召见你，你好好想想。那一夜，彭德怀整个晚上没睡着觉。隔天毛泽东在丰泽园正式召见彭德怀，毛泽东问彭德怀对于朝鲜战争的看法，彭德怀回说如果苏联不管，我们也不要管，但是如果苏联能帮一把，我们就出兵。毛泽东见彭德怀心意跟自己相合便拍手叫好，接着便说斯大林答应出空军，我们出陆军，走！我们到会上去！拉着彭德怀进会场，在会场上彭德怀又是一番慷慨陈词，至此中国出兵的意图已经确定。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10月10日，派周恩来和林彪到黑海找斯大林谈苏联空军和武器装备的问题。后来谈判失败，斯大林虽然给了武器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却要延迟两个月到两个半月才出动。第二天，斯大林与周恩来两人联名给毛泽东发电报，内容为由于准备不足，中、苏两国商量的结果是放弃朝鲜，让金日成到沈阳建立流亡政府，北朝鲜的残余部队撤到吉林整顿，现在立刻组织撤退。毛泽东原本同意两人看法，但心中还在琢磨斯大林的想法，想了一夜，终于明白斯大林还是要借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作用让中国出兵，如果中国不出兵，便会失去斯大林的信任。

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出兵，并发电告知金日成。这时，斯大林已经发电报告知金日成，要他撤退到中国。电报发出后，得知毛泽东又决定出兵了，赶紧再发电报，让他等待中国大军。14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电报，请他与斯大林商议武器装备以贷款形式购买，以及要苏联空军保证出动的时间等问题。15日莫洛托夫转告斯大林的谈话说，武器装备可以半价用贷款形式给中国，苏联空军仍按照两个半月出动，但不会越过鸭绿江。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就懵了，我们在朝鲜作战，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那不就等于跟没出动一样吗。周恩来紧急通报这个情况，便于16日回国了。这个时候，42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悄悄地渡过鸭绿江了。18日，毛泽东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还是决定照原计划出兵。19日，志愿军大部队陆续渡过了鸭绿江。这就是中国军队参战的大致过程。

再说一句苏联的参战。其实，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打起来之后，不到一星期苏联空军就参战了。11月1日，苏联空军不但参战，还越过了鸭绿江，以后还一直延伸到平壤上空，后来形成“米格走廊”，让美军飞机闻风丧胆，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朝鲜战争的空战，在1952年以前，基本上都是由苏联空军打的。到了1952年下半年，中国空军才加入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经过大体上就是如此。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到朝鲜战争爆发，这实际上就是冷战在亚洲起源的问题了。

孙玫： 还有一个问题，那时粟裕是真病还是假病？

沈志华： 粟裕是真病，我看了粟裕的年谱，朝鲜战争还没开始时他就病了，所以他一直是在青岛养病，他在青岛听到消息要他当这个司令。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病重当中，但如果需要他现在出马，立刻可以去。后来毛泽东告诉粟裕说不急，你慢慢养病，将来再说。后来的情况我就没看到了。

孙玫： 是很重的病吗？

沈志华： 高血压、头晕，还有一个什么病，我记不太清楚了。

孙玫： 谢谢。

齐茂吉： 非常感谢沈教授，我们请他来讲一场演讲，事实上他却讲了两场演讲。下次希望还有机会再请到沈教授来跟我们讲其他问题。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沈教授。

（2008年12月8日在台湾中大历史研究所的演讲）

第二讲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李宇锋： 今天，我们高兴地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来给我们分享他的研究苏联历史的学术成果。沈老师是研究苏联历史的专家，多年来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他对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对此进行的研究，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苏联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兴亡过程对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必须进行反思，而反思的前提就是了解真相。

我们最初的设想是请沈老师来解析《联共（布）党史》，正如沈老师在新近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的绪论中所说：“在中苏友好时期，中国人对苏联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一部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延安时期开始，这本书至少影响了中国两三代人，而就我们的阅读范围所及，至今没有看到一篇系统纠正其中谬误的作品。沈老师认为这本书论述的苏联只到1937年为止，他更希望对整个“苏联斯大林道路为什么行不通”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当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更加重要，也十分感兴趣。下面，我们就请沈老师给我们讲课。

沈志华： 原来我们想写一部《〈联共（布）党史〉辨伪》，讲那里面哪些是瞎话，哪些是斯大林的编造，事实是什么，想一对一那样辨析。但就现在看，有些事情很清楚，有些事情还不清楚，档案这块儿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还得做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在中国真正搞苏联史的人很少，你看我《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前言里写的，说实在话我心里非常着急，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跟不上来。我好不容易在全国搜罗的，从博士生到研究生这一批四十岁以下年龄段的人我已找了十几个人，但最后还是让我给涮下去两个，因为实在是提拔不上来。材料非常好，但他就是不会写，俄语他们也不错，但写东西不灵，因为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事。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说苏联解体这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但怎么搞清楚？你得把发生的什么事一点一点都搞清楚，不然你脑子里装的全是假的东西，你得出的结论肯定是有偏差的，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写这个，就是从实证的角度，做专题的东西。一定要先把一个个的问题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谁谁谁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事情要这么简单，那还要我们这些史学家干什么？政治家一拍脑瓜说谁叛变了，我就根据你这个来写就行了——《联共（布）党史》就这么写的。

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的项目，但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苏联解体以后，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学术界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苏联到底为什么解体？到底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但是我觉得前二十年大家是在一直争论，根据都不足，有时对话根本都对不上，基本的事实没有搞清楚就争论，我觉得意义不大。无论你是什么观点，前提是要把事实搞清楚。所以我是从专题研究开始的。苏联史，其实不光是苏联党史，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重构历史，完全得重建，原来脑子里那些东西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是假的，大部分是有偏颇的，或者是有误解的。所以就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我们当时的案例要比这个多。写这本书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有些老同志身体不行，有些年轻人写的东西水平还达不到要求，最后留了这二十八个问题，光稿子修改都费了我八个月的时间。

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研究苏联问题，其实是想理解中国的问题。你想，中国跟着苏联走了那么多年，从孙中山那会儿就开始就要学苏联，到了毛泽东又学苏联，只是到了60年代才跟苏联分道扬镳。但即使是那样，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虽然毛主席说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超过苏联。超过什么？他不过是想在钢产量上超过，在粮食产量上超过，但整个体制没有摆脱苏联那一套。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反而结果是整个党解散了，国家解体了。那么中国呢，因为改革开放走上了另外一条路。造成这两者的区别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回答苏联为什么解体，其实核心是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战”以后中国包括亚洲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像朝鲜、越南，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又有一批亚非拉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它的旗子上打的是社会主义（包括缅甸的奈温，他至少是要用这个概念），其实这里面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人们做出这种选择，也不是领导人拍拍脑袋说——咱们就跟着社会主义走——就可以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欠发达的国家，它想实现民族国家的发展，想实现现代化，如果走原来资本主义发展那条老路那走不通。

恩格斯讲的所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那些条件，到了20世纪，对于后发展、后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什么“三角贸易”，什么发现新大陆，这些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积累资本的条件都不具备了。殖民地到了“二战”以后全独立了——原来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的那些外在的、客观的条件都不存在了，所以想发展资本主义，又处在一个外在压力之下，怎么办？但是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就是苏联在那儿呢，而且当时来讲他发展得还不错，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苏联就很稳定。这个对当时中国人的刺激也很大，所以大家看着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方向，这些从理论上也好，从现实的角度上也好，后发展国家、后发达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

但是这种选择也有两个问题。就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第一个大的问题是理论上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跟着苏联走的，其实都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咱们说了半天社会主义，真正构成社会主义实体的其实就是苏联，苏联是什么道路呢？其实就是“斯大林模式”。所以我们现在说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也不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设想的那个，而是斯大林在30年代创立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要搞清楚，如果这个搞不清楚大家在对话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他说社会主义不好，我说社会主义好，请问，咱们说的是哪个社会主义？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非常抽象，它没到那个地步，还在搞巴黎公社呢；列宁说的比较具体，像《国家与革命》，讲得很详细，像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公有制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已经临近这个门槛了，他要告诉社会，告诉党，告诉人民，将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有几条设想，但他这个设想历史证明是不能成立的。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一直到1921年，苏俄搞的所有的试验几乎都失败了。国有化、货币改革，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其实就是粮食征集制），包括搞公社。俄国农业三种方式，一种是有点像中国的个体户，它叫独立农户，一个是集体农庄，当时叫“劳动组合”，再一个就是公社，那会儿列宁最初成立的就是公社，因为公社最符合共产主义那种理想，大家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劳动，这就是公社。但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失败了。

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喀琅施塔得一直都说是反革命暴动，喀琅施塔得水兵不满意苏维埃政权，举行了暴动，最后给镇压了，但实际上喀琅施塔得那些水兵都出身农民。他们为什么起义？就因为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这些政策，你把人家吃的全都收走了，全搞“一大二公”那些东西。再加上13个省的农民暴动。所以列宁比较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初要建立这个政权说也是为了农民，现在起来反对的全都是农民，不是原来的贵族，不是白俄、哥萨克。水兵是农民和工人，在城市里是工人。所以这个时候列宁才感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行了，这是国内政策的实践。

国际政策更失败了。进军华沙，策动匈牙利革命，德国水兵起义，一个连一个的失败，他为什么要这样策动呢？他脑子里原来想的就是世界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一定是在欧洲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所以列宁就想，既然同时发生就得积极推动，大家一块儿进入社会主义嘛，所以就策动起义，攻打波兰等等，最后全失败了。所以，无论国内政策还是国际政策按照原来的设想，包括列宁自己的设想都是空想，所以他才决定搞“新经济政策”。

当时就觉得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原来那个模式走，原来那个模式在历史上我们把它归纳叫“军事共产主义”。它是带有战争或者叫准战争的状态下实施的一些共产主义的措施，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有些做法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说征粮食什么的，不征粮食要去打仗了怎么办？但是，不能把它作为平常时期、和平时期的办法用一种国家的政策永久

地实行下去，那谁受得了啊？所以战争刚一结束农民就起来暴动，原来布尔什维克来的时候说是帮助农民的，是反对地主的，现在地主都打跑了你还对农民这么苛捐杂税，农民当然不干了。

所以到1921、1922、1923年的时候列宁认识到一点，就是原来那套政策是不行的，要改。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材料看，包括列宁本人和整个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高层都认为这是个临时性措施，是暂时的退却。没办法，遇到了困难，原来这一套不行。货币贬值都成了天文数字了，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列宁决定放弃军事共产主义这一套做法，开始搞“新经济政策”。所以，我觉得“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最重要的，从列宁包括苏俄党，都认为按照原来的那套理论的设计搞是行不通的，所以它就想到改，比如从农村开始。刚才我讲的那三种形式，它不但解散了公社，也不鼓励继续劳动组合，而是鼓励独立农户，俄文叫xytop，xytop就跟咱们的个体户意思差不多。工业上允许商业的存在（内战时期是不允许商业存在的）。农业也开始搞合同制了，不搞征集制了。

到了1923年列宁临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他最后几篇文章，我觉得列宁是有些醒悟），他觉得这不是临时性的政策，也不是退却，觉得就应该这么做了。所以他讲合作制，是讲这是将来农业发展的一条道路，而不是临时性的措施，将来还是要走向合作制，但这条道路是漫长的，不是说你想搞一下子就搞起来的。他这里讲到农村公社问题、生产问题等等。在工业部门其实也在开始搞，开始考虑把商业市场不是作为义务临时、暂时的接受，而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经济形态保留下来。我们讲的社会主义的这个概念这个首先要清楚，苏联人做的这个事情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已经改变了，而这个改变到了1923年的时候它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列宁认为是暂时的手段，临时的、退却的，已经开始考虑把它作为一种长期的经济制度、长期的政策执行，可惜列宁去世的比较早。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上来，这个我在这里没有细讲，其实郑异凡研究得特别好，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就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怎么上台的，就是从1924年到1929年他怎么一个一个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一派一派打倒。利用这一派打另一派，然后再利用另一派打这一派，最后布哈林被打倒了。这部分的内部斗争我没有写太多，也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讲斯大林个人的那种权术、政治经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对手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永远斗不过一个职业政治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愿意耍这种手段，但斯大林就可以耍阴谋手段。

今天跟这个好说咱们两个把他给搞掉，把他弄掉以后跟着再跟别人弄你。托洛茨基是对他威胁最大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来对付托洛茨基。知识分子本身就有文人相轻、互相之间观点不同等特点，正好他就利用这些来把他弄掉，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搞掉以后，他又反过来利用托洛茨基的一些理论。因为那些人都是比

较传统的，知识分子比较追求理论的完整性，比较要求完美。所以你现在解释马克思这套东西，你现在用“新经济政策”，他觉得理论上逻辑的扣解不开，这个问题一直到赫鲁晓夫，一直到我们现在都没解开。

你怎么解释呢？斯大林他就不管这个，怎么说他都对，但是知识分子就不行，他非得把这扣给解明白了。斯大林就利用这个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全部打掉。但是他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就是消灭市场经济，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执行确实遇到了好多问题。它遇到的问题其实咱们中国在70年代后期改革到整个80年代全都遇到了，一样都不少，什么“双轨制”啊，什么市场跟计划的冲突矛盾了，到底是以国家指令为主还是以市场化为主了，还有对农民、个体户到底怎么看，等等。

总而言之，那时中国叫“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新经济政策”那会儿就是这样。政策一放就乱，一看乱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放了又乱。比如商品荒的问题，市场没调理好就出现问题，出现商品荒了，然后就为了国家利益加紧去干预，那么一干预农民就不上交了，压低价格。总而言之，苏俄那时出现的所有困难其实中国人最有体会，我在中国七八十年代看到那些现象，觉得与苏联“新经济政策”那会儿太像了。

斯大林干脆全部消除，不搞了。还搞什么“新经济政策”？市场那么乱，全部取消。所以从他搞全盘集体化开始，那会儿他在政治上已经独掌大权了，到1929年的时候该打倒的也都全打下去了，布哈林也臣服了，这时候他开始全面推行他那一套东西。其实他的思路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样的，他后来所搞的基本的理论就是“贡赋”理论。他大概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社会主义要发展没有资金，没有原始积累——就是刚才我说那些，资本主义那些原始积累在俄国都不可能，那怎么办？那只能从内部来积累资金，内部积累资金的来源就是农业，因为大量劳动力都是农民啊。

他还有一个前提，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当中随时都可能被灭亡，那就得发展军火工业，就得发展国防。发展国防就得靠资金投入，资金投入哪儿来，就是农业。这套理论其实就是克尔日扎诺夫的理论，克尔日扎诺夫就是托洛茨基的铁杆经济学家，等于说他把人家全打垮，回过头他又把人家的那理论捡回来了，全盘集体化和国有化、工业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搞起来的。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斯大林体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体制。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背景下构建的社会主义，后来人们说社会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不好，其实说的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说的都是斯大林搞的这一套，所以我们称它为“斯大林模式”。现在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分什么斯大林、马克思模式啊？当然要分了，怎么能不分呢？你要是讲事实的话，你把他们的想法、理论都拿出来一对比就能看出来，斯大林时代构成马克思社会主义

理论的条件都不存在了，哪有世界革命啊，哪有先进国家同时革命呢？都没有。就是一个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跟马克思的前提都不一样。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个模式呢，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他不要求理论上的逻辑和合理，他只要求现实，能用就行。这套思路在当时确实能用，在当时很能服人。你面对资本主义怎么办？你要想和它斗争，你就得积累，搞积累没钱，就得靠农业，农业你就得搞“贡赋”理论，你要想控制国家资源，你就得搞计划经济，一切都顺理成章。也许在当时情况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它当时确实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当中。（但是有没有战争的危险，这个其实可以讨论，我不认为当时确有战争的危险。斯大林当时有这种担心你也不能说你不能这样想，换个人也说不定这样想，毕竟十四国干预刚刚结束嘛，是不是？）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这里排除了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那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到时咱们再讨论。

先说经济体制。实际上到了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苏联确实取得了工业上很大的成绩，这个不假。但问题在于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第一，结构不合理；第二，代价太大；第三，激起民怨。其实到了“二战”前的1939年苏联的社会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紧张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不光是经济，经济只是一个方面，人民生活一直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有点像中国“文革”前的情况，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十几年了，二三十年了，生活水平没有太大改变，中国其实比它还好点。苏联人更倒霉，我看到一个材料，是苏联人抱怨说老让我们做贡献，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一天到晚为革命加紧工作，加紧生产，我马上要死了，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还老做贡献呢。这反映出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低下。再一个，让社会处于非常恐怖状态的就是“大清洗”。

“大清洗”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争，现在可能有人说：“不对，当时杀了不是80万人，是60万人。”你这少了20万人他就做对了吗？我真奇怪了，现在的学者争的是到底是62万人还是68万人，争来争去，你搞清楚最好，搞不清楚也没关系。有些事你很难准确地搞清楚，事情不是说他多8万人、少10万人就能改变它的性质，当时（苏联）的社会是这么一个人心惶惶的状态，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救了苏联。

为什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救了苏联呢，我觉得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方面就是说战争爆发了以后，苏联把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了，民族都要灭亡了，你还计较多吃一口饭、少吃一口饭的问题吗？就像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救亡是第一位的。苏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社会无论从心理上，从社会生活水平上，百姓的忍耐程度，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恰恰战争来了。战争一来就要动员，民族主义成为动员民众的一把钥匙，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使人们迷信了这种体制，恰恰是战争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它本来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战时体制嘛。正好要打仗了，所以这个体制不用改变就直接移入到战争的状态下，很实用。英国丘吉尔是把英国的经济体制临时改变成战时动员体制，他需要做很多工作，做大量体制性的改变。苏联不需要这个过程，是战争外在形势配合它的内在的结构，就使得人们以为这个体制还不错，很有效用的，要不然战争怎么能打赢？后来斯大林在1946年3月9日讲话就是这种观点，说："战争证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先进的，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战争能打赢根本不是靠那个体制，人家英国战时都得搞这个，对不对？相对的集中资源，由国家说这个资源怎么用，战争可不是就这样吗？但战争结束以后你还能这么搞吗？而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呢。所以，斯大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就是从政治的角度，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原来资本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改变了。怎么改变了呢？就因为斯大林，社会主义跟另一个资本主义两人结合了去打击其他的资本主义。"二战"说明了一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政治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真正给这个世界造成威胁的未必是布尔什维克，可能那种地缘政治更重要。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像日本、意大利、德国，这些都是后起的，要不就是战败了，像德国，它忍受不了凡尔赛体系的压迫和制约，就把民族主义给煽动起来了。而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它需要一个发展的空间。真正造成这个世界动乱、造成战争的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那会儿也没有说想要解放全人类啊，到处发动战争啊，所以他们才能够有这种结合。斯大林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

我认为到了斯大林的时候，意识形态对共产党来说本身就有两重性、两个层面：一个是信仰的层面，一个是工具的层面。所谓信仰，大家真诚地相信，包括宗教也是这样，他真正的就是信仰，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部分共产党人他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虽然他不太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但是党告诉他共产主义是什么，他真的去信仰，这样的是有很多人。但在高层，在领导层不是这样。苏联被整下去的全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搞政治不行，因为他有一个道德底线，他需要理论上的完美，但是职业政治家不管这个，斯大林是个典型的政治家，他现实。什么能用，他就用什么，手段无所谓，主要是能用，主要看结果。所以，斯大林至少到了1936、1937年的时候宣布社会主义成功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他心里已经从信仰的层面降低到工具性层面了，他就是拿这个当牌子而已，要动员周围人都来帮助他，那时共产国际一呼百应。当然钱也都是他出的。你甭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英国，还是哪儿，这钱都是苏联出的，所以他们服从苏联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他们还有了合法性——那就是共产党。共产党都信奉国际主义，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最典型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二战"前他处理欧洲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共产国际时。

当时威胁到苏联安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希特勒，当时苏联觉得

希特勒的兴起对他们的确是一个威胁，特别是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时，但同时从意识形态上和苏联直接对立的是英、法，因为英、法曾经武装干涉苏维埃。结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两线作战。他这边是跟希特勒谈，那边他是跟英、法谈，然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就是他的一个外交工具。

从1935年到1938年的时候，共产国际下达指示给欧洲各国共产党，说什么呢？说法西斯德国是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民主的一面、进步的一面，所以你们各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是反对政府而是要支持政府、反对法西斯、反对德国，这个像英国、法国、西班牙各国共产党马上就宣传起来，写文章支持等等。因为那会儿他在跟英、法谈《集体安全条约》，结果谈不拢，双方谁都不信任谁，这条件也谈不下来。同时莫洛托夫跟里宾特洛甫在秘密交涉，就是给希特勒提出个条件，说你能不能保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告诉希特勒，苏联的安全底线在西部就是波兰，在中部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定要掌握在苏联自己手里，再一个，我要占芬兰一块地，当然是交换，因为芬兰离列宁格勒（圣彼得堡）非常近，结果希特勒都答应了。这样情况下跟英、法还谈什么呀？甭跟他们谈了，跟希特勒联手，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1939年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一签，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马上就给各国共产党下指示，说资产阶级政府不可相信，说法西斯德国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所以你们都要起来反政府，必须推翻各国的政府来支持苏联。这时各国共产党又发文章反政府，所以法国多列士后来被通缉了。大战在即反政府，反对跟希特勒作战，你这不是叛国吗？所以弄得各国共产党特别头疼，今儿让我这么做，明儿让我那么做，完全是苏联围绕着它的利益下指示。苏联和德国共同打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起因，我认为是在这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是不错，但他们跟苏联就没矛盾吗？跟苏联的矛盾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都不是，就是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利益，只不过是复杂的多元的。在处理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是因为苏联跟德国签订了这个条约，德国才敢扩张。不错，德国扩张是从苏台德问题、捷克问题、奥地利问题，是一点点地在扩张，但是，到了波兰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底线了，所以英、法说，要再打过来就要出手了。如果苏联坚持不跟希特勒做这个交易的话，其实他不敢打，他怎么敢打呀，他一打过来势必形成一战时期的两线作战。就是因为苏联跟希特勒签订了秘密条约，所以苏联先宣布波兰纳入苏联的版图，德国不满这个，然后两国夹击波兰，把波兰给吞并了。

所以那个时候斯大林非常得意，他认为是正确的行动。跟着1940年他又打芬兰，因为德国也不支持芬兰，芬兰孤军奋战，最后战败了，本来应该交换的土地结果让苏联白得了。那个时候斯大林非常得意，希特勒也很满意，因为这块儿我就放心了，他就专心去跟英、法打了，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但是，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野心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当然希特勒有点毛病，我觉得是他神智有点不太

清醒造成的，你英国还没打下来呢你就打苏联？他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其实他再晚点能够把英国给拿下，这个时候或许他真的就成功了。结果没拿下西线他又打东面。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一进攻，第三国际又变了，苏联马上给各国共产党下达指示，说最坏的还是德国，还是法西斯，说你们资产阶级政府还是可以支持。结果又翻过来，把所有共产党在欧洲弄得一点信誉都没有，名誉扫地，说你们共产党还有点主心骨没有？为什么后来一直就说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就因为这个。苏联说什么它就跟着说什么，这个时候所谓共产主义的信仰，所谓世界共产革命都给降低到苏联的一个工具的层次上。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其实又出现了一次机会。刚才我说的这些客观上提供了基础，就是可以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从地缘政治，大国关系来处理国际问题。“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其他国家都衰落了，就美国独大，而苏联也在战后显示出它的力量，到了1945年的时候美苏合作就成了一种趋势，斯大林其实在这点上看得非常清楚。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研究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是有深刻含意的，他不早不晚。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共产国际这个名声不好，不愿意援助你，你早就该解散了，苏德战争一爆发就该解散了。那会儿斯大林没解散，一直把它拖到1943年。

1943年5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了，战争的局势已经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时候，解散共产国际，其实他考虑的就是战后的安排。他知道共产国际是个障碍，是他跟西方沟通的一个障碍。他解散共产国际特别突然，所有人都没想到，而且非常着急，让季米特洛夫几天拿出个方案，立即解散。就是因为这时候丘吉尔在跟罗斯福在谈战后，在谈整个战争后期的安排和世界格局的问题。他要给西方人一个信号，就是我不代表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可以不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斯大林真的是想放弃世界革命，公开的放弃，这个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确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战后苏联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避开原来革命战争时代的那些责任、那些任务和那些做法，这个前提是存在的。美国也这么想，斯大林也这么想。

再有一个就是苏联当时的状态。苏联当时是怎么个状态？就是人们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失望，我看了大量的材料，苏联原来都有审查制度，就是你写信给谁，具体技术的细节我不知道，反正当时能把信给你弄出来，然后再给你封进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苏联档案解密以后，现在把当时邮检过的信件全部作为档案。就是苏联红军打到欧洲以后，几百万军人啊，在他们写的信件里面反映出：人们突然发现，战败的资本主义怎么比战胜的社会主义还富裕得多呢？有人到匈牙利一个市民家去看人家的生活，人家家里有壁挂有地毯有沙发什么都有，说我们奋斗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没见过这玩意，什么抽水马桶，都比不上他们。你看这些普通士兵信里写的特别有意思。它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反映的是原来你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的时候，宣传、灌输社会主义无比优越

啦，说咱们过得最好啦——其他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兴许还管用，但真的有一天突然窗户打开了，人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会造成一种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看苏联的这些信件反映的是，士兵们从整个精神上它受不了：难道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这么一个小国吗？这么大的一个苏联生活水平还不如匈牙利？我们宣扬的都是斯大林怎么伟大、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当时在整个苏联人民心里造成的一种动荡。特别是这几百万人一回国，不是去农村就是回工厂，他们见过的情况像瘟疫一样就传开了。我看了根据这些情况写的汇报材料，苏联有监督员，他也是工人中间的一个，但是他负责给党写小报告，反映这些情况。

现在他们这些材料都公布了，各式各样的小报告，谁谁说了什么，谁谁想什么，就能反映出从1945年到1946年整个苏联社会的情绪。其实这些情绪构成了一个改革的社会基础，刚才我说的那些国际环境构成了一个改革的外部基础。而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体制改革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人在乎它，不像赫鲁晓夫时期。如果那个时候斯大林能够看准这一点，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改革，苏联会是另一个结果，就是很有可能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来。但是，这个机会并没有抓住。

没有成功的原因我正在写，我就写整个战后这一段，题目是“冷战与重建：斯大林的最后年代（1945—1953）”。因为这里发生了好多事情，但是以前几乎就没有这么一本书，就是讲战后这一段，斯大林最后这八年，到底是怎么搞的。我觉得从大体的轮廓的想法，从苏联本身的这个角度讲，第一，斯大林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要改变这个体制。他对外有这个意识了，但就内部来讲他还没有认识到原来那个体制其实并不适合苏联的正常发展，他误认为挺好，而且“二战”打胜了。我觉得这是他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目的逼迫他必须这么做，为什么？对权力的那种依恋，对权力的那种追求，因为只有这种体制他可以把各个方面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特别是对意识形态。所以我正在写的，材料全集中这上面了，我觉得这是斯大林本身的一个局限。

但还有一个就是外部的原因，主要是冷战爆发。这里面很复杂，在我看来美国人现在的观点都错了，美国的一个主流学派认为冷战是斯大林挑起来的，其实是错的。冷战不是斯大林挑起的，斯大林曾经千方百计想避开它，因为刚才我讲的那个情况你可以看出来，斯大林非常现实，他知道苏联实力不行，没法跟美国竞争，所以尽量保持低调，但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又不希望丧失。特别是，斯大林有一个错误的做法，他总想给别人一个感觉，我非常强大、谁都不怕的那种架势。比如在伊朗问题上，比如在土耳其的问题上，都是这么表现的，其实他是外强中干，虚张声势。但是他那样就把人家给吓着了，西方人觉得这苏联不得了，真的要扩张，其实不是，他就是吓唬吓唬西方。再加上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等等，这就造成了冷战的爆发。冷战的兴起也逼迫斯大林又回

到原来的老路上，因为他不得不发展军备、原子弹啊。当然还有一个客观自然的原因，就是1946年夏天到1947年发生的大饥荒，就是旱灾。我想是种种原因吧，天灾人祸，总之把苏联走向改革的路给堵死了。

到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又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粮食生产已经低于1913年的时候，住房是一个人四平方米。莫斯科人都没房子住，比中国那会儿还惨。中国那时候我记得结婚房间不够住，还拉一个小帘，一家人老头老太太小孩住这边，儿子小媳妇住那边。社会主义搞成这个地步，再加上斯大林晚年时严重的疑心病，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弄得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没有一个不心惊胆战，所以这造成一种什么局面？

3月1日早晨斯大林刚一休克，这帮人心里高兴啊。（李宇锋：人家不是说5日吗？）他3月1日休克后就一直没醒过来，5日他是死了。当然斯大林死之谜现还在争论，到底是下毒，还是什么，但我看了这么多材料我认为不可能下毒，没有人能给斯大林下毒。但是有一条，不给他治病，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他是在上午10点被发现的，他是28日晚上喝酒喝多了，一个人睡，第二天早上10点——他一般是早上10点起——拉那个铃，没反应，大家一想，可能今天他要多睡会儿，但到了11点再拉那个铃，还没反应，这保姆就通知了警卫队，警卫队就通知了政治局，然后他们过来一看斯大林已经休克了。中午的时候政治局委员都来了，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四个人围着他转了一圈，谁也没说话，走了——你倒是赶快叫医生过来治啊，结果谁也没说话走了。

下午3点医生才来。反正每天都有记录，这个档案现在都有。到了3月5日这帮人实在是绷不住了，最后就决定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改组苏联领导层，就把苏共十九大斯大林建立的系统全部打乱，重新回到原来那个体制。莫洛托夫又回到外交部，贝利亚又重掌安全部和内务部，驻外大使也换了，整个全都换了，政治局常委11个人，斯大林排最后，那会儿斯大林没死呢——没死，就在旁边那屋躺着呢。他们就在这屋开会，等不及了。当时最怕的就是斯大林再睁眼，你说要是再睁眼这帮人怎么办，好在等他们开完会，说想过去再看一眼，9点钟，斯大林闭眼了。

所以，要把斯大林这套东西搬掉，其实是大势所趋，不是说赫鲁晓夫想怎么怎么样，大家都怕了，老百姓也觉得这个制度不行了。它确实有问题。我们从现在看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这几年当中批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不是苏共二十大，只不过苏共二十大把这推向了一个极端，就是把话挑明了，其实暗地里的做法都已有了。贝利亚死的时候（贝利亚是1953年底被枪毙的），苏共就通知高岗——各国都派一个人——到苏联去听取关于贝利亚案件的情况通报。其中莫洛托夫有个讲话，讲到说贝利亚的问题不光都是他的问题，跟斯大林有很大的关系。当然通报是很小范围内，这其实说明在那个时候，包括莫洛托夫在内，莫洛托夫其实是最保守的一个人，他都提出这

种看法，只不过因为当时苏联党内的权力斗争，贝利亚、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他们之间的争斗，没有精力把这个事情做开。

一直到1955年马林科夫下台，赫鲁晓夫全权掌握了苏联的政权以后，马上开始调查“大清洗”案件，制定新的经济方针。所以苏共二十大不是偶然的，是整个苏联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新的领导人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思路，要改革才能改变苏联的这种外强中干的状况。对外是显得很厉害，原子弹也有了，中苏同盟又签订了协议，可是到了1953年苏联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了？吃没有吃喝没有喝，政治空气又紧张。赫鲁晓夫是政治局常委啊，每天在家里心惊胆战，就怕电话铃响，说电话铃一响他都哆嗦。斯大林来电话，斯大林到了1952年10月以后已经不再露面了，他想见谁，完全听他电话召唤，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晚上10点到凌晨3点在他的别墅里决定的。这个时候，包括莫洛托夫，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在家等电话，电话铃一响，他心里特矛盾——叫他去吧，说明这圈子里还有他，不叫他去肯定就给排除了，但是叫他过去吧，搞不好明天早上就回不来了——你想都到了这种程度，谁受得了啊？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想搞改革，从政治上要民主，批判个人崇拜，从经济上重新安排工农业生产比例，提高生产技术成分，调整投资比例等等，这些做法都不是偶然的，从1953到1956年这几年之间逐步逐步在向好的发展。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遇到最大的、致命的打击，就是中国。以前没有外在的因素，如果仅仅是苏联党内矛盾的话，其实我认为赫鲁晓夫能克服，因为苏联党在政治局里保守派是少数。因为像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这些元老派里面都是保守的，其实赫鲁晓夫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中央委员里面提拔的都是年轻的。年轻的都是改革派，像苏斯洛夫，搞意识形态的；像柯西金，都是从小地方提拔上来的。一帮年轻的在中央委员里面占绝大多数，他靠这个来制约政治局，这也就是1957年元老们想政变没成功的原因，否则的话赫鲁晓夫早给弄死了。1957年，他一是靠军队，二是靠中央委员包围克里姆林宫才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给打下去了。所以单就苏联党内政治斗争的话，我觉得赫鲁晓夫应该是占上风的，但是中国这个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就是1958年以后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一步一步把他推向了绝路，这个过程就很复杂了。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就是要详细地写在整个赫鲁晓夫执政过程当中中国给他施加的压力。

李宇锋： 请您简单说一下线索。

沈志华： 苏共二十大的时候和中共八大的时候双方还一致，因为你可以看毛泽东写的《论十大关系》，你把毛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做个对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有些语言都是一样的——当然也不说是毛泽东照搬的，因为毛泽东调查是在苏共二十大报告前，但成文是在苏共二十大后，那个时候毛泽东想到的一些问

题，和赫鲁晓夫想到的问题比较类似，所以才有八大那个《论十大关系》。那时候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其实双方都是一致的，他背后有一些分歧的因素，也没有表露出来。双方主要分歧之一是对斯大林的看法，再一个就是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讲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别的方面都相一致，你看政治上苏联反对搞个人崇拜，中国不提毛泽东思想，这都是对应的。

但是，到了什么时候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呢，就是1957年底，1957年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57年底其实形势大好。（李宇峰：1956年吧？）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说中苏分歧是从1956年开始，从苏共二十大，其实完全错误，那是一个神话，是一个误会，是个陷阱。我只讲一点，就是1957年的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那是个什么协议？那是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和核武器样品的一个协定，这种援助在全世界都没有过。什么人能把核武器的技术给其他国家？只有苏联，所以1957年中苏关系已经到了顶点了。

还有一点，中国提出要跟苏联建立联合国防办公室。不是中国没有参加“华约”吗，苏联老想让参加“华约”，毛泽东那会儿说，算了不参加了。但是很多事你得求人啊，比如你想搞核武器，没有苏联成吗？苏联答应了，中国也觉得双方越来越近了。联合国防办公室十大任务，所有的情报、资料、技术、训练，包括武器的制式要全部统一。就是你这个军队随便调到哪儿，拿谁的炮弹都能用，武器都是通用的，就达成这么个合作协定。所以其实1957年底、1958年初中苏关系已经达到了最顶峰，但就这时候出事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形势太好了，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东风压倒西风”。这个大家都承认。包括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赫鲁晓夫也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力量比资本主义力量强了，但是应该怎么办呢？赫鲁晓夫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力量，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说你比我强可能会打我，现在我比你强你还会打我吗？他是这么个逻辑。所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力量，那么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基础不就更牢了吗？我们跟资本主义谈判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谈判我有资本——我比你强大啊。

所以赫鲁晓夫就开始积极地搞美苏缓和，一会请尼克松到苏联来，一会儿他到美国去，他认为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既然我们比敌人强大了你还跟他谈什么呀？直接打败他不就完了吗？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原来我们弱，我们不如人家，咱们跟人家和谈，跟人家搞和平共处，现在我比他们强了我还跟他共处什么，消灭他就完了——所以现在需要的是掀起世界革命，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然后大家一努力就把帝国主义消灭了。

就是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在责任就更大了，因为苏联怕美国我不怕，但我又没有苏联的力量强大，因为苏联毕竟那么

多年了。那么怎么办呢？搞“大跃进”。通过“大跃进”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再搞上去，那就没得讲了，苏联就不在话下。其实“大炼钢铁”“大跃进”与其说是超英赶美，不如说根本的目的是要超过苏联。我专门写了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中国为什么要超过苏联？他在莫斯科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讲：“中国是个政治大国。”那当然，中国是政治大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苏共中央拿中国共产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小册子，印发100万册作为全党学习文件。你想想哪儿有这种事？以前都是中国学苏联，学苏联斯大林什么讲话，作为中共的文件，苏共什么时候拿别的党的文件作为他的全党的学习文件，只有中国。（李宇峰：那是哪一年呀？）是1956、1957年。

“一论”只印了20万册，但到“二论”的时候印了100万册。《真理报》一抢而空，中国影响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苏联人自己都说，苏联以后不要再提以苏联为首了，应该说“中苏为首”。包括苏联党内都说，毛泽东同志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不过就是个种玉米的。是啊，一天到晚他都说种老玉米，以为他是搞农业出身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那种政治威望确实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没的说，包括很多像哥穆尔卡啊，苏共的领导人等，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又有风度，又能说又能想，处理事又稳重，哪像赫鲁晓夫毛毛糙糙的，有几件事他处理好了？

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问题，都是毛泽东出面给他解决的、解围的。所以毛泽东就有这么种心态，中国政治上是大国，人口上是大国，但你经济上超不过人家，最终说话还是没有分量啊。所以他要搞“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人民公社，憋着劲的要把经济搞上去。那么这样就到了1958、195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到1960年的时候到这个事情发展什么程度？

1959年10月，他们吵了一架，在北京，非常凶，甚至都到了指着鼻子骂的程度。那次把赫鲁晓夫气坏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就三个人，你们十个人围攻我们。你看那会议记录特别有意思，刘少奇一句，周恩来一句，林彪一句，这个一句那个一句的，弄得赫鲁晓夫不知跟谁说了。陈毅说话比较冲，给赫鲁晓夫抓住了，说：“陈毅，你太狂了你！你就是个元帅，我是总书记啊！”到了这种时候领导人之间就撕破脸皮了。回去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了政治局会议，苏联开了个中央全会，大家讨论怎么办。双方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就说中苏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不能破坏。所以必须要维持中苏关系良好状态。前提是中共认为，苏联的路线错误，必须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是团结在正确路线上；苏联也认为是中国的路线错误，而这个路线错误主要是毛泽东本人造成的，是因为他的急功近利、骄傲自满造成的。苏斯洛夫的报告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1960年大家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邓小平主张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写几篇文章，毛泽东一听说好，好主意；苏联也写。中国和苏联就开始在报纸上各自表述，马克思主义理

论各自表述。然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也是各自表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要说理论争论，苏联马上就矮了半截，为什么呢？因为马列主义原本就是革命和战争年代的产物，而中共认为现在还继续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所以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是它的原义，运用的是它的原义。比如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等等。

所有这些，说得是振振有词，马克思就是这么说的，哪一卷哪一页。苏联就非常的尴尬。因为苏联他想说的这些，马列主义经典里面没有。但是，他又不敢说我这个不是马克思主义，他还得说我这个也是马克思主义，他就老去找点边缘的词句来解释。那让中国一驳，你想都是搞理论搞了这么多年的人，中国一下就抓住他们的软肋了，结果弄得苏联是非常的尴尬。特别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一辩论，中国这边激昂慷慨，振振有词，那边就理屈词穷，对不上话。所以问题就是，要不然你就说我这个已经超越马克思主义，他又不敢讲；说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修正，那更不敢讲了，本来就骂你修正主义了，他哪敢承认这个。

所以这个理论上的对垒苏联从根儿上就站不住，再加上赫鲁晓夫这个人头脑又发热，回去生闷气，说也说不过人家，死说活说毛泽东他就不承认他是错的。明摆着就是中国的问题，你说你现在搞什么共产主义嘛，你能搞共产主义吗？但是说不过毛泽东呀，就采取了意识形态以外的办法——撤出苏联专家。没想到，他太不了解毛泽东这个人了！苏联撤专家以后，毛泽东在北戴河说了句什么话？毛泽东当时在北戴河开会苏联突然就通知撤走全部专家，毛泽东一听："好啊，太好了！他不就觉得我欠他的债嘛，撤走债就一笔勾销！"这真是毛泽东的心情，他不愿意欠苏联的债，没有吧又不行，可是老是需要别人的帮助也不行。一撤专家他非常高兴，过两个月赫鲁晓夫想明白了，想缓和，提出把专家送回来，毛泽东说不要了，别来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是越来越看不起赫鲁晓夫了，你看他说的那个话，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幼稚，马列主义没学好，不懂辩证法，很容易上当受骗，他还去和美国谈判，不就是上当受骗嘛，他没这个资本，没这个本事；对中国一点不了解，听风就是雨，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以为真，照他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一定倒台。还真是，没到八年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苏联的改革是很不顺的，他真正开始做实际上是和中国闹翻了以后，1962年他才开始引进市场经济，叫"利别尔曼建议"、"利润挂帅"这些等等，开始有这个苗头，原来的苏共二十大的改革方针完全是在计划体制内，这个很像中国最开始的计划内改革，因为中国也是一步步走的，先是在体制内，计划内改革，然后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然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步一步，最后才到了现在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正好就处在双方进行理论辩论的时候，这一下就让中国抓住把柄了：马克思主义有哪一条要搞商品经济？你这个就是修正主义嘛！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看过有本书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里面举的例子全是这个：什么苏联的自留地呀，自己背着商品的小商贩（背小口袋者）呀，这全作为资本主义现象，就跟咱们“文革”时讲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一样。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外部的压力，而这种外部的压力和苏联党内的保守力量一结合，赫鲁晓夫下台了。所以，赫鲁晓夫下台了，虽然柯西金试图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几年，根本就搞不下去，因为政治上得不到支持。柯西金是很想搞改革的一个人，可惜是孤掌难鸣，所以赫鲁晓夫想要改革，而且是刚起步就中断了，而这个中断和这个中苏分裂，和中国当时比较激进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批判修正主义。

为什么赫鲁晓夫没走到今天中国这一步？一个是党内有人反对，一个是中国在外边骂他是修正主义，他怎么往前走？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前提基础就不一样，这个和毛泽东有关系，毛泽东从来就不喜欢国家计委他们这一套四平八稳地按计划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就没有建立起来，跟苏联把计划经济法律化凝固化的那种状态根本就没法比。苏联一个计划指标下来那就是法律，完不成要进监狱。第二，最主要的原因，大家回过头来想，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要想改变，如果上面没有一个人，这个人有资历，说话有人听，能镇得住的话，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在党内的资历不够，他说话没人听。不是没人听呀，是人家敢起来反对。中国要不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传统力量和理念上来讲，人们一直觉得搞计划经济，搞公有制是正常的。我就是这么做，你说不出我什么来，但是你要是稍微搞点商品啊、市场啊，就总觉得是个把柄，这就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误区造成的。

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干的时候，心里觉得是干了好事，又不敢和别人讲，真的是心虚呀。真的是修正马列主义，但是又不敢说，又不敢承认，苏联共产党很大的毛病就在这里，自己陷入了自己构造的虚假的理论外壳里。其实怕什么呢？我觉得邓小平关键是他有这个资历呀，他在党内有这个威望啊，要不是他，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你再看看别的国家或地区其实也是这样，台湾地区要不是蒋经国改革，也不会有现在的政党多元。苏联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包括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个资历，在这样一种体制内，领导人如果说话不算数，人家想反对就反对是做不成大事的。

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来讲，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已经走上绝路，再加上勃列日涅夫那么长寿，在位18年。所以到了他死的时候，其实苏共已经病入膏肓了。问题不是没有看到，你像安德罗波夫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太老了，精力不行了，上台一年多就去世了，跟着契尔年科也是一年。戈尔巴乔夫是从苏共二十大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接受赫鲁晓夫那套东西，接受新的观念比如民主观念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他在党内没威望也不行，最后引起苏联的巨变，最后导致苏联的解体……

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思路，总结起来就是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

联那个时候选择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但是你应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去调整、改变。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只有资本主义那一条路。现在很多国家都学西方，但是自身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很多方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应该有自己的一条路，但是你这个路怎么个走法，这个是靠你本国人民的智慧去选择的。

现在史学界也在争论说1964年是不是一个转机，就是赫鲁晓夫下台，然后周恩来去莫斯科，是不是一个转机。我现在看到的最新的材料，我先讲这个过程然后做一个评判。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赫鲁晓夫下台呢，确实是因为得罪了党内很多人，说他搞分裂的党、农业的党，随便调来调去提拔了年轻的，所以他得罪了一批元老派，所以人家背后策划策划就把他弄下去了。弄下去以后勃列日涅夫上台，这个人其实是最无能的。真正弄他的不是勃列日涅夫，是政治局里面一帮人。他们商量半天，就把勃列日涅夫推上去了，因为当时勃列日涅夫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他的位置在那儿，这是其一。

第二，因为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最没本事了，你把他推出来，以后万一不成，有他担着呢；如果成了，他也不会再走个人崇拜，就是个人独裁那个路了，所以他用得上。从这个思路上来讲，这些保守派是要改变赫鲁晓夫的整个路线，其实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也是推翻了苏共二十大这些东西，重新搞计划经济等等这一套。对于中国来讲，他们也认为，就是当时在苏共党内认为，主要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的原因，就是两党关系挺好的，怎么那么好就突然反目了呢？就他们两人个人闹意见。赫鲁晓夫看不上毛泽东，毛泽东看不上赫鲁晓夫，是他们个人恩怨造成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这边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应该是障碍去除了一半，应该是可以和解了，所以苏联就发了一个信息，希望中国代表团能来。其实中国得到赫鲁晓夫下台的信息以后，也分析认为现在可能是个机会。

但是中共的想法，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没有放弃中国共产党要替代苏联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他认为就是再上来的人，也没什么能力，政治能力不行，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不透，你有什么资格为首？所以他对周恩来说你去做个姿态，第一我们要派代表团去，第二我们要派周恩来去，这规格非常高了，除了毛泽东就是他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诚意。前提条件就是你要公开承认错误，公开宣布放弃苏共二十大的东西，这就是周恩来去的一个条件。去了以后跟人家一谈，人家说你这个也太过分了，说这样吧，咱们先不争论这个问题，咱们先恢复关系。原来苏联不是组织起草委员会，就是搞莫斯科会议，后来从情报局解散以后，共产党就开会解决问题，1957年莫斯科会议，1960年莫斯科会议，1965年还要开，原来是1964年底开，中国就反对，因为明知道开这个会就是抵制中国的。苏联就做了让步，说那我们改日期，我们不着急开。中国说改日期也不行，那好，那我们就不开了。苏联想至少在表面上不要给美帝国主义造成中苏分裂的印象，那对两国都不利，只对美国人有利。但中国说，不行，苏联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实际上这个谈判活动就谈僵了。

7日苏联方面召开酒会，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喝多了，一把就拉住贺龙说，咱们两国都是兄弟，不应该闹分裂，都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他们两人闹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弄下来了，你们回去把毛泽东干掉，咱们俩党不就恢复关系，不就好了嘛。贺龙根本就没听懂，因为他不懂俄语，翻译在旁边，听完了以后没敢翻。翻译是王大刚，王大刚就去找阎明复，阎明复是给周恩来当翻译的，阎明复一听坏了，马上和周恩来说，周恩来一听脸都白了，马上带着全队就撤了，跟勃列日涅夫说要走了。

勃列日涅夫也正跟着中国人喝酒，谈得正欢呢，说怎么突然走了？不知道，回来一问，马林诺夫斯基吃饱撑的说这个。（这些都是看回忆录，王大刚的回忆，阎明复的回忆，还有俄国人的回忆，因为当时的酒会的场面不可能有文字的记录。阎明复我当时也采访了，问这个事，只不过情节上有点出入，但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登门道歉，说酒后失言，周恩来说什么酒后失言，就是酒后吐真言，你们就是这么想的。中方回国了，不谈了。回来时机场的接待规格很高，是毛泽东亲自去接的，这个连苏联政治局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说中共的接待规格表明决心要跟苏联决裂。

李宇峰： 后来的珍宝岛，怎么就变得这么极端呢？

沈志华： 珍宝岛这个事，现在档案还没有解密。首先，俄国档案现在看不到，现在看的都是外围的一些史料，中国档案也没解密。所以现在看的都是一些表面现象，双方内部怎么商量的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个事咱们得从头说，就从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说。这个事怎么引起的，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他有一个通病，都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国家之分。本来大家互不相识，只要唱一首《国际歌》，马上亲密无间。

东北苏联红军和李运昌部队就是这么回事。共产党的军队进东北，开始没有件像样的军装，进东北的时候让苏联红军包围了，以为是土匪呢，缴了械了。共产党军队就着急呀，说我们不是土匪，是共产党，他们也听不懂呀，最后想了一个招儿，唱《国际歌》。一唱，唉哟！咱们是兄弟嘛，于是苏军把武器全还了，而且帮着去打山海关。所以在共产党这个理念当中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没有国家观念，特别是主权观念。因为按原来的理论，革命一成功就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就没有国界。

而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各国还是有国家利益之差的。但是因为理念上没有改变过来，所以中苏边界不确定的问题其实谁都知道，只是大家不说而已，也认为如果咱俩是兄弟的话就没问题。我专门去考察过新疆，大家都知道这座山就是中苏的分界线，但是这中苏分界线到底在哪？没有标志，也没界碑呀，不仅如此，夏天咱们赶着羊全到那边去了，冬天他们赶着羊全到这边来，互相走来走去，没有一个边界的概念。

珍宝岛也这样，以前中国人过去过来没事，就是一个争议地区，但是没事，不是问题。但是到了1960年以后，两党关系一紧张，就造成国家关系紧张，这个时候才发现双方没有分界线。所以从1960年开始，边境纠纷就不断出现、不断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最后周恩来说不行，中苏还是得划界，不划界这些事就得没完没了，而且是将来的安全隐患。苏联派一个代表团，双方都来了。当时谈的情况，基本上，毛泽东那会儿对边界问题是有一种类似于传统帝王的领土观念，他不大在乎这些。

后来中苏双方谈、谈、谈，基本上双方也谈成了。在1964年的边界条约草案当中，珍宝岛就已经是我们的了。但是此时不知毛泽东是如何考虑的，这边刚签好草案，周恩来请这些苏联代表团专家们去北戴河游泳——乘凉去了，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佐佐木更三时说：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呢。结果第二天日本人就把这番谈话登报了。这一登报，苏联急了，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这边刚和你签了草案，你们就要算旧账，什么意思？干脆不签了，苏联代表团就回去了。所以1964年这个边界条约就没签。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呢，目前只能推测。我认为他就不想跟苏联签，不想安安稳稳地过去。毛泽东对此有个批示：“谈判，不解决问题。”咱们可以谈，但是我不想了断这个事，不想解决这个事就是留个借口，什么时候我需要有个借口，我就可以找。（这个和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时候的想法是一致的，中国一定要出兵，打败了没关系，打败了咱们就撤，将来再出兵咱们就有理由了。）他没有讲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我判断就这是这么想的。周恩来好不容易谈成了，而且是按照毛泽东说的标准、底线谈成了，但他一句话就全给否了。苏联就很紧张了，以为中国根本是不但不想签订这个条约，搞不好还想要那个150万平方公里——这是“珍宝岛事件”背后的背景和原因。但是实际上中国没有这个想法。我看了那么多的资料，毛泽东从来没说过他想要，其实他不想要，但是他老拿这件事说事儿苏联受不了。

关于事件具体是怎么发生的，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主要是上面这些和沈阳军区的一些材料，从中能够看到“珍宝岛事件”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中苏边境纠纷冲突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了，不断发生正面冲突。在这个冲突当中大部分都是中国吃亏，中国第一线都是民兵，而且争议地区都是我们去种地，我们去收割，是我们到了争议地区，而苏联地区是边防军在巡逻。双方一冲突起来呢，中国老是吃亏。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提议，有个方案是从下面往上报来了，说一定要报复这个修正主义，不能让他们欺负我们的革命群众。

这个报告就层层地往上报，没有一个人敢阻拦，你想当时那种情况，谁敢说不许报复修正主义，不许给中国人民出气？没人敢呀。所以，这肯定是经过周恩来，经过毛泽东批了这事。我看过一个档案，中国调一个团参加演习，林彪都得报毛主席批示，这个演习是怎么怎么回

事，最后经毛泽东同意，才可以演习。当时军队调动一兵一卒都得经过毛泽东亲自批，演习都这样，何况真打仗呀。

所以肯定是毛泽东批了，但是这个背景我们看不到材料。苏联那边等于就是没准备，不知道。特别是3月2日，那天勃列日涅夫不在，葛罗米柯也不在，国防部长也不在，咱们的边防军战士——孙玉国头天就带一个小分队——潜入珍宝岛，在那个就是苏联边防军巡逻的路线上埋伏好了，等第二天早上，苏联边防军一到这儿，突然一拥而起，一个个围上全歼灭了。苏联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我看的档案也有一些显示出，当时苏联给东欧各国的通报，里面讲了珍宝岛的情形。怎么发生的，他们去检验尸体，近距离射杀和刺刀捅的。这个事发生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背景的，说想通过这个事情达到一个什么战略目的，是没有的。但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却真的引起了两国战略安排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苏联觉得中国是有边界诉求的。

原来毛泽东讲的，150万平方公里，搞不好这就是一个前兆。特别是3月5日苏联反攻又让中国给打败了，吃个大亏，当然中国是事先有所准备的。结果苏联就开始调兵了，苏联一调兵，中国又紧张了：就发生这么点小事，你调那么多兵干什么，是不是要打仗啊？所以，下了一号令，一天到晚挖那个猫耳洞，那会儿我就在海军航空兵服役，一天到晚就接到战备、战备，天天紧急战备。苏联也搞了个报复，就在新疆。这个事虽然看不到内部文件，是否有证据苏联政治局开会讨论，至少这一段的文件还没有解密，但是其他的其实都能看到。

李宇峰： 苏联要炸掉我们新疆的核设施，美国给通报，这段是怎么回事？

沈志华： 这个现在不能证实，因为现在仅仅是美国的材料说有这么回事，是苏联找美国，至少让美国同意，我事先告诉你，我要炸中国西北的核设施，只是后来美国没同意。这是美国的材料。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的材料和俄国的档案，都没找到证据，所以我就没敢写，因为这些东西你要写，就得有比较扎实的史料的证据才行。

李宇峰：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金日成和斯大林之间的默契打起来的，现在外边是这么传的。中国是被动的介入，是这样吗？

沈志华： 是。

李宇峰： 你在俄罗斯看到这方面的档案了吗？

沈志华： 不给看，都封起来了。苏联档案后来为什么给封起来，和几件事儿都有关，其中一个是一名澳大利亚的记者到了俄国，他看到一份什么档案呢，就是越战巴黎和谈结束以后，越南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一共俘虏了多少美国人，都关押在什么地方，哪个集中营关了多少人，哪关了

多少人，你把总数加在一起，我记得大概是两千多人，但是巴黎和谈的时候越南同意还给美国的不到500人，你看《第一滴血》，兰博解救美国战俘嘛，不就是解救这些人嘛。结果他把这个档案给公布了，这个我还真的就找到原件了，因为他把那个复印出来了。结果一闹，事儿闹大了，美国不干了，温伯格立刻就飞到越南要人去了，说我们都知道在哪关着呢。结果越南就找俄国去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当年咱们都是兄弟我们都受你领导，你要什么信息我们就给你提供什么，你现在档案一开，把我们弄得非常被动了。这个事在苏联档案界也是风靡一时。

（2009年9月2日在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学术研讨会的演讲）

第三讲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至今，朝鲜战争的起源仍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我们发现了很多新的档案材料，但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得到的结论也相去甚远。我研究朝鲜战争有十五年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也在不断修正。朝鲜战争涉及的问题很多，今天我就集中讨论它的起源。至于它的影响，比如中国的走向、亚洲格局的变化等，那是另外几个大问题，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

学术界对朝鲜战争的起源有几种说法。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这种说法就不说了，根本不符合事实，现在不但大家不相信，官方也不这样说。学术界对起源的分歧在于，一种看法认为是金日成为了朝鲜统一发动了朝鲜战争，它是朝鲜内部运动的结果，只是受到了外部的影响。另一种看法正好相反，认为主要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重心的转移，影响了朝鲜内部的运动。

在苏联或者苏联加上中国决定发动战争这种前提下，第二种看法又可以分为两个方向。有人认为苏联要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契机，在亚洲掀起一场革命，于是，金日成就发起了战争，以解脱斯大林在欧洲遇到的危机，即苏联在柏林打了败仗，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美国人的说法也差不多，认为如果当初美国态度比较强硬，苏联可能不至于发起这场战争，很多人把责任加到了艾奇逊头上，因为他当时发表了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的公开言论。另一个方向就是我的看法，我认为恰恰相反，斯大林不是蓄意发起战争，而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决定的，但这种偶然背后又有其必然性，即苏联整个亚洲战略的变化。下面，我就主要讲讲我的看法。

对朝鲜战争起源的讨论的前提是，大家对史实的基本认定。随着俄中相关档案文献的披露，大家对朝鲜战争从发动到初期的基本史实，没有太大争论，有争论的都是对决策动机的判断。历史研究的难点就属判断决策的动机了，而这在共产党国家尤其困难。美国等国家文件解密后，非常公开透明，记载着空军、海军、总统等意见的报告都解密后，很容易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后来怎么想，为什么做改变。而共产党国家常常是领导人一人说了算，说变就变了，变的时候下面的人都不知道，苏联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恰恰就是问题的难点所在：我们很难判断苏联和中国决策者决策时的想法和目的。也正因为这样，学术界才存在争议。

朝鲜战争的起源有两个线索，一条是朝鲜内部的线索，如民族解放和统一等革命运动，另一条是国际线索，一般人是看美国和苏联或者中国和苏联，我认为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更重要的。说到底，我认为，朝鲜战争的根本起源是中苏关系的变化，而不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

系是因为中苏关系变化，才跟着发生了变化。朝鲜内部的线索比较简单清楚。朝鲜半岛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和苏联没有确定谁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因为都没想到战争结束得这么快。波茨坦会议只决定了日本本土和太平洋海上问题由美国人解决，中国东北由苏联解决，谁知苏联一出兵，美国一扔原子弹，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就带来了朝鲜半岛管辖权的归属问题。

其实当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朝鲜了。现在看来，斯大林算得很精确，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从西伯利亚地区调了五百多朝鲜人，然后南下以占领朝鲜。原来这些朝鲜人都住在远东地区，张鼓峰事件后，斯大林觉得这些朝鲜人不可靠，就把他们都迁到西伯利亚了。战争快结束时，为了占领朝鲜，又调了几百人随军进入东北。这时，美国发现如果自己再不出面，整个朝鲜就要被苏联占了。于是，杜鲁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问能不能以“三八线”为界，朝鲜一人一半。当时，包括国防部官员等美国人都认为斯大林不会接受，而是会提“三七线”、“三六线”，甚至更南的界线。按美国人的设想，只要苏联同意分，什么界线都可以，把汉江以北全给苏联都行。没想到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以“三八线”为界，美国人以为斯大林脑子没转过来，其实斯大林脑子转得比他们都快。斯大林后来给杜鲁门的信中说，他认可“三八线”是有条件的，“三八线”不能只划在朝鲜半岛，还应该向东延伸。如果这里有地图，大家就可以看到，“三八线”向东就把北海道划了进去，也就是说，苏联红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

所以，交换南朝鲜的条件就是美国把北海道让给苏联。如果成功，苏联以后就没有日本北方四岛的麻烦了。但是，杜鲁门很巧妙地把这个问题甩给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翻脸不认，斯大林的计划落了空，虽然生气，但因为已经认可了“三八线”，覆水难收，也没有办法。这样就遗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联的势力被排除在太平洋之外。如果能占领日本，整个日本海以北的太平洋区域就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了。

战争结束后，美苏达成了占领朝鲜半岛的口头协议。苏联的外交部给斯大林写过一份报告，指出朝鲜元山、釜山、仁川、济州岛这四个港口中，只要占领两个，甚至一个，就能解决苏联建立远东战略基点的需要。这和从沙皇俄国到斯大林时期的太平洋战略都是有关的，其核心就是出海口。几百年了，俄国人都在为出海口而奔波，北边是波罗的海，南边是黑海，所以他们就和瑞典、土耳其打仗。东边是太平洋，所以沙皇俄国愿意出钱修中东路，强租旅顺港。沙皇当初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夺了去，1945年，斯大林又夺了回来。由此可见俄国人上百年来为出海口和不冻港所做的斗争。

后来，斯大林没有采纳苏联外交部的方案，因为1945年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苏联租用旅顺港三十年，大连港的主权归还中国，但行政权归苏联，即行政首脑由苏联任命。实际上，旅大地区直到1955年都在苏军占领下。1949年以前，行政领导都是苏联人认可的。中国长春铁路从满洲里经过哈尔滨一直到大连，是中

苏共同经营，股份平分。总而言之，这个条约保证苏联能够实现其出海口和不冻港的战略要求。而四个朝鲜港口中，除了元山在“三八线”往北一点，其他三个都在南朝鲜。要实现外交部的目标，必然会和美国产生矛盾，斯大林于是选择了放弃。美苏双方在朝鲜都采取了让步的政策，都不想和对方发生正面的冲突，这就是“二战”刚结束时远东的战略格局。

我研究欧洲冷战起源的问题时发现，苏联对整个欧洲的政策就是搞“联合政府”，不管该地区是否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按照雅尔塔协定，东欧本来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但苏联仍命令其推行联合政府，不能共产党一党执政。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是出于这种思路，对朝鲜也一样。苏联最开始没看中朝鲜共产党，扶持的是曹晚植。曹晚植有点像中国的孙中山，是很有名望的民族主义者。

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由美苏中英共同对朝鲜进行托管。英国因为距离远首先提出退出，中国因蒋介石忙于对付共产党，也提出了退出。于是，成立了美苏联合委员会，同朝鲜各民族政治派别组建临时民主政府，美苏托管一段时间后，组建起政府，朝鲜再独立。对于这项决议，南北朝鲜都反对。北朝鲜的领军人物就是曹晚植，于是苏联开始排挤曹晚植。曹晚植失踪后，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发电报，推荐金日成，说他年轻有为，对苏联很忠心，苏联这才把重心转到金日成身上。

1947年，美苏联合委员会的进程受到了冷战的严重影响，不得不解散。美国人很聪明，把朝鲜问题交由联合国处理，这就使得朝鲜问题处于美国控制之下。联合国决定在整个朝鲜进行普选，金日成抵制联合国官员进入北朝鲜，于是，朝鲜就分成了南北朝鲜。金日成在北朝鲜举行的选举因为没有联合国官员的监督，联合国不予承认，而联合国在南朝鲜举行的选举，北朝鲜不承认。这样一来，1948年的朝鲜就形成了两个政府。当时，北方的状况远远好于南方，因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效率很高，经过土改、国有化等，经济很快就恢复了，社会还很稳定。而南方因为推行民主，不同党派忙于政治斗争，不顾经济，整个社会是一团糟。

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苏联单方面宣布撤离朝鲜。按道理，美国也要撤，但是李承晚不同意，要求美国起码要帮助南朝鲜训练一支部队。于是，美国又留了半年，帮助南朝鲜训练了一支国防军。1949年6月，美国军队撤离。此时的朝鲜没有外国军队，只剩下金日成和李承晚各自领导的部队。李承晚一直主张北上，要武力统一。金日成也明白，和平统一不现实，只有靠武力。所以，“三八线”附近频繁出现交火。但由于美苏不提供武器支持，南北朝鲜一直没有大的冲突。

这时，中国的问题就来了。1949年3月，苏联红军刚撤走不久，金日成就到苏联去了，表面上是签文化经济合同，但实际上提出了武力统一南北朝鲜。斯大林表示，美国还没走，北朝鲜应该先发展，做准备，

如果李承晚发动进攻，那么可以反攻，并顺势拿下南朝鲜，但不能主动进攻。金日成看斯大林不支持，回头就找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还在双清别墅，他会见了金日成的特使，朝鲜人民军政治局主任金一。金一提出了要军队的请求。他指出，面临南朝鲜武力进攻的威胁，北朝鲜没有部队，而解放军中朝鲜族的有几万人，能不能派到朝鲜去。毛泽东说没问题，现成的就有两个师，一个在沈阳，一个在长春。这些人是四野南下的时候，因不愿意离开老家而留下的。毛泽东让金一拿着他写的条子去沈阳找高岗，并答应武器装备全都会配备齐，另有一万多人跟着林彪南下打仗了，战争一结束就把这些人也派到朝鲜去。毛泽东还提醒金一，如果北朝鲜主动进攻，要提防日本人干涉，另外，中国也帮不了很多忙，因为中国的战争还没有打完，等中国统一了，就可以帮助朝鲜。金一带着这样的消息回到了朝鲜，金日成因为没有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认可，也很难采取军事行动。

到了7月，美国人撤走了，中国的两个师也全副武装地到了朝鲜，金日成就想发动战争。他先找到什特科夫，制定了“翁津半岛作战计划”。翁津半岛就在朝鲜西边“三八线”附近。金日成的计划是让人民军在“三八线”一字排开，先打翁津半岛，如果李承晚没有反抗或者国际舆论反应不大，就全线出击，两个星期占领整个南朝鲜。这个计划后来被送到莫斯科，具体的讨论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拖了很长时间。

直到1949年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最后做出决议，否定了这个计划。决议认为不能发动这次战役，否则会把美国引来，使朝鲜半岛陷入战争状态，所以，北朝鲜现在应该继续游击运动，发展游击队；加强和平统一的宣传，争取人心；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军备。总之，就是不能发动武装进攻。后来，什特科夫回电说，金日成看到电报非常沮丧和痛苦，却又没有办法。

因为苏联的电报非常多，不难发现斯大林经常斥责大使馆的人，认为他们没用，总让“三八线”闹事，甚至瞒报军情。1949年10月25日，金日成向毛泽东提起他曾说中国统一后会帮助朝鲜统一。因为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西南地区，基本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毛泽东就不想支援朝鲜，但他又不好意思告诉金日成，就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请他出面。斯大林回电说，毛泽东同志，你的来电收到，关于朝鲜问题，我和你的看法一致，现在金日成不应该发动进攻，这个问题我来做工作，你放心。这封电报是11月5日发的，也就是说，截止到这一天，斯大林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和毛泽东一致，起码在朝鲜问题上，中苏没有分歧。

接下来就是毛泽东访苏，毛泽东12月16日到的，在当天会谈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毛泽东来干什么，毛泽东说想请斯大林判断一下目前的国际局势，和平能维持多久，因为中国刚建国，要发展经济。斯大林说，只要毛泽东不打，金日成不打，二十年都有可能。可见，12月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基本立场都还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什么时候变的呢？一个月后，1950年1月17日，首任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要上任，金日成就把苏联和中国的大使都叫来给他饯行。酒过三巡，金日成醉了，一把拉住什特科夫的手不放，说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斯大林不让他解放南朝鲜，毛泽东说中国统一后就帮他，现在也不帮了。斯大林非让他等南朝鲜进攻再反击，南朝鲜到现在都不进攻，怎么反击，和平统一不可能，只有靠武力，游击队也解决不了问题。金日成借着酒劲，把平日不敢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吓得苏联大使不敢吭声，只能劝他去休息。晚上什特科夫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描述了整个过程，并判断说金日成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看出他是借着酒劲一吐心中的积怨。

斯大林1月19日收到电报后，一直没动静。1月30日，斯大林突然回了一封电报说，他同意金日成的计划，但是，这件事不能冒风险，请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这个变化太突然了，根据资料记载，变化的过程不超过一个月，一个月前，他还反对，一个月后，他不但同意，还亲自开始策划。为什么斯大林会发生这种变化？按照逻辑，肯定是那个月中发生的事触动了斯大林。那么，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那个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二是美国人发表了一个声明。中、美的政策对苏联的选择都有重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两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产生了什么效果。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去苏联干什么了。这涉及到中苏同盟的问题。过去的研究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我多年一直在追踪毛泽东对美国和苏联的看法什么时候变的，怎么变的，我陆续写了六七篇文章。从1944年开始，一点点地，像剥竹笋一样，一直剥到1950年，才发现症结所在。毛泽东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后，和苏联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三个大矛盾。

一是西安事变，中共本来决定利用西安事变审判蒋介石，然后和其他容得下共产党的派别联合抗日，但是苏联反对，坚持认为要留下蒋介石。最后，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党不得不听。

二是1940年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认为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中共刚开完会，苏联大使就在重庆召见叶剑英和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说政治上可以反攻，但军事上坚决不能动，即便政治上反攻，也不能点蒋介石的名字，因为要维持统一战线。毛泽东第二天开会，口气就变了，说政治上反攻，军事上静观其变。这两件事都是中共中央作了决定后，被迫采纳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心里非常不高兴。

第三件事是让八路军到内蒙打日本，毛泽东不愿意去，这让斯大林非常不高兴。虽然我们现在看共产国际的档案，知道毛泽东上台是斯大林支持批准的，但当时，斯大林并不知道毛泽东何许人也，他熟悉的只是王明等人，可当时王明的老师米夫已经被斯大林杀了，王明在斯大林那里也失宠了，所以选毛泽东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因为斯大林看重毛泽

东。后来斯大林了解毛泽东了，认为这个人不简单。所以，1944年斯大林决定战争结束后，他不会和共产党合作，只会和国民党合作。他和美国人、蒋介石都说，他只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而且毛泽东领导的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其实，毛泽东也没看中斯大林，毛泽东看中的是美国。从1944年春天到1945年春天，毛泽东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向美国人传递信息：将来在中国能成事的是中共，指望能帮助中共的是美国人。根据美国解密的毛泽东和戴维斯的几次谈话，毛泽东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毛泽东见了美国军事代表团，第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美国人琢磨了好几天，想毛泽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最后他们认为，毛泽东是在表明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后来，美国人就住下了，和毛泽东越谈越亲密，越谈越融洽。美国人对共产党的勃勃生气印象很深，认为这是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和重庆的花天酒地、贪污腐化相比，真正的希望不是在延安吗？所以，这些人，包括美国军方的史迪威、大使高斯和一批年轻的外交官，都对共产党另眼看待。毛泽东也不断地在传递他的信息。

比如，当美国人说将来苏联会帮助你们时，毛泽东回复说，苏联救自己还来不及呢，根本顾不上中国共产党，将来真正能救中国的是美国人，而且，不仅是经济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很先进，值得中国借鉴。毛泽东还跟美国人说，共产党实行的措施不算什么，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家都能接受，当时宣传的是新民主主义，和美国没有矛盾。所以，这些人向白宫传达的信息也是：共产党是一支可利用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些人肯定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出于同情共产党，但他们觉得共产党可能是一支比国民党更清廉、更优秀的政治力量，将来跟这些人打交道可能比跟国民党打交道花的代价更小，这点从他们给美国发回的电报上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这些人想给共产党留一条路，但美国整体是右倾的，在国会，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是少数，加上蒋介石院外集团的活动，到1944年底，白宫采取了一系列做法使得毛泽东越来越失望。首先是史迪威被撤职，然后是高斯被换成了赫尔利，赫尔利是典型的反共主义者，其他同情中共的外交家也被召回了美国，戴维斯更惨，回国就被抓了起来，当间谍接受审判。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同志们，苏联其实也是我们的朋友。”这句话听着就酸溜溜的，毛泽东本来是想和美国人做朋友的，后来美国人不回应他，他只能说苏联人也是朋友，说得是非常不情愿的。

果然，之后的重庆谈判让毛泽东更生气了。日本人投降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国民党没有想到，共产党也没有想到。日本投降后，共产党离日伪统治区近，可算是近水楼台。毛泽东当时很兴奋，立刻就任命了上海和南京的市长和江南五省领导人，省长都是共产党，并命令部队进驻大城市。但斯大林不同意，说现在不能占领大城市，不能和国民政府发生矛盾，必须去重庆谈判。政治局讨论了一天，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去

重庆。其实，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电报的第二天还没反应过来，还批准了书记处关于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然后新四军里应外合拿下上海的文件。可见，最初共产党的目标还是占领南方大城市，和蒋介石一决胜负。

接下来就更复杂了，从1945年到1948年底，苏联的目标特别明确，只要保住东北的权益，其他的不关心。当苏联能和国民党谈的时候，就把共产党出卖了。所以，苏联才要用坦克车把彭真赶出沈阳。但是，当苏联和国民党谈不拢的时候，就又把共产党请过来，说国民党明天就在秦皇岛登陆，你们赶快派部队过去。所以，国民党登陆秦皇岛登不上去，他们遇见的也不是土匪，而是八路军。最后，苏联不得不撤退的时候，非常希望共产党能帮其守住东北，所以，临走时想把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全给共产党。但当时，毛泽东已经不信了，不去了。长春撤离时，苏联一边通知蒋介石说明天早上8点离开长春，一边半夜告诉共产党让他们早上6点先来接管。撤离的时候，苏联是真心希望让共产党接管东北，但为时已晚，国民党的军队已经从山海关打进去了。

从1945年占领东北，到1946年5月撤离，苏联反反复复，既不想得罪美国，又不想让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既要跟国民党达成协议，又不能让其他势力占领东北。而共产党就是张牌，需要的时候打出来，不需要的时候收起来。按我的判断，国共内战共产党没有得到苏联太多的支持，苏联虽然留下了一点武器，但远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援共产党，因为撤离发生在1946年5月，当时冷战还没有爆发，美苏正在磨合。苏联采取了退缩的态势以显示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表面上不能得罪美国人，但东北确实牵扯到自身利益，不能放弃，只能暗地帮助共产党，祈望共产党能在东北站住脚。这是国共内战爆发时的情况。

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1947年一年之间，中国的战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年初共产党还被国民党赶着打，到了年底，就开始了全面反攻。同时，毛泽东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他此时非常需要苏联的帮助，因为虽然靠自己打败蒋介石没有问题，但是他害怕美国出面。我想，这是1947年到1948年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期间，毛泽东至少四次给斯大林电报说要去莫斯科见他，语气非常谦恭。斯大林的态度则是不冷不热，有时回电说让毛泽东过去，可在毛泽东准备好时又发电报说苏联要收麦子了，不让他去。毛泽东虽然生气，但电报上只能客气地说下回再说。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中文名字）给斯大林的电报上就写得非常清楚，虽然毛泽东的电报措辞客气，其实他正在发脾气，在拍桌子嚷，他就不相信苏联收麦子比中国革命还重要，完了还问苏联是怎么回事，政治局委员都得下去收麦子。

其实这是实情，1928年苏联收购危机之后，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政治局委员都下去。所以，斯大林说莫斯科没人也是实话，但他不见毛泽东的主要原因并非如此。毛泽东四次发电报，斯大林每次都推三阻四，最

后毛泽东彻底生气了。当1948年底斯大林发电报说毛泽东可以过去时，毛泽东也发了一次脾气，说中共要开会，不去了。但这个脾气发得很小，他紧接着就发电报说会开完了，可以过去。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拿下东北后，苏联的目的就达到了，他就非常满意了。所以，他在1947年说对中共还是要支持的。很多人觉得斯大林的整个态度都变了，其实不然。斯大林担心的是，共产党打到长江边上了，如果美国人出面，苏联是管还是不管？管，就和美国发生了冲突；不管，就要坐看美国支持蒋介石把共产党往北赶，搞不好东北就得而复失了。所以，我认为，斯大林想让毛泽东安于半壁江山。俄国很多学者不承认，但我觉得不能光看1949年那封电报。

1948年，罗申就开始在国防部活动，散布“如果需要调停，苏联可以安排”的信息。1948年年底，罗申升任大使后，仍在继续该活动。可见，苏联当时非常担心。其担心有两个方面，一开始，苏联是担心美国出兵。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发现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2月28日，苏联代办给斯大林发的电报上说，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美国的军事干预，而是美国要参与调停，更关键的是，美国现在千方百计在跟共产党打交道。所以，就算美国不出兵，就算共产党打过长江，如果共产党被美国控制，还是会威胁到苏联。我认为，这个时候，也就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是斯大林决心全面干涉中国问题的转折点。

1月8日，国民政府给美、苏、英、法发了照会，说内战是不对的，希望他们能帮助调停。斯大林这时特别着急，有些乱了方寸。他接了照会后，就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告知了毛泽东。斯大林说，他给国民政府的回复中说中国应该和平，调停可以，但首先要共产党同意，所以国民党应该征求共产党的意见。他还指示毛泽东，如果国民党来征求意见，就按他草拟的内容答复，说内战的责任不在共产党，共产党希望和平，如果需要外国调停，只有苏联有资格，美国等国家不能参与。要和谈、要调停并且只能由苏联调停这三层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

斯大林的电报是1月10日发的，毛泽东1月12日回了一封电报，这是我看到的共产党领导人公开顶撞斯大林的第一个文件。毛泽东的口气非常强硬，上来就说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和谈的必要，现在不是谈不谈的问题，而是要跨过长江，打败蒋家王朝，现在和谈与调停都是蒋介石的阴谋，如果同意，就是给了他喘息的机会。毛泽东还给斯大林拟了一份答复国民政府的回电。毛泽东所以敢这样做，一个原因是他非常愤怒，斯大林居然在革命就快成功的时候要他和谈，而且就算和谈成功了，也是在苏联的阴影下。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毛泽东也看出来美国不会出兵了。于是，他才敢一边和司徒雷登在南京谈，一边派刘少奇去莫斯科谈。

俄国学者说苏联没有调停的意思，是因为1月11日斯大林又发了一封电报，说上一封电报提到和谈并不是他真的想和谈，他的意思是和平

的旗帜不能放，必须要抓在手里，还说不想和谈很好办，提出让国民党接受不了的条件就行了，这样不但谈不成，还能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俄国人把这封电报作为苏联不想调停的证据，但我觉得其中学问很大。这封电报肯定不是1月11日写的，毛泽东的电报是1月13日发出去的，此前毛泽东肯定没有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所以我判断，斯大林是看到毛泽东的回电后有点下不来台，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又发了一封，并把电报上的日期往前写了两天，这种可能最大。

另一种可能是，斯大林发了第一封电报后，觉得说得有点过分了，就又发了一封相反的。这种情况出现过很多次，比如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说，他上台的时候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全部赶下台，要共产党一党专政，向苏联和南斯拉夫学习。毛泽东等了很长时间，苏联一直没有回复，于是1948年2月，他又发了一封电报说目前的政策是要推行联合政府，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能起到作用的。半个月后，斯大林回复说第二封电报讲得不错。所以，我认为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已经把他的意图讲得很明确了，这种意图也非常合乎逻辑。1月14日收到电报后，毛泽东回电说收到了斯大林11日发的电报，至于电报是不是11日发的，我们不得而知。最后，中国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指1949年4月15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八条二十四款），国共和谈没有成功。

这件事反映出，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了，他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于是，斯大林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东北。我把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有决议的目录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5年讨论或做出决议的问题共858个，但其中直接涉及中国的只有四个，且都是有关东北和新疆的地方性问题。1946到1948年，在政治局范围内每年讨论都是几百个问题，涉及中国问题都不超过五六个，而且只有1948年下半年讨论的中国问题才开始与中共有关。到1949年，一下就增加到70个，1950年更猛增到132个，还不算朝鲜战争问题。

可见，斯大林真正关注中国是在1949年。这一年，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认为要控制中国就得控制共产党，必须要和共产党搞好关系。于是，随后发生了三件大事，先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说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意识形态、政策走向等等，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走。斯大林对此非常满意。1949年2月，苏联援助中国的决议就开始不断出现，这是以前没有的。但是，毛泽东此时有个担心，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且他本人也反复强调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可他并不知道斯大林的想法。米高扬来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他只带着耳朵来听了。于是，毛泽东就派刘少奇到莫斯科去。

6月27日，刘少奇和斯大林见面，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会议记录上看，斯大林让刘少奇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说，刘少奇要的海军、空军、大炮、军舰等等，斯大林一一允诺，要什么给什么，连不要的都

给。斯大林问刘少奇为什么不尽快占领新疆，刘少奇说太远了，途中还有马步芳的骑兵。斯大林说这好办，他们可以用飞机把军队运进去，而且骑兵最怕飞机轰炸，苏联派两个团一炸就行了。果然，最后解放新疆时，一个军的先遣部队都是苏联飞机运进去的。28日，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电报后，立刻宣布一边倒。这时，司徒雷登还在跟中共玩牌，他提出北上，但又不跟白宫挑明，想等成事之后再说。而且他还摆谱，嫌火车不安全，要坐飞机去。28日之前，中共对他一直忍让，但是28日中共态度大变，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司徒雷登“他爱来不来，来了也谈不成”。最后，司徒雷登就没去成。

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了解了苏联的态度。这样，双方根据政治基础结成同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要建设社会主义，由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等等，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了以后，还认不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斯大林在远东折腾了半辈子，就是为了条约中的港口。9月2日，斯大林在苏联红军墓碑前说，他们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所以，如果中共不认，问题就大了。但从毛泽东口风中，斯大林又觉得不妙。为什么这样说呢？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套话，毛泽东说，原来为了革命，外蒙古独立是没问题，如果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了人民手里，他们就要考虑蒙古民族的统一。米高扬向斯大林一汇报，斯大林非常愤怒，让他马上让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如果要谈到蒙古的统一，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

米高扬向中共转达后，任弼时不乐意，说这样不对，内蒙古300万人，外蒙古才100万人。毛泽东赶快把任弼时拦住，哈哈一笑，说这事以后不提了。但此时，斯大林已经感觉到了中共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仅牵扯到外蒙古，还涉及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当时，东北的问题也有所涉及，但提得非常婉转，只讨论了长春铁路的产权归属问题。这些都使斯大林有所警觉。而刘少奇到苏联后，中共又使了一招，不再提具体的问题，直接问新中国如何处理1945年和苏联的条约。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中共中央讨论得出三条意见，一是废除条约，二是保留条约，三是暂时保留、日后修改，问苏共中央同意哪条。斯大林更聪明，拿笔一画，说等毛泽东来了亲自和他谈。这是件大事，毛泽东也在琢磨，中共中央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又宣布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那么，和苏联的条约到底废不废除呢？如果不废除，共产党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党内还受不受拥护？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怎么解决，还要看苏联的态度。

10月1日一过，毛泽东就不断给斯大林发电报，拐弯抹角地表示想去莫斯科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不答复，让毛泽东想来就来，但对条约的问题只字不提。后来，周恩来想了一招，毛泽东的电报是这样写的，说如果要谈条约，他就和周恩来一起去，如果不谈，他就一个人去，最后问斯大林是他一个人去好还是和周恩来一起去好。斯大林还是不答复，毛泽东没办法，最后只身前往给斯大林祝寿。结果第一次会

谈，两个人就吵崩了。毛泽东说，他来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1945年条约的会议，话还没说完，斯大林就说打住，此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认为1945年的条约必须保留。于是，会谈陷入了僵局。

后来，毛泽东又问斯大林，周恩来同志要来，让不让他来，斯大林说，如果你找他有事就让他来，但是自己不会见他，言外之意就是不会和中共谈条约的事情。毛泽东给刘少奇发了电报，政治局讨论后回复说，看来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如果这样就算了，祝完寿就回国吧。但是毛泽东一直不回，坚持要谈。10月22日，毛泽东突然接到电话说24日可以谈，他发给刘少奇的电报上兴奋地说，斯大林终于同意谈条约的事了。

谁知，24日当天斯大林对条约只字未提，毛泽东气坏了，从那天起，就闭门不出，整整待了一个星期。英国媒体捕获到这个消息，马上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了。斯大林这下急了，劝毛泽东出来露面。王稼祥建议毛泽东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宣布自己来苏联的目的。于是，答记者问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此次他来是为了解决某某问题以及中苏友好条约的问题的，这样谣言就破了。虽然现在对发言稿出自谁手还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斯大林，有人认为是毛泽东。从文体上看，我认为是毛泽东，但即便是毛泽东，内容肯定也是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的。

总之，这件事说明，斯大林表示让步了。斯大林怎么想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斯大林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和毛泽东闹僵。

1月2日，莫洛托夫来毛泽东住所，转达了斯大林愿意签订新条约的意思，并邀请周恩来来莫斯科。这样，具体的谈判就交给了周恩来。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斯大林非常狡猾，他组织了非常庞大的条约起草小组，从1月5日就开始起草新条约，而此时毛泽东正游览冬宫呢。20日周恩来抵达，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他们俩就不要参加了，让米高扬和周恩来谈就行。当23日苏联把整理好的经斯大林批准的方案亮出来时，中方发现，说是新条约，内容和1945年的却差不多。毛泽东气坏了，把方案扔到一边，要求中方重新拟定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的协定。

1月26日，中国起草了自己的方案，大概意思是，或者到和约签订，或者到1952年，中国要无偿收回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我在俄国档案中看到了苏联对这个方案的四个修改文本，其中有一个反应最为强烈，上面划的不是感叹号就是问号，还打了许多杠杠，最后一看，是斯大林的签名。但苏联28日回给中国的文本内容完全变了，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斯大林又一次让步了。而这意味着，苏联将会失去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其在远东的战略基点消失了。这就是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

苏联为什么让步，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态度。截至1949年底，美国对中国一直犹豫不定。到了12月29日，美国必须拿主意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国民政府也于12月8日迁到了台湾，更重要的是，

毛泽东都到了莫斯科了。美国国内的两派意见争得不可开交，军方要求支持蒋介石，国务院则认为不能再支持蒋介石了，现在最好的战略应该是拉拢共产党，把共产党和苏联分开，因为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于是，1月5日美国发表声明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听出来了，美国在挑拨离间。

12日，艾奇逊更是声明：美国和中国没有利害冲突，美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中国也没有美国的租界，抗日战争中，美国给予的援助最多，而在东北、外蒙古和新疆，是俄国人在侵犯中国人的利益。这时，苏联非常明白，如果自己不拉拢中国，中国就会被美国拉拢过去。所以，苏联最后同意修改条约是国际形势所迫。

但是，苏联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最关键的是，其战略安全受到了威胁。苏联要想在远东保留出海口，只能从朝鲜入手。所以我推断，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为了在远东建立战略基地，赢得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一直不想和美国发生冲突，这也是此前禁止金日成发动进攻的原因，那么难道现在苏联就不担心了吗？

1月，美国宣布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这是原来计划里就有的，苏联也知道，但是公开以后，斯大林就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让金日成打南朝鲜美国是不会干预的，因为这和美国的核心利益无关。加上金日成保证四天解决战斗，美国根本来不及干预。果然，6月25日开打，6月28日金日成就拿下了汉城。总而言之，限制发动朝鲜战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斯大林就决定支持金日成了。

有人认为这个看法听起来玄乎，但其实我已经想了十几年了，我认为我的解释还是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我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张曙光： 沈志华教授给我们带来了生动的演讲，下面有请金东吉教授进行评论。

金东吉： 沈老师讲的都是事实，但是，我和沈老师的解释可能有所不同。沈老师认为，朝鲜战争起源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加上美国宣布朝鲜半岛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打消了斯大林对美国干涉的担心。如果真是这样，以后发生的事情可能并不好解释。比如1950年3月、4月，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了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表示，如果美国干涉，他就不参与，而且这件事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如果美国不干涉斯大林才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话，他其实不那么需要加上的条件。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给金日成发电报，让他来莫斯科讨论进攻南朝鲜的事情，并嘱咐说这事千万不能让中国人知道。因为中国当时最

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毛泽东曾明确跟斯大林说，中国不赞成发动朝鲜战争，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以便发展经济。

沈老师还认为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是出于争夺战略港口的考虑。但其实，当时苏联已经在利用北朝鲜的元山等港口了。我在莫斯科查资料时，当地学者说，他们看过1950年1月28日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上面有写准备发动朝鲜战争，我现在还在盼着会议记录的原件能够公开。根据我的判断，斯大林所以同意朝鲜战争，不仅因为这符合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还因为他认为毛泽东不可靠。而且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中加了一条，在特殊情况下，苏联可以不从旅顺港撤走。

斯大林的另一个目的是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开，他曾在1950年8月说，如果中国牵扯到朝鲜战争中，对苏联是很有利的。所以，1950年6月27日的安理会苏联没有参加，从事后来看，斯大林可能是想以此作为自己没制止美国介入的借口。斯大林还发电报给东欧各领导说，欧洲现在的压力减轻了，美国的注意力都转到了亚洲，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加强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力量。

总而言之，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并非只有争取不冻港口这一个，朝鲜战争可以解决很多让斯大林头疼的问题。我想，减轻欧洲的压力同时拉拢中国，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当然，这方面我还要继续研究。

王栋： 首先感谢天则研究所的邀请！我是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的是政治学，虽然论文是关于冷战的，但只能算半个冷战史研究者。朝鲜问题不是我的专攻，我就只简单谈一下吧。

关于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起源，沈老师在《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评述。这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早期研究都在美国，现在正在慢慢往欧洲扩展。冷战史在美国史学界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领域，其发展得益于史料的获得和解密。70年代，美国解密了朝鲜战争的相关资料，激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90年代，苏联档案的解密再次使得这个问题成为热点。从80年代末至今，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档案的解密，使得冷战史学界出现了“新史学”。其主要的研究理念是，要看各个冷战参与国的档案，而不能仅限于美国和苏联的，这样才能得到冷战的全貌。美苏冷战并不只涉及美国和苏联，而是对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自己研究的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美问题，中苏问题只涉及过一点，所以不好谈具体的问题。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到具体的史料，只能做逻辑推断。这是对历史研究者功力的考验，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确实，历史在某些点上会呈现出一片空白，但加上了我们的想象和逻辑推演，就可以填补上去。套用国际关系的名词，沈老师的研究有比较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在考察斯大林为什么短时间内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一问题时，沈老师抽丝剥茧，最后从苏联远东地缘战略的角度给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我想提出的问题是，90年代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开始复兴，相当一批学者都是从这个视角考察历史的，包括一些曾经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冷战史研究大家。比如梅尔文·莱弗勒，他最近的《争夺人心：美国、苏联与冷战》就标志了他从现实主义取向向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型。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似乎很少有学者能讲得很清楚。很多学者讨论中苏分裂的时候，都喜欢把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我的一个朋友在他的书中也按西方的传统，说因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所以中苏分裂了，但其实好几个问题他都没有讲清楚。

另外，他有时谈的是意识形态，有时谈的又是国内政治。其实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讲，这两个变量虽然外延有重合，但基本还是两个不同的变量。那么，到底怎么区分，还希望沈老师能进行指导。

我读沈老师的书经常会有一个感觉：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沈老师呈现给读者的历史往往有别于官方的叙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讲过，记忆是想象的一部分，一个民族一定要建立在对过去的共享记忆之上。官方对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的历史叙事形成了我们几代人的记忆，经过宣传、教育的强化，它已经构成了国民的共同记忆，形成了我们自我认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沈老师的观点给人的震撼还是很大的，颠覆了官方史学的叙事范本，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叙事产生疑问。

其实，不仅是中苏关系，对整个近代史的叙事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些历史叙事又构成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神话”或者“迷思”。有学者这样定义“迷思”，说它是一种公共信念，由有关世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普遍性的表述构成，能把人团结起来，通过缓解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给人提供安慰，并把人动员起来，去进行某些社会行为。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本身又是息息相关、难解难分、相互强化的。不管是好是坏，这种历史的迷思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的文化、记忆和信念里，构成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深刻认同的基础。

历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要审视、讨论这种迷思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不仅是历史学者，我研究国际关系时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触，很多时候，呈现在眼前的都是迷思，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却不得而知。比如领土争端，这是国际关系里很常见的问题，它涉及意识形态、信念、记忆、情感、利益等等很多变量，加上现代传播手段的放大、扭曲，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往往无法认识真相。我年前在美国开了一个会，当时正好美国对台军售，国内吵得一塌糊涂。我跟美国人讨论的时候，他们会从美国的利益和视角讲卖武器的原因，回国后，把他们的观点和国内的观点对比来看，是很有意思的。

台湾问题不仅是个当代的问题，还有很深的历史根源，我认为这是

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三方的博弈，就不细讲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真相”很多时候可能是永远无从得知的。有时候，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不得不羡慕历史学者，因为历史学者有历史档案可以依赖，虽然这些档案不能完全把历史拼出来，但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审视历史、接近乃至复原真相。

萧延中：沈教授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我说不清“起源”和“原因”的差别有多大。但我的理解，如果讲“起源”，那就要讲述历史过程，讲它演变的过程，而主要不是探讨导致这些历史事情发生的原因。沈老师的讲演给我的感觉是，他更多是在追究斯大林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而在历史学，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个结果可能有多种原因，并不像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那么明确，对原因的探讨会有多种路径和可能性。这样，沈教授今天论证的就可能是多种原因之中的一种。

我是研究思想史的，思想史研究的路径跟沈教授的纯史学研究差别很大。沈教授的研究是从大量的史料入手，对纷繁的史料进行梳理，再从中发现线索，这是思想史研究无法相比的。沈教授的著作和文章往往把原始档案资料按时间排列出来，把各种各样的事件放到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重要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最后结论就很自然地流淌出来。这体现了历史学所特有的魅力。如果他人要对这个结论提出批驳的话，那么就要首先批驳其引用的史料。当然，到底怎么解释史料，就是另一个大问题了。显然，这与思想史研究探讨认知构成与概念内涵，发现思想家的预设和逻辑是不一样的。

我对毛泽东研究关注得多一些，我的一点感触和疑问是，从思想史角度讲，具有强大干预能力的思想家的个人情感，对历史过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我所读的相关资料来看，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正像刚才沈教授所说，他俩骨子里不是一类人，或者太是一类人了，谁都不会服谁。在我接触毛泽东研究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毛泽东与斯大林早晚必有一争，因为他们俩个性都很强，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人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听另一个人的。所以，中苏争论的很多问题其实早就出现了端倪。

关于毛泽东访苏情况的资料，我最早读到的是《师哲回忆录》，他讲的好像跟沈教授讲的不完全一样。师哲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时候是天天等着斯大林找他谈，但斯大林一直回避，只是好好招待。毛泽东闲着没事干，被冷落了，最后让师哲给斯大林处打电话，毛泽东让告诉对方，他自己说在莫斯科只有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师哲说“拉屎”这个意思在俄文里有好几种表达，“拉屎”是最难听的，应该用另一个词。毛泽东不同意，说就用最难听的。这些话翻译过去后，斯大林不久就有所反应，同意谈判了。权利主义者在衡量问题的时候，考虑的是个人因素如何影响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而作为学者，我们又该如何去讨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于朝鲜战争爆发原因的讨论，沈教授好像主要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展开分析，也就是说，战争的缘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需要占有远东地区的出海口。但是按沈教授刚才的介绍，“三八线”以北地区本来就已经有了港口，而且苏联后来跟中国也在旅顺、大连港的问题上谈妥了，这样，按照争取出海口的逻辑，就根本不需要再发动朝鲜战争了。所以，这种地缘政治学角度的解释可能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考虑。

我还对沈教授一个说法有一点不太能理解。沈教授说，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想拉拢美国，也就是说，那时中国有跟美国合作的可能性。的确，当时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一段时间里大力倡导民主宪政制度，中共的报纸发表了很多赞扬宪政民主制度的好文章，我们今天看来都会为之振奋。毛泽东也的确跟美国人讲过美国的制度好一类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一贯的著作连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是出于策略目的而写的。我觉得毛泽东从来没有想在执政后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一方面是他根本不相信蒋介石会搞联合政府，另一方面是他建国不久就很轻易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对当时“中—苏—美”三角关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它与中共最终“一边倒”但后来又出现中苏论战的关系又有多强？这些问题都还值得讨论。

盛洪： 我说三点。首先，沈教授刚才的报告基本上印证了我的看法，即朝鲜战争的爆发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朝鲜不幸成为了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牺牲品。第二点，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当时反对朝鲜战争的决定是非常正面的。至于后来中共又介入朝鲜战争，我猜测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历来只要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就要出兵朝鲜，这已经成了传统；另一个是，毛泽东可能和斯大林做了交易，以东北的利益作为交换。最后，我们认清事实是为了作价值判断，对事件的正义性作出评判。

沈志华： 我想，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因为我只讲到了前面的部分，后面的其实更有意思，但是今天没有时间细谈了。我就补充一点，斯大林不是一定要拿南朝鲜的港口，但确实是为了保证苏联的远东战略，进，就能拿南朝鲜，退，仍然能拿旅顺口。后来的结果是，战争打起来了，中国还把旅顺口送给苏联了。如果不是赫鲁晓夫1954年签的协议，旅顺口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收不回来，因为1945年的协议中还有三十年的期限，1952年的协议中连期限都没了，而且战争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占领着旅顺口。所以，苏联不是简单要拿南朝鲜和出海口的事，而是苏联在亚洲的战略问题。其他的问题就不在我今天所讲的内容范围内了，时间关系，我们以后再交流吧。谢谢大家！

（2010年2月26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

第四讲 重新解读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问题确实是中国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这可以想象，这是那一代人经历的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对于这件事情，人们的记忆曾经是错误的。

历史学研究的依据是档案文献，以前的历史记忆有错误，也不奇怪，因为过去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从来没有解密过，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报纸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从苏联解体以后，俄国的档案开始解密，中国的档案也陆续披露出来，大概从1996年以后，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理解才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事实。

过去美国的情况比较清楚，因为美国按照三十年解密法，不断有材料披露，所以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政策过程人们是比较清楚的。不清楚的是中国跟苏联、朝鲜这方面。当然，现在朝鲜的档案没有解密，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朝鲜跟中国的交往以及朝鲜跟苏联的交往，通过中国和俄国的档案解密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来。那么应该说，经过学者十几年的研究，关于朝鲜战争过程当中，在铁幕这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基本上是水落石出的，不是说没有空白，但是大的脉络、大的逻辑是比较清楚的。

今天我主要讲朝鲜战争起源的问题。朝鲜战争起源包括两个大的问题，一是朝鲜战争究竟是怎么爆发的，二是中国究竟是怎么出兵的，中国出兵其实也是朝鲜战争起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讲的内容，如果不是档案文献，我会告诉你们，因为有一些是有空档的，不是所有的文件都解密，或者解密了我不一定找得到，档案馆像大海一样，要去找材料，就要有大海捞针的准备。但是有一些回忆录可以弥补这样一些缺失，所以以档案文献为主体，以当事人的回忆录为补充，我基本上构建了一个朝鲜战争起源的过程。

一、朝鲜战争究竟是怎么爆发的

朝鲜战争的起源，首先恐怕要讲“三八线”的问题，“三八线”究竟是怎么划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不管美国和苏联，都没有想到战争会那么快结束。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是比较突然的，他们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朝鲜问题，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对于其他都做了规定，比如海上作战由美国负责，陆地作战由苏联负责，谁负责朝鲜半岛作战，并没有谈到。

8月6日美国突然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斯大林担心日本投降，立即命令苏联红军出动。150万苏联军队很快就逼近朝鲜半岛，不久日本便投降了。当苏联红军已经到达汉城的时候，美国军队还在冲绳岛，相差600海里，所以美国人非常着急，说不能让苏联独自占领朝鲜半岛，要跟苏联达成一个交易，协议要求是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共同接受日本的投降。原来美国国防部和杜鲁门都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接受这样一个方案，因为他们完全处于下风，他提的“三八线”其实是给苏联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苏联不同意这个划分，无论怎么划分他们都可以接受，但是没有想到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三八线”。当时美国人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这点事他都想不明白。其实斯大林非常聪明，他怎么会不明白？他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说我可以接受“三八线”，但是这条“三八线”不仅在朝鲜半岛，它要向东延伸，延伸到哪里？日本。

从地图可以看到，北海道的大部分都在“三八线”以北，其实斯大林的目的是想在日本本土登陆，但是美国不愿意，所以杜鲁门就把这个事甩给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很干脆地拒绝了。这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三八线”的问题上苏联已经吃了大亏，但是当时也没有办法，因为美国和苏联战后初期的主要趋势是合作，来统辖战后世界。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了一个决定，对朝鲜进行托管，因为朝鲜是一个新解放的殖民地，以前被日本吞并了，所以要进行托管，托管一段时间以后再建立统一的政府。雅尔塔会议时，托管的四个国家是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英国首先退出，离得太远，来不了，后来蒋介石也退出，因为蒋介石的军队也到不了朝鲜半岛，打共产党还来不及。所以就剩下美国和苏联，实际上就成立了美苏联合委员会来处理朝鲜问题。

但是没有多久，美苏朝鲜委员会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美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厉害，特别是1947年的夏天欧洲的冷战爆发以后，朝鲜联合委员会的会议根本开不下去，所以美国人使了一计，把朝鲜问题交给了联合国。联合国当然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所以联合国做了个决议，在朝鲜实行大选。这个时候，朝鲜南北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距。朝鲜北方被苏军占领以后，想建立一个他所依靠的联合政府，当时朝鲜比较复杂，有共产党、民主党、新民党，各个党派，苏联依靠的是叫曹晚植的一个人，他是比较有影响力、比较有权威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因为曹反

对托管，才把朝鲜的管理权力交给了金日成。金日成原来跟着杨靖宇在东北抗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师长，当然这个师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师，也就百八十人。

1941年日本大扫荡的时候，金日成基本被打垮，他们就逃到了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建立了88旅，88旅里有一部分是朝鲜人，他们组成了朝鲜营，金日成就是营长。战争结束以后，苏联人把这六十多人送到了平壤，配合苏联在朝鲜占领军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慢慢发现金日成又年轻，又很忠诚，就决定把政权交给他了。在俄国档案里，苏联对金日成有个评价，说金日成工作积极，经常汇报思想，俄语学得好，值得信赖。从1945年到1947年，朝鲜北方的局势比较稳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土改、公有化等等，而南方非常乱，一天到晚为选举争吵，还搞暗杀，乱七八糟。所以到1948年，北方的经济迅速恢复，而南方还在议会争论的过程当中，经济没有人带头发展，比较混乱。

因此，当美国要在朝鲜半岛进行选举的时候，北方朝鲜就拒绝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入境，大韩民国虽然成立了，但参与投票的都是南方人。不久之后金日成自己建立了一个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认为这个国家也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和联合国建立的实质是一样。在朝鲜的宪法里规定，首都不是在平壤，而是在汉城。大概到了1972年，朝鲜宪法才定都平壤，金日成才承认了这个事实。

因为两个朝鲜国家这样的态势产生以后，就出现了国家怎么统一的问题。当时李承晚也想北进，因为他认为，联合国的官员进不去，就没有办法进行选举，没法进行选举，就只有靠武力解决。金日成也认为只有靠武力，打下南朝鲜才能统一，这一点南北双方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当时美国人和苏联人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能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统一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美苏之间的争夺，在欧洲已经是愈演愈烈，他们都不想在远东，在远离他们核心利益的地区再发生一次美苏之间的冲突。

所以1948年北朝鲜成立以后，苏联就主动提出单方面撤军，到1948年底，苏联军队全部撤出了朝鲜半岛，美国人觉得很难堪，因为占领朝鲜半岛是为了接受日本投降，日本都投降好几年了你还不走？而且两个国家都已经成立了，所以美国人也要撤。但是李承晚不愿意，说不能撤，撤了我怎么办？我连军队都没有。好歹帮我建个国防军，这样美国人又在朝鲜待了半年，帮助李承晚建立了一支5万人的国防军。

美国人其实也知道李承晚的心思，他拿这支军队就是想北进，所以美国人走的时候很聪明，没有给李承晚留下重武器，不给重武器怎么进攻？只能防守而已，其实苏联也是这个心思。1949年3月，就在苏军全部撤退以后，金日成去了一趟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这是公开的访问，当时表面上是搞一个经济文化协议，但是私下里金日成谈到了国家统一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提醒他，说国家统一可以，但是不能使用军事手段，可以和平统一，不能打仗。除非李承晚发动进攻，那个时候可以

用军事手段。斯大林给金日成划了一条界线。

金日成回来后，心里挺不踏实，所以4月他就派当时朝鲜人民军的总政治部主任金一到北平找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刚从西柏坡搬到北平，还没有进驻紫禁城，还在香山别墅。金一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谈了一圈。

他们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朝鲜主要想要军队。他说北朝鲜没有军队，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有一批朝鲜族部队，金日成同志想问问主席，能不能把这批人带回去？毛泽东跟他解释说这个没问题，现在这两个师没有南下，林彪部队入关的时候这两个师一个留在沈阳，一个留在长春，我写个条子，你到沈阳找高岗，两个部队你可以马上带走，而且给你配齐全部武装。但是还有大概15000多人已经随着林彪的部队南下了，不是整建制的朝鲜人部队，是朝鲜排、朝鲜连或者朝鲜营，分散在各个部队当中，这批人现在正在打仗，回不来，等南方战事结束，我把这批人集合在一起给你送过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朝鲜人是在日本吞并朝鲜时大量逃亡到东北的，在“二战”结束时已有200多万人，这200万人国籍都不定，原来是朝鲜的，现在迁居到了中国，但是中国一直战乱，始终没有正式解决国籍问题，直到1952、1953年，中国政府才着手解决朝鲜族国籍的问题，就是不能拥有双重国籍。当时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招兵，这批人就加入了林彪的部队，组成了专门的朝鲜族部队，整编的就是164师和166师，从师长到战士全都是朝鲜人。

二、朝鲜提出要建立东方情报局。当时在欧洲有共产党情报局，是1947年9月，斯大林在那里建立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把整个共产党的力量给统和起来，但是里面没有亚洲国家。所以当中国革命胜利，再加上朝鲜，越南的革命形势也很好，金日成就提出来，想拥戴毛泽东建立东方情报局。毛泽东答复说，现在不着急，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虽然大局已定，但是新的国家还没有成立，这个事以后再商量。这时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就是金日成要统一的问题。他说，在这个时候，我建议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来实现国家统一。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或者日本人很可能干预，参与进来，但我不能帮你们。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都已经南下，等完成统一以后，我可以挥师北上，帮助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所以1949年4月，金一带回去的信息就是中国共产党也不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事情就放下了。

1949年6月，美国军队全部撤走，金日成觉得时机到了，美国军队都没了，就剩李承晚，所以他就设计了瓮津半岛作战计划。计划把人民军的几个师在“三八线”一字排开，首先在瓮津半岛发动进攻。如果美国人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应，他就全线出击，估计两个星期可以结束战斗，占领整个南朝鲜。这个计划就交给了苏联大使什特科夫，什特科夫看完了以后非常欣赏，认为这个计划好，进可攻退可守——进，可半个月拿下整个南朝鲜，退，战线至少也缩短了六百里，就把这个计划报到了莫斯科。

但是莫斯科一直没有回音，到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了个决议，这个决议通过什特科夫转给了金日成，说你们设想的这个战役，莫斯科不同意：第一，这样一场局部的战争势必引起整个朝鲜的大战，结果就会引起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发生冲突，这个不可取。第二，你们也没有做好准备，不可能半个月就结束战斗。建议朝鲜劳动党，建议金日成继续采取和平统一的方法，顶多是在南方发展游击队。

金日成接到这个电报以后非常沮丧，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金日成痛苦万分，但是毫无办法。到了9月，事情还是没有进展。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给毛泽东发了个电报，说当初答应等中国统一后就帮助朝鲜统一，现在是不是轮到我统一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很难办，为什么？因为原来毛泽东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在1950年左右，当时整个南方的问题没有解决，不要说台湾跟西藏的问题没有解决，整个广东、四川，西南都没有解决。毛泽东是想把大陆的问题都解决了再成立新的政府，但是斯大林不同意，10月1日就成立了新政府，所以他不好答复金日成，就给斯大林打了电报，说斯大林同志，金日成现在还是想采取武装的手段解决统一的问题，我不太好办，你看是不是可以出面？11月5日，斯大林回电，说毛泽东同志，在朝鲜问题上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个问题不要着急，我来说服金日成。所以到了11月的时候，苏联和中国的意见还是一致的，是不允许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我们看到的在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和莫斯科之间往来电报中，一直到12月，经常不断地出现这种电报，就是莫斯科在责问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因为当时朝鲜半岛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地发生零星军事冲突，莫斯科非常烦恼，经常发电报说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让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这都做不到？他当然是做不到，两边都想打，都把部队放在那里，难免擦枪走火。

所以到12月底大概还是这样的状态，这时候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主要是谈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在12月16日的第一次会面，第一段话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毛泽东同志，你找我有什么事情要问？毛泽东说，我想请斯大林同志对未来的亚洲国际局势做一个估计，和平究竟能维持多久？因为中国现在刚刚建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搞经济建设。斯大林说，我想直年到十五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他就开了个玩笑，只要你不打，金日成不打，我想二十年都有可能。意思就是利用这二十年的时间好好搞和平建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到12月底，双方的看法还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保证亚洲处于一个和平的环境，不在这里引发什么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

但是不到一个月，事情就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现在档案文献看，1月17日，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上任，按照惯例金日成就组织了欢送的宴会，请了中国大使、苏联大使，各方的官员大家来开会。一边开会，一边设宴招待。酒过三巡，金日成就醉了，摇摇晃晃，又吵又嚷，一把抓住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手，说我现在非常痛苦，你看几千万南朝鲜劳动人民还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等着我去解救，但是斯大林同志不让我去，非让我用和平统一的方法，现在和平根本就没用，还说等

着李承晚发动进攻我再进行反攻，到现在李承晚也不进攻我怎么反攻？游击队也不解决问题，我只有打过去。什特科夫已经被莫斯科骂得狗血淋头，对这个问题非常头疼，当时汗都下来了，不知道该怎么答复，就扶着金日成让他回去睡觉。晚上，他就给斯大林写了一个长电，把整个开会的情况，金日成怎么表现，详详细细做了汇报，最后他写了个判断：我判断金日成其实是借了酒意说出了埋藏在心里很久的话，他不敢讲，这话他只有借着酒劲才能说。

1月19日，斯大林接到了这封电报，但一直没有反应。过了十天，也就是30日，斯大林突然给什特科夫发了个电报，说请转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计划，但是这件事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风险，请他到莫斯科来，我要和他当面谈。

这个电报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个文件，就是斯大林为朝鲜战争开了绿灯。过了两天，2月1日斯大林又追了一封电报给什特科夫，说前天说的那个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这两个电报说明什么？第一，斯大林改变主意了，他原来不同意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但是现在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但是具体怎么办，还没有商量好，他要金日成来面谈，但第二，这件事要背着中国人，为什么？因为当时毛泽东还在莫斯科，如果金日成来了，和毛泽东碰上了怎么办？也就是说到1月底，苏联的政策变了，但是毛泽东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个事。到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离开了莫斯科，中苏同盟条约已经签订。3月8日的时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给金日成，说现在你可以来了。金日成就做了一番准备，坐着火车，大概4月10日到了莫斯科，一直谈了半个月，到4月25日离开莫斯科。

关于这段历史，现在没有任何文献解密，斯大林跟金日成究竟谈了什么，怎么谈的，现在俄国档案还没有解密，可能是因为非常隐秘，什么原因不太清楚。我只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工作日志》当中看到过一个记录，斯大林从1924年1月1日当了总书记以后，就搬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克里姆林宫有一个工作日志，每天记录进出斯大林办公室的人、时间等等，就像中国原来皇上的起居注一样，都有人给记着。这当中，记录了一次金日成进入克里姆林宫，应当是正式会谈，但是即使这个正式会谈现在也没有文献披露，更不用说在那些别墅里头的秘密会谈了。

现在史学界知道这个谈话内容的渠道是回忆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给金日成当翻译的这个人后来在50年代叛逃了。朝鲜问题非常复杂，金日成时期，很多人叛逃，有逃到苏联的，有逃到中国的。这个人逃到苏联，写了回忆录，还有其他一些相关人写的回忆录，基本上描述了这段历史，谈得是否准确，大家没有很大把握。但是我个人分析，觉得八九不离十，因为跟后来的文献能够基本符合。他主要谈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斯大林非常担心美国人干预的问题。所以他主要问金日成，打起来万一美国人要干预怎么办？金日成充满信心地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个不是问题，首先，我发动的是一场闪电战，四天就解决战斗，美国人根本来不及反应。朴宪永同志在南方有20万劳动党员，只要我这

儿开枪那边就起义，里应外合，美国人没反应战争就结束了，还怎么干涉？他来不及干涉，调兵都调不过来，战争就打完了。

朴宪永当时是南朝鲜共产党总书记，南北分裂以后，他在汉城呆不住了，就迁到了北朝鲜，成了北朝鲜的副首相兼外相，威望非常高。斯大林一听有道理，当然我想斯大林相信他的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当时，苏联截获了美国关于“橄榄枝计划”的情报，主要不在于金日成是不是发动闪电战，或者战争多快结束，主要是美国的战略预测，在苏联国防部得到的美国计划中提到了美国预计在朝鲜发生战争后立即撤离，不在朝鲜半岛跟劳动党打，守住日本海就完了，不去争夺。因为他们认为朝鲜半岛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坦克都开不动，大部分都是山区，有什么可打的？所以斯大林这一点是比较放心，金日成有了这个保证，又有这个信心。

第二，是斯大林非常关注的，他说这个事一定要找毛泽东。朝鲜的问题，要找毛泽东同志解决，毛泽东同志最懂东方的问题，最会搞武装革命，你去向他好好请教。将来如果出了事，美国人干预，我可是帮不了你，那个时候就要靠中国同志。金日成不太愿意，但当时还是同意了。

金日成走了以后，斯大林迟迟不见他有所动作，非常着急。5月3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说，毛泽东同志，不久前金日成同志到我这里来，我们谈了一些问题，谈的是什么，容他当面向你禀报。在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的心思，朝鲜的事是他决定的，但他决定以后，知道毛泽东肯定反对，又不好自己直接跟毛泽东谈，所以他要求金日成一定要去谈。为什么这样？我想他出发点有两个：第一，朝鲜问题和其他亚洲的问题，按照当时中苏的分工，是归中国管的，不应该归苏联管。1949年的夏天，刘少奇到莫斯科的时候，当时斯大林跟他讲，说中国共产党是很了不起，自己就把天下打下来，很能干。以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咱们两家分工合作。欧洲的革命归我管，亚洲的革命就拜托中国共产党了。刘少奇回来跟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然很高兴，但是这个时候斯大林私下和金日成商定了朝鲜的事情，而背着毛泽东，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将来怎么面对毛泽东？已经把亚洲问题托付给人家了，又在背着捣鼓，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毛泽东不同意的，所以他要解开这个扣。中苏同盟条约刚签订，就背后搞这个事，怎么说得出去？第二，反映出斯大林这个人做事非常缜密。如果他认为美国人一定会出兵的话他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所以他判断没有人会出兵。但万一美国人出兵了怎么办？苏联又不能上，他不能跟美国在朝鲜刀对刀、枪对枪，那时候就只能靠中国人了，所以这是斯大林的一个比较深远的考虑。

斯大林催促金日成，可到了5月12日他还不动身，斯大林着急了，又发了封电报给什特科夫，说怎么搞的？金日成还不去北京？什特科夫跟金日成一讲，第二天，13日金日成就赶快跑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和金日成进行了会谈。金日成说，毛泽东同志，我刚从莫斯科回来，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了我的计划。毛泽东说，不会吧？我也刚从莫斯科

回来，斯大林没跟我说这事。半夜11点半，周恩来紧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把这个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罗申紧急发了个电报回去，14日上午斯大林回电，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菲利波夫同志（斯大林的化名）同意了朝鲜同志们的意见，但是这件事最终要听中共中央同志们的意见，如果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不合适的话，朝鲜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可以推迟，但是到底怎么办你们自己商量。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很难办，他知道斯大林跟金日成确实已经商量过这个事情。所以到15日，两个人再会谈，毛泽东的态度就全变了。

根据驻北京、驻朝鲜的两个苏联大使的报告内容，毛泽东大意上是这样讲的，说金日成同志我不是不同意你用武力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你这样做是正确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但我原来的想法是，你容我先解放了台湾，我把部队往北调，再帮助你一块儿解决南朝鲜，这不是很顺理成章，很容易的事情吗？既然现在斯大林同志和你已经做出了决定，先让你采取行动，那么我就把台湾的事情放一放，你就先打。请你告诉我，现在你需要什么？是要人还是要枪？

金日成当着苏联大使的面，一拍胸脯说，我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扬长而去。所以毛泽东非常生气，而且走了以后就没了消息，从此跟中国之间的电信来往就中断了。实际上从现在看到的档案文献，包括回忆录的材料上看，原来朝鲜人民军确实做了一个作战计划，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打过仗，特别没有打过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参谋部起草的计划很不成熟，实际上朝鲜战争真正的作战计划是苏联顾问制订的，叫做先发制人的作战方案。设计得非常精密，凌晨4点打炮，40分钟以后分七路进攻，哪路打哪，然后包抄汉城。四天以后拿下汉城，整个作战计划非常严密。原来这个计划写的是7、8月发动进攻。但是金日成不愿意，说7、8月下雨了，对进攻部队展开非常困难，必须在6月完成，后来就定到6月25日。当时朝鲜部队的苏联顾问非常多，从排长开始到参谋总部，每人盯一个，整个都是苏联顾问，所以整个战争的策划和准备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起来的。一切做好了准备，6月25日大炮一响，战争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确实非常顺利，按照原来的作战方案，四天以后，也就是6月28日果然拿下了汉城。金日成非常高兴，又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斯大林同志，现在我已然拿下了汉城，准备把朝鲜政府迁到汉城，同时我希望苏联顾问团也迁入汉城，因为我们马上要开一个隆重的庆功大会。电报发过去，斯大林一看这电报，非常生气，马上给他回电，说金日成同志，你只是占领了南朝鲜的几座城市，李承晚的军队都在向南逃跑，你不赶快组织部队去追击，开什么庆功会啊？再说我不同意苏联顾问团迁入平壤，我跟你讲过，苏联人是不能过“三八线”的，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点。金日成一看，还得追？马上重新组织部队，庆功会也不开了，组织两路军团，沿着东西海岸线往下追。

这个时候美国军队参战了，美国反应得非常快。美国为什么会参战？美国原来计划是不参战的，如果朝鲜打起来美军就退守日本海，为

什么战争一打美国又参战了？美国的档案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原来美国对亚洲问题，包括对中国和对朝鲜是什么态度呢，就是等待尘埃落定，不是说要干预中国的事情，或者干预朝鲜的事情，他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底该不该干预，特别是在蒋介石一路败退的情况下。到了1949年12月，这个问题就已经迫在眉睫，必须要解决。为什么？毛泽东已经到了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蒋介石已经到了台湾，苏联可能马上跟中国要有一个新的战略行动，美国就要表个态，到底是继续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2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这个事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军方的意见是不能再退让，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军在中国一路往南打，一路撤退，现在就剩一个台湾，如果美军再撤退，就把台湾让给中共，这会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不能再退让了，一定要保蒋介石，要保台湾。但是国务院的意见不一样，艾奇逊讲，我们现在不能从军事上看问题，必须从政治上看问题。什么叫政治？美国的敌人是谁？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人，是俄国人。如果美国现在把主要的兵力、钱财都用来跟中国人打仗，跟中国人发生冲突的话，只能让俄国人站着看笑话，这样我们从战略上的选择就失败了。所以战略的选择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中国和苏联结成联盟，至少让毛泽东保持中立，这样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就有一个宽大的缓冲地带，就不会发生美苏之间的冲突。

杜鲁门一听说，你讲得有道理，但是怎么不让中国和苏联结盟？艾奇逊说这个非常好办，你把台湾让给共产党，他一定感激你，这样就不会跟苏联结成联盟。这个信息要马上发出去，但当时中美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所以1月5日杜鲁门就公开发表声明，讲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了一场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话当然是说给毛泽东听的，他又怕毛泽东没听明白。所以在1月12日，艾奇逊又发表一个公开讲演，这讲得就更露骨了，说历史上中美就是友好的，中国老百姓你们想想，我们美国人什么时候侵略过中国？到现在中国那么多外国租界地，有美国的租界地吗？没有。“二战”的时候给了中国多少援助？你们想想丢失的东西都哪儿去了？现在新疆在谁的控制之下？外蒙古是怎么分出去的？还有东北150万平方公里现在哪去了？所以他这个讲话一讲完，传到莫斯科，斯大林气得说这不是明摆的挑拨离间吗？

如果中国能接受美国的暗示，不跟苏联签订条约，不搞中苏同盟，美国的政策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美国人没有想到，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了，而且立即公布于众。这样，艾奇逊设想的计划就失去了政治前提，所以整个美国的战略思想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就是4月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现在这个文件，我看在学术界重视得不够，尽管有人专门研究它。因为这个文件原本是针对苏联的核武器爆发，1949年8月份苏联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样就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加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就给美国人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从他们讨论的结果看，

当时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美国的防御就不是一个欧洲的问题了。所谓遏制战略，都是在欧洲的范围内，他不想把事情扩大到亚洲这么遥远的地方。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共产主义就从大西洋一直跨到太平洋了，怎么办？必须全面围堵，全面遏制。所谓全面遏制，按照“68号文件”的解释，就是不能让共产党势力在任何一个方向有所突破。在哪突破就在哪顶回去，这就是遏制。当然“68号文件”只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因为美国决策的程序比较复杂，各个部门提建议，最后形成一个总体文件，然后再分解到各个部门，这还不是具体实施的方案，而是一个思路、思考。

　　但是这个思考，其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就是这个时候，美国的防御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全面遏制的理论出发，美国不能让共产党势力在任何一个方向有所突破，不管是朝鲜也好，台湾也好，或者是越南，这就是“68号文件”的精神主旨。但是因为时间非常紧，还来不及制定实施方案。结果不到两个月，金日成就在朝鲜发动了进攻，所以美国人立即做出了反应。朝鲜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二、中国究竟是怎么出兵的

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共产党顶回去，而这个意见就是艾奇逊提的，他认为这个涉及到美国的声誉问题、名誉问题。如果朝鲜不顶回去，越南、马来西亚都会成为问题，所以现在一步都不能让，必须顶住。现在共产党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突破都要顶住，这就是美国为什么突然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

那么美国参与朝鲜战争，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立刻就引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金日成能不能顶得住？金日成如果顶不住怎么办？斯大林是很有考虑的，所以7月2日苏联大使罗申就找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已经注意到美国出兵了，不知道中国同志有没有做好准备？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应该做好准备。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建东北边防军，要准备集中三个军先到东北。如果美国越过了“三八线”，我们愿意出动陆军跟美国人打，但是希望苏联出动空军。

罗申当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7月5日斯大林直接给周恩来发了个电报，其中谈到他很赞同中国的方案，另外他最后答复，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那么苏联将出动空军协同中国的陆军作战。实际上，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在7月初的时候，斯大林就已经有所考虑，而且做过承诺。

从这以后的情况，大体上是这样，开始朝鲜人民军进展是很顺利，因为美国人开始确实部队调动不过来，美国在日本一共就四个师，所以开始只能靠空军轰炸，最早派了一个营的先遣队在大田着陆，结果全军覆没。朝鲜人民军就是人海战术，像浪一样地就往南滚，你一个营跳伞下来，那不全给卷里头了？所以一直退，退到洛东江，大概到了整个朝鲜半岛南端，慢慢地才稳住脚，美军的登陆也开始在釜山实施。这个时候金日成就感到很没有把握了。我看了一封电报，大概在8月初的时候，因为朝鲜人民军没有经历过这样现代化的战争，所以飞机一轰炸，整个部队全乱了。金日成就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要求苏联顾问必须南下，说苏联顾问不南下我的战争没法打。后来斯大林还是答应了，虽然斯大林很不满意什特科夫首先答应了金日成的要求，但是他也没办法。他也知道如果苏联顾问不南下，金日成的部队真的就乱了。但是他提了一条，可以派顾问去，但是把军装全脱了。谁到南朝鲜去，都算是《真理报》的记者，是自愿去的，跟政府没关系。然后他又跟什特科夫专门写了一段，说这个事就你个人负责，他们死了没关系，但是不能让他们落在美国人手里。

斯大林不想留下一点痕迹，表露苏联在参加这场战争。我还看了一份电报，很有意思，他不是援助北朝鲜一艘军舰吗？苏联人开着军舰就进了港口，进完了人就要走，金日成不让走，说你不能走，你们走了我

们怎么办？没人会开这军舰了。金日成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您能不能把领航员、驾驶员都留下来？都走了军舰没人开，等于没用了。斯大林回电，不行，我可以帮你训练驾驶员、领航员，但是苏联的人员必须撤回，不能参与战斗。包括汽车也是，一次苏联给朝鲜3000辆汽车，朝鲜没有那么多司机，就跟苏联要司机，斯大林说我可以帮你办个驾校，但是要司机没有。后来又找中国要，从东北派了一大批司机过去。当时斯大林的想法就是避免让苏联人给美国留下这个借口、口实。

那么这样，金日成就有些怨气，所以他就跟什特科夫讲，苏联人不帮我，那么应该让中国人来帮我。既然美国都已经出兵了，美国人可以帮助李承晚，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帮助我？毛泽东其实从7月开始就想把部队派过去，从我们现在的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俄国的档案文献来看，他至少三次提出这个问题。

当时中国的设想是这样的，把几个军的部队全部换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变成朝鲜部队，秘密派到朝鲜参战。其实到了8月，在洛东江的战事就处于胶着状态，打不过去，也反攻不过来，毛泽东就非常担心，就通过中国的联络官柴军武，就是后来的柴成文，转告金日成，说现在非常危险。也通过苏联大使转告，几条渠道告诉他。因为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岛国，美军随时可以从两边海岸侧后登陆，如果一旦被切断了后方，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要用重兵来防守东西海岸线，但是我知道你现在抽不出重兵，中国军队可以换上朝鲜的服装过去，帮你守后方，你在前面打。金日成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就找什特科夫，说你请示一下斯大林同志，我们现在想让中国出兵。

结果过了好几天，莫斯科没答复这个事。没答复他就不敢动。就这样，拖到了9月份。当时毛泽东有一封电报说得非常明确，说美国登陆的地点很可能在仁川或者元山，都在“三八线”附近，一个西海岸一个东海岸，两个港口，要特别防着这个情况发生。但是当时金日成做不到。后来斯大林给他一个回电，说你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要老指望别人。我再给你点飞机大炮，装备再给你一些。这样就把他稳住了。

但是9月15日，美国果然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因为仁川那个地方确实是不容易登陆成功的，仁川港外海水非常浅，一年就三四次涨大潮的时候，船才能靠岸，还靠不了大岸，得靠月尾岛，然后换小船再登陆。而这个涨潮的时间，就两个小时。所以两个小时如果没有登陆成功的话，潮水一退，你所有的军舰就搁浅了，那足够让人打半年的。所以美国国防部没有一个人同意麦克阿瑟的计划，但是麦克阿瑟谁的话都不听，结果还就让他蒙着了。按照美国的战史书上讲，仁川这个地方登陆想要成功，想要偷袭成功，只有1/5000的成功率，结果就让麦克阿瑟赌赢了。

9月15日，7万美国人，200多艘大小舰船在仁川登陆，金日成防守的人不到两个营。仁川登陆一成功，立刻局势就完全变了，美国人马上兵分两路，一部分包围了汉城向北，一部分南下就把洛东江，围困釜山

的朝鲜人民军全部给包围了。这时候形势就非常危急了，所以9月17日周恩来紧急召见朝鲜大使，说现在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如果朝鲜政府有什么要求，马上提出来，我们立刻做，意思就是要出兵。刘少奇也传递了相应的信息。

到20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就开始讨论，到底请不请中国出兵？金日成说这事还得问斯大林，如果斯大林同志不同意，咱们也不敢私自作主，于是又找什特科夫，说赶快请示斯大林，形势危急，你得给我答复，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他前面请示了好几回。9月24日斯大林回电，说现在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坚持，革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持。这点困难算什么？20世纪20年代，十四个国家干涉俄国革命，我们正是因为坚持，才战胜了敌人，所以你要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只要坚持下去，胜利终归是你的。金日成一看，明摆的还是不让中国人出兵，让我坚持。斯大林还是不能让中国参与这事。

到了9月27日，汉城已经被重重包围，而南方的战事在平壤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联系完全中断，根本不知道南方发生了什么。后来逃回来一些部队，说部队全部被瓦解了，所以这时面临着一个很重大的危机，如果这个时候美韩联军要是北上的话，“三八线”没有一兵一卒防守。所以他们又开会商量，金日成决定给斯大林写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斯大林同志，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朝鲜劳动党和朝鲜劳动人民英勇奋斗，坚持作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现在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希望苏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给我们以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你认为苏联出兵不合适的话，那么请你帮助我们组织一支国际志愿部队——落款：金日成。然后电报就发出去了。

30日，斯大林接到电报，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这是直接给金日成回的电，说金日成同志，最近我在南方疗养，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大清楚，看来现在你真的是遇到困难了，但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真的出了问题苏联是帮不上忙的，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请中国人出来帮你。这个问题你不用着急，我会和毛泽东谈的。金日成一接到电报，连夜就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援信，现在这个信就在北京军博展览。然后派朴一禹连夜往北京送，他也不等斯大林的答复了。而斯大林10月1日确实给毛发了电报：现在是出兵的时候了，请告以何时出兵。10月1日毛泽东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当时他只是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商议了一下，这个也是回忆录里写的，没有文件。10月2日的凌晨3点，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这个电报我们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发表了，但是只发表了中间一部分，是告诉斯大林说中国同意出兵，10月15日先出四个军，然后是第二批。

等到了天亮了，书记处扩大会议一商量，大家都反对，说现在出兵不是时候，该出兵的时候他不让去，现在让我们出兵，这不是等着送死吗？我们跟美国人仓促作战，也没有什么准备。大家都表示反对，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只能把写好的昨晚那封电报收起来了，没有发出去。晚上他连夜召见了罗申，讲了书记处扩大会议的意见，说我们认为现在出兵

时机不成熟，中国现在很多人反对出兵，讲了几条原因，第一是中国连年作战，现在是军队厌战。第二是民主党派反对出兵，第三是我们要搞经济建设，现在不能再打仗。第四就是即使打了也打不过人家，中国武器装备不行，根本无法跟美国比，出去也打不了胜仗，但是最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这还不是最后的意见，我们还要开会讨论。

罗申连夜把电报就发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接到这个电报以后，5日他又给毛泽东发了个电报，斯大林讲，现在出兵是最好的时机，你要了解大的国际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已经是走向没落，你看日本、德国、意大利都完了，英国衰败了，法国一蹶不振，现在就剩美国了，只要你和我联合，把美国人打败，实现共产主义的日子就不远了。那个时候，你的台湾问题也就顺便解决了。

电报发过来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参加会议的一些人，像聂荣臻、杨尚昆他们的回忆录来看，包括彭德怀的回忆录，当时大体上情况是这样：4日那天的争论没有结果。当时彭德怀在西安，在西北主持军政，也不知道到北京开什么会，以为要开发大西北，卷了一大堆图纸就进京了。进中南海一看，不对劲，大家都死气沉沉的，他也不敢说话，晚上回去就住北京饭店。9点，邓小平去见彭德怀，说出事了，朝鲜打起来了，毛主席坚持要出兵，大家都反对。毛泽东同志让我转告你，明天9点丰泽园单独召见，你好好想想。

彭德怀一夜没睡着觉，主席单独召见肯定是让我支持他的意见。第二天早晨9点他到了丰泽园，一见面，毛泽东就说："老彭你说该不该打？"彭德怀就把他想了一夜的话告诉了毛泽东——如果苏联完全撤手，我们也不能参与。如果苏联半撤手，就是他们能帮我们一把，跟苏联联合，还可以和美国有一拼。毛泽东一拍桌子，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拉着彭德怀就进了怀仁堂。10月5日下午政治局的会议，才做出了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后的决定。

10月6日召开第二次国防会议，10月8日下达了命令，具体分工等等，但是毛泽东担心一件事，什么呢？就是苏联的空军。如果我们把部队派过去，斯大林的空军没到怎么办？所以不行这事，得让周恩来、林彪亲自去一趟，必须让斯大林当面确认这件事。

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就上了飞机，毛泽东同时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说我们现在已经决定出兵，但是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我让林彪和周恩来和你当面商量，他们已经过去了。10日，周恩来和林彪就到了黑海，这个会谈的过程现在没有文件，但是会谈的结果有文件。这个文件是公布得最晚的，大概是2005年还是2006年才解密的，所以黑海会谈一直是个谜，当时怎么谈的都不知道，就是靠当时参与会谈的人的回忆。现在大概情况是比较清楚的，当时周恩来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武装装备不如人，所以非得靠苏联的先进装备。斯大林立即答应，武器装备没有问题，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第二，中国没有空军，只能出陆军，但是一定要有苏联的空军配合，否则的话没法和美国打

仗，制空权都是人家的。斯大林说，陆军准备比较容易，扛起枪就走了，而空军技术性非常强，需要准备一段时间。要不这样，你们先出兵打着，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以后，苏联空军准备好了自然会出动。周恩来一听，心里说这哪行？我们前面打，你万一不去呢？两个半月以后谁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行，要出动咱们就一块儿出动，要不然我们也推迟，我们等你们空军准备好了，咱们一块去。

争论来、争论去，后来斯大林说既然这样算了吧，我们也不出动了，你们陆军也别出动了，放弃北朝鲜，通知金日成到沈阳建立流亡政府算了。林彪一听，这不行，这不是引火烧身吗？朝鲜没打完到沈阳建流亡政府？说，斯大林同志，能不能这样，把金日成同志留在山里打游击，继续牵制美国人？

最后讨论还是没有结果。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就联名给毛泽东发了封电报，说中苏两国领导人经过仔细的磋商，认为现在只能放弃北朝鲜。原因是中国军队没有做好准备——包括空军。一看这文件，就知道肯定是斯大林起草的，空军又不是中国的，什么叫包括空军？下面列了一个行动是大单子，老弱病残撤退到苏联远东，残余部队撤退到吉林和辽宁进行整修，金日成同志到沈阳建立流亡政府，苏联大使协助金日成撤退。最后写了一句，毛泽东同志，最后的意见由你来决定。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以后愣了。连夜把彭德怀全给叫回来了，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仔细看这个电报就知道毛泽东的思路变化，从下午3点接到苏联大使送来的电报，要求当场答复，毛泽东是同意斯大林的意见的，到了晚上的9点50分，毛泽东又回了个电报，还是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也就是说到晚上毛泽东还是决定放弃朝鲜。但是第二天，政治局开了一天会，同样，开会的内容我们不太清楚，现在没有看到文件，但是结果是知道的。这个会开完了以后，毛泽东立刻给斯大林、周恩来回电，给斯大林的回电说，我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还是出兵，即使苏联空军晚到，我们先出兵。然后又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向周恩来说明经过讨论，还是要出兵。其中的原因并没有说清楚，斯大林既然已经给了一条退路，可以不出兵，为什么还是要出兵呢，这也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大的问题。

到了会议结束，毛泽东就把结果告诉了周恩来，但是他跟周恩来讲，还有两个事你必须再找斯大林，第一，他的所有的武器装备我们现在没法给他钱，问斯大林能不能作为贷款，我们打完仗再算？第二，要让斯大林保证两个月最迟两个半月，一定要出动空军。这样我们可以先出动，但是要改变一下做法，先出动但不跟美国人打，找一个地方藏起来，等着两个月以后武器到了，苏联空军到了，再跟美国人打。周恩来这会儿已经回到了莫斯科，见斯大林不容易，斯大林还在黑海，所以他就找了莫洛托夫谈这个事，莫洛托夫跟斯大林商量，最后答复是这样，首先说武器装备以贷款的方式提供给中国，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按半价计算，打完仗再还。第二，说到空军，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会过鸭绿江。周恩来一听就急了，我们是在朝鲜打仗啊，空军不过鸭绿江，算出战吗？于是打了电报告诉毛泽东，跟着坐飞机就回来了。

毛泽东一接电报赶快把彭德怀又给叫回来，那时候彭德怀的42军先遣部队已经渡过江了。18日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给四野十三兵团发了电报，照原计划出动。所以在10月19日的晚上7点，东北边防军就建制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25万人悄悄渡过了鸭绿江，中国军队就出动了。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这涉及到苏联出兵的问题。说到这里整个出兵的过程就结束了，但是苏联出兵的情况还要补充一点，这个情况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苏联国防部的档案，苏联空军早就做好准备了，什么时候调动哪个部队，后勤等等，都布置得非常严密。但是他就不告诉中国，因为他跟毛泽东心里都不知道对方在琢磨什么，斯大林怕毛泽东算计，毛泽东也怕斯大林算计，从这里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极端的不信任感。

但是中国决定出兵这件事，确实让斯大林非常意外，而且非常感动。为什么？在朝鲜有个蜂腰地带，比较好防守，毛泽东原来准备把部队安置在那里，不出战，等苏联的武器装备到了再开始，至少构筑一条防线，让它远离中国的国境。但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军事文集》来看，我们发现中国的情报大体上都晚到两三天，比如根本不知道平壤早已经陷落，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平壤陷于重围。所以，中国军队出去的时候是走山上，麦克阿瑟指挥的两军北进是走山下，这一下根本就没到预定的防御地点，两边军队就错过了。彭德怀回头一看，呦，美国人在山下呢，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是遭遇战，双方都没准备。但是中国人反应快，美国人傻乎乎的按照军令，该扎营扎营，该睡觉睡觉，一下子被中国人包围了，给打懵了。这时候是10月25日，所以中国宣布出兵的时间，也就定在了这一天。实际上19日出兵，那为什么宣布中国志愿军是25日出兵呢？其实25日是打起来的那一天，这一打事情就公开了。

因为麦克阿瑟也懵了，说哪来这么一股部队？不知道怎么回事。彭德怀很聪明，打完仗一下军队全进了大山。美国人打完，说人呢？麦克阿瑟坐飞机上去视察，那会儿已经下雪了，白雪皑皑一片，上去一看，怎么没人呢？所以他回去给国防部发电报，说小股流窜部队，不足为患，让部队继续前进。正好就进了彭德怀的口袋。彭德怀打完仗以后部队全后撤了，美国人想不到，这一前进正好进了中国的口袋，所以第二次战役是伏击战，完全把美国人打傻了。斯大林一看这情况，中国人真的出兵了，而且出兵就跟美国人打上了，不得了。

于是28日他就通知了苏联空军部队，立刻升空，协助中国陆军作战。我们现在知道，苏联空军第一次空战是11月1日，就在安东上空，而且第一次出战就越过鸭绿江，不可能不越过鸭绿江，不越过鸭绿江根本没法跟美国的飞机打仗，因为美国飞机也接到命令，也不能越过鸭绿江。现在看美国远东空军的作战命令，非常有意思。他让美国飞机轰炸鸭绿江大桥，鸭绿江大桥有一半在中国，有一半在朝鲜，他的命令写着只能炸朝鲜这一半，不能炸中国那一半。这桥一定要炸掉，因为不炸

掉，后勤源源不断地来，但是你不能炸中国那一半。真的很准，现在去丹东看看，真的就是炸的朝鲜那一半，中国这边鸭绿江大桥好好的在这里。关于轰炸鸭绿江大桥，就我现在查的结果是当时美军轰炸安东是误炸。后来我采访安东市当时的市委书记高扬，问他到底美军是不是轰炸安东市？他说是误炸，就两颗炸弹。我相信他的判断，因为如果美国想炸，安东早就成一片火海了，那时候整个天空都是美国人的，而且他门空军也不会下这种命令。

为什么会发生误炸？我当过海空航空兵，而且就是轰炸机部队，如果只炸朝鲜这半边，飞机必须顺江飞，才能保证炸弹不会偏离到中国去，因为炸弹是45度角往下走，只能往前走和往后走，不可能拐弯炸到哪儿去，所以这个航线也是美国远东空军轰炸的一个模式，就是顺江而飞。但是顺江而飞对飞行员非常不利，高射炮在这儿架着，飞过来一直打，不定哪个炮碰上就打下来了，损失非常大。于是，有的飞行员就改变了飞行的方向，没有顺江飞，而是横着飞。这样，高射炮对着的是一个点，而不是一条线。但是横着飞就出现一个问题，稍微晚一点摁按钮，炸弹就会落到中国的境内，而且飞机也必然进入中国领空。

11月1日以后苏联空军连续出动，后来人数不断地增加，飞机不断地增加，前前后后苏联有10个空军师26000多人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空中作战。大概在1952年以前空战基本上都是苏联人帮着打的，因为那会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刚学怎么驾飞机，根据苏联的材料记录，苏联空军是不跟中国空军联合作战的，技术条件相差太远，没法联合作战。比如，飞行员分四种，白天简单气象、白天复杂气象、夜晚简单气象、夜晚复杂气象，四个天气都能飞的叫全天候飞行员，那会儿苏联差不多都是全天候飞行员，中国空军志愿军全军就两个，所以中国的空军不是说上就能上的，主要是在外围。到了1952年以后，中国空军的参战力度才开始加大。

抗美援朝战争，陆军主要是中国的，后来朝鲜虽然有几个兵团恢复整建，但是基本上作战还是靠志愿军，他们没起太大作用。但是空军主要靠苏联，这样，在朝鲜战争过程当中，中苏并肩作战，还有很多战略决策方面的一致性，刚刚建立起来的中苏同盟关系才得以稳固和发展。

好啦，朝鲜战争起源的过程大体上我给大家疏理了一遍，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讲到这里吧。谢谢。

主持人： 因为大家对台湾问题都比较关注，所以有一种说法说朝鲜战争打断了解放台湾的进程，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沈志华： 对，这个说法在一般民众当中是流传比较广的。其实学术界原来也有很多人是这种看法，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为什么？我刚才其实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过程，从这里面应该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68号文件”，其中就包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所以实际上，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就是5月到6月的时候，美国军方已经改变了

对台湾的政策，提出了各种建议，包括增加军援、派顾问团，甚至包括第七舰队北上。这些方案都不是在朝鲜战争之后提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争之前，只是当时这个方案跟原来的既定方针是矛盾的，他需要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正在走的过程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了。所以我觉得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促进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而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引起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这就是我的结论。

主持人： 大家都认为朝鲜战争打一年，应该可以结束了，为什么会拖延数年？有一种说法是这么说的，毛泽东当时察觉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的联合国决议是个极大的错误，因此导致1951年未能实现停战，您认为呢？

沈志华： 你是说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中国不想停下来。为什么？因为中国出兵以后形势非常好，一直赶着美韩联军往南逃。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其实国际舆论都是要求停战，因为“二战”刚结束，又爆发这么大的战争，大家都有一些恐惧感。开始停战的条件对中国不是特别有利，但是志愿军出兵以后，尤其是打过“三八线”的时候，联合国提的条件已经非常有利于中国了，这就是1951年1月11日印度等十三国提案。这个提案讲什么？就是只要中国同意停火，双方撤军，召开国际政治会议，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然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等，一共有五点。如果当时中国接受这个方案，战争肯定能停下来。但是当时，联合国的议案首先要美国同意，否则美国一票否决，不同意这个方案，提出来也没有意义。

于是，这个议案就先送给美国征求意见。美国当然是不想停战的，他们吃这么大亏，“二战”以后那么耀武扬威，没想到被中国人打成这样，而且打完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他们要坚持不停战的话，国际舆论他们又受不了，说提了这么多提案就是因为美国不接受，所以战争停不下来，最后要美国来承担这个责任。美国总统想来想去，最后没办法，左右为难。这时，艾奇逊给他出了主意，说我建议你同意接受这个议案，为什么？我估计中国不会同意。如果那样就太好了，你同意停战，中国不同意停战，那么将来所有的罪名全是中国的，这个事只能一赌。杜鲁门想了想也只能这样，所以他就同意了，联合国就把这个方案给了周恩来。

果然，中国不同意接受这个提案，这一下美国人正中下怀。这事的结果对中国非常不利。首先，在政治上所有世界各国舆论都认为是中国不想停战，战争继续的责任完全在中国。其次，在外交上也很不利，联合国跟着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一下子就使中国陷入孤立境地。再次，在军事上更为不利。为什么？其实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是要求停止进攻的，他为什么要求停止进攻？是因为中国整个的后勤没有保障，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发了个电报，但是毛泽东说不行，这不是个军事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必须过“三八线”。这是第三次

战役。第三次战役几乎就没打，中国军队一过“三八线”美国就撤了。所以彭德怀就给中央军委写信，说这很蹊跷，美国人马上撤退了，不能再深入南进，再南进就要犯金日成过去犯过的错误。所以毛泽东同意暂时停战休整。但是这个停并不是说整个战争停下来，而是休息以后再往前打。毛泽东为什么做出必须过“三八线”这个决定？其实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压力，包括金日成和斯大林的意见。所以从军事上讲，这时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军队没有能力再战了，而美国人恰恰相反，美国虽然没有士气，但是军事上没有什么损失。

后来麦克阿瑟因为跟杜鲁门闹矛盾被撤职了——你知道麦克阿瑟后来牛到什么程度？10月的时候，杜鲁门想了解一下中国到底会不会出兵，就问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却说自己没有时间，回不了美国，于是要总统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威克岛会面。后来因为他总想把战火烧到中国去，结果两个人矛盾激化，麦克阿瑟被撤职，接替他的是谁？李奇微。李奇微到部队一视察，发现美国其实军事上没有什么损失，全是机械化部队，跑起来很快，又有后勤部队保证供应。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所以我认为，第一次时是中国犯了一个战略性决策的错误，导致朝鲜战争的继续延续。等到第四、第五次战役，美国已经打回了“三八线”，形成了拉锯战，中国才决定停战，但是现在停战，什么条件都没有了。而且中国都不好意思提出停战，只能求苏联帮忙。这时斯大林出面找美国要求停战谈判，于是开始开城谈判。

这一次是美国不想停战，因为这时他们正占优势，而且当时有个对日的和约问题，美国想在签订和约后停战，这样在战争中的中国没有办法参加，如果先停战再签和约，就没有理由拒绝中国参加对日和约，所以停战谈判的时候，美国就开始胡扯，制造各种事端，把谈判拖下去，一直拖到《旧金山和约》签字，美国人要求赶快停。但是这时中国又不想停了。因为过了一年，苏联的武器装备全到了，中国部队也训练出来了，坑道也挖好了，正憋着股劲要跟美国人打一场，这是第三次。

所以一次一次，一直拖到斯大林去世。其实斯大林是支持中国的，他让中国一边打一边谈，不能让美国人踏实。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必须得停，后来通知中国和朝鲜，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朝鲜战争就结束了。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延长了这么长的时间。

主持人：战争之后带给人们的总是很强烈的反思。有人说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国家实力，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根本性的错误，而且花了太多的钱，以至于是最后导致国家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不知道沈教授是怎么看待的？

沈志华：关于中国出兵的评价问题，确实是众说纷纭。因为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评判。我想我们还是应该从当时毛泽东本

身的思考来做一个判断。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我想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是非常实在的，就是所有当时反对出兵的人有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是出去以后要打胜仗，不然出兵就没意义了。打败了，搞不好还引火烧身，你还出兵干吗？这个道理按说很简单，毛泽东不懂吗？不会不懂。所以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说打败了也得出去打。这就说明他不是从军事上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从军事角度看，胜败才有意义，而他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为什么从政治上考虑？这就要把朝鲜战争之前中苏关系的背景搞清楚。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造成了中苏互不信任的结果，至少是毛泽东跟斯大林互不信任。斯大林想维持1945年的那个条约，条约规定外蒙古独立，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合营，旅顺港租给苏联三十年，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够同意保留这个条约，而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废除这个条约，他要把“中长路”要回来，要把旅顺港要回来，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要回来了。这时斯大林的心里是怎么想毛泽东的呢？这个人太难对付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把我斯大林逼到这份上。所以他后来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就是发动朝鲜战争。

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因为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苏联失去了旅顺港和中长路，意味着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在亚洲的战略基点从此消失。因为苏联依靠的就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结果造成中苏之间的极不信任，毛泽东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回国讲，他说这个条约签订是我虎口夺食给夺回来的。

事情结束后，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解放台湾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中共有能力的话，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内立刻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中共并不知道美国的政策发生变化，是估计自己的能力打不了才放弃的，但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能力打不了蒋介石呢？这就涉及到苏联的军援问题。

当时国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主要看双方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人放弃对台湾的援助而苏联人大量援助中共的话，打台湾没问题。相反，美国人加大了对台湾的援助，而这时候斯大林放弃了对中国的援助，他决定发动朝鲜战争以后，把原来答应给中共的飞机和军舰都给了金日成。这种情况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所以就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在朝鲜遇到危机的情况下，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中国不出兵，不管是什么原因，就真的放弃了北朝鲜，那么就彻底得罪斯大林了，中苏同盟就真的会出现裂痕了，而这样一种结局，从政治上讲，对中国更不利。因为你已经得罪了美国人，现在又得罪苏联。历史发展就是这样，你走了第一步就决定了第二步，你走了第二步就决定了第三步的方向。

所以我想，毛泽东出兵，应该说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巩固中苏同盟，当然实际上也是考虑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因为他刚刚掌握这个政权，社会动乱、经济萧条，中共地位尚不稳固。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苏联

的援助，这个政权很难维持下去。所以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主要是为了巩固中苏同盟，而巩固中苏同盟是为了新中国的稳定。人们所谈的付出的代价都是物质性的，但是这是迫不得已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的话，很可能造成斯大林跟中国的关系破灭。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

主持人：对于朝鲜战争有一位美国将军说，朝鲜战争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役。历史的真相真是这样吗？

沈志华：这是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的，原话是这样，没错，但是有一个前提，他不是讲美国参与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按照这个意思说，美国人都承认自己参战是犯了错误。其实不是，当时他是跟麦克阿瑟在争论，如果我们把战火引到中国去的话，这场仗怎么打。

麦克阿瑟的意思说，不能光在朝鲜打，朝鲜这么小的地方，而且那帮人不遵守战法，白天不好好打仗，晚上来两枪，声东击西，弄得美国人都懵了，不符合战法，不跟他们打，我们直接轰炸北京，轰炸青岛和天津，这就是麦克阿瑟的想法，但是美国政府说这样做不是扩大战争吗？轰炸了中国，苏联再轰炸咱们，再轰炸日本，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起来了。那时候美国人并不想发动大战。但是中国，苏联都判断错了，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不是说美国参与朝鲜战争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而是说美国如果把战争引到中国去的话，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还有歌曲《我的祖国》《中国志愿军军歌》，这些都让我们知道中国志愿军这样一个称号。当时出兵朝鲜的时候，我们的志愿军真的就这么一下子定下来了吗？

沈志华：从现在看的文件上看，志愿军是到了决定出兵的时候才定下来的，应该是10月6日的国防会议，毛泽东的命令是10月8日签署的。关于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有人说原来是支援军，后来改成志愿军。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能存疑，因为我没有找到文献，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看到档案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时间大体上就是在10月6日到8日这段时间。

（2010年3月27日在浙江宁波市图书馆的演讲）

第五讲 苏共执政七十四年留下的历史启示

郝振省：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下面请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沈志华教授隆重登场。由于时间关系，我作两点铺垫。

第一点，就是关于沈教授本人的，可以说沈教授他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在前苏联的历史、中苏关系史和国际冷战史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甚至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为了取得一手资料，他在苏联解体以后，俄国史学界比较困难的时期，以私人的身份斥资数百万元从俄美购得大量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并且向学界无偿地开放。

另外，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在社科院发起读书活动，他的经历有点儿传奇。从1996到2002年间，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4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引起轰动。2004年，他从体制外回归到体制内，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这是他的简单介绍。

第二个铺垫就是今天的演讲题目，大家也看到，主要就是苏共的执政和苏联模式对我们的启示。这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同志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有人说苏共35万党员的时候夺得了政权，5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法西斯、希特勒，当它有二千万党员的时候失去了政权，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深思吗？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我们的专家，请他给我们分享他的科研成果，让我们欢迎沈志华教授。

沈志华： 没有在这种场合下讲过，原来都是在学校给学生讲，比较随便，刚才一看这么多领导干部，有点儿紧张，如果讲得有什么不正之处大家批评。

我先解释一下这两个题目："斯大林模式"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斯大林模式"有点儿刺眼，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问题二十年了，这是中国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四年会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政权？我想分几个问题讲，首先主要是讲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题，其次什么叫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然后讲苏联历史上三次改革的机会以及为什么会错失。

因为苏联解体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失败，在冷战当中双方对峙、对抗了半个世纪，最后以苏联解体为终结。这件事发生以后，在美国主流媒体和舆论当中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就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所以现在美国人看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一起开会，他们总讲，现在我们可以把冷战的责任都推给苏联了。像盖迪斯，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冷战史专家，他出了一本书——《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什么了？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了整个这五十年世界的对抗，战争，最后的责任是在苏联。因为他搞了社会主义，现在它失败了，所以全世界都要跟着美国走，他们就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论坛上。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最近我也在写一本书，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的一部分，就是讲冷战与重建——斯大林的最后年代，讲从1945到1953年，究竟这个冷战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说到苏联解体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分解一下，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要有一个区分，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原来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曾经在欧洲风靡一时，为什么？到了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道路又在世界上风靡一时，你不要说苏联、中国、东欧，就是非洲、缅甸等等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实社会主义的出现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要发展的，都是要进入现代化的。它怎么进入？原来是有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恩格斯曾经总结过的那些资本主义实现原始积累的条件，黄金、奴隶贸易、殖民地的问题等等，到了20世纪这些条件对后发国家来说都已经没了。

后发展国家怎么实现自己本国、本民族的现代化？于是人们看中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总结出来的是一个理论上的，因为马克思他毕生的经历其实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达到顶峰了，而它自己的内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内部是无法解决的。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只能靠外力打碎这个国家机器，构建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初期阶段。那个时候他设想得很简单，就是消灭私有制。但实际上实现马克思这个理想的，不是在马克思认为应该实现社会主义的那些地方。很简单，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基础是英国的经济，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他认为出现的矛盾和无法解决的矛盾，都是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后来实践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恰恰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俄国。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出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要说它是斯大林的模式？我们下一步讲，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逻辑上讲是这样的，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终结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终结。逻辑上是可以这样讲的。那么为什么苏联失败？有很多说法，我想至少有一种说法是靠不住的，是没有道理的。这种说法就是过去很多人都讲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叛变。

我谈谈我的看法，当然学者当中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认为就是

戈尔巴乔夫叛变，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太简单了。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起这么大作用？这就使我想起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话，关于“出卖论”，他的大意是讲我们很多人就是革命运动一遭到失败，追根寻源的时候就说某人叛变，他出卖了什么什么。他原话说“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的本钱就依赖于某个公民的忠诚上，那太可悲了”。

大家可以看看《马恩全集》第11卷。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看中国自己的，中国曾经也有中央领导有逃跑的，也有叛变的。中国共产党倒了吗？没倒啊。这样的解释是一种政治情怀，是一种发泄。包括苏共党内，我们跟他们接触，他们也都赖到戈尔巴乔夫身上，说这是他造成的。不错，戈尔巴乔夫是有责任，面对危机他处置不当，但是苏共失去政权的根本原因如果要归结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身上，这不是一个科学的看法，不是一个历史的看法。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又是导致一个接班人的问题。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中国搞了多少年了？苏联搞了多少年？结果我们还是把整个国家的希望，整个党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接班人的身上，这不又回到《九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去了吗？怎么选择无产阶级接班人？不是这样，问题比这复杂得多。

所以讲到苏联解体的原因，这二十年来中国的学者，包括俄国学者从各个角度都进行过探讨，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宗教、民族，确实有很多原因。我是想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理解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换一个角度，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问题不是到90年代人们才发现的，早就知道它有问题。你早干吗去了？七十四年你都不改？所以我想探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苏共执政这七十四年当中，它发现了问题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使苏联的社会主义走进了死胡同。说这个人有病早就知道，你为什么不治它啊？到你最后治的时候晚了，已经病入膏肓，抬到手术台上了，结果就没下来。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看苏联的历史，究竟这个制度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发现了问题以后有没有改正的机会，有没有改革的机会？有，我总结有三次。

我们先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十月革命现在也有很多争论，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和我们原来的理解很不一样。我说十月革命有它历史的必然性，是指一种历史趋势，是人们选择的时候，它已经无法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列宁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其实他并不清楚。如果你看看《国家与革命》，那个时候他在瑞士，他的整个思路跟马克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要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搞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成功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包括列宁跟德国人的交易，要不然他回不到俄国去。当时“一战”的时候，德国两线作战，西线跟英法作战，东线跟俄国作战，它很想跟俄国停战，然后集中精力去对付英法。当时俄国临时政府没人敢签这个协议，后来找到了列宁，列宁说我要掌握政权，我跟你停战。结果德国人给了2600万马克给布尔什维克，用火

车把列宁送回俄国去了。当时为什么追捕列宁？大家看《列宁在十月》的电影，那里有很多假的、编造的东西，但是当时追捕列宁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他和德国人合作。列宁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管别的，先拿下政权再说，然后我再搞我的土地、和平、社会主义。所以他就成功了。

原来我总是不明白这个《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列宁非要签订这个和约，现在清楚了，就是因为原来他有过这个承诺。所以，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有它很大的偶然性。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原来他也没有想直接搞社会主义，但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通过让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决议，所以他解散了会议，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这个时候，因为俄国单独跟德国讲和了，所以最后遭到十四个国家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体制，这就是1918年到1921年的状况，或者叫“战时共产主义”。就是国家权利高度集中，没有货币，没有流通，所有都是配给制，是为了在战争的环境下来应付这个局面。

在农村搞农村的十月革命，就是消灭个体户，搞集体农庄，特别是搞公社。但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内战胜利了，把十四国的武装干涉都赶走了，白匪也给镇压了。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政权的危机不是来自国外帝国主义，也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动派，而是来自国内的工人和农民。当时有十三个省农民起义，为什么？你把他们的粮食都收走了，搞“余粮征集制”，所谓余粮征集制就是粮食征集制，根本不是余粮，都带着机关枪下去征集。你看《列宁在1918》的电影演的那段，当然电影的观点是觉得他征粮是应该的，因为征集的对象全是富农，其实不都是富农，甚至多数不是富农。

农民起来反对，跟着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我们书中的第二个专题写的就是这个。过去书上都说这是叛乱，实际上喀琅施塔得核心的人物都是工人。列宁在这件事情里头，虽然他把这个事儿镇压下去了，但是他看到了核心的问题，就是工人反对我们，工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因为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口号是不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这是一次政治危机。所以列宁就果断做出了一个决策，搞“新经济政策”。这就是第一次机会，第一次改革。所谓“新经济政策”其实很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就是在农村包产到户。他没用这个词，其实就是鼓励独立农户，解散集体农庄和公社，在城市恢复商业，恢复个体工商等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现在俄国出了四卷本的档案，整个的这个过程档案材料已经非常丰富，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开始布尔什维克的认识很简单，他说没办法，必须得退一步，我不让步这个政权就没法维持。对工人让一步，对农民让一步，对城市的手工业者都让一步，所以很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但实际上到1923年的时候，列宁写《论合作制》那篇文章的时候，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很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要找的那个制度，就是通过合作

制，来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当时谁比较理解他的想法呢？是布哈林。当然列宁去世得比较早，他到1923年写完文章以后基本上管不了什么事儿了，布哈林按照列宁的想法，提出了很著名的口号——“发财吧！”后来受到斯大林的批判。这很像我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就是鼓励你去发财，为什么？因为原来人们都不敢发财，那么经济怎么发展？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发财吧！”

“新经济政策”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列宁和苏联领导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新问题。那时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计算”。你要学会计算，计算后来就是计划。所以“公有制加计划”就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对市场经济、市场管理、价格问题有很深的研究。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双轨制”的问题，“剪刀差”的问题，商品荒的问题，贫富差别问题，后来又出现了1927年的谷物危机。你面对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两种办法，一个是往前走，一个是往回走。这个时候和苏联的党内斗争就联系起来了。

列宁去世的时候，斯大林只不过是一个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这个总书记原来的地位是很低的，总书记就是总秘书，整理整理文件，发发通知。即使是这样，列宁也有担心。后来斯大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他把政治局和组织局都纳入到总书记的下边。因为当时在苏联有很多革命家，一个最有名的是跟列宁齐名的，就是托洛茨基，再下面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几个人，后来才轮到斯大林。

列宁的担心很有道理，他说斯大林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合适？请中央同志们考虑。斯大林这个人很有组织能力、工作能力，但是他性格粗暴，在这个位置上未必合适，希望同志们在一定的时候把他拿下来。斯大林非常聪明，他就挨个地征求意见。其实最早他直接竞争的对手是托洛茨基，他联合所有的领导人，先把托洛茨基干掉，又联合布哈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干掉，这个时候就面临跟布哈林的争夺了，冲突就是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布哈林提出来要继续搞“新经济政策”，谷物危机的问题不是富农屯粮，是我们的价格问题、是销售合同等等，他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斯大林说不对，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样一直争论到1929年的时候，他就把布哈林打下去了，从党内当时多数干部的思想状态来讲，是支持斯大林的。因为阶级斗争的问题，消灭商品，这个原来在党的原则当中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跟商品是两码事，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商品呢？没市场哪来的商品？搞公有制，怎么能允许有小商小贩、新经济人，随便来回走动？所以斯大林认为，只要重新搞集中，这些问题都由国家一揽子全解决了，不用考虑这么多复杂的问题。

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先搞的就是全盘集体化。这就是从

1930年到1933年大规模推行全盘集体化。苏联的集体化推行是费了很大劲的，跟中国农业合作化是完全不一样。所以1955年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兴奋，中国怎么可能这么快？当时苏联搞了好几年，死了多少人啊？农民不愿意进入，不愿意进入怎么办？是富农的，举家搬迁，都给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用火车把几百万人送到西伯利亚去，剩下贫下中农搞集体农庄，贫下中农没有财产，因为集体化就有财产了。

就这样，还是有整村反对的。最后斯大林派飞机轰炸，大炮拉过去，不搞集体农庄就炮轰村子，集体农庄就实现了。集体农庄的一个主要目的，他认为计划经济农业是最不好进入的，工业好进入。他认为这样一来，又有了工业的积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一个前提是你要搞工业化必须有积累，但是原来那些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现在社会主义都得不到了。金矿没了，奴隶、贸易、殖民地也没有了。贷款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要消灭苏联，他们怎么会借款，所以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办法就是搜刮农民。

斯大林用了一个理论叫做“贡赋论”，就是农业先给工业积累资金，然后等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再来投入农业，这就是斯大林的一个思路。所以他跟着就搞了工业化，就是1933年开始，集体化完成，开始搞工业化，到1936年工业化完成。这样一种体制，在工业当然就是国有化城市的那种集中，再加上计算，就是进入计划体制。

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苏联确实是工业化搞起来了，而且正好这个时候赶上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当时苏联人非常得意，当时全世界人都看到，说苏联经验好啊，美国那边一片萧条，资本家全跳楼了，这边工业化一下起来了。当时是没法细分析它的代价问题，它的成本问题等等。看现象，这个社会主义搞得很红火，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但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来讲，他们也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干预的有效性。其实也是从这里资本主义，像后来“罗斯福新政”，和后来“凯恩斯主义”，其实吸取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的内容。在一些重大的投资，重大的项目上国家直接干预，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

所以到这个时候，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再到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就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和1918年到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极其相似，实际上它是一种战时的体制。搞经济学的对这方面分析得更全面、更透彻，简单讲就是集中，资源调配很有优势。所以国家可以干大事儿的时候，其他可以不发展，你要让资本家自己投资就不一样了。俄国可以啊，发展军工，发展重工业。其实到了3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矛盾也开始积累，但是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就是战争威胁。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挽救了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

为什么？因为这种经济体制比较适合于战争，英国到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也搞战时体制，但是这种体制不适合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下的建设。

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斯大林就放弃了“新经济政策”，而建立了一套新的体制，我们把它称作“斯大林模式”。换句话说，如果列宁多活几年，我判断斯大林不大容易得势，因为他们俩的矛盾非常深，特别到了列宁晚年的时候，斯大林跟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已经不说话了，列宁后来给斯大林写了一个便条——鉴于你对克鲁普斯卡娅粗暴的态度，我们俩的私人关系从此断绝。但是列宁死得比较早，布哈林那会儿又年轻，而且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又不大会政治里的这些事儿，很容易被斯大林给打败了，这样很容易这个体制就建立起来了。

到了战争的时候，人们就误会了这个问题。就以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体制，苏联怎么能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史学界很多人有这种看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巧合。因为战时体制可以临时建立，你不能因为它适合于战争，正好战争发生了，你就认为这种体制是非常成功的，它只不过是适合于战争。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苏联战胜希特勒也不完全是靠这种体制。它有很多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农民反抗。德国人进入苏联境内的时候，很多农民都表示欢迎，整村整村的反叛了，他们不愿意再受这个压抑。这种情况很多，平常人们不敢讲，他不想进入集体农庄，你逼着他进，现在可来一个人给他们解放了。所以很多人给德国人引路，接着往下打。再一个，美国的物资援助有很大的作用，苏联打仗不全凭他的武器装备。

斯大林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完全知道，斯大林是何等聪明的一个人。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就是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的机会。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苏联的第二个机会就是“二战”。

对“二战”后的情况，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整个国际环境。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原来是很孤立的，但是战争使他受益匪浅。主要就是因为希特勒进攻了苏联。历史有时候很难假设，原来斯大林是怎么想的？他知道战争已经威胁到俄罗斯的领土了，但是他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他要什么呢？他要占领波兰，要占领波罗的海三国，要占领芬兰。这样才能在苏联的西北部构筑一个缓冲地带。

这个条件，当时他有两个谈判对象，一个是英法，一个是德国。谁能保证苏联的斯大林的条件，他就跟谁合作。所以先跟英法谈，谈不拢，这边秘密地跟希特勒接触，最后希特勒全答应了，波兰、苏德一人一半，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尽管占，打芬兰德国支持，所以1939年苏联就签订了苏德秘密条约，跟着两家就瓜分了波兰。所以最近为什么波兰总统的飞机出了事，人们就大讲苏联和波兰到底有什么宿怨，这宿怨大了去了。瓜分波兰后，跟着就是一万多波兰军官在卡廷被苏联给埋了，再就是1944年的华沙起义，人家起义了，苏联红军到了华沙城下坐山观虎斗，不搭理人家，最后起义军都让德国人给消灭了，你说波兰人能不恨苏联？这是题外话。

本来斯大林认为他赢得了时间，而且构筑了防御带，但是没想到希

特勤很快就发动了进攻。打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这个时候给苏联提供了机会，就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这会儿跟英国、美国，跟西方结盟了，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的国际格局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大家都承认苏联了。不管你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咱们是朋友，咱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个时候斯大林看到一个机会，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解散共产国际。很奇怪，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解散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都蒙在鼓里，都不知道。斯大林一道命令，几天之内解散共产国际，把报告、计划交上来，共产国际这些人全傻了。

原来在人们眼中共产国际名声很不好，共产国际最早是1919年列宁缔造的，他是想通过共产国际发动世界革命，后来没搞起来。到了30年代就变成了苏联的外交工具，完全听苏联的。所以苏联当时跟英法谈“集体安全”的时候，共产国际就下命令说，各国共产党都要支持你们政府，法西斯德国是一个威胁，最坏。各个共产党都发表文章，发表讲演。突然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条约，共产国际又下指示说德国还是不错的，它有社会主义成分，最应该反对的是你们本国政府，所以大家起来都写文章反对本国政府。

结果到1941年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又发指示，其实最坏的还是德国，结果各国共产党在本国挨骂，说你们完全是苏联的传声筒。所以“二战”开始以后，特别是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以后，很多人认为共产国际应该解散。但是斯大林那会儿没有解散，因为共产国际很有资源，后来解散的时候看档案材料，有很多培训学校，培训间谍、收发报的、爆炸的，各地建电台、档案室、图书馆、干部培训学校，整个一个大的王国。所以斯大林那会儿还没有想明白这个事儿，他不想把这个资源抛弃，但是为什么1943年5月他抛弃了？那个时候是欧洲战场转折的时候，因为到3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了，苏联已经翻盘了，形势开始向好转的时候反而解散了共产国际，为什么？

斯大林想到的就是战后的安排，因为战后他决定要跟英美合作，要跟西方合作。共产国际口号就是要搞世界革命，把资本主义统统消灭光，人家怎么和你合作，左手给你贷款你右手要消灭我，不可能啊。所以他一定要解散共产国际，然后就跟美国谈。所以大家看战后的国际体系，其实是苏联和美国共同缔造的，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等等。

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构建了战后的国际体系，而苏联正是缔造者之一，就是说它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制造者。所以它必须遵守这个规则，什么规则？就是和平共处。这个时候在国际上已经有这么一个客观的环境，客观条件允许他这么做，所以斯大林采取了联合政府的政策。因为他答应美国人，东欧划作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保证东欧不搞一党制，搞选举制，公平投票。所以你知道苏联红军打进东欧的时候，那些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开始非常高兴，说现在轮到我们掌权了，苏联说不行，你立刻建立农民党、自由党什么的。他们说没有，那也要建，要搞多党制，这样美国才能接受这个势力范

围。

1945年到1947年的时候，东欧都是多党制，都是在苏联的扶植下搞起来的。斯大林还有一个口号叫“条条大路通罗马”，说搞社会主义各有各的路，你们不能学苏联，苏联搞无产阶级专政，苏联搞计划经济，你们还不到这个条件，你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叫民族社会主义道路。那会儿东欧国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社会主义方案。

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劝说共产党放下武器，进入政府。法国共产党那会儿多厉害，50万武装力量掌握在法国共产党手里斯大林就把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叫到莫斯科谈，他说你回去把武器放下，加入政府。然后斯大林跟戴高乐谈，说你要接收多列士。多列士那会儿他是被法国政府通缉的共产党总书记，因为他反政府当然要通缉他了，多列士就逃出来了。这时候斯大林跟戴高乐做了一个交易，说你让多列士回去，我保证让共产党武器都放下，这样就解决了法国的问题。然后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掌握25万军队，斯大林同样把领导人陶里亚蒂叫到莫斯科跟他谈，回去也是这么办。再就是希腊，希腊共产党马上要夺权了，斯大林说不行，因为希腊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当时希腊是斯大林答应给英国的，所以共产党必须得加入政府。

中国也一样，1945年日本刚投降，中共那会儿连下几道命令，立刻让新四军占领东南各大城市，然后任命了江南五省的省长，上海市、南京市的市长。另外华东局打报告要求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请新四军配合，里应外合拿下上海。毛泽东当即批准，立刻执行，说别的地方也可以参照这样去办。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说苏联不让他革命，就是斯大林给他来个电报说不行，让他马上去重庆谈判，建立联合政府。所以这个是当时斯大林的从外交的角度考虑的整个一套，他的整个的思路就是放弃世界革命，他认为就是不要革命。

从国内来讲，也确实有这样一种诉求，就是原来苏联是个封闭的社会，老百姓不知道外边什么样。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打，几百万苏联红军一下到了欧洲，这下开了眼了。你就看俄国档案里全是来回写信，当时苏联有邮检制度，来回的信件能弄出来再装进去再发走，现在这些信全解密了，反映出这些苏联红军到了东欧以后的体会：说匈牙利怎么这么发达，他们家里还有马桶，什么谁谁家挂一个壁毯，在俄国都是贵族家里才能挂的。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咱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不如资本主义，说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如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确实让苏联人感到心态不平衡，你就别说这些底下的老百姓，当兵的，就说朱可夫。那是欧洲占领军的总司令，朱可夫战后因为功高盖主，斯大林对他非常忌惮，所以一级一级往下降，最后降到敖德萨一个小军区副司令，什么理由呢？降他得有一个说辞。看俄国档案里写的是他往自己家运送红木家具，你想一个欧洲占领军总司令往他们家运红木家具，可想苏联穷到什么份上，这种反差当时对社会的影响特别大，

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变了，我们搞了二十年社会主义，结果还不如一个匈牙利，还不如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小国。

战后在党内也确实有一批人有这个思路，就是将来的发展道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特别是后来成为“列宁格勒派”的这么一批人。现在我们发现了一批档案，本来战后苏共要开十九大，这个时候“列宁格勒派”的这些人，他们当时主持起草新的党章，这就是1947年2月“苏共中央党纲草案”。这个党纲草案特别像苏共二十大的，就是改变投资比例、加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农业投资等等，包括军转民等，想了很多措施。就是要改变战前的很多做法，这其实是一种态势。

到1946年的时候苏联确实很有可能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道路，至少苏联的领导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客观上也有这个环境，也有这个条件。但是，后来发生了两件大的事情，阻断了苏联朝着这个道路发展的道路。第一个是旱灾，旱灾出来了怎么会影响到发展道路呢？因为，这次旱灾在欧洲是百年不遇的，当时苏联非常惨，现在档案全出来了，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特别是农村。所以他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还得用原来的手段，搞征粮、强化集体农庄，搞这套东西，使他不得不走回头路，这个时候除了要解决自己国家的饥荒的问题，他还得帮着解决欧洲的问题，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都要粮食，都是苏联势力范围，都管苏联要。斯大林没办法，只能去救济东欧这些国家。

再一个就是冷战的出现。这个事儿比较复杂，我简单讲，美国人现在的观点，美国现在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冷战就是苏联、斯大林造成的，为什么？他的逻辑特别简单，说：苏联是一个内陆国家，内陆国家要发展必须有出海口，所以苏联必然扩张；第二，苏联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必然扩张。他要搞世界革命，要把全世界都给染红了，所以他必然扩张。苏联又是内陆国家，又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它必然扩张。因为扩张引起了西方的恐惧，所以西方采取遏制战略，这样冷战发生了。这个看法完全不顾事实，这是一种逻辑推理，但是它的前提错了。

第一，斯大林在战后基本上解决了出海口的问题，因为波罗的海他已经拿到手了，西方也承认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归属苏联，也承认芬兰一部分领土跟苏联的交换，再加上他跟蒋介石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旅顺口交给苏联，所以太平洋的出海口也解决了。唯一没有解决的就是黑海的出海口，虽然不满意，但是跟土耳其也有协定，这不是大问题。所以，出海口问题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内基本上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满足了苏联安全的要求。

第二就是共产主义，斯大林那会儿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他已经解散了第三国际，所以这两个前提不存在了。那么另一个逻辑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这个材料，其实斯大林这个人他非常的现实，他知道苏联的力量远远不如美国，他怎么可能跟美国搞对抗？再一个，他对战后的安排——雅尔塔体系是非常之满意。

他怎么会主动破坏这个体系呢？不可能的。你看莫洛托夫的回忆，说战争结束以后，有一次斯大林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面前挂一张大地图，他说，我现在非常满意，从苏联的周边开始，全是我的。从芬兰到波罗的海三国，划了一块波兰的领土给了苏联，然后又从德国划了一块领土给了波兰作为补偿，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了。东欧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亚洲，朝鲜占了一半，外蒙古也给分离出去了，东北他也占了，新疆也在他控制之下，很满意。他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这儿，就是伊朗，伊朗的石油的问题。

所以他不会主动去破坏这个框架，但是为什么会引起西方的恐惧呢？是斯大林的这样一种心态和另外一种与心态不同的做法。他知道自己虚弱，但是他不希望你知道他虚弱，其实我力量很弱，但是我外表要非常强大，所以斯大林干了几件特别傻的事情。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伊朗的石油，本来跟人家约好了，当时英国跟苏联出兵就是占伊朗的油田，把德国人赶走，当时苏联说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就撤军，结果他不想撤，为什么？一撤，油田也没了。他跟伊朗国王讲，你必须把北部油田常年租给苏联，我就撤军。人家不干，他就吓唬人家。他就扶持成立了一个民主党闹独立。现在库尔德问题就是那时候弄起来的，民主党都起来了，闹得很凶的时候，人家一纸状告到联合国。美国一出面斯大林就蔫了，跟伊朗民主党说，我走了，将来是死是活你自己看着办吧。

土耳其也是这样，因为苏联的黑海舰队要进入爱琴海，必须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个海峡都在土耳其的管辖下，他通知土耳其的总理说你必须改变黑海管辖的协定，说如果不改变我就采取强硬措施。人家也告到联合国，说苏联怎么样，斯大林立刻软下来了，他说算了就不要了。但是他这两种做法让美国人感到恐惧，说你苏联动不动就要动武，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根本就是说说，你要是同意了我就占便宜了，他不需要准备军队。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希腊，希腊确实是误会苏联了。因为希腊共产党进入政府以后吃亏了。关于希腊，1944年10月的时候斯大林跟丘吉尔两人搞了一个“百分比协定”，丘吉尔到了苏联以后，谈战后欧洲的势力划分。斯大林说你先说说看法，丘吉尔拿一张纸写，希腊：英国90%，苏联10%；罗马尼亚：苏联90%，英国10%；保加利亚：俄国75%，英国25%……把这个纸条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了一下说挺好，拿铅笔打了一个勾。因为有了这个，希腊应该是英国管，这样希腊共产党就很后悔“二战”刚结束那会儿不应该听斯大林的交出武器，所以后来希腊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马科斯又带队伍上山了。

西方人都认为是苏联在背后鼓动的，其实根本不是。现在档案解密了，确实有人鼓动，是铁托和拉科西。就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他们的鼓励，那个时候革命劲头还高涨，成立了援助希腊联合参谋部。苏联是一直躲在后面，马科斯带着部队上山以后，找莫洛托夫说苏联得给我们援助，莫洛托夫说你现在是游击队，在山上我们怎么支持你？什么时候你成立了国家，我们就支持你。那还不容易，人家在山头上树了个旗子说

希腊民主共和国成立了。这会儿找苏联，你赶快承认我们吧，莫洛托夫又说，等你周边的国家都承认了以后我们再承认。结果没等苏联承认，起义就被英国镇压下去了。这个事儿当时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西方人判断，希腊的武装暴动也是苏联在背后弄的。这样就出来了“杜鲁门主义”，就是美国人开始认为，如果照苏联这样干，整个欧洲就会纳入苏联的铁蹄之下，所以就以希土危机为由，杜鲁门发表宣言，这是1947年3月。跟着出了“马歇尔计划”，美国想来拯救欧洲，因为它非常担心。1946年的时候欧洲一片狼藉，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没有煤。伦敦，巴黎，都冻得够呛。当时欧洲人特别担心说共产主义势力会不会乘虚而入，丘吉尔那个“富尔顿演说”讲的就是这个。美国也担心这个时候苏联乘人之危。所以马歇尔接任了国务卿以后制定了一个援助欧洲计划，就叫“马歇尔计划”。但苏联也属于欧洲，东欧这些国家都在欧洲。他们在底下商量说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把苏联给甩出去。

但是斯大林不知道这回事。这个计划一出来，斯大林立刻让莫洛托夫，让经济学家研究“马歇尔计划”，说到底怎么回事。后来瓦尔加写了一个报告，诺维科夫写了一个报告，说“马歇尔计划”按照《资本论》的说法就是资本过剩，他有钱没地儿花了，所以他现在要到欧洲发贷款。这正是咱们的机会，咱们应该争取美国的贷款来发展苏联的经济。所以苏联给各国共产党发电报说大家都到巴黎开会要钱去，结果一到那儿发现人家根本就不想给他，莫洛托夫带了100多人到巴黎跟英法谈，感到谈不拢，英法很简单，说你要援助可以，你拿这个钱干什么？你有什么资源？你都得亮出来，就像咱们现在写个什么项目，写个可行性报告，你得把材料给我。苏联说我这个钱还没到手，情报全拿出来，不行。咱们搞一个一揽子计划，你就给我多少钱，到时候我连本带利还给你就行了。美国又不干。

这个时候斯大林得到了“克格勃”的一个情报，就是在巴黎的苏联间谍窃听了法国和英国外交官的谈话，核心内容是怎么设法把苏联给排除出去。斯大林一看说算了，这个钱根本就要不来。结果把所有东欧国家都带回来了，谁都不许去。斯大林想了想说不行，还得把“马歇尔计划”给破坏了。第二次巴黎会议的时候，他通知各国共产党说你们全都去参加这个会，苏联不去了，你们去的目的不是要钱，是捣乱，让他们谁都要不着钱。电报发出去以后，第二天斯大林又一想，不对，东欧这些人控制不住，他们真拿了钱怎么办。后来他又发电报说谁都不能去。有的国家听话就不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外交部长不是共产党员，你不是搞联合政府吗？我们控制不住。这下斯大林才知道联合政府政策不能再搞。后来他也施加了压力，最后东欧都没有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个事儿给斯大林敲了警钟。回来以后，从1947年9月斯大林开始筹备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又回归到原来对抗的道路上去了。

跟着他就不断在国内加紧了原来战时经济体制的推广，而且通过共产党情报局在东欧各国搞苏维埃化，就是1948年到1952年，整个东欧

全部走上了苏联的道路。这个时候斯大林跟各国共产党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一条，就是苏联的道路，谁要搞社会主义就按我这个方式搞。谁不服，格杀勿论。原来东欧国家，除了南斯拉夫，都是苏联解放的，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两派，一派是本土派，一派是莫斯科派。莫斯科派这批人比较听苏联的，而本土派坚持的就是想走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像匈牙利的拉伊克、波兰的哥穆尔卡都是本土派，最后东欧几乎所有有共产党国家的第一把手都被斯大林杀了，这个清洗很多人不清楚。因为是在东欧搞的，像匈牙利总理拉伊克、保加利亚总理托斯科夫、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斯兰斯基等等，都给处死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走苏联式的道路。所以到了1952年的时候，除了苏联，又有一批国家走上了苏联的道路，而斯大林也彻底放弃了有可能出现的改革的机会。这就是到斯大林去世前的状况。

第三次机会，就是斯大林去世后。我们现在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过去都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搞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其实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赫鲁晓夫搞的什么修正主义呢？很多史实过去我们是不清楚的，现在我们比较清楚了。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有深厚的背景的，不是赫鲁晓夫头脑一热搞的。从斯大林去世苏联就开始变化了，因为斯大林晚年的时候，苏联社会已经紧张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到1952年以后，他人也老了，疑心病很重，连续制造了很多事件。“格鲁吉亚案件”、“犹太医生案件”等等。搞了很多。而且从苏共十九大以后，苏联就没有召开过政治局会议。有什么事都到斯大林别墅去商量，他想叫谁就叫谁，他根本就不管那个名单。而且斯大林到1952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身后这些人靠不住。

苏共十九大有一个故事，马林科夫是他的秘书，十九大开一中全会的时候要确定中央领导人的人选，斯大林跟马林科夫说，你拿一个名单出来吧。马林科夫吓得汗直往下滴，说让我拿一个名单出来？这是要我谋反吗？他不知道说什么，这会儿斯大林拿出一张纸，这个名单我给大家念一下——他早起草好了。一念增加了十几个人，就是要分化他们的力量。赫鲁晓夫回忆录里讲的一段非常形象，斯大林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一般是晚上9点以后，他们所有政治局委员每天晚上在家等着电话，不知道今天晚上斯大林是不是召见，电话一响心里就哆嗦，为什么？他召见，第二天也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他不召见，也许是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了。连斯大林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

突然有一天，1953年3月1日斯大林休克了。现在关于斯大林之死，民间有很多猜测，是下毒还是什么，其实我看都不是，就是不积极治疗。因为斯大林有一习惯，他每天早上10点起床，床那边有一带子，一拉，人家给送洗脸水。结果那天11点都没响，那时他的警卫，所有的秘书全都换了，就是保姆没换。然后她又等，一直等到中午，还没动静，就打电话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全叫来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几个人来了，一看，斯大林已经倒在地上了，这四个人就围着他转圈，谁也不说话，说开会商量商量。你说这人都晕在那儿了，你还要开会研究。到下午什么时候才派医生来，这些现在苏联档案全都解密了，他每

天的医疗过程都清楚了，我看不是什么下毒，就是他们不想让他醒过来。

而且到了3月5日的时候，那会儿斯大林还在克里姆林宫躺着呢，这边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重新确定苏联领导人。又恢复了11个常委，列了名单，最后一个是斯大林。然后莫洛托夫也回到外交部，贝利亚重新拿回内务部，赫鲁晓夫掌管书记处，这几个人就都分了，分完了想到那屋再一看斯大林没气了，这些人才踏实下来。

从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的政策立刻开始发生变化。苏联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结束朝鲜战争，莫洛托夫回到外交部的第一件事儿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方案。后来周恩来来参加斯大林葬礼，苏联领导人就让他参加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跟周恩来讲说，回去以后跟毛主席讲，我们要结束战争，原来斯大林的路线有问题，我们不能老打仗。周恩来说不行，毛主席1月刚在全国人大发表的宣言，说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投降为止，一直打到把美国赶出朝鲜为止。现在我们没法停，这个弯转不过来。赫鲁晓夫说，转不过来也得转，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让周恩来带回来，朝鲜战争后来就是这么结束的。

跟着就是马林科夫发表了演说，就讲和平共处，其实战争不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有核武器的状况下，大国之间应该避免战争，再就是贝利亚，他负责处理在1953年6月德国东柏林发生的骚动，人们对东德党统治不满上街游行，贝利亚决定放弃过去惯用的镇压手段，不要管了，他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咱们苏联不要承担这么多责任。

还有包括改革农业方针，改革干部路线，这都是在1953年到1954年的时候出现的，恰恰赫鲁晓夫那会儿是最没地位的，他排到第五位。赫鲁晓夫这个人很有心计，他利用原来的一些大家比较保守的观点，比较传统的观点来攻击这些人，比如贝利亚，后来他被抓起来，说他是英国间谍，这是瞎造的。给他立了个罪名就是处理东柏林事件不力，没经审判就枪毙了。处理贝利亚的时候赫鲁晓夫也非常聪明，他找莫洛托夫，说贝利亚要整你了，咱们要把他干掉，其他人都同意，就看你的态度。然后他找别人，还是这么说，最后大家都同意，开会马上处理贝利亚。

贝利亚处理完了以后下一个就是马林科夫，他当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怎么下台的？就是因为马林科夫说的和平共处，对核战争的看法，还有包括加大农业投资，这些都违背了斯大林同志的意愿。再加上马林科夫这个人也确实没有政治经验，他一直是个秘书出身，没有在地方工作，赫鲁晓夫利用他掌握的权力，特别是对党的干部的控制拿下了他。等把他们拿下了以后，其实赫鲁晓夫执行的还是他们这些人的政策，包括朝鲜战争，包括农业投资。隔了两年，赫鲁晓夫的一个讲话和马林科夫当年的讲话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马林科夫已经不是部长会议主席了。

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我们那会儿非常反感，就是因为批判斯大林，现在看来当时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是整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因为现在所有的政治局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一次一次怎么讨论，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他们当时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那会儿“大清洗”的时候斯大林抓的人太多了，开始这个罪名也没敢往斯大林身上推，都推给贝利亚了，说全是他搞的。1954年成立了“平反委员会”，当时主席是莫洛托夫，到1955年的时候他们找到一份材料，说明是斯大林亲自干预和指挥了清洗。

这件事在政治局引起很大的轰动。你看政治局会议记录，他们把重要的犯人或证人直接叫到政治局会场上来质询，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把文件拿过来，最后平反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认为第一，斯大林是完全知情的，因为原来他们把斯大林和这个事儿隔开了，说斯大林是被蒙蔽的，其实斯大林完全知道。第二，很多人都是他批准杀害的。第三，使用肉刑，至少有两次是斯大林亲笔批的。这些证据拿到了，政治局开会大家讨论怎么办。后来赫鲁晓夫讲说，这个事儿我认为应该告诉全党，必须告诉全党，我们不能再蒙蔽党员了。有些像莫洛托夫他们虽然比较保守，也认为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但是不要动作太大，以免引起思想混乱。

所以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的问题揭出来，其实是整个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决策，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做法。其他的政策那就更不用讲了，像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原来《九评》的时候中国说苏联从二十大就搞修正主义，中共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共是非常赞成的，你可以把苏共二十大的文件和中共八大的文件做一个比较，几乎是一模一样，包括他们所谈的问题、方向、观点，甚至采取的措施。你看看毛泽东当时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布尔加宁写的《经济发展纲领》很相似。为什么？因为当时来讲，中共是195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也面临一个将来怎么发展经济的问题，苏联也是面临这个问题，他们的处境很相似。

对外政策也是这样。比如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如果说朝鲜问题没解决，那是因为美国的干预，不想解决。但是印度支那问题怎么解决的？那会儿胡志明是不想停，当时正好奠边府大捷，当时中国是派了很多军事顾问打的，越南人觉得再往下打就可以取得全面胜利了。当时周恩来跟范文同谈，认为不能再往下打。当时的情况是法国人支撑不住了，他们想请美国人干预，美国人正好想插手印度支那的事儿。如果再打下去把美国引进来怎么办？

中国不可能再来一次朝鲜战争。所以在日内瓦对越南人说你们停了吧，范文同不同意，周恩来就直接坐飞机到了柳州，把武元甲和胡志明召来谈了三天，说你有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取胜而不招来美国人的干预？胡志明说我没有把握，周说那就停。然后就画了“十七度线”，把南方的解放区让出来，而北方的大城市，像河内、海防，法国让出来，形成了“十七度线”。这就是中苏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时搞的和平共处的政

策。

马来西亚也是，我前年沿着马共的革命路线绕了一圈，我想搞清楚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基本搞清楚了。本来马共有一支武装力量，一直想夺取政权，闹革命，学中国共产党，学印度支那共产党。1954年10月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联合给马共中央发了电报，说现在已经不是革命时代了，你们要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参加政府。这是当时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一个共同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我看来，这个时候苏联很可能完全走上另外一条路。当然会逐步地改变过去斯大林的一些做法，这个时候中共和苏共是比较配合的。后来发生了问题。

到了1957年底，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当时形势大好，苏联连续三年农业大丰收。苏联最头疼的就是农业问题，只要有饭吃了，他心里就有底气了，再加上工业的改革。还有，1957年底的时候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潜艇下水，美国人都没有造出来，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呼雀跃。说现在我们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讲，现在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时候发生了分歧，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现在力量这么强大，我们就不必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战胜帝国主义，我们跟他谈判，通过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力量的对比，就可以把它压下去。毛泽东恰恰相反，说既然我们这么有力量，我还跟他谈什么？跟他打就完了嘛！说敌人不打就不会倒下去，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怕什么？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所以中苏开始在国际战略上发生分歧。

再一个造成分歧的就是波匈事件以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苏联一直是领导的党，一直是老大哥，中国什么都听苏联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赫鲁晓夫弄得头昏脑涨，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的问题太莽撞，说话又很富激情，他作秘密汇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突然把斯大林的问题谈出来了。当场有两人就休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当时心脏病就犯了，后来就死在了莫斯科。

底下基层机关的讨论就更是吵得一塌糊涂，最后不得不派保安部队来维持秩序。东欧也是，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的动荡、混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析怎么怎么样，斯大林还要肯定，尽管他犯了很多错误。这个文章写完了以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赞叹不已，苏联当天的《真理报》一卖而空，跟着印了几十万小册子作为党内学习文件。

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出了一个“二论”，就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印了100万册，全党学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原来都是各国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怎么苏联共产党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二者的地位就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苏联处理波匈事

件，赫鲁晓夫没主意，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请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又请周恩来到欧洲，周恩来去华沙、布达佩斯、莫斯科穿梭外交，最后平息下去了。赫鲁晓夫特别感激，说周恩来同志怎么怎么样，说真是中国共产党帮了我大忙了。可知原来斯大林跟毛泽东有一个“君子协定”的，是苏联共产党管欧洲的事儿，中国共产党管亚洲的事儿。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亚洲的事情管得不错，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管得不错。欧洲苏联自己管不了了，现在要靠中国去管。

再加上1957年6月苏联党内发生的夺权事件。赫鲁晓夫掌权后，党内还是有斗争的，一些老人对赫鲁晓夫很不满，他们就策划了一个宫廷政变。突然有一天苏共召开政治局会议，布尔加宁往总书记那个位置一坐，对赫鲁晓夫说，今天的会议就是讨论撤销你的职务，赫鲁晓夫很聪明，说我要做检讨，说我有很多错误。赫鲁晓夫嘴也能说，到下班了也没说完，要求明天接着检讨，晚上回去给朱可夫打电话，要他连夜把全国的中央委员全都接到莫斯科来。朱可夫是国防部长啊，他调用了大批直升飞机，把200多个中央委员都接到了莫斯科，第二天早上他们包围了克里姆林宫。说总书记的任免不是政治局决定的，而是中央全会，所以他们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当然中央全会一开莫洛托夫他们几个人就成了反党集团，这个事儿公布以后，没有人信。怎么可能？莫洛托夫是和列宁一块搞十月革命的，他怎么会反党？

都不信啊，所以赫鲁晓夫就慌了神，对米高扬说，你赶快到中国去找一下毛主席，请他老人家出来说一下话。米高扬到北京见了刘少奇，刘少奇说主席在杭州呢，他就到了杭州，谈了8个小时。谈完了，毛泽东就一句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我支持他。”米高扬说最好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你走吧，我这就发。米高扬没到莫斯科，《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声明，说中共中央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已经深深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政治上要靠中国，当然经济上中国是靠苏联帮助，但是那会儿政治上是我们中国帮助苏联。所以这个时候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过，到了1957年底的时候，苏联的经济上来了，科技发展上来了，苏联又不能放弃它的大国的地位，这就是两党发生争执的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是很尊重毛泽东的，与斯大林时代完全不一样。赫鲁晓夫那会儿对毛泽东毕恭毕敬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是受了斯大林的压制，你看他的警卫员写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在屋里发脾气。为什么呢？毛泽东不睡沙发床，他得睡硬板床，气得他把沙发垫子扔到外面去。第二次毛泽东要访苏前，赫鲁晓夫专门问汪东兴说主席有什么要求？因为开64国共产党书记会议，所有人住在列宁山，那里有一大片别墅，只把毛泽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说怕主席感冒，因为这儿离会场近。汪东兴说主席不睡沙发床，赫鲁晓夫说我们赶快做木板床。还有什么要求？说主席上厕所都得蹲着，他不用马桶。赫鲁晓夫说我们这儿全是马桶，怎么办？他们想了一招，运来沙子砖头把马桶给埋起来剩一个窟窿。你可以想象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态度。但是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做法有一些确实让苏联人接受不了。

什么事？比如莫斯科会议，苏联人来找毛泽东商量说要开这么个会，毛主席就指示说开这个会可以，你事先要做好准备，你们要先搞一个文件，让大家都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不要写。苏联起草好了，10月25日送到北京让毛泽东过目，毛泽东说这个不行，那个要改，还特别指出，这个文件不要提反党集团事件，那是你们党内自己的事，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谈。赫鲁晓夫就按照这个意见改了。

但11月18日毛泽东即兴演说时，突然说，下边我要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内出了问题，一些人出来反对赫鲁晓夫，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处理的是正确的，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时所有的苏联领导人全惊呆了，你不是说不让我们说这个事吗？怎么你给说出来了。米高扬当时就站起来了，直盯着毛泽东，两个人对视，然后他就在这儿来回走。当时，吉拉斯，就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给卡德尔写了一个纸条说，你看苏共和中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这会儿苏联人很难忍了，你现在是干预我们的内政了。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原因，当然中苏分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苏分裂对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却起了一个致命的影响。

分裂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苏之间他们在争论谁的看法，谁的观点，谁的立场上是正确的。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才有资格、有权利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从1960年开始双方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从现在看，包括《九评》的内容，要说当时占上风的肯定是中共，因为中共引的都是马恩列斯的经典，经典的出发点和当时中共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而苏联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变了，认为不能老搞革命，老搞战争，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而是认为要和平发展，要和平共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很少说这种话，他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你看苏共的文章，引用的马、恩原话经常是牵强附会的，在政治上苏联人处于下风。

这样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党内的整个看法受到中共的影响，这也是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外交上也是这样，因为中共当时的一些做法，比如炮击金门，都是比较激化国际矛盾的，按毛泽东的讲话就是刺激刺激有好处，到处给帝国主义捣乱，你不能让它安生，安安静静怎么行？那就没有革命气氛了。而苏联就希望不要刺激了，咱们踏踏实实搞建设就行了，你老制造危机，毛泽东说战争边缘政策，敌人可以搞，我们也搞，所以就炮击金门，弄得赫鲁晓夫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共说苏联就是怕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就要证明他不怕帝国主义。比如U-2飞机事件，人家在你头顶飞了五年了，你不打，你非等到1960年给人打下来了，美国又急了。赫鲁晓夫不打又不行，毛泽东总指责我怕帝国主义，我要证明我不怕。还有柏林墙，就是中国的这种压力，给苏联造成的政策的畸形，他想搞和谈、搞“戴维营”，通过和谈、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是又不能放弃武装斗争的这种手段。中共总指责他，所以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逐步下降了。到1964年搞了政变就把他弄下来，下来以后就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

其实勃列日涅夫的很多做法都恢复了斯大林的体制。支持各国武装斗争，到处撒钱，赫鲁晓夫时期认为，各国的革命斗争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除了经济上可以发展贸易。勃列日涅夫那会儿可是全世界满地撒钱，拉丁美洲搞一个“黑豹党”，先给个20万美元。一会儿这又闹点事儿，到处支持。越南、朝鲜原来都是苏联不管的，亚洲的事儿归中国管。1955年的时候，苏联驻河内大使给外交部写的报告说，原来苏联给越南的援助都是通过中国，苏联不直接派专家，都让中国派专家，他们就提出来是不是能够直接援助给越南？当时赫鲁晓夫答复说不行，所有越南的事情都是通过中国处理的，我们不直接干预。但是1965年以后，勃列日涅夫就直接插手越南问题，当然这也是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

所以，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回到了斯大林的状态，当然他表面上没有声张。周恩来1964年11月到莫斯科，当时苏联也想恢复关系，中国也不想跟苏联闹下去。但是，中国有个条件，就是你苏联要当面承认错误，这个苏联的脸下不来，他知道他们不会照赫鲁晓夫那么做。包括苏共二十大的一些政策悄悄地都变了。最近解密了一份档案，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做了一个报告，特别长的一个报告，就讲为什么赫鲁晓夫下台。很多内容就是说他搞的不行，改革乱改，都得恢复。

但是，他不能跟中国人承认。当时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部署是到莫斯科去，让他当面承认错误，让苏联自己起来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这怎么可能？他悄悄改了就行了。周恩来去了，当然谈不拢。结果又赶上“马林诺夫斯基事件”。马林诺夫斯基是苏联国防部长，他开始跟中国关系挺好的，他公开讲话要对帝国主义斗争，要勇敢，不怕死。周恩来非常高兴，说马林诺夫斯基同志谈的很好，下来就喝酒，马林诺夫斯基喝多了，不该说的就来了：其实中苏之间根本就不应该分裂，咱们都是非常好的同志，就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合不来。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去了，你们回去把毛泽东也赶下来就完了。周恩来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带领所有人离开了会场。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带人登门谢罪，说是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周恩来说，那是酒后吐真言。你必须自己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苏联不可能接受。所以中苏就彻底分裂了。

中苏分裂以及中国对苏联的影响，除了遏制了苏联的有可能向改革的路子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后果，就是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本来中苏是一家人，所以没有什么边界问题，没有什么安全的问题。但是现在中苏一分裂，很快就导致国家利益的冲突，就是边界事件。包括1962年的“伊塔事件”，和几千起沿着中苏边界的冲突，这个时候双方认为对方已经给自己构成了威胁，特别是珍宝岛。一仗打下来双方都紧张起来了，苏联也紧着往亚洲调兵。这样，本来是和中国人一块对付美国，现在中国与美国走到了一起，苏联不得不对付中国和美国。所以对苏联不得不恢复到以前的扩充军事的经济体制上，国力损耗非常大。当然后来还有阿富汗战争，也是对苏联国力消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苏联的解体，从经济的角度看，中苏分裂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这样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基本上又回到原来的道路上，而且勃列日涅夫一统治就是二十年。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板结化，越来越官僚化。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想改，已经晚了，根本就改不动，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陷得太深了。中国为什么能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条是它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计划就是法律，完不成计划就进监狱，中国是上有什么计划，下有什么对策。这个计划不当回事儿，从“一五”计划开始，“一五”计划不是咱们制定的，都是苏联人弄的。“二五”计划，从开始设计、起草控制数字到计划时期结束，也没搞出来。中间夹着冒进、反冒进、“大跃进”，反反复复。“三五”计划好容易搞出来了——吃穿用，毛泽东一下就给否了，要搞战备，发展重工业。到“四五”计划就进入“文化大革命”了。所以中国的改革可以推开，而苏联就不行，就是这种体制太僵化了，这样就造成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面临的问题。

我今天讲的苏联大概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苏联共产党在它执政的七十四年当中没有很好把握住历次的改革机会，在有可能实行改革转变道路，或者社会实现转型的时候，没有搞起来，没有抓住，或者抓住了很快又放弃了。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我觉得也可以总结一下的。

这包括党内的理论认识和思想统一问题，这个认识不清楚，党的干部要是总是抱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而不改变的话，改革是很难实行的。要想搞改革，你看苏联这几次，党内普遍的这种理论水平和理论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旦进入盲区，进入误区的话，你很难走出来。再一个就是党内的斗争，这就涉及到领导人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有时候适合于你，有时候不适合。像冷战在外部给斯大林的改革造成了一个困境，等等，这些原因。我觉得其实我们最后应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没有走出困境，没有改变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没有改革，没有及时的转轨。

最后讲一个问题，我想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走不通，我们能不能走下去。将来是个什么结局？就是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按说不是我研究的范围，我是研究已经发生的事情，未来怎么样不是很清楚，我也很难做这种判断。但是从历史的经验看，我有一种感觉，我认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实际上从18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都在选择。先进的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但是它也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没完没了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分析得非常透彻，就是市场没控制，完全是自由化的经济是不行的，那么它要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分。同样，这一百年来，社会主义走过的道路，也有问题。太僵硬，太主观化，为什么？没有市场的因素。所以60年代在苏联出现了一种理论叫做“趋同论”。所谓“趋同论”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吸引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中又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现在到美国去看看，我想它的社会主义的成分不比我们少，你再到北欧看看更是这样。当然这不是我这次讲的主题，但我觉得逻辑上得回答这个问题。否则的话，这次报告好像就没有画一个句号。

我的报告就说到这里。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郝振省： 今天的时间掌握的还是恰到好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和沈教授互动一下，可以提问题。

听众： 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听到沈教授的精彩讲座也非常受启示，我有一个问题，中国有句话“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发展道路先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乃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苏联的影子，包括今天在内，我想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模式发展尽管跟苏联有区别，但是共性也不少。怎么样避免苏联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发生？有这样一种观点说，中国现阶段经济改革还是成功的，或者说基本成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好像还没有真正开始，没有实质性的开始，长此以往，说经济向前发展，政治体制之后恐怕改革也不能取得实质的成功，您怎么看？当时有一种说法叫改革开放可能救国，但是也可能亡党，您怎么评论？特别是2010年国内外天灾不断，在这种背景下您对我们的道路向前发展请做一个预测。

沈志华： 本来说是不谈现实的问题的，现实问题比较敏感，而且也不是我们历史学家研究的范围。我还是说苏联吧。如果苏联进行了改革它应该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但是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些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改革是必需的，关键是怎么改。赫鲁晓夫想改，改得一塌糊涂。又搞工业党，又搞什么农业党，难怪人家把他打倒。我说经济改革改得不错，接下来是怎么走，各个国家国情不一样。我想改革不管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是必要的，问题是怎么改？而怎么改，这个其实在座的应该最有发言权，因为你们都是国家干部，我只是教书的，但是我知道应该慎重。

听众： 沈教授您好，听历史学家的讲座有一个事实胜于逻辑的感觉。我想提一个问题，两个方面。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60年代我们对苏联有个《九评》，这个题为《九评》的文章今天读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理论性很强，说服力也很强。刚才听了您的介绍，这个《九评》恰恰是对苏联一种调整和变化的一种评价，我们把它叫做修正主义。这种评价在今天来看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有很多观点是错误的。第二个方面，我们今天的改革当然好像还有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改革的好多领军人物，甚至包括小平同志，都是《九评》的主持人，他们对中国改革思想的形成与这个《九评》有没有关系，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有没有相应的联系？我想这么大的变革，中国的这种思想，是不是也受到了我们对《九评》这一段思想反思的这么一个关系？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点。

沈志华： 《九评》文笔非常好，逻辑性非常强，当时都是中国一流的笔杆子写的，现在看起来从文学的角度还是很不错的。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前提都错了，因为《九评》的一个前提是给社会主义有一个定位，给当前的国际时代有一个定位，如果你是处在革命的时代，战争的时代当然赫鲁晓夫做的全是错的，苏联做的都错了，咱们做的都对。如

果你定位说社会主义根本不能搞市场经济，那么《九评》批的都对。说莫斯科有人小倒小卖的，有小商小贩的。但是你想想改革开放不全是这个吗？就是它有一个前提的问题。

我知道你想问的事情是不是改革有理论先导，我觉得没有的，其实理论都是后来的事情。就是你现在走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是不是非要先争论，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你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我想邓小平原来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不要问姓“资”姓“社”。为什么这么讲？我想这个事想了很长时间，他不知道吗？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个坚持”也是他讲的，他为什么又说不要讲姓“资”姓“社”？

我们太落后了，我们要发展，这就是实际的要求，至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从理论上讲，这个事儿现在是说不清的。这种对历史实践的理论性的总结总是滞后的，它必须有一段时间的积淀。所以你看《资本论》，马克思写了30多年《资本论》，他是在矛盾都出来了，这些现象都已经发生了，而且找到了逻辑脉络的时候才能形成理论的。你现在怎么可能形成理论？现在形成理论一定是不客观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邓小平那句话，理论上先不要探讨，怎么对发展有好处，怎么社会能稳定，又能把经济搞上去，大家还能满意，你就摸索着来，你不要管姓资还是姓社，搞不好真是个“趋同”。理论滞后，这点我们要把握。理论前导，一个是不容易出来，一个是出了一点儿问题后边全乱了。

听众： 首先谢谢沈教授的演讲，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苏联的国体有很多弊端，但是它毕竟当时是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它的航天、科技、人才都是和美国抗衡的，但是一夜之间江山变色，国家全盘私有化。我想请您从民族性格上做一个分析，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在这个国家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上会起到什么作用？

沈志华： 民族性格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深层的民族文化的问题，这个不是我研究的专门的领域，如果你要想听我的看法，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文化所起的作用，文化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影响，大概至少要以世纪来计算，它不会对一时一事发生影响，很难讲阿富汗战争是俄国人的性格问题。你说中苏分裂是俄国人性格或中国人的性格，那就落入马林诺夫斯基说的那句话了，不就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他们俩人性格不合吗？在这个世界上，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我觉得是一个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问题不会出在决策——或者一个具体决策，或者一个具体的选择上。

第二，对于两个相邻的国家的关系，民族文化和性格有没有影响？我研究中苏关系这么多年，我的感觉是有。但不是在当前，在具体的问题上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而是起到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我的理解。不过，文化学和民族学研究是专门一个学问，我的研究还

没到这个领域。

听众：我想请问，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与苏共党内民主是不是有历史的相关性？我们现在强调要推进党内民主，刚才有位同志讲，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很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起步，我不赞成这种观点。现在党内强调要推进党内民主，用党内民主带动全社会的民主。我想请问沈教授，您从苏共历史的经验看，苏共内部的民主方式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沈志华：从苏联的民主政治的角度讲，我认为在赫鲁晓夫时期确实有个比较大的发展。就是苏联新领导刚执政的时候，它采取的执政方法跟斯大林是一致的，所以才能秘密枪毙贝利亚。但是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了，就是按退休处理，这就是进步。原来是消灭这个人，后来不是，所以赫鲁晓夫退休以后还能写回忆录，还能赚钱。这就是进步，但是从苏联的做法上看，很多都是试验的，不是都那么成功，有很多地方是不可取的。

此外，苏联有一些做法，中国也未必能做，就是刚才那位同志说的，它的文化底蕴不一样，苏联能接受的东西我们未必能接受，苏联能做到的东西我们现在未必能做到。比如这个选举，人家的选举还真是像那么回事儿。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犯了一些错误，搞这个工业党、农业党，它也是想在党内搞两党的竞争。他们具体的做法是有些问题的，所以党内都不满，包括裁军。

为了和平共处，它当然要裁军，但处理不当，赫鲁晓夫下台也是得罪了大批的军队干部，我看过一份档案，陆军不满，海军也不满。所以我觉得赫鲁晓夫是迈出了几步，包括他按程序办事，包括1964年罢免他那个事儿，很多事情。在记录方面，我们这个传统有点儿问题。我说苏联的传统，你看它的档案，你能感受出来，他的政治局会议都有记录，有工作记录，有速记记录。每个人说的什么话，一字不差地给你记录下来，然后还有工作记录。

从毛泽东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不做记录，比如我们查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档案，我们都知道，最后的决定是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的，但是去查档案，一个字也没有。就一个出席会议的人员的名单，讲的什么不知道。这都是传统。而俄国就有这个传统，而且你想，他这个议会在沙皇的时候就有，他真要做一些什么事儿比中国容易。我只讲民主的这个概念在俄国比较容易接受。中国应该怎么走，我不知道。我们都说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但历史学家只是做镜子的，他的责任就是做出一个能真实地客观地反映历史的镜子，不是哈哈镜。至于照过镜子以后应该怎么想，怎么做，这是照镜子的人的事情。

郝振省：因为和主讲嘉宾的互动是我们中央国家机关这个层面的读书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带有很深的，或者很真诚的研究和探讨的性

质。根据情况请大家原谅，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沈教授从接触到的苏联的大量的解密档案里面，来挖掘和分析苏联的模式以及它垮台的原因，还回顾了列宁阶段的苏联社会，分析了由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的另一个问题。特别是布哈林也提出了“发财吧！”这样的口号，给我们回顾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预的优越性和30年代工业化的基本的完成，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二战”胜利以后看到了在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形成了改革的可能性，也通过共产党的情报局加强了控制。回顾了赫鲁晓夫的苏联社会，特别是以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很生动的档案材料，大量的史料对我们了解苏联的发展、苏共的执政和它的模式的得失成败，应该说有很强的意义和很重要的价值。

包括沈教授最后对我们的启示也是他的看法，也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种借鉴。应该说他占有大量的丰富的解密档案的材料，介绍了好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体现了政治的历史的极端的复杂性，和我们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艰难性，从这个角度的体会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值得思考的空间，促使我们通过读书、读一些有分量的书来更好地比较，更深入地思考我们当前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想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2010年4月17日在中央国家机关主题读书讲坛上的演讲）

第六讲 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主持人：一年多以前阅读的一本书《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本书从一种全新的角度，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这场战争，它不再单纯强调抗美援朝，也不再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切从史实出发。后来又听说这本书的作者在中国史学界算是一个异类，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沈志华先生。

沈先生，很多人都把您称作是中国史学界的异类、传奇人物，您是不是也这么看？

沈志华：走的路可能跟大家不大一样吧。一般人是读完中学读大学，读研究生，然后进行教学或者科研。我没上过高中，也没上过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吧，还没读完，后来又做了十年生意，到90年代初自办民间学术机构，重新搞历史研究。所以可能有一些方法或者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被人称为异类。

主持人：您中学、大学没有读过，我想因为时代背景，大家会比较理解，怎么研究生还没读完呢？方便透露吗？

沈志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因为一个政治原因。1982年，大概还有十六天论文答辩的时候，公安局突然把我抓走了，说我是中央情报局特务。当然后来证明是个误会，我一个学生，怎么能成中央情报局特务？当时他们想抓一个美国人，正好我认识这美国人，就把我抓进去了。但是经过调查之后，查无此事。

主持人：两年的监狱生活是怎么度过的？

沈志华：没什么，一段经历而已。人必须面对现实，你已经是个劳改犯了，就踏踏实实干活，白天干活，晚上写书就是了。我第一本书是在监狱里写的，写苏联“新经济政策”，就在我那个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的，大概写了有四十万字吧。

主持人：您写的这些东西，难道不会被监狱的管理人员看作是反动材料？

沈志华：他们收走一看，是苏联土地问题啊，雇佣劳动、地租问题啊，也看不懂，算了，就还给我了。

主持人：但是这段经历会改变您的想法吗？

沈志华：没有，要改变了我的想法，我今天就不会坐这了。我在监

狱里当时想过，我可能出去以后什么也没有，没有工作、学历、工资了，但我可以凭本事当个农村教师吧。所以我想不行我就到哪个山村里当个教师，数理化、文史地我都能教，不过从监狱出来正好改革开放，就去深圳了。

主持人：到深圳以后做什么呢？

沈志华：从提包开始，给人家什么都干，办工厂、办农场、搞进出口贸易，什么赚钱做什么。

主持人：十年过程，您给自己评价，算得上是成功的商人吗？

沈志华：小有收获吧。我要没收获，怎么能到俄罗斯去买回这么多档案？我从回到学界以后，去美国、俄国，开会呀，访问啊，全是自己出钱。我到去年就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都是我自己过去攒的钱。所以我说小有收获，是因为它能够供养我后来搞学术研究。90年代初，俄国档案解密，如果中国人要再晚一步，它又封起来了，你就想看你也看不到，这就是历史的机遇。你就抓不住这么个机会，搞历史的嘛，档案就是粮食，没粮食怎么做菜、做饭，你吃什么呀？

主持人：从商界转回到学界，恢复学者身份是哪年的事？

沈志华：要是被一般的学者接受，我想可能1993年左右吧。那时候我去参加会，人家说你是哪来的，有论文吗？我说写了一篇，您看行吗？哎，写得还不错啊，后来就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后来开会也就邀请我。我没有单位，人家打我家里电话找我，慢慢就在学术界开了很多会，组织一些课题研究，组织档案的翻译，搞一些专题讲座什么的。要说是被官方学界认可，那可能得到21世纪了。那个时候史学会理事也找我了，各大学也聘我了，也去北大讲课了，去各个大学带研究生啊什么的，我想可能算是被人承认了吧。虽然是异类，总还是有用的嘛。

主持人：为什么能够放弃那么多赚钱的好机会来研究历史？还投巨资在收集、整理档案上？

沈志华：个人兴趣吧，我觉得，人活着钱再多也没有太大意思，要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我也有条件去干。我翻译这批苏联历史的解密档案，出版了34卷，从出国搜集档案，到回来组织翻译、校对、出版，大概花了140万元。还有呢，我设了一个史学研究出版基金，因为历史学著作学术性太强，一般博士论文没有补贴是出版不了的。特别是年轻的学者，没什么名气，刚出师，特别需要社会上给予资助，我就搞了一个“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每年资助一批专著，这十二年大概花了也有一百七八十万吧。还有其他就是开会啊，零零星星的。

主持人：花这么多的钱，为了自己的兴趣，可见真是一份热爱。您当时去俄罗斯，了解、购买这些解密档案时没有身份和单位，困难吗？

沈志华： 要想办法。我是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找院长谈的，需要立个项，中国现在急需搜集俄国档案，社科院愿不愿做？他说社科院这事儿当然要做，但是国家没钱。好，我有钱，你就给我个名分就行了，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哪国，你给我办护照，但是钱我出，内外结合，是吧？

主持人： 有了社科院的这个名分之后，有了人之后，到了俄罗斯顺利吗？

沈志华： 也不顺利，俄国在专制体制下七十多年，所以形成的那种官僚体制、官僚制度，真的难以忍受。反正做生意的很多方法用上，才能够把这个档案给弄出来。

主持人： 做生意的什么方法？

沈志华： 举个例子，中国人要去看档案，且不讲很多不给你开放，就算给你看了，复印一页一美金，而且他一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我就得陪着他在那儿，住着旅馆，天天吃。你不知道，俄罗斯1995、1996年，物价那个高，你不想个办法是不行的。所以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差不多就是喝大米粥，在郊区大卖场买些便宜的香肠、面包。我们去的四个人把需要的档案目录全部抄写或者复印下来，然后找一帮俄国学术界的朋友，茅台和二锅头一摆，喝吧。喝完酒，每人给一笔钱，按照我的目录去帮着复印。他们本国人嘛，能搞到东西，还便宜。我们就回北京等着，过了半年，东西全寄来了。

主持人： 我想，沈先生今天的这场演讲，也和当年那一段艰苦困难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下面我们有请沈志华先生进行今天的演讲：《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沈志华： 60年代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这件事，对整个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所产生的那种震荡，丝毫不亚于90年代苏联的解体。还有一点特别相似，像苏联解体这么大的事情，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么多人研究俄国，没有一个人预测到。大家都非常吃惊，说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偌大个帝国就坍塌了。同样中苏同盟在60年代分裂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准确预测。

去年11月我们到美国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档案，就是1948年到1976年对中国形势评估的报告，请了一批专家去评估。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两件事是表示中苏分裂公开化了，一个是1960年苏联把全部在华专家撤走，这是公开的；再一个当然就是1963年的政治大论战，双方在报纸上互骂。那么看到的美国档案，一直到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仍然认为中苏之间不可能发生分裂。他们一个基本观点是，中苏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都是搞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目标是一致的，都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敌人是一致的，都是美国人，所以他们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道理分裂。

到1958、1959年就有一些风言风语出来，“大跃进”问题啊等等，但是美国人认为呢，就是关系面临破裂的话，中苏领导人都会各自调整他们的政策，以适应同盟的需要。但历史事实恰恰是他们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政策，当他们发生分歧的时候呢，这个同盟就破裂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到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想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苏同盟会破裂？哪些事情上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最后觉得不能再容忍对方了，分歧不能调和、妥协了？这些问题呢，在学术界是有比较大的争论的。

过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搞“三和路线”，提出了一条反对马克思主义或者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那么中共不能接受这个错误的路线，所以分裂。这观点是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提出来的。后来很多学者同意这个看法，而且把1956年作为中苏关系变化的历史转折点。

第二个看法主要是说，1958年“联合舰队事件”。就是苏联当时提出要跟中国搞一个海军的联合舰队，毛泽东反对，说不行，中国要自己搞，你给我帮助。最后苏联同意了，简单地说就是这么个过程。很多学者认为呢，这件事反映了苏联干涉或者要侵犯中国的主权，毛泽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所以顶撞了赫鲁晓夫，导致中苏分裂。过去基本上是这样两种看法。

但是我这几年看了很多材料，包括中国的、俄国的档案，我觉得这两个看法都站不住脚，都缺乏历史的依据。第一，首先说苏共二十大，中苏之间没有路线分歧，甚至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外交上当时中国搞的也是和平共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在二十大之前。对内政策也没有分歧。很多人说，毛泽东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所以跟苏联分道扬镳。其实不然，你只要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把布尔加宁关于苏联“六五”计划的规划仔细看一遍，对照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完全一致。比如投资比例的问题，加大轻工业投资比例，加大农业投资比例，都是苏联先提出来的，中国后来也提出。苏联提出要开发远东地区，中国是内地和沿海地区相结合，这也是一样的。还有调整农轻重的比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所以对内政策也是一致的，包括对斯大林的看法。

其实毛泽东并不反对批判斯大林，只是觉得赫鲁晓夫这种做法比较幼稚，比较草率。他几次讲话都讲到，这个我们还得感谢赫鲁晓夫，如果他不批斯大林，谁敢批？是赫鲁晓夫，是苏共中央帮我们揭开了这个盖子，这是压在中共头上的石头啊。所以他内心是非常高兴的。至于说后来事情发生变化以后，他有很多想法，人们把它挪到了1956年。所以，说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起点，这没有任何根据。

第二个问题，关于联合舰队的问题，我也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就是苏联1957年12月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验成功，可以航海一万多海里，要求有一个长波电台跟这个潜艇出去联络，

它都到了这个印度洋了，怎么跟它联络啊。当时苏联海军提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在印度建一个中转站，即所谓长波电台，第二个是在中国海南岛建。方案报上去以后，赫鲁晓夫说，印度不行啊，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说中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兄弟嘛，建个长波电台有什么。结果跟毛泽东一提，他不干。因为苏联提的方案是由他出钱，因为他要用嘛，他不干。后来苏联说我出70%，毛泽东也不干。苏联说我出50%，他还是说不行。毛泽东说，我出钱，你可以用，这没问题。后来还是按照中国的意见签了合同，这件事就过去了。

中国知道苏联试制核潜艇成功以后，海军就向周恩来提了个建议，因为中国海军是在苏联帮助下建起来的，那是1954年和1955年，苏联给了中国一批海军装备，从炮艇到鱼雷快艇、巡逻艇。1957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得到消息说苏联核潜艇试制成功了，说我们还要更新的技术，就是核潜艇。苏联当时就不想给，我刚研究试制成功，还没用呢，就给你。所以提了个方案，就说这样吧，核潜艇咱们共同使用，所谓联合舰队就是我先培养你们中国的干部，将来你掌握技术了，慢慢再制造这个东西，这就是联合舰队问题的由来。跟毛泽东一说，毛泽东不干，说你要搞合作我就不干，除非你给我技术。

那是1958年的7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跟苏联人发火，发那么大的火，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中苏分裂的一个起点。但实际上那次事件在我看来，毛泽东是在作秀，他有更深层的考虑，否则的话，非常令人奇怪。第一，这么点儿事情，至于发这么大火？毛泽东说到什么程度呢？说你要搞联合舰队，是不是你要占领中国啊，你要占领中国的海岸线，他跟尤金讲，说你回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的一万公里海岸线我都给你了，我上井冈山！非常奇怪，这件事怎么惹他发这么大的火呢？这是一个问号。第二，这个事情后来赫鲁晓夫就来了，谈了一天，解释清楚就过去了。后来苏联就跟中国签了个协定，解决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问题啊，包括提供海军援助等等，基本都按中国的要求办了。且不说这里不涉及到损害或者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矛盾，也没有引起两国政策上的分歧，所以我以为把它作为中苏分裂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分歧当然是有的，我们一定要找到，在这个事件中反映出中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才能表现出它们的分歧。而出现分歧后，两国领袖没有一个人肯让步、妥协，这才会导致分裂。根据档案材料，我认为有两件事情导致了中苏的分裂，这两件事情，一个反映在对内政策上，一个反映在对外政策上。

对外政策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越来越倾向于对美国采取缓和政策，特别是1954年苏联氢弹试制成功以后。我看了很多苏联专家给苏共中央写的报告，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再打仗，一旦打仗就是人类的毁灭，有很多分析的数据和理由。因为如果你不能在第一次打击时解决问题，对方只要反击就是两败俱伤。我觉得这对赫鲁晓夫的影响特别大，可能导致他认为到了现代社会，至少大国之间不能再爆发战

争，一旦爆发就是核战争，就是人类的毁灭。整个苏联对外政策的基调是要求缓和。再一个就是1956年苏共提出发展经济，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不能总是那么紧张，像朝鲜战争那种紧张的状态。基于这一点呢，他反复地强调要缓和，不要什么事儿都跟美国人吵架，通过谈判来解决矛盾，比如提出限制核武器，只要是禁止核试验的会都去参加，包括高峰会谈、日内瓦跟艾森豪威尔会见之类的。

但是当时中国不这么看，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认为紧张的状态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这是他的原话，大家可以看看毛泽东的文集、文稿里头类似的话非常多。他认为紧张的状态，一方面可以刺激美国，可以拴住它，不让它去镇压全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另外也能刺激中国的生产。他这种思路呢，认为紧张没有什么可怕的，战争边缘政策没有什么不好的。从1957年底在莫斯科会议上，他已经表露出这么个思想，赫鲁晓夫在谈和平发展计划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你要认清楚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什么意思？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谁怕谁。他说，我不怕它，打原子弹怕什么？我有六亿人，死一半我还剩三亿呢。这番话当时真是语惊四座，在座所有的共产党领袖都听着，都以为听错了，三亿人死了，他觉得没什么。当然毛泽东本身并不是那意思，他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说要革命就不能怕牺牲。所以，他那种革命的激情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一种冲动，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这个时候中国在设计什么动作呢？在设计炮击金门，就是要打台湾。

在对外政策上跟苏联出现的分歧，是因为第二次台海危机引起的。1958年7月14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决定炮击金门，因为1954年打过一次，发现不行，为什么，福建没铁路，没机场，制空权都在国民党手里。于是准备了三年，“鹰厦”铁路修成了，福建空军基地也建好了，彭德怀认为可以打了。毛泽东同意了，说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打，具体什么时候打，你不用问我，你们前敌指挥部就可以决定。但是7月19日尤金突然来了，说要建联合舰队。为此毛泽东就发了一大通火。尤金吓得回去就中风了。尤金认为是他的责任，是他自己把话传错了，要不然为什么毛泽东发这么大火。回去给赫鲁晓夫打一个电话，赫鲁晓夫也惊呆了，说毛泽东同志这是怎么了，我们就提个建议，你不同意就算了，至于发这么大火嘛，说什么要上井冈山啊？他寻思不行，得去北京一趟。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要赫鲁晓夫来一次。我看了8月3日那次会谈记录，非常有意思。事情都解决了，很平和。

刚才我讲了长波电台的问题，联合舰队都解决了，合同也签了。最后要走时，毛泽东说了句话，哎，赫鲁晓夫同志，明天你走，我到机场送你去，不但我去，我让在北京的所有外交使团都到机场送你。赫鲁晓夫就说，为什么呀？我是秘密来的，谁都不知道。毛泽东说没关系，秘密来可以公开走嘛。不但你要这样公开走，我们还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他说我都起草好了，你看看。赫鲁晓夫一看，果然中国已经起草好了，因为他来时，随团来了国防部长、海军司令一大批人啊，全给列上了，还说中苏领导人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其实

他们根本就没谈这些事儿。为什么？毛泽东就是要把这个《联合声明》发出去。

后来1958年11月20日在郑州开会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番话；还有1959年10月2日赫鲁晓夫第三次来中国的时候也说过：也能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同志们都以为炮击金门是我和赫鲁晓夫商量的，其实我一个字也没有告诉他。结果大陆一打炮，美国人以为中苏是商量好的，调得美国军舰来回跑。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后果。因为23日炮击一开始，杜勒斯马上做了个判断，这一定是赫鲁晓夫跟毛泽东商量好的，因为赫鲁晓夫刚走，中国就敢炮击金门，这得注意，搞不好就把苏联也惹上了。这就是毛泽东要的。他让美国人以为中苏是商量好的来打，其实赫鲁晓夫一点儿都不知道。所以回去以后赫鲁晓夫特别生气，一方面他认为，你中国这个外交政策和莫斯科会议的精神不一样，莫斯科会议讲缓和，你这儿讲紧张，人家不打你，你打他干嘛呀？你把美国人给招惹来，你要打你就真打，后来他派葛罗米柯来问，中国到底要干什么？是不是要解放台湾？毛泽东说，不，不，这个台湾暂时不解放。他说，要不然你们是要登陆金门？毛泽东说也不登陆金门。他说，那你打炮干什么？毛泽东说，就是引美国人过来。我这一打炮，他就紧张了，他紧张，就把他的军事力量都调到台湾海峡来，其他进行革命的，什么黎巴嫩的、中东的革命啊，就蓬勃发展了嘛。你看他的思路完全跟苏联不一样。我认为是这个事情造成了中苏在外交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毛泽东不让步，赫鲁晓夫也不让步。

后来中苏之间还发生了“响尾蛇导弹事件”。台海危机的时候，开始中共这边有制空权，美国不敢直接参战，但后来给国民党提供最新研制的空对空导弹，叫“响尾蛇”导弹，当时很先进，一下就把中共飞机打下来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大概是1958年9月24日，双方在温州上空打，有颗导弹掉地上没炸。那会儿中国军队里都有苏联顾问啊，这消息马上到了莫斯科，苏联正在研究空对空导弹，遇到技术难题，赶快跟中国说，把这枚导弹给我们来研制。中国就左推右挡不给。赫鲁晓夫很生气，说你们的武器从陆军、空军到海军，哪一件不是苏联提供的？管你们要个导弹，还是美国人的，都不给，咱们还算同盟吗？

后来过了大概很长时间，到1959年，中国给发过去了，结果苏联海军把那个箱子打开一看，傻眼了，拆得乱七八糟都装不上了。显然是中国人也琢磨半天了，这是先进的东西呀，但毕竟技术差一大截，能拆不能装，而且还少了个东西。有个远红外线的制导系统，最关键的装置没了。赫鲁晓夫就说，这也不知道是中国人故意扣着不给咱们啊，还是当时就没这东西。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就不像一个盟国。

正好在6月这个时候，苏联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装车了，这是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同，苏联要给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这个重型工业部部长打电话请示赫鲁晓夫，赫说别发了，你不知道毛泽东下一步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谁都摸不准，何况现在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你再给他个原子弹？赫鲁晓夫说此事暂缓吧。这件事表明，赫鲁晓夫在

对外政策上决心跟毛泽东翻脸。他知道这件事儿是违反协议的事情，两国签的协议都可以违反了，他一定是横下一条心了。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惹怒毛泽东。

1959年6月的时候，“三机部”和国防科工委的那些人，像张爱萍、宋任穷都特别生气，所以后来把中国原子弹叫“争气弹”。“620工程”什么意思？就是苏联6月20日那封信，推迟提供原子弹样品那封信，所以叫“620工程”。但毛泽东并不生气，在这件事儿上，从头到尾到现在，我没看过他为这件事儿讲过一句话。我就琢磨，毛泽东是因为什么事儿跟赫鲁晓夫翻脸？后来找到这个原因了——人民公社。

从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帮助苏联处理了波匈事件以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个特别微妙的变化。原来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曾经跟毛泽东两个人有一个“君子协定”，欧洲的革命苏联人管，亚洲的革命中国人管，就是中共负责，像朝鲜、越南、印度支那，这些亚洲的革命都归中国管。这是刘少奇当时去访问莫斯科时跟斯大林谈定的。

后来双方一直遵从这个原则，中共几乎对欧洲的问题不大过问，苏联也很少过问亚洲的问题，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了以后，我就看到越南大使馆给苏联外交部的一个电报，就是苏联给它援助的物资什么的，都是通过中国人给。然后他们的一些什么项目，包括土改啊，整风啊，党内的事，全是请示中共。1955年，越南那个电报意思是要摆脱中国，就跟苏联人说我们能不能直接跟你们联系，以后你们就直接援助给我们，不要通过中国。苏联外交部回电告诉越南人，不行。以后有什么事找中国人，别找我们。就是到1955年的时候，仍然是这种状态。所以双方是有严格的分工的。但是1956年情况开始变了。

赫鲁晓夫对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实在是处理不了，当然这个人能力有限，政治经验不足，没办法就请中国人帮忙。10月23日刘少奇去帮着他处理那个事，然后1月周恩来又“穿梭外交”到波兰、匈牙利，最后把这事儿给抹平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东欧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从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内部闹乱了，批判斯大林是怎么回事儿啊？所有共产党员的思想都混乱了。这时候，毛泽东讲了几番话，讲得比较入理，在大家看来都说得过去，这就是“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么几件事使得到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中共的影响就达到了高峰。毛泽东那会儿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像哥穆尔卡、乌布利希，这些东欧国家领导人，挨着个儿地去见毛泽东，去请示，跟他探讨革命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这个莫斯科会议上讲了一个问题，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政治上是个大国，有经验，但是有一点不行，是什么呢？经济。他用个小指头比划，经济上是个小国。所以赫鲁晓夫在会上一提出说十五年要超过美国，他第二天就坐不住了，马上提出来，十五年你超过美国，我十五年要超过英国，这就是所谓“超英赶美”口号的由来，回来就布置“大跃进”。这过程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就不

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毛泽东又提出来一条人民公社。他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板，指出了人类走向未来美好社会的一条光明大道。

他几次在会上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些都过时了，这是斯大林提的，我们中共不用。“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也不对，这是列宁提的，也过时了。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什么呢？是“多一点，快一点，少一点，省一点”，叫“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还讲苏联，一天到晚嚷嚷向社会主义过渡，它过渡了四十年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就不一样了。他从钢产量说起，然后说起整个经济发展速度，赶超英国，从十五年降到十年，然后最后降到七年，降到五年，说要赶上英国，两三年就够了。所以他认为，很可能我们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到了共产主义的门口我们先不进，我们在门口等着他，让他先进。就当时那个雄心壮志和那种口气，他当然是很想把中国领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社会。“大跃进”到了1959年初就失败了，各地指标全往下压，其实庐山会议本来是压指标的，不是批彭德怀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彭德怀这个《万言书》就送上去了，毛泽东最反感这个。彭德怀就犯了这个忌。因为本来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问题了，为什么去开这“神仙会”，为什么开庐山会议，就是让大家都消消气啊，过去都做错了，把指标压下来，能够继续，能够平衡，再回到周恩来、陈云搞那个路子就行了。结果彭德怀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毛泽东火了。

当然这事儿本身跟苏联还没有关系，他刚把这个《万言书》批回去，外交部有一份报告上来了，上了庐山了，说现在苏联共产党基层党员普遍认为中共在路线上犯了错误，它指的就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我们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作答，请主席批示。到现在我没看到毛泽东怎么批的，反正这事儿给压下来了。第二天又有两份材料上了庐山，一个是天津市委干部讨论会的情况，一个是江西省干校讨论的情况。讨论什么呢，就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说这个“大跃进”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什么亏本了，什么人民公社搞早了，什么这是心血来潮啊等等，整个材料都上去了，毛泽东就沉不住气，批了几个字“印发大会”，但是也没提什么反驳意见，就是印发大会了。刚发走，第二天又来了个材料上庐山，谁呀，就是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这一下毛泽东就再也忍受不了了。

因为人民公社这个事，我看了很多材料。苏共中央曾经有一个决议是安德罗波夫草拟的。因为中国搞了人民公社以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学习，不但是东欧的各国，像保加利亚总书记都直接说，也要搞人民公社，包括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搞，认为人民公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要先进，要好。于是，苏共中央就决定让这个安德罗波夫组织一个专门小组研究这问题，研究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中国这个人民公社肯定是一种狂热的、激进的情绪造成的。说中国现在并不具备搞人民公社的条件。但这个事儿，苏联是绝对不能反对，报告说：据分析，人民公社这事儿跟毛泽东直接有关，他们看了很多中国领导人发言、讲话，只

要在这个问题上一批就会跟中国闹翻。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话，也不说它好，也不说它坏，沉默。

从1958年9月北戴河会议以后，中国提出人民公社，一直到1959年这一年，苏联报纸上看不到“人民公社”这个字样。1958年11月7日，那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发表讲话，对人民公社一个字儿不提。当时中国搞的是最热火的时候，毛泽东就憋了一肚子气，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苏联认可中国这种试验，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都挺赞成的，你怎么就不说话呢？那时《参考消息》上登过米高扬和美国参议员的谈话，赫鲁晓夫和美国人的谈话，但是塔斯社否认，说是造谣，毛泽东也就作罢了。到了7月，赫鲁晓夫去波兰，人家又提这问题，说赫鲁晓夫同志，您给我们说说，这人民公社到底怎么样啊，能不能搞？赫鲁晓夫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搞公社，我们20年代就试验过，但是失败了，为什么呢，条件不具备，讲了一番道理，说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你才能够搞，否则的话就像1920年苏联搞公社，列宁说那全成了养老院了，都不干活儿，光坐那儿吃。首先是物质条件没达到，另外精神条件，思想境界也没到那个地步。

后来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讲，他为什么当时说那句话，他说我要再不出来说呀，就得天下大乱，全学中国搞人民公社了。他说党内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有这个意见了，所以不得不说，但是我又不能明讲中国，我只能说苏联自己吧。这话到了庐山，毛泽东就翻脸了，当场就批了这么几个字，把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的讲话，印发大会，请同志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失败的公社在我们这里也一定会失败。然后讲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历史，讲了一大通发下去。第二天一想，不行，这个气还没消，把吴冷西、陈伯达他们几个笔杆子叫来，说马上下去搜集人民公社的材料，我要向赫鲁晓夫们宣战，我要向一切反对和怀疑人民公社的人宣战。又说现在有些人已经和帝国主义走到一起了之类的话，讲了很多。

又过了一天，他又讲了一番话，跟刘少奇说把赫鲁晓夫这个讲话登在《人民日报》上，我要让中国人民看看赫鲁晓夫是怎么反对人民公社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登。可以看得出毛泽东的那种愤怒的心情。因为他的一个试验，不但在党内受到了抨击，又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了。从这件事能够反映出来，他想走的这种建设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赫鲁晓夫和苏联当时设想的发生了分歧，而他完全不能接受苏联的意见，所以他要宣战。

从这以后，中国开始提出，以后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这就是1959年11月上海政治局会议提出来的。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觉得不可以再容忍了，但是都知道，如果闹得两败俱伤，得利的只能是美国人。所以刘少奇文稿上讲了一段话，说中共中央已经定了，将来主要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但是他又说，中苏关系不能破坏，这涉及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利益，这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不过有个前提，就是苏联必须承认错误，必须回归正确路线。

苏联那边呢，几乎做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决议，196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的结论是什么呢？说苏中友谊是战略性的，是最重要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破坏跟中国的关系，但是中共一定要承认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这话意思就是在正确路线的前提下保证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几乎提出了完全同样的方针，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4月和5月双方在报纸上发表各自的文章。第三者一看就知道，双方各说各的，在这个时候，分歧的大局已定，只是个爆发的时机问题。

另外双方还都企盼着对方能够承认错误，承认错误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咱俩谁说得对呀，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共产党国家关系里头很核心、很关键的一条，于是就出现了世界工联会议的争论。本来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中国的时候，是想跟毛泽东缓和，结果大吵一顿。虽然最后双方说，哎呀，算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以后咱们不要再争了，把这个会谈记录都烧了，其实谁也没烧，烧了研究者今天就看不见了。回去以后双方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在报纸上发文章。世界工联会议本来说的是内部讨论的事情，不对外。这本是双方都说好了，但是1960年6月初工联会议的时候，中国发了很多材料，讲述了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不同的看法，这个做法使苏联非常恼火，说好了中苏分歧不对外的嘛，何况开世界工联会议还不都是共产党国家，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苏联认为中国违规，回去以后，赫鲁晓夫就策划了一个布加勒斯特会议，就是围攻中国，逼着中共认错。这次是彭真参加，6月24到26日召开。结果彭真态度特别强硬，说我们没错，错都是你们的，双方又吵起来了。

彭真前脚回国，赫鲁晓夫后脚就采取行动了——撤专家。因为当时中国有3000多名苏联专家，可以这样讲，“一五”计划，整个中国的现代工业的基础，都是苏联帮助建立起来的，156项工程。1958年大概进入“二五”计划，苏联赫鲁晓夫又追加了很多项。赫鲁晓夫认为，我只要一撤专家你就得低头，就一定得承认错误。结果他没想到，中国人不低这头。专家撤了，他把这个箭射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反对赫鲁晓夫这么做。我跟一个苏联大使谈过，他就说，当时外交部都反对赫鲁晓夫这做法，因为这明摆着撕毁合同，国际交往不能这样。赫鲁晓夫这人就是火一来了，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到了这一步，中苏之间脸皮就撕破了，彻底地分裂了。虽然1961、1962年中国自然灾害的时候，赫鲁晓夫又想恢复这种关系，比如给中国贷款啊。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吃那种古巴糖，都是苏联转运，还有伊拉克蜜枣，那会儿困难啊，都吃那种大黑枣。还有苏联还要给大米贷款啊等等，又说专家再给你派回来，中国人说不要，欠债我们照还。也经过几次谈判，包括1962年刘少奇去苏联，但是双方已经无法再继续，因为根本的路线已经出现分歧了，谁都不愿意让步。因为让步的结果就是你让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谁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子，世界各国共产党就跟着他走，所以中苏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妥协的机制，出点问题就爆发。

到了1962年10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就是中印边界打起来了，再一件就是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呢，中国是希望苏联支持中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呢，苏联是希望中国支持苏联一把，结果双方谁也没支持谁，就彻底闹翻了。于是就有了1963年两党会谈，那就是针尖对麦芒了，谁也不肯让步，就开始大论战，就走向全面的分裂。我讲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根据新的档案文献材料，当然是我根据这些材料的解读，我得出的认识。总体上可以这么说，炮击金门反映的是中苏之间对外政策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不能迁就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反映的是中苏之间在经济建设、对内政策上的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赫鲁晓夫，所以中苏走向了分裂，这就是我的研究结果和结论。

主持人：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毕竟长久以来，我们习惯听到的历史都是教科书里面的历史，而且在目前的学术环境当中，像您这样一位学者去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它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沈志华：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一个是政府的事情。历史学家是干什么的，我一直认为历史学家，就是把历史的本来面貌描述出来就行了。所谓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都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我没这个责任感，也不挑这副担子。我只告诉你，我只应该告诉你，历史原来是什么，你怎么解读这段历史，怎么从这里头找到什么经验来指导当前的行动，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政府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讲，我认为呢，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来就非常困难。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以后人们研究现在还好一点儿，有录像了。那过去靠什么？没有形象的东西，完全靠文献，还有口述，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文献，把它还原成过去历史发生的，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如果再加上一些额外的导向，说需要它是什么样子，那就更不行了，那你就别做历史研究，研究出来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只能忠实于历史。所以我在解读档案材料时，面对中苏关系研究，我就是一学者。如果你只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容易出问题，你总有民族感情吧，总有你的喜好吧，你不能因为个人情感，明明看到是这样，却不这么去说，那是不对的，那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历史学家。

主持人： 谢谢沈先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

听众： 关于外蒙古问题，中共和国民党在处理上有什么不同吗？各自处理时的时代背景又是怎样的？

沈志华： 外蒙古的问题，首先是斯大林的外交战略所致。斯大林要求在苏联的周边不能有敌对国家，这跟沙皇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斯大林在处理战后欧洲问题时，都是这么处理的。实际上外蒙古已经在苏联人的手里，在1921年苏联内战时，有很多白俄，包括哥萨克被打败

了，这帮人就逃到外蒙古，苏联红军就追到外蒙古，跟当时的共产党就建立了联系，于是就扶植像乔巴山啊等等。这些人夺取政权，就建立了蒙古共和国。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根本就顾及不到那儿，自己的仗还打不完呢。

二次大战快结束时，斯大林想起这个问题，当时美国人考虑，打败了德国人以后就要打日本，想让苏联人帮着打。斯大林说，帮你打可以，但有条件，外蒙古保持现状——他用的词是外蒙古“保持现状”，苏联在东北的所有权益都要收回，他指的主要是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他要强行租用，再就是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另外控制大连海港。这些都是1904年以前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后来19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被日本人夺走了，现在要把日本人打败了，这些特权要还给苏联。这两个问题是罗斯福跟斯大林在雅尔塔商量好的。

这些当时国民党确实不知道，但是1945年7月的时候，苏联也准备调兵了，斯大林提出要跟中国人签条约了，就是中国人得承认，外蒙古独立划分出去，东北的特权得给苏联。宋子文去那儿一谈，双方就吵起来了。蒋介石也知道，把外蒙古丢了，那不是千古罪人吗，所以坚决不能同意。后来斯大林跟他讲，实际上我已经占上了，你不过就是承认一下而已，当时蒋介石就不承认，你可以占领，但是要我在法律上承认，那就是我这届政府的责任，我对国人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斯大林讲的是：如果中国不签这条约呢，我就不出兵，不打日本，我让美国人自己打，结果没想到8月6日，美国在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原子弹一扔日本就要投降。斯大林一看，不行，日本一投降，还让苏联出兵干吗呀，苏联要不出兵，如何得到这些利益？所以他决定立即出兵。不等条约签订，8月8日下令，苏联150万大军分三个方向进攻，占领了东北，跟着日本就投降了。

这时候斯大林跟蒋介石讲，说你签还是不签，说你要签了，第一，苏联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支持共产党；第二，新疆问题我帮助你摆平；第三，苏联占领东北三个月后撤军。你要不签，那我就不一定支持谁了，我已经占了东北，什么时候走，不知道。最后弄得没办法了，让王世杰去签的字，果不其然，国民党开国民大会就一通地骂，说他卖国贼。后边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就是国民党要垮台了。这时候，斯大林知道他将来的合作伙伴就是毛泽东，觉得问题又来了，如果中共不承认1945年那个条约，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所以他1949年2月就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探听消息。毛泽东也不好明着跟他说，毛泽东是这么跟他讲的，说米高扬同志啊，我们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有一个民主派人士认为呢，如果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是不是外蒙古就能合并进来。米高扬一听当场就跟他讲，说这不行，这有条约的。第二天斯大林来了个电报，口气非常强硬，让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如果蒙古要统一的话，它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的问题，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他这么强硬的态度，当时毛泽东说，那算了，以后暂时就不提这个蒙古问题了。所以这问题就搁下了。

1949年底，毛泽东再去莫斯科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否定1945年那个条约，重新跟苏联签一个条约，就国家利益而言，他们主要争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中长铁路的问题，就是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港。因为当时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就在旅顺港，如果中国要收回了，他就很麻烦，得迁回那个海参崴去，而且将来苏联再进入太平洋的话，就得绕西伯利亚大铁路，绕远东一大圈儿。苏联的意思呢就是维持那个旧的条约，所以双方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当时并没有提到蒙古问题，因为前面毛泽东说了，以后不提这个事了。

那么这个事后来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1月26日的时候，中国提出一套方案，就是让苏联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等等，归还大连的什么行政权啊等等，讲了很多跟苏联的方案是完全不一样。我看过那个俄国档案原件，斯大林在上头全给打的叉子，不是叉子就是杠子，然后是问号、叹号，说明他极其愤怒。就是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斯大林根本没法接受，因为根据中方的方案所有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大概在两三年以后就荡然无存了。但是两天以后苏联就同意这方案了，几乎就是按照这个条件签的。为什么呢？就是蒙古问题。

那天周恩来就找斯大林去了，说要谈蒙古问题。你看《师哲回忆录》是这么写的，说斯大林一听这脸就白了，不是你们都不提这事儿了吗？周说，不是，说我们是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承认蒙古的独立。斯大林一听，挺高兴。但是呢，周说，您先看看我们这个声明。斯大林一看，周恩来先讲的是中方的这个条约，就是关于什么这个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一个综合协定，说如果苏联同意这个协定，我们可以发表声明，就是承认外蒙古独立。言外之意，你要不同意，外蒙古的问题就得悬着。所以我看苏联最后接受这个条约，斯大林没有什么选择。

这个时候关于蒙古问题，到1950年基本上就这么解决了。

主持人： 网友“喀秋莎”说读过您的著作，很欣赏您用真实、客观的态度来解读历史，希望您能够客观地谈论一下苏联红军，特别是斯大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发生过的作用，这和我们曾经认识到的历史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沈志华： 中国的军队在30年代的时候，原来最信什么人呢？最信德国人。蒋介石原来的所有顾问团全是德国人。但是到了1937年，中日关系突然因为卢沟桥事变以后，发生了变化，日本跟德国是盟国嘛，所以开始排斥德国专家，特别是1938年之后，改由苏联人来当顾问团，大概有六七个大的战役，都是苏联顾问帮着策划，跟日本人打仗。

另外就是帮助中国生产一些军工产品。另外苏联的飞行员实际参加了抗日战争的一些战役，特别是武汉大会战的时候，死的都是苏联飞行员。大概苏联就是作为援助人员总数有3000多人。到了1942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后，苏联顾问基本上就撤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人，1942年以后基本上就是美国人，正好珍珠港事件发生了，美国加入了太平洋战

场，所以美国就换成了俄国人，然后就是美国顾问团一直到国民党最后撤离大陆。

主持人： 谢谢沈先生。

听众： 我想请教的是，中苏两党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这两位领导人，他们的性格特征是哪一个造成了中苏关系最终的、不可避免的最终破裂？

沈志华：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共产党国家都是领袖外交，几乎没有例外。从这个角度上讲，领袖个人的气质和特性，就对外交路线和政策的影响，要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不过我认为，它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构成中苏分裂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设想，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性格，不是赫鲁晓夫这样急躁暴烈的性格的话，可能中苏关系、中苏同盟还会延缓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就是他们必然要走向分裂的，我以为是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中苏根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进入国际体系了。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共同创造的这个体系，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等等。它进入到这个体系以后，就要考虑游戏规则，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的话大家就无法相处了。中国不一样，50年代，根本就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中国根本不理你那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毛泽东最爱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就是当苏联考虑和平建设的时候，中国在考虑怎么发动世界革命。苏联在考虑核战争危害的时候，中国还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儿呢，相差了至少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的政策必然发生分歧。

第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一般的国际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利益。怎么做符合我的利益，我就怎么做。如果不行，我就让步。大利不行，我求小利。总而言之，两国之间找一个利益结合点就可以，大家承认共同的衡量尺度是利益。但是共产党国家不一样，它的认识要超于一般的利益，甚至高于一般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从马克思开始到恩格斯、到列宁，后来到斯大林、到毛泽东，他们都想的是一件事，他不是要解放中国，解放苏联，是要解放全人类。比如苏联这国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你在这里头既看不到一个民族主体的内涵，也没有任何地域的概念，说这边界在哪儿啊？全球。说哪儿都行。都包含什么人啊，全世界。所以说中苏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是必然的，是他的责任，而且他认为他有这个责任。举个简单的例子，毛泽东为什么非要参加朝鲜战争，他不知道中国当时很穷吗？他不知道中国的武器不如美国吗？都知道。他不知道斯大林想借中国的手来达到他的目的吗？他全知道。但是他不得不为之，为什么？他认为他有这责任。所以我认为，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或者苏联共产党领袖来讲，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国的利益。

再就是第三个问题了，在共产党国家，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是交融在一起的。因为原来共产党都没掌握过政权，都是在野党，是被追杀的、被压迫的，所以他们联合起来了，就形成了一个国际组织，中国共产党原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来自共产国际的命令就得执行。那么，党际关系的原则是什么？党际关系的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这是写进党章的。国家关系不是这样，它讲究平等、对话、对等、主权，其实在五六十年代，所有共产党国家关系当中，没有平等而言，也没有主权而言。这么一种关系，就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弊病，它是没法儿解脱的，以至于最后导致分道扬镳。按一般的国际关系很好理解谁服从谁，谁有钱，谁力量大，谁就有“权力”，那就服从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美国总是耀武扬威的，它不就是有钱嘛，力量大呀。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这原则，看谁正确，看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中国才跟莫斯科有一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认为他比赫鲁晓夫要强得多。这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来看，中苏分裂是必然的，不管毛泽东、赫鲁晓夫还是别的什么人，只是个早晚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 最后呢，我想请沈先生用一句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沈志华： 希望大家都对历史感兴趣，而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还原历史本来的、真实的面貌。

（2010年6月26日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

第七讲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

主持人： 今天我们请到了沈志华教授来给我们作一个讲演。沈志华教授做学问的风格是讲究要有证据，所以非常重视档案。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沈先生的情况，我这儿也有一个小档案，不过找不着了。就凭我的记忆吧！沈教授现在是华东师大的终身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还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名誉研究员，工作非常忙。

他这一生也很坎坷，前半生也经历过了可以说是“危运”。坐过牢，下过海，但是下海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这样，他又在1992年重返史学研究阵地。在1994年以后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大家如果在网上搜一搜就会知道，他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我简单地统计了一下，可能还不完整，从专著到档案的编辑，到资料的编辑，这些所有加起来，起码有五六十种，而且都是货真价实的。比如说苏联档案选编一共34卷，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他为中国和苏联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料基础，因为一切历史研究都靠第一手资料说话。档案非常重要，所以也就决定了沈先生研究的风格。沈先生的研究是靠档案说话，我们知道一则档案常常会改变对整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应该说它是基础性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沈先生做的工作对于我们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是功德无量的。

从上面这些成果，我们就可以知道沈先生的成果特别地多。有时候我也想，他怎么能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出版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一天都不睡觉。刚才我还在问他这个问题，沈先生告诉我他睡的极少，最少的时候一天睡个三四个小时。如果没有这功夫，不可能出这么多成果。看了他的材料以后，我对沈先生非常地敬仰，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他做一次演讲，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下面我们就欢迎沈先生做演讲。

沈志华： 谢谢。今天让我讲这个题目，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出了一套书，叫《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就讲苏联怎么崛起，怎么崩溃？当然我们这套书还是个案性的研究，专题史的研究。主持人想让我围绕这本书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你们就知道这里面大概收集了28个专题，从十月革命一直到苏联解体。当然其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但这是国家项目，该结项的时候还得结，所以到此为止。现在有三卷，我现在想搞续集，不过下一步再说吧。

就我们研究的内容，我想讲一个题目——“苏联解体与斯大林社会主

义模式的终结”。因为从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人非常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最有资历的共产党突然自行宣布解散，而且苏联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一瞬间就轰然倒塌。当然什么说法都有，过去比较多的一个说法是戈尔巴乔夫叛变了，他出卖了苏联共产党。这个说法很有政治性，但是很缺乏学术性，没有什么根据。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看法，认为政治、经济的原因，或者是党本身的问题等等。那么到底苏联为什么会突然解体？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必须对苏联历史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后才能回答。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没有经过历史研究所做的解答，都是一种逻辑推测。我可以不看任何历史，我想也能想出几条理由来，很容易，但是它可能是不真实的。所以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把历史搞清楚。从历史研究入手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与苏联解体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以后在美国形成一个主流学派的观点，叫“历史终结论”。说历史已经终结，为什么呢？资本主义终于战胜社会主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了。但是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它认为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所以才说整个社会主义不行了。剩下的就是资本主义。那么由此也就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大，要指挥全世界的态势。其中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就是我们要解答的——苏联为什么解体，实质上是回答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走得通走不通的。就从苏联这个例子来看，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有没有可能走出去，还是它无论如何、归根到底是要失败的？实际上我们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以苏联的历史作为一个例子。

美国人自然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其实在最近几年“历史终结论”也受到质疑了。因为“9·11”以后，美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面对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争斗了几十年，最后把它打垮。但是一个本·拉登就弄得美国整天坐卧不宁的，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未必苏联社会主义倒台，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就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全胜。但是这是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回答苏联的问题，回答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想谈谈我通过这么多年研究形成的一个大体看法，不是非常成熟，还需要更多的案例。我研究苏联历史也是有一个问题意识的。其实我一直想回答苏联道路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光明的道路？如果它是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为什么后来走不通呢？为什么后来会失败？苏联的失败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回答的问题。

当然，你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社会主义是怎么产生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怎么出现的。在世界历史上展现出这么一条道路，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这方面我的回答是，社会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产生是有它历史的合理性的。你应该读一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经典，特别是《哥达纲领批判》。我记得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会还在“文化大革命”，一天到晚读马列，我

可是真读啊。《资本论》我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然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那会我正好在监狱，也没别的事，正好看《资本论》。我看完了以后，感觉马克思的逻辑非常严谨，你很难推翻他的分析。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分析后，做出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和方法的一个论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它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呢？解决的途径就是必须打破私有制。砸碎了私有制以后，才能解决这样一个矛盾，才能把生产力的能量释放出来，社会才能进一步发展，所以他就推导出一个公有制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共产主义。

因为共产主义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所以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就叫做社会主义。简单地说这是马克思和列宁他们的理论。最先实践这个理论的就是俄国。大家可以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写这个《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基本上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模式去推演俄国的现状。所以他在《国家与革命》里得出一个结论，苏联不能搞社会主义，至少目前不能搞社会主义。但是俄国的现实突然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一个革命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二月革命，沙皇政权倒台，俄国政权出现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回到俄国，突然觉得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了，不必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让资本主义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所以实际上列宁知道他的实践和理论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这就是第一个专题的内容。在大概1918年到1920年这几年里，列宁有一个基本的想法，还是实践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通过世界革命来完成俄国革命。你看进攻波兰，策动德国水兵起义，搞匈牙利革命暴动，其实都是在发动世界革命，结果都失败了。最后就剩下俄国自己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初做的所有努力都是想实践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搞国有制、废除货币、农村公社，但是到了1921年俄国内战快结束的时候，列宁发现这一套根本就行不通。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我们那本书第二个专题讲的就是喀琅施塔得。原来历史上把喀琅施塔得事件说成是一次反革命的叛乱。当然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因为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的目标是针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认为苏维埃的政权形式是好的，但是不能让布尔什维克领导，所以他们起来暴动，口号是“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这件事就引发了列宁的思考。因为列宁发现喀琅施塔得水兵就是十月革命的主力部队。连他们都反叛了，布尔什维克这几年做了什么呢？你建立的政权真的是人民的政权吗？喀琅施塔得“叛乱”或者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其实是给了列宁一个信号，而且他非常敏感地捕捉住这个政治信号。再有就是农民起义，反对粮食征集。总之这一套社会主义政策不行了，开始设想要实践一套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个什么事物？这个大家也可以看，第三个专题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讲的还不够。讲了这个过程，但是对于新政策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我们还是没有说透。我原来的硕士论文写

的就是这个，写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体制。“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列宁想的比较简单，他觉得原来的做法比较过激了，太超前了。所以他说要退一步，但是退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进两步。所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退一步进两步》，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暂时的退却是策略上的，是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生存所必需的。因为你不这样，人民就反对，你只能退却。退却就是允许货币、私人商业的存在，还要允许——在中国叫个体户，苏联叫独立农户——个体农民的存在。不急于去搞原来理论上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这样做是适合于俄国当时的状况。但是列宁到了1923年的时候，就是写《论合作制》的时候，他已经慢慢地感觉到这可能不是一个暂时的退却，也许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因为原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很短暂的，就是一代人、两代人把过去那些污泥浊水给荡涤了，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他的前提是世界革命爆发，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列宁所在的俄国的这种状况——单独一个国家，而且资本主义发展也相对落后。

这个时候，列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觉得也许是这样，社会主义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制度。列宁的这个想法在党内基本上是不被认可的。因为布尔什维克一直接受的是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像托洛茨基、加米涅夫那是比较有名的理论家。但是列宁的威望在那儿，列宁做的一些事情大家也都接受。可是很快列宁就病了，第二年就去世了。列宁死了以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发生了严重的权力之争，就是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这些原来跟随列宁的人互相之间争斗。

简单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斯大林先借助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把托洛茨基干掉，因为托洛茨基是对他最大的危险。托洛茨基当时的名声跟列宁几乎是等同的。而托洛茨基本身是一个非常教条的人，他理论性非常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里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知识分子，一类是职业革命家。知识分子是要追求理论的完美性，按理论和逻辑办事。职业政治家不按理论和逻辑办事，是非常现实的。斯大林不懂理论，是个职业革命家。所以他利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他们先把托洛茨基打击下去。

第二步再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连在一起，又把他们打掉了，最后他又反过来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把布哈林给打掉。因为布哈林比较接受列宁的这一套，像合作制、商品经济、农村的富农经济，就是后来中国人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苏联的口号就是“发财吧！”你可以发财，原来在布尔什维克脑子里发财是非常资产阶级化的一个口号。斯大林就利用托洛茨基的理论又把布哈林打掉了，这样子到1929年到1931年的时候才形成了一个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通过搞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构成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也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普遍化，形成一个暴力的政治机构。其实它就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就是1918年到1920年的状态，这就是俄国革命最初表现出来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对世界的影响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就在斯大林

搞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的过程当中，西方世界发生了重大了的经济危机，就是1929年到1933年影响全球的经济危机。

这种状况让人们看到一个现象，好像资本主义非常不稳定，而社会主义像斯大林搞的这一套好像是非常稳定的，经济发展很快。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开始产生了它的影响，那以后斯大林的权力和影响不断扩大，苏联又通过共产国际来发动世界革命，主要是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二战”以后就出现了东欧的社会主义，随后又出现了亚洲的社会主义，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拉丁美洲和非洲就跟上了。为什么他们会跟上呢？原来他们的宗主国都是资本主义，你想走资本主义这条道路，人家是不让你走的，你是被限制的。所以，很多后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国家都觉得社会主义是条出路，大家都选择了社会主义。也不能说都选择，很多人选择了社会主义。至少它的旗子上、国名上都写上社会主义。你看，纳赛尔的埃及是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加纳也是社会主义，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所以上世纪60年代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候很多人觉得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个落后的国家想走向现代化，实现繁荣富强，走原来的道路客观上是不允许的，也没有条件。因为恩格斯曾经分析过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前提就是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有很多客观条件，比如说殖民地、地理大发现、黑奴贸易等等。这些资本主义提供工业发展的前提，到了五六十年代对于后发展国家都不存在。所以他们觉得可能社会主义是一个可行的道路。如果你把这段历史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国家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情况很复杂，从俄国到东欧、中国、朝鲜、越南、非洲，包括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像古巴，其实国情都完全不一样。但是大家都选择了同一条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这个时候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因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前提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且是在世界革命胜利的条件下产生一个新的社会，但是所有的革命都没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发生，也没有发生世界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恰恰是在马克思认为最落后愚昧、封建保守的地区和国家发生的。最后革命之后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前期所设想的事物。那么，到了什么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了？第一次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因为原来的共产党的宣传，人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当然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下一步发展的阶段，所以一定比资本主义要先进。这是在所有苏联人头脑当中留下的印象。那个时候苏联的社会是封闭的，资本主义当然也封锁了苏联，再加上苏共本身对国民的控制，所以他们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完全变了。为什么？几百万苏联红军打出了国境，到了欧洲一下大开眼界。我看了大量的档案，都是那些红军写的家书。他们到了德国、匈牙利，到了欧洲以后往家里写了很多信。那个时候苏联就有邮检，你写信警察都抽检，悄悄给你打开，看完了再

给你封上，你也不知道，他又给你寄走了，现在这些全成了档案。因为档案解密了，所以安全部原来抽检的那些东西现在全部公布出来了。他们到了西欧有什么感觉？突然觉得苏共宣传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原来还没有资本主义好。到匈牙利，一个普通的市民家里头就有挂毯，我看一封信里写的，说这是在俄国贵族家里才有的东西啊。社会主义搞了那么多年，还不如匈牙利这个小小的资本主义国家。

住房啊，人家的马桶、地板都比苏联好。不但普通的士兵是这样的，就连高级将领也是如此。朱可夫多厉害，“二战”苏联的名将，后来斯大林对朱可夫非常担心，要把他打压下去。你知道斯大林最后整治朱可夫是什么罪名？俄国档案里记载，就是因为从德国往俄国运红木家具和地毯。你想想，朱可夫是驻德的最高司令官，居然从德国往苏联运红木家具和地毯，说明什么？说明你苏联最高级的军事将领还没有一个德国普通人家的生活条件好。否则的话，他怎么会从人家家里把那个红木家具当做战利品运到自己家里。当然，斯大林要打击他，也是鸡蛋里挑骨头，往自己家里运的绝不止他一个人。这个事说明一个问题，人们突然发现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其实还不如资本主义。所以有的信里头写，为什么战胜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如一个战败了的资本主义国家？

因为苏联红军基本都是原来的工人、农民，回来以后就复员了。一复员，他们在西方的见闻就散到全国各地，一下这个社会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电视、互联网，大家就通过信和口头传递，苏联档案可以说明，这个现象就非常普遍。大家认为苏联原来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问题的，不如资本主义，特别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实我们现在从档案材料看，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到1939年和1940年的时候，苏联社会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斯大林这个计划经济就是由国家做主，想投资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没有市场调节。国家都发展什么？当然是重工业、军火工业了。其实是跟德国采取同样的一种经济政策，就是“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这样一种现象到战后被斯大林曲解了，被苏联很多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曲解了。他们说什么呢？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制度，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正是因为搞了这么一种制度——现在我们叫军事共产主义，当时叫社会主义——所以苏联才有强大的军火工业、重工业，作为后来获得胜利的基础。“二战”的时候苏联很多军工厂、坦克厂是拖拉机厂改造而成的。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苏联。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它按照原来的制度搞下去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化，迟早有一天要发生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但是战争挽救了它。为什么说它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因为它就是高度的集中制，国家有权力调配资源，可以短时间地集中和使用资源，这恰恰适应了战争需要。战争结束以后，有很多党的高层干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苏联开始出现了要改变这样一种经济模式的要求。一些比较年轻的党内干部，就是后来所谓的“列宁格勒派”，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他们这样一批人，就开始制订新的代表大会纲领，也就是十九大的纲领。我们在档案当中发

现，1947年2月这个纲领草案就出来了，这个纲领草案跟苏共十八大完全不一样，很接近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那个新方针，就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发展轻工业等等。虽然它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它开始发现了问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际环境。战后的国际环境也为苏联创造了一个可能改变国家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机会，这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合作。在1943、1944年，战争还在最紧张的时候，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开始考虑战后的世界格局问题。斯大林和罗斯福想的是非常一致的，罗斯福也看到，对苏联不能跟它对着干。因为你跟它对着干，必然导致下一次世界大战。你必须跟它合作，因为它也要发展经济。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的其实是斯大林，因为斯大林也明白，你这么跟美国对抗下去，苏联是不可能发展的。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世界革命到了3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工具、口号了，已经不是理想了，也不是追求的目标了。

最典型的就是共产国际。1937、1938年的时候，当时苏联面临什么情况呢？它有两个对手：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英法。苏联或者联合英法遏制德国，或者联合德国遏制英法。对于苏联和斯大林来讲，就要看谁对它最有利。实际上真正威胁苏联的是德国，所以苏联这边就跟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发通知，说德国法西斯是最坏的，是最威胁革命的。各国共产党都要起来拥护本国政府开展反法西斯战争。所以法国、意大利各国共产党就拥护政府并反对法西斯。但是英、法政府并不相信苏联，所以集体安全体系迟迟建立不起来，而这个时候希特勒钻了个空子。苏联不是要安全嘛，德国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所以在苏德秘密谈判的时候，希特勒就答应了斯大林几个条件：第一，波罗的海三国你可以占领，德国不会过问这事。第二，波兰苏、德两国可以把它瓜分，你一半我一半。第三，苏联要是打芬兰，德国也不会管。这就是斯大林要求的安全保障，至少斯大林当时认为有了缓冲地带，苏联的安全就有保障了，所以他就在1939年跟德国签订了秘密条约。秘密条约签订以后，共产国际所有的指示全变了，说其实法西斯还是有好处的，法西斯好歹它是国家社会主义，是能够破坏资本主义的，是一种可以借用的力量。所以各国共产党都要起来反对本国政府，跟德国合作。各国共产党又写文章发表演说，说德国不错，各国政府都是必须打倒的。这样就弄得他们非常被动。这其中，德国当然有自己的想法。

到了1941年，希特勒觉得西线大体上可以放心的时候，突然发动了新的对苏战争——“巴巴罗萨计划”。苏德战争一爆发，共产国际再次发出通知：其实最坏的还是法西斯，你们还是得起来反对德国。这样就把共产国际的形象弄得非常糟糕。不但各国共产党开始对共产国际失去了信心，世界各国都认为共产国际不再是世界革命指挥部，不过是苏联外交工具而已。

那时候斯大林并没有解散共产国际，而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当时苏联能够控制周围的一些国家，指挥一定的力量，都是靠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有相当的资源，有自己的情报系统、档案系统、党校，甚至有间谍训练基地。中国不少谍报员都是在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所以苏联当时掌握了很多资源，斯大林不愿意轻易放弃它。德国人快打到莫斯科的时候，共产国际迁到内地去了。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1943年5月，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为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西方的欢心，和西方合作。

到了1943年，这个时候苏联已经开始跟英国丘吉尔，特别是跟美国罗斯福频繁接触，斯大林就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他已经决定放弃世界革命。所以到5月的时候，斯大林突然找季米特洛夫，说你马上起草一个通知，解散共产国际。当时所有人都糊涂了，说我们刚迁回莫斯科，这不是胜利在望了吗？您怎么突然说要解散！

从当时的目标来看，很显然斯大林是为了督促西方开辟第二战场。因为要真的战胜法西斯，不能只靠苏联自己的力量，一定要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主要原因，一是想继续消耗苏联的力量；二是担心苏联真的打胜了，苏联再来发动世界革命。长远来看，斯大林就准备跟西方搞全面的合作，所以他就突然宣布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当然，史学界对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有过争论。很多人说了，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以后，把共产国际的资源都转给了苏共中央国际部。它的图书馆、档案、学校都转给苏共。只是让原来共产国际有些人回国搞革命。因为共产国际是各国逃亡出来的共产党员聚集地，或者派遣出来到这里的。有些人就回去发动当地的革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就是斯大林并不想放弃这个工具，因为毕竟是种资源。但是，解散国际这种做法，本质上当然是对世界革命的否定——因为连大本营都不要了。

到1944年以后，他的这些政策就开始逐渐地显露出来了。特别是通过几次国际会议，像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最后跟西方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和一致。西方承认苏联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大家都知道“百分比协定”吧？1944年10月丘吉尔到莫斯科，俩人坐在那儿聊天，丘吉尔问，斯大林先生你有什么要求？斯大林也不说，微笑着说你看着办吧。丘吉尔揣摩他的心思，就拿着个纸条写——罗马尼亚：苏联50%，我们50%；希腊：英国90%，苏联10%。还有哪儿哪儿谁百分之几，这就是所谓的“百分比协定”。他不知道满不满意，把纸条就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了看微微一笑，又推回去了，可以嘛，你们慢慢谈吧！他基本上是满意、接受的。而且还说这事先别跟美国人说，他在跟西方做这种交易。

当然后来稍微有些改变，因为莫洛托夫又跟英国人在具体谈哪些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哪些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后来又通过雅尔塔会议基本上确定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包括东欧主要的一些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外蒙古、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都是苏联的。除此之外，斯大林还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就是战后苏联经济恢复，这个钱从哪儿来？苏联损失惨重，美国跟苏联没法比，美国本土又没有落一颗炸弹。而且美国军火生意做得

多好，卖了多少武器？所以，重建的资金都得从美国来。后来战时租借的物资苏联赖着不还，就是这种心态。一直到了50年代还在争，苏联就是赖着不给。

苏联原来想什么？想通过战后的赔偿得到资金，但赔偿也都没有实现，比如对德国原来苏联要200亿美元，结果西方人不干，双方吵，吵到100亿，最后100亿也没有拿到手。再就是它希望向美国贷款600亿，所有这些必须在跟西方合作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这样为将来苏联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外部环境：第一，和平，不打仗了；第二，进入世界的国际体系。可以跟西方通商了，可以有商品交换了。这个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中，都是很难发生的事情。这样一种环境的构建，特别是苏联开始进入国际体系是很重要的变化，原来苏联没有进入过，别人都不承认。因为苏联的根本目的跟其他国家都是对立的，要世界革命，要推翻所有的国家，那是苏联的目标。西方能跟苏联合作吗？所以苏联必须放弃这个革命目标。

对此斯大林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明确地跟西方讲，苏联不会搞革命。搞什么呢？搞联合政府。这也是美国和整个西方给斯大林提的一个条件，之所以让苏联保存这些势力范围，苏联要保证不搞一党制，要搞选举、搞联合政府。斯大林马上答应，而且斯大林确实是尽心竭力这样去做。我看了苏联红军进入匈牙利的时候跟匈牙利共产党的一段对话。苏联红军来了，匈牙利共产党非常欢迎，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盼来了，这下我们能掌权了吧！当时红军跟他们讲，不行，斯大林同志只是说要搞联合政府。说你们应该和什么农民党、民主党联合执政，匈牙利人说这些党已经没有啦。没有你们可以建一个，建一个你们也得搞联合政府。因为这是斯大林答应西方的条件。保加利亚也是这样，波兰特殊一点，这事后来引起他们的争端。德国也特殊一点。

对于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那更得这样了。你知道当时法国共产党势力多大？50万军队啊，那在欧洲可不得了，法国共产党一跺脚，整个法国都颤抖。戴高乐到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跟他谈多列士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多列士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反本国政府。反本国政府的时候，当然法国就通缉，颠覆政府罪，后来他就逃到苏联去了。斯大林就跟戴高乐做了个交易，说你取消对多列士的通缉令，我现在就让他回国当总书记，回去就一个任务，让共产党放下枪，跟政府合作，搞联合政府。戴高乐当然答应了，所以多列士回去就解散了法国共产党的50万武装力量，然后进入政府。当然这个条件是非常优厚的，四个部长都是共产党人，还有一个副总理。有一段时间共产党差点掌权，这是后话。意大利也是，斯大林把陶里亚蒂叫到莫斯科，跟他谈，你回去就一个任务，把意大利共产党掌握的25万民族军都解散，回去跟政府合作，建立联合政府。

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因为日本投降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谁也没有想到会突然投降。原来的设想都是1946年以后太平洋战争才能结束，所以美国人也是想方设法在打苏联的主意。因为日本关东军那会

儿还有100万人，谁打这些军队？美国人是不想打，说日本人那是不怕死的，跟你玩命，打的话损失太大，让苏联人打去。但是让苏联人打，就得给苏联政治条件。所以美国答应莫斯科，外蒙古可以独立，中国东北可以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苏联才派150万大军打东北关东军。打完了以后，苏联怎么实现要求？必须得跟中国签个协议，这就是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能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出海口、不冻港、外蒙古等权益。外蒙古独立就是为了保护西伯利亚大铁路。斯大林是不能看到在苏联国境以外有一个直接接壤的敌对国家。中国就很危险，所以必须让外蒙古独立，必须占有东北，这样就使苏联和中国有一块宽阔的中间地带。

但是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所有的这一切背后的事他哪里知道？他认为苏联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他们肯定得支持我。所以日本突然宣布投降，因为美国扔了原子弹，苏联又突然出兵，本来苏联出兵的前提是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等不及了，因为这个原子弹一扔，斯大林一想，日本如果真投降就不要苏联出兵了，那所有的设计就全泡汤了。所以突然在8月8日下令马上出兵，不等条约签订了。反过来是150万大军已经占领东北的情况下，蒋介石是签还是不签？所以蒋介石没办法，签了城下之盟。但斯大林做了一个保证，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苏联绝不支持共产党。

但是这些毛泽东真的不知道，所以5月，就在日本投降前三个月，他在中共七大上讲话，说苏联是我们的朋友，国际援助一定会到来，国际主义一定会到来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但事实就是这样。日本刚宣布投降，毛泽东非常激动，立刻下令占领华北、华南，接收南京，组织上海市工人起义，然后跟新四军里应外合，占领上海，甚至连南京市长、上海市长和江南五省的省长都拟好了名单，俨然要占据半个中国。

为什么？因为国民党都在西南，来不及接受日本投降。他下山跑不了那么快，又没有飞机，兵又运不过来，铁路也断了，所以共产党近水楼台，可以先拿半壁江山。突然斯大林给中共来电报说不行，立刻停止所有的进攻计划。日本投降必须向国民政府投降，只有国民政府才能接受日本投降。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美国人也是这么说。你说中共有什么办法？并且，在斯大林的多次督促下，毛泽东到重庆跟蒋介石和谈，建立联合政府。斯大林在中国也是这样，他想通过建立联合政府来实现自己的要求。

通过战后美、苏的合作就创造了苏联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些都是为苏联改变发展道路提供机会和创造条件。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本身传统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政治理念当中，斯大林想到的事全党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再说，斯大林为了统治的需要，他要控制人们的思想，也不能公开讲。他们的敌人还是资本主义，党章就是那么写的，因为党章还写要搞世界革命，还要推翻资本主义。所以党内的传统意识形态阻

碍了苏联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这是一个内部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来自外部的因素，就是冷战的爆发。

冷战爆发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美国跟苏联之间关系的变化，罗斯福去世是一个重要原因。杜鲁门上台以后，杜鲁门的很多政治观念跟罗斯福不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双方的不信任感，就苏联做的每一件事，美国都得琢磨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从美国人来看，苏联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扩张。其实不是，斯大林就没那个实力扩张，也没有那个野心。但是斯大林的行为方式很奇特，他老是吓唬人。知道自己很虚弱，就怕人家看出来，就不安全了，所以表面上要显得很强硬，土耳其危机、伊朗危机、希腊危机都是如此。

关于希土危机简单说几句。其实斯大林的目标非常有限。比如在土耳其他就想跟西方共同享有达达尼尔海峡的占领权，以便黑海舰队通过。在伊朗他就是想在北部油田多租借几个油井。但是他做出的架势非常吓人，比如把部队驻留在那不走了，逼着对方答应。所以伊朗、土耳其都很害怕，说苏联究竟要干什么？其实它不知道，斯大林知道。斯大林对苏联战后的虚弱、国内的贫乏比谁都清楚。他没有能力通过武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一点目标。但是他要诈唬你，表面强硬的威慑是没有成本的。结果伊朗投诉到联合国，土耳其也投诉到联合国，所以斯大林就这样，对方一硬他就软，马上撤销了土耳其这个声明，在伊朗马上撤军，也把伊朗民主党给出卖了。是苏联把人家煽动起来的，最后跟民主党总书记说，对不住，我们走了，以后能死能活就看你自己了。

其实斯大林是非常现实、非常机会主义的一个人。可能实现目标，他诈唬诈唬，能实现就实现，实现不了就算，本来苏联也没有想要。但是这种外在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让美国人就更不信任苏联。本来他们对共产党就不信任，认为共产主义生性就是扩张，苏联再到处谋取利益就更激化了与西方的矛盾。希腊问题是个特殊例子，从根本上说就是个误会，苏联共产党确实没有掺和在里面，也没有任何主张。这个背景就更复杂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些原因，美国就采取了一种比较强硬的政策，而斯大林是一让再让，一步一步退让都没有导致双方发作。

除了两个问题，就是德国和波兰问题坚决不让，这两个是苏联的核心的利益所在。其他的全部可以让，所有有争议的，包括中国东北的问题，包括朝鲜。朝鲜“三八线”斯大林纯粹让给美国人的，苏联红军都到了汉城（今首尔）了，美国军队还在冲绳，距离有600海里，居然就划了条“三八线”把汉城交给美国了。他就是向美国表示苏联多么有诚意。到什么时候斯大林觉得不能再忍让了呢？

到1947年的5月，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政府破产，共产党被政府踢出去了。跟着就是“马歇尔计划”，美国和西欧这样做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不让苏联参加，但是让东欧这些国家都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个不是挖苏联墙脚了吗？这个时候斯大林不能再忍让，所

以建立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宣布两个世界、两个阵营的产生。

这样外部环境就破坏了。冷战发生了，战后出现的机会就失去了。因为冷战这个环境，苏联更加强了重工业、军火工业，特别是原子弹的研制，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些领域。他所需要的贷款没有到来，所想要的战利品也收获不多。怎么办呢？还得靠压榨农民。再加上1947年的大饥荒，那个大饥荒是欧洲百年不遇的。为了要拉拢东欧国家，还不得不把几十万吨的粮食运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所以在种种内外部的环境下就造成了改革机会的流失。苏联的发展道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没有任何改变，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僵化。因为这个时候斯大林感到政权不稳了，为了控制他只能用老的方法。再加上外部环境，所以战后从1947年到1952年，这段时期是苏联在东欧强制推行一党制和苏联化的历史过程，从而使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凝固化。

到最后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斯大林老年时期心理状态发生一些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到1952年以后，斯大林年纪越大疑心病越重，本来他也不大相信别人。年龄增大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外出少了，外出少了接触的信息渠道就少了。他就只能在深宫大院里头听别人跟他汇报，他就得琢磨谁汇报的是什么话，谁说的真的，谁说的是假。俄国档案里记载了，到1952年的时候，斯大林在党内搞了一系列的清洗，他一旦不相信谁了，就把他清洗掉，什么“列宁格勒派”，一会儿搞“格鲁吉亚案件”，一会儿搞什么“医生案件”。伏罗希洛夫是跟着列宁一块干革命的，就是电影《保卫察里津》里骑着马冲上前线的那个人。斯大林居然说他是英国特务，给他们家安窃听器。莫洛托夫也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因为莫洛托夫的老婆是个犹太人，斯大林把他老婆先关到监狱，然后逼着莫洛托夫和她离婚。莫洛托夫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离了，不离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保了，但结果他的外交部长职位还是给撤了。贝利亚自己也很紧张，因为斯大林知道贝利亚搞秘密警察那么多年，手里控制了安全部和内务部，斯大林一刀切两半，说贝利亚你只能管一个安全部，内务部再找伊格纳季耶夫管理，这等于在党内就制造了矛盾。

本来老百姓的生活就很贫苦，党内又是这样人人自危，社会就紧张得不得了。赫鲁晓夫有一段讲得是最生动的。因为十九大以后，苏联政治局从来不开会。有什么事都到斯大林的家里商量，斯大林也不住城里，他在郊区有个别墅。到晚上9、10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电话，马林科夫今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赫鲁晓夫同志你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所以手底下这些人每天都在琢磨，吃完晚饭就等电话：“也不知道今天是叫我不叫我，叫我是好事，说明领导核心圈子里还有我，但是也很难说，没准今天晚上去明天早上就回不来了。”你想想，斯大林周围的这些人都是这种心态，整个社会到了什么状态？特别是医生案件以后，苏联在国内开始大规模反犹，以至于共产党很多高层领导人因为是犹太人，或者有犹太人的血统而受到牵连。斯大林都快把大家逼疯了。

1953年3月1日上午突然发现斯大林休克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只有

一个心思，就是“您最好不要再站起来了”。因为斯大林再站起来，就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斯大林的医生日志记录最有意思。他们发现了斯大林躺在那以后就给领导人打电话，过了两个小时，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领导人都来了，四个人背着手围着斯大林转了一圈，走了。又过了两个小时，他们派医生来弄俩蚂蝗吸血，因为斯大林是患了脑溢血。你们看那个记录，一天、两天、三天，等到了3月5日的时候，记录上显示斯大林病情是越来越恶化，这个时候他们就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席会议，开会的时候斯大林就在旁边躺着。会议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把苏共十九大斯大林搞的一切全部推翻了，贝利亚又重新掌握了内务部，莫洛托夫回到外交部，驻华大使也换了。

斯大林知道他死后，这些人当中的不同意见会反映出来。所以他提前要给组织掺沙子。十九大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认为是马林科夫要接班。为什么？因为是马林科夫作的政治报告，在共产党的惯例当中，谁做政治报告可能就是下一届的领导人，所以大家都盯着马林科夫。斯大林就让马林科夫提出一个政治局的名单，马林科夫哪里敢？最后还是斯大林自己提出这个名单，人数从11人增加到25人，整个改变了领导结构。等到3月5日的时候，这些人又给改回去了。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其实是看到了原来苏联社会的问题，认为必须得改变，不改变苏联社会就要爆炸了。等他们把联合决议起草完了，大家再到隔壁一看，9点多，斯大林正式咽气了。这回大家心里踏实了，要是斯大林真醒过来就麻烦了。

斯大林死了以后，到1955年中间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苏联历史上一个空位时期。因为马林科夫当时的职位最高，但是马林科夫最没本事。他是个秘书出身，很缺少政治手腕。贝利亚权力最大，布尔加宁资格最老。只有赫鲁晓夫是资历又浅，到中央的时间也短。他1950年才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原来只管农业。但是赫鲁晓夫最有心计，所以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政治斗争。赫鲁晓夫先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人，先将贝利亚干掉，因为这个贝利亚太危险了。赫鲁晓夫采取了很多花招，他跟莫洛托夫说，贝利亚最近要把你干掉，咱们一定要把他制服。他说现在大家都同意，就听你的意见了。莫洛托夫一想，那行吧！那我就参加。然后他就找布尔加宁，说贝利亚要把你干掉，大家都同意，就听你的意见了。布尔加宁说，那行吧！这么一个一个做工作，大家都同意了，于是突然开会宣布贝利亚被逮捕，没过几天在地下室被枪毙了。第二个要整的是马林科夫。因为马林科夫职位最高，赫鲁晓夫就抓住马林科夫犯的一些错误。到1955年1月，马林科夫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所以，这一段人们看不大清楚苏联领导人到底是要推行什么政策。

其实现在我们仔细看俄国的档案，就会发现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上层的领导人、高层的领导人，集体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苏共二十大的新方针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想法，而是苏联高层领导人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尽管他们没有商量。比如说贝利亚做的第

一件事，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因为他掌管内务部，所有的监狱都在他手里掌握着。他知道从“大清洗”的时候，多少人冤枉进去了。所以斯大林一死，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重新调查，这些人有多少是真的反革命。再一个是柏林的骚动，东柏林起义引起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恐慌，但是贝利亚主张不能使用武力镇压，要尊重东德人民的选择。按照原来苏共的政策一定是镇压。但是正是因为党内传统保守的势力仍然在，最后给贝利亚定的罪名就有这么一条，说他放弃社会主义阵地。这样一做，表面好像大家都是反对这样做，其实不然。这是政治斗争当中的一个借口。

像马林科夫主要也是几条错误，其中一条他宣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不要打核战争。这个跟原来的斯大林传统的观念是完全对立的。斯大林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早晚一天要打，所以时刻准备打仗。马林科夫这么一说，实际上在给西方传递一个信号，苏联要改弦更张，要换一条道路。这个也成了他的罪名。再一条就是马林科夫的农业措施，他要加大农业投资。俄国农业一直搞不好，到1953年的时候俄国的粮食产量还不如1913年。

所以这些人都有改革的想法，只不过在空位时期，赫鲁晓夫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实际上后来他自己做的就是前人想要做的，就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想要做的事。比如说平反冤假错案，赫鲁晓夫接手以后立即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搞这个事情。马林科夫一下台，赫鲁晓夫关于农业改进措施的发言和马林科夫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出路只有一条，必须改变这种道路。

所以苏共二十大提出新的方针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只有他们才在政权的核心，他们看到了基层的问题，也看到了上层问题。而且这是一种集体意识，只不过后来反映到赫鲁晓夫一个人身上。当然，赫鲁晓夫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中央委员来支持他这种主张。所以苏共二十大提出三条对外政策：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要跟西方搞缓和，东西方不能一天到晚老打仗、总闹危机，手里都攥着原子弹，谁吓唬谁啊？至于苏联国内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苏共二十大的国内政策改革还是没有直接涉及根本问题，在当时那种思想条件和意识形态下也不可能，但二十大毕竟是提出了问题。比如投资比例的问题、工业布局的问题、加强轻工业生产的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加强技术和计算成本等等，这些都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不管的，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计成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付出的成本更大。资金可以随便调用，完全是长官意志，没有任何的市场调节。

我们不能说苏共二十大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它指出了这个方向。这就使得苏联开始步入“新经济政策”之后的“第二次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党内，在政治体制上赫鲁晓夫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提倡党内民主，批判斯大林，批判个人崇拜，搞非斯大林化。但是他的做

法有些问题，属于政治经验不足，不过想法非常好。因为现在这些党内的记录都公开了，你可以看看当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有人想不通，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党中央讨论的时候说斯大林是有很多错误，但不能全盘否定。他们同意批斯大林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根据档案证据，发现和证明斯大林是“大清洗”的主谋。

这件事暴露以后，苏共领导人都大惊失色，因为长达几十页的调查报告在所有政治局委员开会的时候当场宣布，大家听完了都非常震惊，这种事竟然是斯大林干的。原来他们都认为是内务部、安全部干的，是秘密警察干的，斯大林不知道，被蒙蔽了，原来党内都这么解释。的确是，大家都承认有问题，但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苏联红军的将军、元帅几乎全是间谍，中央委员杀了多少？大概80%吧。大家可以看当时的具体数字。最后一经证明，原来都是斯大林背后主持搞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先前把他美化成一个神，现在看，其实是一个罪犯，用政治局会议上的话，是一个“魔鬼”。最后是集体决定让赫鲁晓夫做这个秘密报告。它本质上是要改变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即把一个人捧得这么高，一言堂、没有党内民主。

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不错的，但他没有想到，这个事一传出去以后，引起这么大的社会震动。大家想想，老百姓接受不了这种现实，原来他们作报告也是遮遮掩掩，不敢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老百姓、普通党员就更难接受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时候，讲到斯大林的罪状，当场就有人晕倒了。会场上那空气，整个都窒息了，一点声音都能听见，听着听着，“哐叽”倒一个，“哐叽”又倒一个。波兰总书记贝鲁特就突然心脏病复发，结果死在了莫斯科的手术台上。到了社会上就更不得了，有些基层单位讨论的时候，那都是保安部队围着一圈，要不然就打起来了。所以，秘密报告引起了比较大的社会震动。几年下来，一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之前，苏联开始一步一步地做改革的尝试，很遗憾的是这次改革又失败了，这个失败也是有内外两种势力反对造成的。

从党内来讲，保守派一直对赫鲁晓夫这样做有看法，主要是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两人，马林科夫是因为被赫鲁晓夫排挤下来了，所以对赫鲁晓夫不满，就站到了莫洛托夫一边。1957年的“六月事件”就是一个信号。这次宫廷政变就是他们私下商量好了。当时在政治局里头还是这些老人，他们串联说，赫鲁晓夫这么干不行。赫鲁晓夫要推行他这一套东西，支持他的也有，像米高扬、苏斯洛夫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是在政治局里毕竟还是少数。所以赫鲁晓夫要发动年轻的干部，提拔年轻的干部当中央委员。这伙老人就设计，6月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宣布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

这就是个信号，但是这件事没有成功。因为赫鲁晓夫也很聪明，你要想免我职务，得说明我有什么错误，他们就说他这个错误那个错误，有斯大林的问题等等，那赫鲁晓夫说我就做检查吧。说起来没完没了，到下班了，赫鲁晓夫说，检查没完，明天我接着检查吧！到晚上给国防部长朱可夫打了一个电话，要他把所有中央委员立刻用直升机调到莫斯

科。第二天一早，200多个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包围了，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总书记必须召开中央全会，这是党章上写的。所以反对派也没有办法，再加上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宫门口一站，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走出克里姆林宫，他用军队给包围了，调动了莫斯科军区的军队。结果一开中央全会，这些老人倒霉了，他们是少数了，所以成了反党集团。虽然赫鲁晓夫处理了这些人，莫洛托夫去蒙古当大使，“苏武牧羊”嘛。布尔加宁到一个发电站当站长，这也不错了。这要是斯大林时候早就给杀了。但是党内反对势力还是很大的，以至于到1964年的时候，终于成功通过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罢免了，这是党内的原因。

说到苏联内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赫鲁晓夫他虽然有这个心，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大家看苏联从1956年开始到1964年，八年的时间没干什么正事，发展是有的，比如体制改革这方面。虽然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利别尔曼建议”提出来是要搞利润挂帅、奖金挂帅，要有物质刺激人们才有生产动力，不能一天到晚光有什么名誉、鼓励、革命精神。短时期可能有用，对某些人可能有用，但就整体社会而言，长期来讲，它不符合人性，不能持久。所以赫鲁晓夫让利别尔曼提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按照他的逻辑发展，是要逐步地展开向市场经济过渡。毕竟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他没有整套的理论设计。

从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材料，我认为赫鲁晓夫他只看到了问题，试着想解决，但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更不要提完整的一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赫鲁晓夫还胡来，比如要搞什么工业党、农业党，你说全民党的问题，他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苏联已经消灭阶级了。消灭了阶级，那资本家就没有资本了，地主都没土地了，他还能叫地主吗，还能叫资本家吗？也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嘛。你这个共产党还能说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吗？现在谁是无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都没有“产”。除了工资，那“产”不都是国家的？所以全民都是无产阶级，那不就是全民党嘛。道理是这么来的，其实也是不错。但是他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构想，再加上党内传统势力的抵触，最后从国内这个状况来讲，没有走出原有的路子。

此外，我觉得对苏联改革还有一个制约是外部因素，就是中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原来跟苏联共产党想的基本是一致的，对比一下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纲领，你可以看出大体上都一致。毛泽东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的工作报告一对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苏联大使馆都有报告、评论，都是这么看的。对外政策也是一样，搞和平共处。

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我们不久前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找马共的共产党员座谈，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档案材料。什么呢？就是1954年10月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联合给马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让他们把武器上缴，解散武装力量，进入政府。这不是正是搞和平共处？这和当年斯大林让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交枪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当时马共说，我们那会挺有力量的。我们都在山里头，我们有

枪、有武器，想出击随时就出来，最后两个老大哥都让我们交枪，我们就交呗，身份就合法了，当然此后就不用在山里躲着，马共就是合法的公民了。越南问题，也是中国和苏联联合压制越南。因为当时越南的印度支那共产党，胡志明他们，当然也有中共很大的援助，特别是韦国清、陈赓顾问团去协助越南人民军，抗击法国侵略者。那时候法国想回来继续扶植傀儡政权，继续以越南为殖民地，这样就发生了武装冲突。那会越共在很多农村发动群众闹革命，胡志明真的是学中国革命经验，农村包围城市，把力量都在农村聚集，越南形势非常紧张。1954年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法国人最后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再跟越共打下去了，怎么办？很可能把越南交给美国人。

美国那会也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中国跟苏联就非常担心，把法国人赶走，再把美国人引来，麻烦不就更大了，劝越南就别打了。苏中在日内瓦会议上就给越南出了个主意，划条线，越共把南方的解放区放弃，然后北方的城市交给越共，就像“三八线”一样，划一条线，南北一分，南越、北越，大家和平共处。越南人死活不干，说眼看要取得胜利了。周恩来原来在日内瓦劝说范文同，说不通，然后趁中间休会，坐飞机到柳州，把武元甲跟胡志明都请到柳州，一起开了三天会。周总理说，你讲讲，你有什么保证，能不能在三个月拿下整个越南？而且能不能保证，你拿下越南的时候，美国人不来干预？胡志明说我不能保证。那好，如果美国人来了怎么办？难不成让中国再来一场朝鲜战争？最后说得胡志明没办法了，就同意了。所以“十七度线”就是这样划下来的，然后周恩来又回北京跟毛泽东商量，又到莫斯科跟赫鲁晓夫商量，再回日内瓦，最后签字，划定“十七度线”。

这个时候中苏还是很一致的，但是后来有一件事发生了以后，导致了中共态度的急速转变，就是波匈事件。1956年的10月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使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虑。原来中共八大的所有这些基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阶级斗争结束了。原来跟苏联的想法是一样的，资本家没资本了，地主没有土地了，富农也不富了，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所以没阶级了，哪来的阶级斗争？所以八大做出了一个论断，就是疾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都已经过去了，群众性的阶级斗争都已经不存在了。将来主要问题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发展生产，大家齐心协力搞经济。波匈事件，突然让共产党想到了一个问题，觉得政权还是有可能得而复失的。而夺取、威胁你这个政权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了，而是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国际反动势力的结合，再有就是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这就是中共得出的一个结论。

对中国来讲，当然中共主要讨论的还是中国问题。从八届二中全会讨论记录就可以看出，在中国虽然国内的反动势力已不存在，因为中国搞了几次政治运动，像“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国内的反动势力已经不存在了。当时毛泽东跟苏联人也说过这个，说你们那儿为什么出事？阶级斗争原来就没有搞好。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但是波匈事件给中共领导人一个什么观念？他们认为人民群众和执政党之间的

关系会发生抵触。而将来真正起来对这个政权造成威胁的，不是国外的阶级敌人，也不是国内的阶级敌人，而是人民群众和执政党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毛泽东要开展整风运动的一个前提。他要搞整风，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共产党。

当然党内基本上不大同意，所以毛泽东就发动党外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他这么一做的结果呢，最后大家起来提的意见，他又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在民主党派座谈会开了四五天以后，毛泽东开始发现问题了，说现在有危险倾向，一个是对共产党不满，一个是对社会主义道路不满。这两个危险倾向随着事态的发展，他越来越感到威胁。特别是学生运动起来了，再加上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当时上海工人罢工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公私合营而不满。而福建、广东，包括湖南，农民的大量退社是因为合作化运动搞得太仓促。结果有的地方，一个县90%的人退出了合作社。这样子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危机的前兆。包括退伍军人也闹事，再加上学生走出校门，比如北大的“五一九事件”，这个时候毛泽东感到有问题了。搞不好中国也会出匈牙利事件，所以决心开展“反右运动”。

随着反右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越来越偏激。主要是毛泽东本人，他就认为阶级斗争表现的形式和原来不一样了，是思想领域里的，是世界观方面的，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所以后来就改变了中共八大的基本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当中，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他的道理跟当年斯大林的道理是一模一样。斯大林说，为什么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呢？是因为阶级敌人越到死亡的时候越要挣扎，毛泽东也是这个理论。这样子他的整个思想就开始变化了，认为还必须要抓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东西。

再加上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原来他想搞和平共处，就是一种策略。在苏联人看来，在赫鲁晓夫看来，和平共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有核武器了，双方的力量都非常强大，要打战争就是两败俱伤。谁也不可能在第一次核打击当中毁灭对方所有的核武器，所以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在苏联共产党看来，倡导和平的环境是一个时代的任务，时代已经不是原来革命的那个时代了。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因。当时在中共看来，在毛泽东看来，它只是一个策略，是因为我的力量还没有你强大，所以我们暂时和平共处。

到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大过资本主义，这就是莫斯科会议的时候，11月18日他的讲话，叫“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有一句俗话，《红楼梦》上讲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看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一天天壮大，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他举了很多例子，十件大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跟着后来苏联核潜艇下水，这两个高端的技术美国当时都没有掌握。

所以毛泽东当时非常兴奋，赫鲁晓夫是这样解释的，说不错，大家都认为现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过资本主义。赫鲁晓夫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更有可能通过和平竞赛来战胜资本主义，我们不用打仗，大家选择嘛，让他们看哪个制度好，我们强大，大家自然选我们，这不和平竞赛就胜利了？毛泽东说不对，正因为我们比他们强大了，所以我们不用跟他们和平竞赛。我们把他打败就完了嘛，你赶快闹点危机，发动革命，多弄几个战争，把帝国主义消灭就完了。这个时候中苏就开始发生分歧。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时中苏之间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到1963年的时候中苏大论战，他们都是在一个话语体系里讲话，而且都称同志。他们是同一个话语体系内的争论。也不是国家利益冲突，那会中国跟苏联没什么国家利益冲突，恰恰相反他们的安全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像中央情报局当时分析，中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分歧到底在哪儿？

毛泽东认为到现在赫鲁晓夫已经没有资格来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因为他不革命了，他没有这种精神，他又不吃辣椒，谁来领导世界革命？谁来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当时不光是毛泽东自己这么看，他当时一讲赫鲁晓夫都是这种话：赫鲁晓夫同志很幼稚，哲学没有学好，不懂辩证法。其实赫鲁晓夫就比他小一岁。

1958年赫鲁晓夫到北京，两国元首见面。毛泽东就穿着件睡衣，里面一个大裤衩就跟人家会谈，谈着谈着，一脱衣服，咚，就跳到水里去游泳，赫鲁晓夫就挨池边跟着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很看不起赫了，他认为赫鲁晓夫已经没有能力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他，他是什么人？毛泽东已经断言说，赫鲁晓夫如果这样下去，必定垮台——八年——你看算得多准，赫鲁晓夫后来执政不到八年就发生了宫廷政变。

不仅毛泽东这样看，现在很多资料都反映出来了，中共党内都是这个看法，特别是高层的领导。他们认为苏联共产党现在已经远远落在中国共产党后面了，特别是中共发了“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主义阵营影响之大，连苏联共产党都印了100万份作为党内学习文件。这在苏共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过去都是全世界的共产党学苏联的文件，现在苏联共产党学中共的文件，这意味着什么？你再看党内报告，苏共很多人说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要派什么学习团到中国来学习，这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大家想，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客观上有一种趋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至少在政治上超过了苏联共产党，而毛泽东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只有一点比较心虚，就是中国的经济不如苏联。这是他在1957年11月18日讲话里专门讲的。

因为赫鲁晓夫讲，毛泽东同志，以后以苏联为首的口号就不要提了，还是以中国和苏联为首。毛泽东说，那哪儿行？不行。说中国现在不行，说中国是政治大国，这点先肯定了。政治上我肯定比你强，人口大国，比你多多了，但是在经济上不行。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发动“大跃

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那个时候中国就有完全的资格来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那个时候中国站在苏联头顶上谁都无话可说，当然，当时这种想法是一厢情愿的。这样就造成了中苏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在争夺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领导权。争夺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指责苏联共产党所谓修正主义。大家现在看看《九评》，在中苏论战当中，中国共产党那可真是咄咄逼人，文章写的真是好。现在看来你不得不佩服。当时毛泽东身边一批笔杆子，对马列主义实在是精通，文章真是写得好。

在中苏论战当中，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困惑的境地，跟中国论战底气不足，为什么？因为大家引经据典都是老祖宗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引用他们的话。斯大林的话苏联人不大认账，所以中国不大引了。因为中共引了这个，苏共不认，好，咱们就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中共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到位的。为什么？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处于革命的时代，所以他们的言论都是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要搞阶级斗争，要搞暴力革命。

这个正是中国共产党做的，而中国共产党认为现在仍然是革命时代，仍然要搞阶级斗争，仍然要搞权力的集中，等等。所以他来解释马克思主义那是理直气壮、扬眉吐气，文章写得也好，文笔也不错。加上播送的播音员也有气势，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听这个节目，听了心里非常激动，讲了这么多革命道理，心服口服。你可以对比看，当时理解不到这一点，苏联的解释、答复就软弱无力、避重就轻。为什么呢？苏联他们的做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时代已经不是革命时代了，所以他想办法在马、恩、列的话当中去找能够用上的，什么列宁说过，遇到土匪，人家拿枪逼着你，你怎么办？你把钱包给他，等走了以后，你再想办法把他打死，这不就是妥协么？他说，你看列宁也是讲妥协的。当然这都是不能上台面的话。

从总体上来讲，他们无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来解释当时的行为，所以毛泽东说苏联是修正主义一点不错，他们确实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而该不该修正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苏联就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到现在应该是修正了，不敢讲。因为前面就有伯恩斯坦、考茨基那个修正主义，名声不好。当时是国际共产和列宁一致反对的。如果要敢承认修正主义，那不就等于是反列宁？反列宁苏共就没有合法性和正统性了。所以苏联的共产党完全处于困境当中，做的事情未必是错误的，但是必须打着马列主义这个旗子。因为不打这个旗子，就没有正统性，他来领导世界革命，来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连马列主义都不遵奉，他怎么领导？

所以它本质上斗不过中国，在这么一种气势下，苏联党内的很多党员都接受了中共的理论，认为中共解释得对，因为马克思都是这么说的。而苏共的那些笔杆子，编来编去都是避重就轻的，都是找点细枝末

节的地方跟中共对抗，所以苏共它心虚。这么一种态势，就从政治上、思想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环境中压制了苏联的改革，也不敢再继续走下去。苏联允许自留地，中国就说是“资本主义的毒草”。当时苏联得留点自留地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但这让中共抓住把柄，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允许这个就是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改革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就最终失败了。

到了60年代后期，虽然柯西金他们这一批人还是想继续搞经济上的改革，但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倾向是趋于保守。特别是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保守派，逐步泯灭了苏联党内所保留的一点点改革的力量。后来，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跟美国进入新的一轮的军备竞赛，国内的体制就越来越转向军事化、凝固化，包括政治体制。大家可以看看后面几个专题，有讲到，但是讲的还不够。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研究的是比较少的。到底官僚体制怎么形成的？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现象，还没有彻底深入地研究。但是给我的感觉是，苏联到了80年代已经完全凝固化了。很难撼动，任何一点改革，都很难办到。

所以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失败？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二十大时代的人，因为他在这个时候接受的教育，后面步入了领导层，所以他提出“新思维”，是有历史背景的。但是两个条件制约了他：第一，他资历不够。他说的话没人听。一个没有相当资历的人，在这种环境下想提出改变党的方针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党内的顽固势力使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推进下去。所以他最后只有一步：解散党。

但是关于戈尔巴乔夫问题，现在研究比较多的还是根据回忆录，这就受到很大的制约。我们觉得，研究历史主要还是要依据档案，回忆录不是不能用，但是回忆录是第二位的，必须跟档案配合起来。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细说。但是总体上可以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苏联党和国家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船调不过头来了，早晚是一亡，就是早点儿的事还是晚点儿的事。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苏联病入膏肓的时候，下了一剂重药，结果当场死亡。你要是下点轻药，或者你干脆不下药，还能喘息一段时间。但这种体制确实是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回过头来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当然我讲的时间很短，把这个历史过程给大家描述一下，其实是想讲这么一个道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按照原来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那个社会主义来建设。如果那样做就必然出问题，因为他们所设计的，不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国情条件下设计的理论。所以用那个理论来形成一种模式，它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经验、没有先人，也没有教训可以吸取，没有前人的路。所以斯大林领着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走上“斯大林模式”这条路是可以理解的。我说可以理解，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也确实使他没有别的选择。但问题在于你看到了存在问题以后，没有抓住或者有意放弃了改革的机遇，一次

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苏联最终没有走出“斯大林模式”的阴影。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不是说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错误，而是说没有进行适时的、适当的改革。其实中国也是这样的。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中国跟苏联的对比，中国为什么走出来了？其实很简单，中国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历史包袱没有苏联那么重。所谓历史包袱没有苏联那么重，就是说建国以后逐步形成的体制是松散的、不完整的、不成系统，无论是政治上的体制还是经济上的体制。我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不是说现在。因为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不久实现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国改变了一条路，这是大家可见的事实。问题是，我们现在要解释为什么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竟然还会走出这么一条路来。

所以第一我就说，它最初的社会主义模式，体制就不健全、不成熟，或者说不顽固。经济呢？中国哪里有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错，中国完全按照苏联一样设计的国家机构，国家计委、重工业部，跟苏联一模一样，但是没有按苏联那样做。谁在这里起作用了？是毛泽东。我觉得毛泽东在50年代到60年代很多的选择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家知道，这是苏联帮着建，整个苏联设计的，起草都是苏联搞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人自己搞的，但是变来变去，这指标就没完没了。为什么？中间赶上“大跃进”嘛，计划刚制订好，毛又说不行，我们要赶超英美，十五年的口号，不到几个月，改十年，十年改七年，七年改三年，最后二年。你想这计划赶得上变化吗？这一句话，从七年就变成了三年，人家得算多少时间？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连计划指标还没有拿出来，这叫计划经济吗？第三个五年计划更难了，因为中国赶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以后，再加上灾荒，正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于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了，周恩来、陈云他们搞了一个以吃穿用为主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年交上来了。正好到这会毛泽东的想法变了，说现在应该是要打仗，什么越南战争一来，他就觉得谁要进攻中国了，蒋介石那会要反攻大陆了，所以他把这个计划给否定了。自己搞了一个以战备为主的计划。他甚至不相信国家计委，自己搞了个“小计委”。所以第三个五年计划几乎是没有。

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就进入“文化大革命”了，工人不生产，全拿着枪上街打仗去了，所以哪里有什么计划经济。这跟苏联根本没法比。苏联计划就是法律，到年底你完不成计划就进监狱。所以苏联改就非常难，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中国上面有计划下面有变化，说变就变，非常容易。大家也都能接受。所以取消计划经济非常容易，没有太多制度上的障碍，思想上的障碍也不如苏联。当然多多少少也有，但是没有那样根深蒂固。所以我说，毛泽东对这种改革其实起到了历史上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

毛泽东本身并不是针对计划经济来的，但他对计划经济里头的一些原则是反对的，比如平衡，毛泽东是反对平衡的。周恩来等人非常讲平衡，说这个经济发展不平衡哪行，说你要炼多少钢，你就得发多少度电、产多少吨煤和铁路运输都得平衡相配合，这个经济才能稳固地向前发展。你大炼钢铁之所以搞乱，就是因为不顾这些，就光知道要钢，要那么多钢你得有多少煤跟上，你得有多少生铁跟上，你得有多少电跟上，你得有多少铁路通，你得运输这些原料、材料等等。都不想，就是要。最后没有办法了，老大娘、老大爷全都自己弄个小高炉炼。我们那会也是，小学生要献钢献铁，我们怎么献？我们把家里锅拿来交上。就是这种混乱，恰恰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导致了苏联式的经济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所以要想改比较容易。

政治上也是一样，因为毛泽东跟别人的想法真的不太一样，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实跟整风是有直接关系的，跟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是有直接关系的。毛泽东凭自己的本事推翻一个旧政权，自己带出了一支队伍，建立了一个新政权。所以他想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权如何巩固。“文化大革命”中他讲了很多话，林彪给他总结了很多，林彪总结的是很到位的。革命的核心就是政权问题。

政权的核心是什么？是执政党的清廉，毛泽东一直这样认为。他为什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炮弹的进攻”？那是从李自成的教训来的。所以他要全党深入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写的一篇文章，讲的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占领紫禁城几天之后就被人打出来了，就是这支队伍腐化了，什么牛金星啊，陈圆圆啊，进了北京城，李自成怎么毁了？不就是得罪了吴三桂。当时怎么得罪吴三桂，不就是因为一个陈圆圆嘛。这就是执政党腐化的结果。

杨奎松教授研究的中共初期干部制度、工资制度是怎么来的，很能反映毛泽东的想法。其实毛学习是反对八级工资制的，他一直觉得就是平均主义，大家都平等，官兵一致等等。所以他要搞整风，就是要消除人民群众跟执政党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个等级制不是说想就能消除的。八级工资制怎么来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遇到很大的困难，把资本家赶走以后不知道怎么发工资，这么多工人怎么定？该给多少不知道。后来突然到大连造船厂，发现苏联人在这儿搞了八级工资制，陈云如获至宝，说这样解决问题了。

但是毛学习不这么想，后来包括军衔制，他也是反对的。他很看不起为了争军衔什么的掉眼泪，大家都说了给他大元帅，他不要。没有几个人不是大元帅，蒋介石大元帅、斯大林大元帅，当时封给毛泽东，他就是不要。他基本的一个想法，要让自己的江山能够千年万载地巩固永存下去，必须保持一支清廉的执政党队伍。这个队伍一定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人民群众不反对你，你就能够坐得住这个江山。再一个就是外来的敌人消灭你，就这么两个途径，所以他要在国内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四清”、整风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反复地整党、折腾，所以党内就很难形成像苏联60年代形成的那种板结式的官僚体制，没事就掺点沙子，没事就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的办法多了，都是看《资治通鉴》看的，读了十七遍。我不知道《资本论》他看没看过，我估计没看，没功夫。所以毛泽东治国有术，但是都是比较传统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上一个时代的。但是他这样做法，确实从客观上阻挠和延缓了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才可能实现改革，改革才可能成功。

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必须得有一个有资历、有威望的人来开启改革的大门，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如果不是他，别人谁说了都没用的。你想，保守的势力惯性多大，谁敢？你完全否定自己嘛，因为他必须有这种决心，你要自我否定才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是不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邓小平他非常有政治智慧，毛泽东旗帜高高举起。这个比赫鲁晓夫就强多了，赫鲁晓夫非要把斯大林搞臭才能改革？不一定。邓小平他就有政治智慧了，毛泽东同志咱就不讨论了，具体有些问题，什么姓资姓社就算了，别争论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毛泽东旗帜照样高高飘扬。政治智慧当然不是说非要他才能有的，但是他的资历在那儿摆着，能够震慑的住。这是保证条件。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下苏联的几次改革，列宁他有资历也有能力，就是死的早，没办法。斯大林是碰到一个环境，他未必没看到这个问题，但他首先考虑的是苏联生存问题。所以在冷战条件下，苏联大饥荒、政权不稳定的情况下，他只能走回头路。赫鲁晓夫有那个胆量没那个能量。所以改革的历史、人物条件，苏联不具备而中国具备。所以中国能够走上改革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还没有走完。以后的事，就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回答的了。

今天我们报告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 第三个环节是和沈老师交流，有谁想要提问？

听众： 沈老师好，你怎么看顾准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看法？

沈志华： 五六十年代这种看法比较普遍，因为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记得是在1962年到1964年的时候，理论界在讨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趋同现象。原来马克思设计的为什么要用暴力呢？他有这么一个逻辑，是因为要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这个矛盾，社会化是不能改变的，是一个发展趋势，那么只能改变私有制，私有制从人性上讲，私有者不愿意放弃自己掌握的权力和金钱，只有让外力来打碎它。这就是《资本论》的一个基本逻辑。

但是我们看到，从1929到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反省这个问题。反省以后他们想到，靠国家的调节来限制私人资本

的发展，来改变投资方向。比较传统的就是宏观调控。“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再加上北欧的福利国家出现，所以到了60年代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那种完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调控、国家参与，甚至国家投入资本来控制的趋势出现了。而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又出现了引入市场机制的这种现象，主要是在苏联。

还有第三种现象也出现了，就是当时苏联理论界把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叫发展中国家，那个时候都叫“民族国家”——称作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搞的既有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资本主义成分。既允许私有制存在，又加强国家的控制。当时，苏联把这个叫“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为这样一些现象的出现，人们总结了一个“趋同理论”，可能将来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会产生一致的共同的形态。我觉得这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顾先生能看到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眼光的。现在来看，我觉得仍然不能排除这种趋同的现象和趋同的理论。

听众： 老师您刚才说1947年的时候，斯大林改变他政治上的想法，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采用了联合政府的形式，苏联提供很多援助。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沈志华： 斯大林1949、1950年对中国共产党说的联合政府，和他1945到1947年讲的联合政府是两码事，虽然是一个词。为什么？因为1949年到1947年讲的联合政府是指的通过民主选举，各党派联合成立一个政府。后来斯大林跟中国说要搞联合政府，和毛泽东说要搞联合政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吸引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不会动摇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这个联合政府的实质问题在于，它是来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体制。

这里有很简单的一个史料，就是1947年下半年在内战当中最紧张的时候，中共中央发表的宣传口号说，将来我们中共要建立联合政府，各党派大家一起，当时讲不能让国民党独裁，所以要各党联合成立政府，这就是共产党当时的目标。到了11月，中共开始反攻了，国民党重点进攻失败了，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发了个电报，他说什么？说哪一天我党要是夺取了政权，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搞一党制，电报给打过去了。他为什么打这个电报？现在大家都在猜测，都在解释。我想可能也很难解释，因为有各种情况。一个情况，他怕苏联不同意中共的口号。因为苏联是一党制，你将来要是掌握了政权，你搞多党制，这跟苏联就不一致了嘛，那苏联要反对怎么办？所以他故意写一封信给他，这是一种可能。还一种可能，就是他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但他要这么做，先得取得斯大林的认可。

这两个都有可能，现在就很难讲。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封电报。但是过了三个月，斯大林没有回电，所以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说我们还是要搞联合政府的。资产阶级这些政党还是有用的，将来还可以靠他们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等等。看到这封电报，斯大林回电，说你说的是对的，在中国跟苏联不一样，苏联的资产阶级都不能利用，都坏透

了，所以必须把他们赶走。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有用，民族资产阶级，什么搞经济，你们共产党也不懂这些。所以他回了这么一封电报。后来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初的时候搞了这么一套。

主持人： 我还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现在沈先生正在组织一批学者再来编俄国档案，准备出版，原来34卷《苏联历史档案》，其中没有涉及中国。现在沈先生在争取把这部分都翻译出版，这样的话，对研究中国的问题来讲贡献非常大。我们期待着沈先生这项工作胜利完成。今天就到这儿，欢迎沈先生再来。

（2010年9月18日在福建师范大学的演讲）

第八讲 毛泽东两次出访苏联轶闻

主持人：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第三期今天下午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开始，我是《文史参考》杂志的总编辑王翔宇，欢迎大家。我们《文史参考》杂志社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本高端历史杂志，我们的宗旨是真相、趣味与良知，也就是通过时事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体会历史人物跌宕的命运，以及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我们搞的文史大讲堂活动是公益活动，目的是搭建起专家学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使专家学者的声音、学术成果能够通俗易懂地走进更多普通读者心田。

今天下午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老师为我们讲授毛泽东访苏轶闻。这个讲题也是几经反复才确定下来的。沈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有很多著作，比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他是国内研究中苏关系以及朝鲜战争方面的权威专家。沈老师为人也很风趣，既睿智又幽默。今天下午我们期待着他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

沈志华： 这个题目似乎不太像学术讲座，其实也挺符合这个历史的。所谓轶闻是什么呢？就是散失了后来又找回来的东西，叫做轶事轶闻。我们对毛泽东出国访问的很多历史的史实都是重新找回来的，原来报纸上登的没多少，包括《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的传记里，很多东西都在中国的档案或者在俄国的档案中，因为有档案的解密期，三十年以后才披露出来。

毛泽东一共出过两次国，一次是1949年12月到莫斯科，第二次是1957年11月，还是到莫斯科。其实这两次访问非常有意思，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第一次访苏就是为了建立中苏同盟，他去了就是为了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从他访苏以后，中苏关系江河日下，差不多一两年以后，中苏同盟就走向分裂了。中苏同盟的建立和中苏同盟的分裂，与毛泽东这两次访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讲的内容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它们当中有很多情况都反复出现，虽然表现不太一样。

比如，第一次毛泽东访苏是毛泽东特别想去，从1947年就开始想去莫斯科，斯大林就是不让他去。第二次是赫鲁晓夫特别想让毛泽东去，毛泽东就是不答应，一直到9月最后他才答应去，这里面就藏了很多故事。第一次访苏毛泽东特别憋屈，非常沉闷，心情特别不好。第二次访苏毛泽东心情好得不得了，包括他睡床垫什么的，第一次访苏给他一个软床，第二次访苏也是这样，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两次访苏特别能反映中苏关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下面先讲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毛泽东在1947年的春天第一次提出他想去莫斯科，但是那时候斯大林比较担心，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内战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这时候把毛接到莫斯科去，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对苏联非常不利，所以他几次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刚开始他答应了让毛泽东来，当时毛非常激动，就在山西一个打谷的场子修建了简易机场，等着飞机接他，后来斯大林说你别来了，你挺忙的，先忙你的事，等战争差不多结束以后你再来。到了1948年，大局基本上已定，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说要去莫斯科，说要向他汇报将来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等等。

开始斯大林也答应，但是犹豫了一下，就说你开始准备吧。毛泽东买了新帽子、新衣服、新皮鞋，准备了四大箱子（文件）向斯大林汇报，结果毛泽东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又来电报，说你现在来不是时候，我们政治局委员都下去征购粮食了，莫斯科没人。当时毛泽东非常气愤，但是也没办法，斯大林不让他去他就去不了。

到1949年初，因为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就是关于和谈的问题，斯大林让中共和国民党和谈，苏联作为中间人调停，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所以两人弄得很不愉快。1949年的时候，斯大林告诉毛泽东，莫斯科你就不要来了，我派人去，他就派了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访问西柏坡以后，中苏关系迅速升温。

通过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将来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所有政策跟苏联都保持一致，所以他非常高兴，加大了对中共援助的力度。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两党关系更加密切，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一个问题。原来中苏之间有一个同盟条约，1945年蒋介石和斯大林签的条约，按照那个条约，中国同意让外蒙古公投后分离出去，同意把旅顺港租给苏联，还牵扯到大连港的行政权，等等。中国共产党马上夺取政权了，苏联很担心中国共产党否认这个条约，所以斯大林很想知道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清楚，他要向苏联“一边倒”，要采取跟苏联一致的政策，而且他要在党内、在全国人民当中宣传这点，要确立这个政策，有一点是他必须要迈过的障碍，就是把1945年这个条约否决掉，重新签一个条约。

其实双方内心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谁也不好明讲，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双方要合作，苏联要拉住中国，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他希望新中国能够加入这个阵营，毛泽东也希望共产党刚夺取的政权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涉及国家利益，双方确实是处在非常矛盾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双方都在试探对方，比如斯大林派米高扬跟毛泽东讲，旅顺港我们当时租用对你们是不公平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说是现在为了革命我们租用了，等你们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就把旅顺港给你们。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那儿听着愣了，旅顺港是一个军港，我们也没有海军，你还给我们干什么，等我们有了海军以后再收回来。

同时毛泽东也提出来，旅顺港不能马上收回来，但是外蒙古想收回来。所以毛泽东跟米高扬讲，当时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赞成外蒙古分离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现在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了，我们考虑到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是不是请斯大林同志考虑让外蒙古回到祖国的怀抱。米高扬一听，马上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毛泽东现在惦记外蒙古了。

第二天他就给毛泽东宣读了斯大林的电报，斯大林讲："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选择，是通过公投的，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不容改变。现在有人要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去，我们坚决反对，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希望还是不要谈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他们经历了这样一轮事态以后，到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刘少奇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有一段专门讲中苏关系，其中就涉及1945年条约的问题。刘少奇报告当中说，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方案：第一，新政权承认1945年的条约；第二，宣布废除1945年的条约；第三，暂时继承，日后修改。这三点苏共中央认为哪一点比较合适？

我看苏联档案上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画了一个大圈，写上"这个问题等毛泽东来了再谈"。他没有跟刘少奇谈这个事。所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考虑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要跟斯大林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到底是继承1945年的条约，还是重新签一个条约。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一个干脆的，11月他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我现在有时间了，我可以去莫斯科，我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讲得非常明确。过去档案没解密，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的都有，说毛泽东主要是治病去了，有的俄国学者写，说毛泽东是来治病，不是谈条约的，所以斯大林没有准备。

其实不是，现在档案出来了，而且不止这一封，后来斯大林没有回电，毛通过周恩来又跟苏联外交部提出说主席要访问苏联，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谈签订条约的问题，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他们名义上是给斯大林祝寿去了，那年斯大林七十大寿，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去呢？后来毛泽东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你要是同意签订新的条约，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同意，我一个人去，你就告诉我，是我一个人去，还是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没办法了，后来他就一个人去。

毛泽东的性格是非常执着的，他见到斯大林第一面是12月16日。两人寒暄了几句，马上他就提出来，说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关于1945年的条约我们是这样……话没说完，斯大林说，打住，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一次会议，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不能改变，必须保留，就把毛泽东的话给堵回去了，再谈就没意思了。转圈转了半天，到最后毛泽东还是不甘心，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到莫斯科来，是不是让他来一趟。斯大林一想，又来了，你让周恩来来干吗？反

正我找他没事，你要找他你就让他来，俩人就谈不下去了。

从公开的材料、照片、报纸看，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在斯大林祝寿的会上，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泽东，其他所有人都在后面。在照片上一般看不到外国领导人，就只有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一块，然后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还是非常关照的。但就是不跟他谈正事，毛泽东非常气愤。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说我跟斯大林同志谈了一次，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不同意谈条约的问题，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商量一下怎么办。

过两天刘少奇回电，说既然斯大林同志态度这么强硬，祝寿完了你就回来吧，再谈也无意义。再后来我就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回电，但是我知道毛泽东没有按照政治局考虑的这个方案来，他就不走了，他就待在莫斯科了。

等到祝寿完了，各国领导人都走了，就剩毛泽东一个人，他待在宾馆里，也不出来，在那里发脾气。毛泽东有什么脾气呢？他不睡沙发床，只睡硬板床，他就把宾馆里的沙发垫拉出来，扔在地上，说“非要让我睡这个，我就是不睡”。还有一个，他不会用马桶。这都是他的警卫写回忆的时候写的。他也不出门了，本来给他安排去列宁格勒访问、去参观地铁、去集体农庄，他都不去了，说头疼，一天到晚不出门。这弄得斯大林非常尴尬，说毛泽东怎么这样，人家祝寿完了都回去了，你也不回去，你不回去也应该参加活动啊。

没几天外电传开了，谣言四起，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中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我们查到了，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我看了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英国和驻苏联大使的电报，让他们造几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还有一个谣言说朱德和刘少奇发动政变，毛泽东回不了国了。到处乱造谣，这样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动，他就找了王稼祥，说你们能不能跟毛泽东说说，好歹出来露个面，这样我们受不了。

关于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现在没有材料，但是后来毛泽东就发表了一个书面的接见塔斯社记者的声明。那个声明怎么写的呢？记者问：毛先生你到莫斯科干吗来了？毛泽东说我来莫斯科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以外，我还要谈关于中苏同盟条约、商品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一次把这个事给挑出来。记者问：那您什么时候走？毛泽东答，那就要看谈判的情况如何了。那意思就是你不签我就不走了。到12月底的时候，毛泽东跟斯大林就僵在那儿了，最后谁让步了呢？还是斯大林。

斯大林1月2日晚上让莫洛托夫去找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同意按照中国的条件签订新的同盟条约。那天晚上毛泽东非常高兴，一脸的乌云散去了，立刻给周恩来写封信说，斯大林终于同意我的条件了，你马上做好准备，五天之后出发，十天以后到达莫斯科，你跟他谈判。然后毛就去参观冬宫、参观地铁、看电影，因为他不管这些细节。

周恩来是1月20日到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以后，中国人不太知道，苏联人其实很有心机，斯大林虽然答应签新条约，其实他们做了新的准备，从1月5日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小组，外交部、交通部等几个部委联合，把所有条约文本进行了修改，基本内容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就是换了个名字，但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里面其实很复杂，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条约本身，还有一个是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的补充协定。

我说的主要是协定，我们一般都是用条约这个名词，实际上是那个协定。那个协定基本上维持了1945年的条款，但是中国人不知道，毛泽东不知道，等到1月20日周恩来到了，22日他跟斯大林、周恩来、米高扬、莫洛托夫所有人进行会谈，会谈的时候只谈了个原则，也没有给他们看具体条文，所以他们都不知道。直到23日，苏联把这个条文提出以后，毛泽东一看就火了，说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你弄了个新条约，中长路还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是等到对日和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另外还没有提大连港的事，毛很不高兴，跟周恩来说，你重新搞一个。

周恩来他们就重新搞了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要求：第一，旅顺港的归还不能等到对日和约，对日和约不知道什么时候签订，所以加了一个条件，就是1952年底以前必须归还；第二，关于大连港，大连港的行政权立即收回，所有租给苏联的物资全部无偿还给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长路，中国提出立即收回中长路，而且是无偿收回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26日把这个方案给了苏联。

他们内部怎么讨论的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了四份关于中国这个方案俄方的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改动的是最厉害的，一共四页纸的条文，除了画杠杠就是画叉子，不是叹号就是问号，最后签了一个名字——斯大林。从这个文件能想象到斯大林非常愤怒。但是，1月28日苏联把中国起草的草案退还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修改，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也就是说，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为什么？从我看到的材料来说，有两个原因，而且主要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是美国人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因为毛泽东到了苏联以后非常轰动，因为中国刚建国，中国元首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待就一两个月不回来了，在那儿干吗呢？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从内战打起来以后，美国人就在犹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派说应该支持，另一派说不支持，国民党很腐败，你支持它干吗，看将来的结果。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他们确定一个方针，等尘埃落定，我们看清楚以后再决定到底支持谁。

到1949年12月，尘埃已经落定，国民党到台湾省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而且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了，美国人就面临一个选择，现在必须表态，到底是承认新的政府，还是继续和国民党保持这种关

系。12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政策研讨会，双方不同的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军方、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说内战过程中我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共产党打到哪儿我们就撤到哪，我们再撤就没地方撤了，现在就剩台湾了，我们如果把台湾给了中共，整个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美国必须明确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不能给中国共产党可乘之机，这是军方主要观点。

但是国务院不同意，艾奇逊说，你们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应该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叫政治？首先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国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人，如果把精力、钱财都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而放弃主要敌人，在战略上就失策了，所以他说美国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是亲近中共，分裂中苏，不能让中苏结成联盟，这样在战略上我们就成功了。那怎么才能亲近中共？很容易，只要把台湾让给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现在中共要解放台湾吗，你就让他来，我们可以不管。

这样毛泽东就不会跟苏联结成同盟，这样在战略利益上美国就取胜了。杜鲁门一听，说，对，还是艾奇逊这招高。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起草了文件，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间又没有信息渠道，怎么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个？原来还有一个司徒雷登在南京，后来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也给弄走了，双方没有渠道。杜鲁门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打就尽管打，解放台湾尽管解放。杜鲁门讲完了没听到什么反应，艾奇逊有点着急，不行，你传递的信息不够强烈。12日他又发表公开讲演，那就长了，讲了半天讲的都是中美之间有传统的历史的友谊，美国对中国多好，美国在中国也没有租借地，说我们美国人对中国最好了，中国同胞们想想，你们外蒙古是谁分出去的，东北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哪去了？这就是挑拨离间，所以斯大林看完以后非常生气，立刻把毛泽东叫过来，说艾奇逊这个讲话你看没看？毛泽东说我还没来得及看，斯大林说，我都翻译好了。我们立刻要发表声明，要反驳他。这里边他们俩还闹了点矛盾，他们说好了要用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来驳斥美国人的谣言。毛泽东也非常清楚斯大林的意思，因为他回来以后在路上问了莫洛托夫，他说刚才斯大林同志说要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说，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回去就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让胡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为什么这样我们也不太清楚。师哲回忆，说毛泽东没听明白斯大林的话，其实我找的这个档案证明得非常明白，而且他专门问了一句，人家告诉他，就是用外交部的名义，毛泽东特意嘱咐胡乔木用新闻出版署的名义。斯大林非常生气，新闻那个东西在西方不是代表政府，说你这是破坏我们达成的计划。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说不大清楚，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

材料。总而言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不大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也是这样表达了意见。这个事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苏联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回，如果毛泽东空手而回，中苏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话，美国人的计谋就成功了。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让步。

还有一个原因，斯大林让步得有个台阶下，原来两边争得这么厉害，突然就这么同意了，这时候就显示出周恩来的智慧，周恩来确实非常聪明。他28日的时候找斯大林，他说我要找斯大林同志谈个问题，斯大林问谈什么问题？周恩来说我谈谈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当时一听脸就变了，说毛泽东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外蒙古的问题了，你怎么又提。

他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1945年条约签订的结果，是让外蒙古进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布独立。现在我们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不是失去了法律依据。斯大林一想真是这么回事，然后问应该怎么办？周恩来说，我们商量了一下，新政府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这样很好。周恩来说，我起草了一个声明，您看看，斯大林一看，心想周恩来太“狡猾”了。

声明这么写的，中苏经过谈判，把原来的中苏条约作为正本，以下两个文件作为附件同时发生效力，这两个附件，第一个是中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第二个是关于外蒙古的声明。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你如果同意的话就一块儿同意，要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打道回府。所以斯大林也没有办法，也只能这样了。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签订了，毛泽东就回国了。

当然后面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我讲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有这个疑问，毛泽东走的时候该轮到斯大林非常憋气，他原来冷落毛泽东，想让毛觉得没趣走了就算了，但结果还是让他同意中国的方案。

从斯大林来讲，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所以斯大林非常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后来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研究都很少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朝鲜战争，你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1月30日。28日他把中国的协定草案交回给毛泽东以后，两天以后他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因为金日成想发动朝鲜战争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1946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对，包括1949年。1948年底苏联红军都撤走了，1949年3月金日成到了莫斯科找斯大林，私下里就跟他谈，说我要统一，如果和平统一无法成功我可不可以采用武力的手段？斯大林说不行，说除非南朝鲜发动进攻，你才能反击，你不能主动进攻。

等到1949年的6月，美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半岛，7月金日成又策划

了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交给苏联大使转到莫斯科，后来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答复也是不行，说不能在朝鲜采取武力行动，还是要和平统一。当然他也找了毛泽东，4月派人到北平找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讲，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条道路，你做得很对，但是你不能着急，我还没有统一呢，等我统一完了，我把部队调到北方，帮着你打南朝鲜。

等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金日成就着急了，又给毛泽东发了电报，你说的，你统一完了，就帮着我统一，你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朝鲜还没统一。这样毛泽东就很难办，原来毛泽东不想那么快宣布新中国成立，是苏联一个劲儿地催，说你整个大陆半壁江山拿下来了，你赶快成立，你不成立政府我们很难办。

因为苏联原来跟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现在国民政府也没有宣布垮台，这边新政府不成立，让他怎么办？我是继续跟国民政府保持关系，还是跟你们建立关系？所以中共要赶快成立新政府。那会儿毛泽东不着急，后来没办法，苏联催了几次，就在10月1日成立。那时候西南共产党都还没有控制，更别说西藏，所以毛泽东就没有答应（金日成）这个要求。他也没有办法跟金日成说，他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给斯大林发电报，说金日成要打南朝鲜，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11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电，说关于朝鲜的问题，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工作我来做，你就不要操心了。

我们看这个电报来来往往，一直到12月底，苏联都反对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武装行动，突然地，也就是过了一个月，到了1月底，斯大林给了一个电报给苏联大使，说请转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计划，但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任何风险，让金日成到莫斯科来，我亲自跟他谈。后来第三天，2月1日他又发了电报，说昨天说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毛泽东现在还在这儿，金日成不要来，等毛泽东走了再来。

后来毛泽东走了，金日成就来了。这个事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事，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得苏联整个在远东的战略基地不复存在。什么战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冻港。从俄国开始，苏联在亚洲地区、远东地区就是为了争取出海口和不冻港，修中长铁路也好，租用旅顺港也好，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签订，苏联整个在亚洲的战略基地就没了，只有依靠朝鲜，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没有时间特别讲。

从毛泽东这段访苏的情况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逼迫着斯大林做了很多让步，但是斯大林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就是对中国的报复，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结果。但是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出兵朝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朝鲜？大家都反对，就他一定要出兵朝

鲜，主要是挽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为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他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要挽回中苏关系，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只有中国参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实践证明后来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1957年毛第二次访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从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到1957年年底，三年时间，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是当然的领导、老大哥，不可动摇，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特别是苏联经历了内部的斗争，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经过这三件事，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三件事的作用非常明显。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说赫鲁晓夫是揭开了盖子，捅了篓子，说批斯大林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没有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斯大林从一个神一下变成一个罪犯，谁都接受不了，当时在苏联党内造成多大的混乱。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时候，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没做完，两个人当场休克，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心脏病复发，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东欧各国，包括中国，整个思想一片混乱。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出来，政治局写了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发表以后，确实对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情绪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后，苏共中央印了20万册，全党学习。第二篇文章出来更不得了，印了100万册。原来都是全世界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是苏联共产党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到1957年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考试，前提条件是你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如果没有读过，就没有考试资格。现在我们外交部档案，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

那时候东欧各国的思想非常活跃，批斯大林以后，双方在争论什么问题，最后争论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句话结束，说我们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再有，波匈事件的实质是什么？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事，请中国帮着处理。1949年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曾经有个“君子协定”，说以后苏联共产党管欧洲革命，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毛泽东当然很高兴，好歹也管着十几个共产党。后来真是，到1955年的时候，越南给苏联写信，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越南想跟苏联发生直接的联系，苏联都拒绝，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但是到了1956年就出了这个问题，欧洲的事苏联管不了，波兰出事苏联管得了吗？匈牙利出事苏联管得了吗？管不了，赫鲁晓夫没有经验，办事又莽撞，于是他请中共出面。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坐镇莫

斯科，当然刘少奇也得请示毛泽东。1957年1月波匈事件过去了，东欧的反弹情绪非常大，赫鲁晓夫没有办法，治不住这个，转而求毛泽东，你能不能到苏联和东欧来一趟。毛泽东回电，说就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就把周恩来派去了。周恩来布达佩斯、华沙和莫斯科来回跑，最后就平息了。

后来赫鲁晓夫非常佩服，苏共觉得还是中国共产党厉害。这事过去不到半年，苏联发生政变，因为赫鲁晓夫为了把党内一些老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轻干部、中央委员，直接威胁到这些老辈的地位，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这些人，而且他们在方针政策上跟赫鲁晓夫也有分歧，他们趋于保守，赫鲁晓夫老想改革这，改革那。到8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选，所以保守派非常担心，6月在一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宣布说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都懵了。赫鲁晓夫这人有小聪明，你不是罢免我吗，你得容我检讨，我有错误，我要求检查，你不能不让他发言。赫鲁晓夫检查特别长，没完没了，下班了还没完，他说我明天接着检查，人家也没有办法，那你明天接着检查。

半夜他给国防部长朱可夫打电话，说你立刻派直升机，把所有的中央委员连夜调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开会，200多个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给包围了，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总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力，政治局没有这个权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宫门口一站说：没有我的命令，我看谁敢出去，没办法，就召开了中央全会。

一召开中央全会，这些元老都成了反党集团分子，出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第二天就公布。这一公布又像一颗炸弹投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宁一块参加十月革命起来的，怎么就成反党集团了呢？马林科夫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斯大林去世以后是名义上的接班人，后来被赫鲁晓夫玩点阴谋弄下来了，怎么都成反党集团了，大家都不能理解。过去做法是，一件事，苏联只要一登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见报，这次就不一样了，苏联登了报，苏联揭出了新的反党集团，各国都没有反应，大概只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国家都没登，都等着中国，说中国不说话，我们也不能说话。赫鲁晓夫一看这事麻烦了，马上派米高扬，说赶快到北京去一趟，无论如何毛泽东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

后来米高扬就来了，毛泽东还没在北京，坐飞机又到杭州去见毛泽东，双方谈得非常好，谈了8个小时。谈完了毛泽东说，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非组织活动等等，讲了一通。米高扬说，你不能光这么说，得见报，要不然我们也受不了。毛泽东跟刘少奇讲，通知明天见报。米高扬非常高兴，坐飞机就回去了，当时阎明复陪着他去的杭州，米高扬是连夜回去的，天气还不好，米高扬在飞机上说，我总算完成任务，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认了。中共一登报，其他各党都跟着登报，这个风波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越来越高，这时候发生了这么多

事，很需要共产党开一个大会进行总结。

赫鲁晓夫很想利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然后开一个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在这个会议筹备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几次让苏联大使派人来，想知道毛泽东去不去这个会，因为这次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率团的话，他就觉得这个会开的就没有意思了。他几次问，毛泽东一直没有答复，开始说看情况吧，后来又说11月天太冷，怕感冒，不去。

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一直到9月，发生了一件事，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很可能有联系，就是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原来苏联一直不同意，从斯大林开始，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炫耀地给他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毛泽东去了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斯大林说，那看场电影吧，毛泽东在回来的火车上就讲，原子弹太厉害了，我们一定得搞。后来派人联系，苏联就捂着盖着，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赫鲁晓夫改了，但是也是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技术。一直到1957年9月，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来谈这个问题。后来中苏就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和设备。

也可能毛泽东一下高兴了，说行，我去莫斯科吧。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来开会，非常高兴，开始做精心准备。外交部档案馆来来往往的电报，讲本来苏联设计好了，在莫斯科的机场毛泽东要发表机场讲演，然后夹道欢迎，从机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后来毛泽东去了以后，说不行，你们那儿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车，我直接坐车到住处。

那时候飞机不能直接飞到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人家到国境来接，毛泽东连飞机都不下，说外头天冷，我就不下去了，你们谁见我就上来，于是人家登上飞机跟他见面。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些生活细节没有搞好，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次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专门请汪东兴打前哨去了一趟，说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那是别墅区，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到会场不用经过露天，里面有一条走廊直接通到礼堂，免得主席感冒。汪东兴讲，赫鲁晓夫同志你得把沙发床换掉，主席不睡沙发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后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后汪东兴看厕所，说这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鲁晓夫说，我们没见过蹲坑。后来我问当时的翻译阎明复，苏联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苏联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砖头、沙子，把马桶周围盖起来了，搭了个台阶，就留了一个窟窿，照顾得无微不至。

莫斯科会议，所有人的发言都要提前交稿，因为你发完言，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广播，第二天见报，按照苏联开会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只有毛泽东即兴发言，而且一口湖南话，很难听懂。我是看过一个苏联秘书的回忆录，他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毛主席讲话，他又没稿子，当时信口开河就那边讲，这边记，记完了翻译，翻译完了还得送电

台，第二天就要见报，又怕出错。而且毛泽东开会，人家都在台上，他讲话就坐在后头，说今天我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头看他。毛泽东这次访苏确实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包括对政治文件的准备，苏联也是几次来找中共，毛泽东也是几次说，不着急，这个会多次被推迟。

最后毛泽东跟苏联人讲，这个会要先搞好文件，要做到都能通得过，你们去准备吧。苏共就开始准备文件，准备完了以后，还得专程送到北京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把邓小平和胡乔木叫过来，说你们先拿去改改。我看他召见苏联大使的记录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文件起草得还很不错，总的来讲没有大问题，就是太长了，要砍掉一半，然后再增加几条，回去改吧。

你看所有这些，虽然表面上还提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际上苏联办什么事都是听中共的，毛泽东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都办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当时处理跟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也是比较复杂的事，1955年苏、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后，苏联出兵以后，纳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馆了，这样苏联就没法抓这个人，然后就找铁托，说要让他出来。铁托说，你要保证不能伤害纳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没了。

后来苏联说我们保证，给他送到第三国，不伤害他。结果纳吉一帮人刚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苏联就把他塞到坦克车里拉走了。铁托非常气愤，说苏联人说话不算话，跟赫鲁晓夫就闹翻了，闹翻了以后，莫斯科会议铁托就不来。赫鲁晓夫非常生气，毛泽东出面来安抚南斯拉夫，当时是卡德尔和吉拉斯去的。还有波兰人，因为波匈事件以后，波兰人哥穆尔卡对苏联也很不满，也是毛泽东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鲁晓夫解决不了，就得靠中国共产党，靠毛泽东出面解决。在整个开会的前前后后，赫鲁晓夫就像个跟班似的，跟着毛泽东到处跑。表面上这个会议是在莫斯科开，苏联是主人，我看背后的导演就是毛泽东。

有一个现象让大家很不理解，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持一个口号，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在这之前苏联跟中国人商量，说以后不要提这个口号，我们以后不能为首了，中国不同意。后来苏联说，要不然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行，就是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说这样不妥，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别人也不接受，像哥穆尔卡就不接受，苏联还有什么资格“为首”？毛泽东就跟他解释，从毛泽东的整个解释来看，其实讲的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以谁为首谁就要负责，有什么事都要找他。谁有实力谁才能为首，毛泽东讲了，美国人不怕我们，怕苏联，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给各国援助，要是以我为首，得我援助，还是苏联为首，他有钱。中国是不能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行，意思就是中国实力不行，所以中国不能为首。

毛泽东后面还有一层意思，以苏联为首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给我产生这样一个感觉，毛泽东是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但是他要在背后起作用，什么事你先在外面支应着，你负责，但是最后发言权是我的，实际上也是这样，1957年底之前，双方大体上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包括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本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这次毛泽东访苏实际上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家可以感觉出来，中苏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了，提前一个月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协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这是中苏政治上的合作，把中苏关系推到了一个顶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些重大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政策开始发生分歧，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整个国际形势非常好，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是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这么好的形势，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就凭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们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靠力量就能够战胜他，并且在谈判桌上我们也有实力。

所以他要继续坚持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要采取战争的手段，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我怕谁去。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三亿人不算什么，会议间歇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六亿人，我们才二千万啊，都不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这次发言，我指的是11月18日即席演说，关于核武器这个吓倒了一片人。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双方的矛盾还在处理苏联国内的问题上。举个例子，原来他让苏联人准备《莫斯科宣言》，原来的《莫斯科宣言》里有这么一段话，讲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前前后后怎么回事。

毛泽东看完以后不高兴，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这是你们党内的问题，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讲这些，特别是不要再批评那些老同志了。苏联人回去就给删了，这段就没了。11月18日毛泽东讲话，讲着讲着突然来了一段：同志们，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就开始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讲的是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赫鲁晓夫同志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懂得团结，你看我们，王明反党，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他说这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米高扬7月5日到杭州找毛泽东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意见是不要把这些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已经开除了，没法改变了，后来主席说那就算了吧。所以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又重提，说中国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这让苏联人非常反感，你不让我们讲，你到会上讲，我们不能讲我们党内的事，你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毛泽东话没讲完，米高扬一下站起来了，直视毛泽东，瞪了毛泽东一分钟，全场就这么看的，一扭脸他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这时候卡德尔写了一个纸条给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人，写的是，中苏两党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因为这个事不是简单的关于团结的问题，也不是反党集团的事情说不说的问题，而是你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来随意的评判另一个党内的事务，而事先你又让这个党不要讲了。所以苏联人非常不满，这样也造成了中苏两党，特别是领导人之间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虽然表面上双方非常好，毛泽东也非常高兴，后来坐飞机回来，在中共政治局党内开会，毛泽东也是非常满意，除了个别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过渡，搞了个备忘录以外，其他的他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在这背后就隐藏着中苏之间一种内在的分歧，特别是中苏两党地位发生变化以后，直接威胁到同盟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除非苏联接受这种地位变化，这个同盟还能继续下去。但到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膨胀了，他地位也稳了，连续三年农业丰收，再加上人造卫星、核潜艇，苏联那会儿不得了，赫鲁晓夫还得当老大，这样中苏两党必有冲突，从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就开始走下坡路。

这就是我讲这两次毛泽东访苏大体上的过程和结果，大概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第一次访苏为了结成中苏同盟，后来也签订了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刚才沈老师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他讲到了中苏同盟，以及毛泽东两次访苏，与苏联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的访苏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毛泽东访苏之后中苏结成了同盟，大家很熟悉的苏联模式，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苏联的一些影子。沈志华老师讲课非常精彩，也很生动，披露了很多毛泽东访苏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以及两个大国背后的一些较量。我们再

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沈老师的讲课表示感谢！下面用一点时间可以给现场的听众提问。

听众：很高兴今天听到沈老师的精彩讲演，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沈老师，毛泽东赴莫斯科的途中保卫十分严密，听说是北京到满洲里边境的铁路线站的都是解放军，国民党也曾经刺杀毛泽东，我想请教沈老师，确实有此事吗？

沈志华：毛泽东去莫斯科的保卫非常严密在档案文献中是有记载，你说国民党刺杀，我没有看到文件，而且我到台湾去看国民党的档案也没有看到，是不是有，我现在也不能确定。

听众：沈老师今天说到毛主席第二次去苏联，毛主席还有一句在我们青年人中流传很广的一句话，他和苏联留学生见面的时候说，“世界终归是你们的。”我希望您从更多史料的角度讲一下，这句话他为什么会提出来，为什么会流传很广。像我在20年前读初一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老师也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人。第二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种苏联模式如果从大学来说，原来那种专业教育的模式有很大缺陷，现在要往通才教育改，我们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您也是华东师大的老师，非常感谢。

沈志华：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时代也是非常受毛泽东这段话的感召，因为他主要是对年轻人讲的，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有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吗？

他见的是当时一批中国的留学生，期待着他们回国。因为当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共产党自己能够信任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的，不是国民党留下的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这个都不能信任，他只有马上派人出去学习。就是这批人，差不多到1957年学成要回国了，指望着他们将来参与中国的建设，所以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是很正常的。至于你说学苏联的教育，这个当然是了，我们从1952年院系调整，就开始贯彻苏联的学制体制，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苏联那套东西，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不但没有把原来苏联的那些弊病、措施修正过来，反正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

听众：沈老师您好，关于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细节，说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随行带了很多礼品，据说有15车之多，里面包括一些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集来的历史文物，但是我还看到一些资料说，这些礼物中还包括像白菜、大葱这些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的礼物，关于这些礼品您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给我们讲述一下呢？

沈志华：毛泽东的礼单是有档案文献，但我没发现有故宫的文物，有很多象牙雕刻的东西、刺绣、中国的工艺品、景泰蓝，细节在档案里都有，我觉得都是一般的，至少我在档案当中看到的是这样。你说白

菜、萝卜，那个是有，《毛泽东文稿》里就有。毛泽东命令山东省准备几车白菜、萝卜，他为什么要带白菜、萝卜去？我也挺纳闷，而且从北京一直开车开到莫斯科去，我想很可能跟米高扬访西柏坡的一段细节有关系，因为米高扬访西柏坡的时候要吃鲜鱼，当时没有。他讲苏联冬天特别冷，什么新鲜的蔬菜、鱼肉都没有，我想是不是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就给他带去了白菜、萝卜。

但是苏联给中国代表团的礼单也很珍贵，我也看了那个礼单，给毛泽东“吉姆”牌小轿车一辆，给周恩来一辆，还有金烟斗、金烟盒，都是金的，就连司机、秘书都有份。我看了看，还是苏联的礼物比较值钱。

听众： 当年对于朝鲜战争，斯大林最初不支持金日成打到南朝鲜的计划，但是后来苏联变成支持金日成，因为当时中国是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台湾，而金日成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南朝鲜，在这中间斯大林变过来，后来变成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而不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苏联本来从不支持，到后来支持金日成，这里的因素是为了对付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想让中国对付苏联，而斯大林为了打破美国的企图，是不是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来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您能否把这当中的关系再详细说一下。

沈志华： 这个事说起来非常复杂，可能没有时间全面讲。我把结论说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材料我先纠正一下，不是斯大林跟金日成提供说美国不会出兵的这个消息，苏联是截获了美国一些情报，而且美国确实有这个预案，一旦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就撤离朝鲜半岛，守住日本海，“二战”以后美国国防部就做过这个决定。但是后来美国人变了，新的情报苏联人没有得到，所以导致了斯大林和金日成都陷入到一个误区，他们认为发动战争以后美国不会干预，实际上美国干预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改变，背景很复杂，在一个月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中苏同盟条约来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结果是苏联要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这就表明从沙皇俄国人开始，俄国人一直努力在亚洲和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没了，怎么办？他想用朝鲜半岛的港口来替代旅顺港，来解决它在太平洋的不冻港和出海口的问题。

所以这场战争不管胜败，斯大林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在跟毛泽东签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港条约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条，一旦远东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机的情况下，苏联还是可以使用旅顺港。后来真的是这样，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苏联应该从旅顺港撤军了，周恩来到莫斯科去，说你们不能撤，你们一撤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防守。斯大林当时就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就再签个协定。

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来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跟毛泽东搞好关系，是苏联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所以我判断主要目标是这样，为了出

海口和不冻港发动这场战争，而他的判断是这个战争没有大的风险，他得到情报是美国人不会干预，他把答应给中国所有的军舰和飞机给了金日成，这就是4、5、6三个月周恩来屡次跟苏联打报告，而且周恩来已经说了这个话，我们6月占领舟山，8月占领金门，来年春天打台湾，所以你必须把答应我们的飞机、军舰提前两个月送达，结果苏联一件都没有给，为什么？都给了金日成，我想这也是斯大林报复毛泽东的一个手段。

所有这些事其实毛泽东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上得罪了斯大林，其实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想他跟斯大林心里都清楚，《条约》是一张纸，如果双方没有战略性调整，这真的就是一张废纸。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原因，我觉得都站不住脚，比如毛泽东派兵打朝鲜是为了国家安全。不对，为了国家安全有一个前提——出战必胜，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安全。但是恰恰那会儿所有人不愿意出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胜利的把握，出战不一定能胜利，如果你打败了，反而引狼入室，本来人家美国没想打你，你出去打人一下，被人打回来了，人家跟着就追到沈阳了，怎么办？

所以中国出兵，毛泽东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他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就不动了，不动是最安全的了，所以他不是为了国家安全，你说是为了帮助朝鲜，当然结果肯定是为了帮助朝鲜，但动机不一定就为了朝鲜。如果为了朝鲜，中国至于这样吗？其实就是为了苏联，为了苏联潜在的背后还是为了自己，因为当时能够帮助中共，能够稳定这个政权，能够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同时搞经济建设的只有苏联，所以毛泽东那会儿就是为了要挽回跟苏联的关系，他当然知道现在出兵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没有怎么准备，武器又不如人，这些材料都非常详细。但是他不这样做就彻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条约就形同一张废纸，没有人再来帮你，所以中国只能出兵。

出兵的结果，我认为毛泽东的目的也达到了，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苏联的空军问题。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持，我看了很多苏联国防部的档案，当时军队的调度，飞机什么时候开到哪，准备多少炮弹非常详细，苏联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斯大林就是跟周恩来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他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出兵还是假出兵，中苏在黑海谈判的时候，双方都是在猜对方，斯大林说，空军准备技术性非常难，说你们陆军先去，两个月以后我们空军上。周恩来说，这哪行，我们出去了，两个月以后你们不来怎么办？说这样吧，我们加快准备，等你们两个月，咱们一块儿去。斯大林想，这不是耍我们吗，我们一块儿去，你出去了可以回来，我们出去了怎么办？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放弃北朝鲜。

毛泽东想了一夜才解开了这个扣，所以他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也出兵，结果中国出兵，10月25日开始交火以后，三天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立刻出动，而且越过鸭绿江，你说毛泽东的目的是不是达到

了。而且后来在朝鲜战争当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志愿军谁指挥的问题，铁路谁管理的问题，越过“三八线”以后是否南下的问题，都是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分歧，最后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派专家给中国经济援助。毛泽东出兵朝鲜就是这么考虑的，结果他目的达到了，斯大林答应了他所有要求。这就是我对毛泽东访苏，中苏同盟建立，到朝鲜战争整个关系的理解。

主持人： 沈老师的解答也很精彩。刚才提问的这位老先生是原来新华社副总编辑。看来大家对朝鲜战争的兴趣还是比较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沈老师专场给我们做这方面的讲座。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最后一位提问。

听众： 因为我知道，毛主席第一次访苏的时候进入东北，高岗给斯大林带去了很多礼物，毛主席一进入东北境内，看到很多关于高岗的语录和高岗的照片，毛主席很反感，结果就把高岗给斯大林送的礼品全给卸下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细节。第二，我想知道毛泽东在第二次访苏的时候，和苏联领导人讨论原子弹的问题。我记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吵起来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就会拿人多讲事，为什么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到这个很害怕呢，人家才二三千万人口，所以有些专家讲，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都是民族主义者。

沈志华： 毛泽东讲的这段话，我们不能从死多少人他不在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当时这个讲演并没有公布。当时双方都给压下来，一直到1963年的时候苏联才把这个讲话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是个战争狂人，后来中国也把这个文件在外交文选上登出来了。我看过原来俄文的记录和中文的记录，其实意思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问过李越然，因为当时这段话是李越然翻译的，我就问李越然是不是翻译错了，为什么导致人家这么理解，说死多少人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就是按照毛泽东说一句翻一句，其实我们看毛泽东的话多了以后就能知道，他不是讲中国人死多少人没关系，他讲的意思是，革命就要有牺牲，就要有死亡，要斗争就要死人，核战争就是人死得多一点罢了，但是不死人，不斗争怎么能打败帝国主义，他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理解这个人首先要确定他不是说死不死人没关系，否则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你们国家死一半人都没事，这恐怕也很难符合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内心。

但是，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达到他设想的革命的目标。在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赫鲁晓夫的想法是比较现实的，为什么赫鲁晓夫讲没有核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是因为长崎和广岛那两颗原子弹的后果，是在十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日本死了很多人，出现很多怪病，人们才发现原来是十年前那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结果，还有日本海死了很多鱼。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文件，苏联科学家专门给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能发生核战争，核战争就是毁灭人类，他们陆续才有这样的想法，而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懂这

个，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核武器就是当量大一点而已，挖个山洞就可以躲过去。现在我看没有人再干这种事，说使用原子弹没事，这里面有一个时代差异的问题。

主持人：今天的大讲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热心的听众，也再次感谢沈老师的精彩演讲。

（2011年1月7日在国家图书馆“文史大讲堂”的演讲）

第九讲 中苏同盟的破裂

沈志华： 很惭愧，我的祖籍是河南，却是第一次来河南讲课。说是河南人，但是我出生在北京，所以很少到河南来。今天讲这个题目，不知道同学们都是学什么专业的？都是学历史的，那应该比较熟悉。毛泽东肯定熟悉，赫鲁晓夫也应该比较熟悉。

其实中苏关系史对中国来讲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孙中山开始，中国就是走俄国人的路，然后到了毛泽东，还是走俄国人的路。一直到1960年代，毛泽东才说，不要俄国人了，我们走自己的路。但是转了一大圈，其实走的还是苏联人的路。什么时候才真的跟苏联分道扬镳，从国家的发展道路的角度讲，从社会制度的层面讲，我认为那是到了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所以对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对于中国人来讲才比较重要。过去说的也非常多，把过去的党史的书，把《人民日报》翻出来看看，相当大的篇幅都是批判苏联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中苏关系特别好，你们都是“90后”了，我们那会儿从小听的都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跟着苏联老大哥走，奔向社会主义”。可是当我们稍微懂了点事的时候，就开始批判苏联，说苏联是最坏的，比美帝国主义还要坏。后来自己学了点历史，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以后才发现，其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

你们都是学历史的，我看中国的近代史、当代史，很多问题都需要重写。随着档案文献不断开放，不断解密，历史需要重写，因为很多史实不对。过去讲的很多事都不对，或者是片面的，或者是歪曲的，或者是伪造的，也有以讹传讹的，什么都有，但是就是离真实比较远。所以学历史，学来学去学什么？首先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描述历史，讲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这是我们历史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然后才去理解历史，解读历史，因为基本的史实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解读它？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我想把我看到的一些新的史料，把历史的过程根据这些新的史料进行重新的描述。

中苏关系为什么会破裂？

过去的说法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苏联提出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中共不同意，后来双方就发生了分歧，苏联的赫鲁晓夫拒不改正错误，后来就跟他分裂了。这是1963年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写的，那个时候跟苏联搞大论战，这个观点大概一直延续到最近几年。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苏共二十大到底是什么路线？中共和苏共二十大的路线是否有根本的分歧？

苏共二十大大概一共有三个大的问题提出来，也是比较引起世界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改变经济政策，过去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政策高度集中，计划经济都不错，但是在这里面比较偏重重工业，重工业里又比较偏重军事工业，所谓“富国强兵”的政策，不大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到斯大林去世，1953年的时候，苏联的整体生活水平非常落后，粮食产量还不到1913年沙皇俄国时候的粮食产量。莫斯科人均住房4平米，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极其低下。所以苏共二十大提出了新的经济方针，就是要加强农业，加强轻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此相关的就是改进一些机构设置、工业布局等等。

其实稍微看看中共八大的文件，再看看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很著名的著作，关于经济方面的，就讲当时中国的问题，是《论十大关系》。你把《论十大关系》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一对比，不用我讲就清楚了，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这方面没有分歧。

第二，对外政策。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路线”，什么是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什么意思？原来共产党讲革命和战争，夺取政权要靠打仗，把反动派推翻了你就掌权了，要想过好日子就得造反，就得组织起来搞武装斗争，这是过去的说法。苏共二十大提出来现在形势变了，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可以通过制度的竞争来战胜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双方都掌握了核武器的情况下，很难再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因为战争的后果就是核战争，核战争的结局就是两败俱伤。这次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搞得这么动人心魄的，但是1945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在日本投放了两颗，谁也没说过什么，还是在上空爆炸，十几万人当场死亡。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污染的事，以为原子弹就是爆炸当量大一些而已，中国人说原子弹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几个炸弹绑一块儿，没有知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搞清楚的？是1954、1955年的时候，过了十年，在日本发现很多人得怪病，太平洋沿岸的鱼都死了好多，最后查来查去是核污染，这个时候才知道原子弹对人类，对自然界的伤害不止是爆炸，更严重的是核污染。苏联科学家就给赫鲁晓夫写报告，专门讲

了这个，说以后不能再打核战争。除非第一次打击把对方的所有核武器全部消灭，但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现在更做不到了，又水下的，又地下的，卫星侦查都不知道在哪儿，别人给你一个就完了，投到开封一个受得了吗？

所以核科学家跟苏共中央讲核战争是不能打的。“三和路线”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提出的方针，和平过渡就是讲不是非要用武力的办法推翻一个政权，可以通过竞选，通过议会道路、和平的道路来夺取政权。不就是实施社会主义的纲领吗，议会得了多数，就说明老百姓都信你，愿意跟着你走，你就可以执行你的纲领了。武装夺取政权是什么？那不是所有人的选择，是咱们自己的选择，就觉得自己好，非要武装掌权，掌权以后要干什么都得听我的，这是原来的方式。苏共二十大管这个叫“新方针”，提出了一个新方针。

那么“新方针”中国是不是支持呢？中国也支持，中国也是搞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第一，是因为朝鲜战争刚结束，当时中国不想打了，也没有力量再打了。第二，中国自己也要搞经济建设了，新中国成立都三年了，老是打仗，没完没了的。因为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又发生了一场战争，是印度支那战争，就是胡志明打法国人。打到什么程度呢？他已经在南方解放了大片的农村、大片的领土，这个时候法国人就顶不住了，就要撤出印度支那。法国人要撤，美国人就要来，因为朝鲜战争以后美国的方针变成了全球性的，要沿着太平洋组成一个防卫圈，要围堵中国。就在这种情况下，才召开了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远东和平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是朝鲜问题，第二个就是印度支那问题。

朝鲜问题没有谈下去，最后就剩印度支那问题。当时中国跟苏联共同劝越南不要再打了，马上停火，双方谈判，当时还没有定几度线，反正划一条线就完了，像南北朝鲜一样，分南北越南。当时越南总理范文同不干，坚决不同意，说革命眼看就要取得全面胜利，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和谈？这就很像1949年毛泽东率领解放军打到长江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当时斯大林也劝毛泽东，你可不能再打了，你再往下打，如果美国人干预怎么办？毛泽东那会儿态度强硬，说我一跺脚就过去，没有问题，中国就全部解放了。越南人不行，范文同挺横，说不接受，周恩来就到了柳州，把胡志明和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也请到柳州，开了三天会，就跟他讲你有没有把握在三个月之内结束战争，有没有把握把法国人赶走以后美国人不会干预？越南没有把握。胡志明也不敢保证，武元甲也不敢保证。没把握那就和谈。因为中国不可能在美国干预战争的情况下再次出兵越南，再打一场越南战争，中国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一个朝鲜战争够了，最后越南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周恩来就赶快到北京跟毛泽东汇报，然后到莫斯科跟赫鲁晓夫商量好，再回到日内瓦就签订了“十七度线”的协定，划分了南北越。这也给后来的中越关系埋下了很多隐患。

还有一个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二战”以后主要是反对英国，因为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二战”以后又返回亚太，马来西

亚共产党就组织武装起义，反对英国统治者。1954年10月，当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联名发了一个电报给马共中央，命令他们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参加政府，不要再搞武装斗争了。既然是来自中国的指示，他们就执行了，就把武器都交了，走出丛林参加政府。

过了几年，到了1962年的时候，中苏那会儿已经分裂，意见不一了，中国那会儿已经放弃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这些理论，要求要搞世界革命，要搞武装斗争。毛泽东在北戴河发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邓小平就把马共总书记陈平叫到北京，指着地图说，你看现在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红旗到处飘扬，就你们这儿毫无动静，为什么？陈平说你们让我们把枪都交了，我们原来都有武装的。邓小平说，那好，你们要枪给枪，要钱给钱，回去继续拉队伍上山。结果陈平回去带着钱和枪，又组织一支队伍又搞武装斗争，因为那会儿中苏分裂了。但实际上马共的大势已去。

三个月以前，我专门到马共的革命根据地走了一圈，从曼谷一直坐飞机到合艾，再坐四个小时汽车到勿洞。勿洞有点儿像中国的延安，就是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再坐四个小时的车一直到马来西亚边境，马共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的山区里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在那里打游击，我采访了很多人。他们说我们的命运受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说让我们打，给我们枪，我们就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交了枪，后来又让我们打，我们又扛着枪打。到1983年，邓小平又把陈平叫到北京去了，说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你们就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400万，回去做点儿生意算了，不要再搞斗争了。

第三个问题，批判斯大林。马恩列斯排老四，实际上在苏联统治时间最长的是他，因为列宁没几年就去世了，所以列宁更多的是一个形象，真正在苏联人心目当中影响大是斯大林。但是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一个秘密报告作完了以后，突然斯大林从一个神变成一个罪犯、一个魔鬼，很多人都不理解，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在中国人的印象当中，至少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认为毛泽东是反对批判斯大林的，因为那会儿中共中央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讲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意思就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毛泽东讲的，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现在档案都解密了，我们又看到了毛泽东更多的说法。

毛泽东怎么讲？他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什么？喜就是高兴，斯大林被批倒了，我心里非常高兴。他是怎么讲的？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勇敢，谁敢批斯大林呢？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同志，如果不是苏联共产党帮助我们，怎么能够扳掉压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这块大石头？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是压在中共头上的，其实主要是压在他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因为他跟斯大林之间的冲撞非常厉害，发生了几次最严重的冲撞。从内心上他是非常高兴的，所以一则以喜，首

先是喜，高兴。

后来他几次三番跟苏联大使，跟外国领导人谈话的时候讲：谁让我们能够解放思想，自由地思考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是没有办法把他扳倒的。其实我们是想把他扳倒的，就是扳不倒，是不是这个意思？现在苏联人把他给扳倒了。如果比较了解毛泽东跟斯大林过去的话，你是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他跟所有人谈话，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谈话记录，包括中国的档案，还有俄国的档案，讲话从来都是这么讲，说斯大林这个人问题很多，就开始数落，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斯大林就没干好事，长征的时候，就是红色根据地的时候，抗日的时候，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都是中共中央已经做了决议，斯大林来个命令中共就得改，弄得中共毫无办法。

西安事变，本来中共是支持张学良扣着蒋介石，然后全国公审，去掉毛泽东心头大患，结果《真理报》公开发表文章，说张学良是个汉奸，破坏统一战线，这边就通知中共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事毛泽东没有办法。皖南事变也是弄得新四军将近一万人被国民党消灭了，毛泽东能不愤怒吗？所以政治局开会和国民党彻底翻脸，军事上做好准备大举反攻，结果苏联一听到消息，第二天苏联大使在重庆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说绝对不许在军事上采取任何行动，国民党再有错误你也得维持统一战线。蒋介石有错可以批，但是不许点名。第二天政治局又开会，毛泽东说，谁说的军事上要全面反击，这很愚蠢的。虽然改了方针，其实他心里非常窝火。

抗战胜利，日本人突然投降了，共产党也没有想到，国民党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在后方，在游击区，离日本战区比较近，所以可以抢先接收日本的投降。朱德、毛泽东连发六七道命令，立刻向华东、华南各大城市进军，中共中央一下就委任了江南五省的省长、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国民党那会儿还在大西南呢，来不及，看着着急下不去。所以蒋介石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中国的事情就在你我之间，咱们好好谈谈，战后建立新中国，民主的中国。第一封信毛泽东看了以后理都没理：我马上就夺取胜利了谁跟你谈？继续抢占大城市。

特别是南京，前一阵有一个电影讲的大概就是这个内容，那会儿汪精卫已经死了，周佛海在那里主事，结果周佛海就跟中共说，我把南京让给你，你得承认我是抗日的，不能说我是汉奸。这边通过地下党赶紧通知，这边粟裕组织部队就要进入南京了，就在这会儿蒋介石派戴笠到了南京。戴笠一到南京直接见周佛海，你要什么？国民政府给你，比他们那个正规，这是政府给的，当场就给了委任状，周佛海一看，立刻倒戈。这是南京没进去。上海是华东局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请新四军在外围，里应外合拿下上海。这边正在积极筹备的时候，斯大林来了一封电报，说毛泽东必须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和谈，中国不能发生内战。8月25日政治局开了一天会，没有办法，说斯大林同志说要去重庆谈判，这边就去谈判了。

所有这些事还有很多，包括过长江什么的，其实他们俩的矛盾特别大。所以你想毛泽东讲起斯大林来，我不知道他头脑里有没有印象说斯大林同志特别好，哪儿好？没讲过一件事，讲的都是斯大林的问题，只不过最后归纳一句“尽管如此，他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讲？这就是毛泽东一则以忧的道理。

他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人缺乏政治智慧，斯大林批是可以批，但是不能这么批，这样就捅娄子、闹乱子了。本来斯大林威望多高，在座的都是他的崇拜者，突然在他所有崇拜者中宣布他就是一个罪犯，就是一个魔鬼，下边谁受得了？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当天，在秘密报告会场上当场就有人休克了，一听实在受不了。有人描述过那个场景，非常压抑，鸦雀无声，因为大家第一次听到斯大林的这些罪状。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也是听完心脏病复发，当时就死在手术台上，死在莫斯科了。所以这个事情爆发了以后，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振荡是赫鲁晓夫始料不及的。毛泽东担心的就是这个，这么做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大家思想就乱了。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说的“三七开”，别管真错假错，反正过去他说的那个你不照着做就完了。

赫鲁晓夫年轻，不懂事，捅了娄子。至于个人崇拜，说实话毛泽东心里是不大同意的，但是在当时那个国际背景下，当时那个氛围当中，谁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过疑议。因为那个时候批判个人崇拜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家都认可的。所以中共八大放弃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毛泽东思想是中共七大的时候提出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是斯大林从来没有接受过。苏联报纸上从来不登这个词，后来毛泽东说算了，咱就别登了，登多了斯大林不高兴，就给改了，中宣部专门下了一个指示，以后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所有的报告、标语、口号、报纸上，这个词不要再提了。毛泽东在文件里加了一句“如果需要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大家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来代替”。

当时这个问题我想是他心里不太高兴，但是并没有表露出来。表露出来是什么时候？是两年以后。等风向变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讲过。说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个人崇拜有两种，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也有错误的个人崇拜。错误的个人崇拜当然要反对，譬如像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以苏共二十大，1956年中苏关系并没有因为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意见就发生分歧，产生矛盾，这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

相反，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好，好得不得了。如果说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科技援助、军事援助的力度，那么1956年以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加强了对苏联的政治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少有人说到。中苏关系为什么那么好，不会是单向的，如果是单向的，中共的地位就不可能得到这种提升，如果是单向的话，中苏就不可能分裂了。中苏关系到1956年以后就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了。以前是，斯大林那会儿非

常明显，到了赫鲁晓夫已经发生了变化，1956年以后就彻底变了，这才是问题的根子。

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了以后，确实加大了对中共的援助。1954年10月他到北京来了一趟，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中国有个习惯，逢“五”逢“十”，要大庆一番。赫鲁晓夫就抓住这个机会，原来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的时候虽然很重视中国，但是双方是不平等的。中国那会儿离了苏联不行，苏联看中国却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五周年的时候，原来苏共中央的方案是什么呢？是派个代表团，代表团是谁为首呢？是米高扬。米高扬虽说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在政府里就是一个商业部长、贸易部长，规格还是比较低的，不是国家元首。第二，在中国办个展览，展览结束以后展览品送给中国。第三，广播播几篇文章，放两个电影，演两场戏，这就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了。

后来赫鲁晓夫说不行，绝对不能这样，这算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大动作，结果他搞了一个方案。第一，把旅顺港还给中国，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旅顺港，要从沙皇俄国说起，沙皇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内陆国家要发展得走海洋，所以要有出海口。但是俄国的三个出海口都是被封闭的，北边就是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出去是波罗的海，得穿过波罗的海才能到大西洋。但是那个时候北边是芬兰的土地，绕过去才是俄国的土地，波罗的海三国那会儿不算是苏联的，所以都卡住它。

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1939年一定要跟希特勒签秘密条约，他就是为了要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的土地，这样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打下一个基础。他跟英法要，英法不给，说我们哪能做这个主？我们都是民主国家，议会不通过。希特勒说我行，我们国家我说了算，希特勒同意了，所以苏德秘密条约就签订了。这边就是把波兰一人一半，波罗的海三国你拿走，芬兰想打就打，我决不管，要不然斯大林怎么能和希特勒签这个条约呢？

南边是黑海，他要到地中海就得经过土耳其的两个海峡，所以要压土耳其，争得通航权，后来他想整个占领土耳其海峡，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通航权是取得了。第三个就是太平洋，俄国原来有一个港口，就是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不好，沙皇俄国很不满意。如果你看看地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哪儿——在日本海，整个日本海给包围了，往北边去不了了，再往北就是北冰洋了，就得南下。但是南下要进入太平洋，必须得经过对马海峡，这边是日本，这边是朝鲜半岛，又受制于人。还有一条也很不利，就是冬天结冰，军舰要出去前边得开一个破冰船，那怎么打仗？不行，所以得重新选。

我看俄国档案，1897年的时候，外交大臣就给尼古拉二世写了一封信，他说在远东我们选了两个地非常合适：一个就是在朝鲜半岛，是朝鲜半岛的东北方向还是靠西侧这边的一个港口；再一个就是旅顺港了，就是辽东半岛。这两个地方都有不冻港，大连和旅顺都是不冻港，大连

沿海有好几个湾，最后俄国就选了一个，就是现在的大连港。这个对苏联人来讲非常重要，结果好不容易跟清政府签了约，就可以投资了。光有港口不行，铁路得占领，所以他们从西伯利亚铁路到蒙古、俄国和中国交界的那个地方，叫满洲里，再往那边走就是沿着黑龙江走了，从这儿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直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再到长春、沈阳、大连，这个就叫“中东路”，后来改叫“中长路”，就是“中国东北铁路”改成“中国长春铁路”。通过这样一个铁路连着两个港口，就构成了俄国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是当时俄国特别得意的，结果没两天让日本人给抢过去了，因为日俄战争，沙皇被打败了。

又过了几十年，太平洋战争，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给抢回来了。又过了五年，毛泽东又给收回了。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跟斯大林最大的矛盾就是逼着他签一个新条约，新条约的内容就是把旅顺港、大连、中长路都还给中国，而且是无偿的。当时斯大林没有办法，就签了，他心里难受，但是没有办法。朝鲜战争爆发了，是个什么结局呢？原来合同写的是1952年要归还旅顺港，后来斯大林说现在该归还了，但是中国不敢要，因为那会儿中国没有海军，一归还苏联海军撤走了，一个军港不就废了吗？而且在战争的情况下，所以中国提出来请求苏联继续留在旅顺港。

这下斯大林高兴了，请周恩来到莫斯科，说不是我不给你，是你们让我继续在这儿。那么好，我们再签个协议。这个协议一签，惨了，没有归还日期。原来说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待对日和约签订以后再归还。什么时候签订对日和约？那会儿谁知道。对日和约在旧金山都签完了，中国都没有参加，都没份，苏联也没有签字，所以归还旅顺就遥遥无期了。1954年，因为赫鲁晓夫知道中国人对这个事耿耿于怀，所以他主动提出来还这个。

第二，还给中国四个股份公司的股份。这四个股份公司指的就是新疆的石油公司、新疆的有色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厂和中苏合营的航空公司。这四个公司当时在中国兴建的几乎所有的企业当中是唯一比较赚钱的，原来的不是经营不善，就是刚恢复，或者新建的还没有投产，就这么几个现成赚钱的，赫鲁晓夫全还给中国了。为什么？他也知道这事中国政府非常头疼。当时签的时候，其实中国共产党是好心。为什么呢？新疆那两个石油公司其实原来国民政府跟苏联就有了，只不过后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就撤走了，撤走以后就荒废了。新疆和平解放以后，王震到那儿一看，说新疆没有工业，就这么几个厂子还开不了工。

因为第一没钱，第二也没技术，还得让苏联人来开。所以打报告给彭德怀。彭德怀打报告给刘少奇，刘少奇打报告给毛泽东，那会儿毛泽东在莫斯科，所以说必须请苏联人回来。大连造船厂也是，所以苏联就办起来了。本以为是给中国办了件好事，结果毛泽东一回国，翻了天了。当时中国头脑当中，国家资源是不能给外人的，给了外人就是卖国。辛亥革命怎么闹起来的？不就是“四川护路”搞的吗，四川路权要给外国银行，不就闹起来了吗。所以当时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国家资源

是不能让给外国人的。再加上英国报纸、国民党也在那里造谣，宣传鼓噪，说“共产党卖国”，弄得国内舆论大哗，很多人群起而攻之，说“共产党卖国”，有很多团员当场退团。这在咱们档案里都有，刘少奇文稿里都有，刘少奇去做解释工作，为什么要搞这几个股份公司，跟大家解释，这个事赫鲁晓夫是知道的。

再有，就是增加贷款，增加援建一系列项目。当时苏联领导人都反对，我看外交部的报告上，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说，我看第一个问题不可做，就是归还旅顺港不行，其他问题也值得考虑。然后问葛罗米柯，葛罗米柯说我也认为不合适，那就重新起草。海军司令也不同意。结果外交部重新搞了一个方案，把赫鲁晓夫提的这套全给扔了。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在政府没有职务，他是党的第一书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他连第一书记都不是，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到1954年自己封的第一书记。结果赫鲁晓夫通过政治局干涉部长会议的工作，他找了一帮人重新起草，然后挨个去做政治局委员的工作，最后通过了。

随着他到中国以后，大批的专家来华，援建项目一个接一个增加，整个“一五”计划，到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完成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才建立起来，大部分都是苏联帮助援建的。从选址、图纸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出产品。原来中国在东北有几个，那是日本的大企业，中国自己在上海的主要都是民族工业，都是小工业、手工业，小型的轻工业。苏联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帮助确实非常大。

再有就是军事。整个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搞起来的。先说陆军，朝鲜战争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武器制式不一样。一个师上去打仗，有拿美国冲锋枪的，有的用苏联的卡宾枪，有的用日本的“三八大盖”，还有中国的“汉阳造”，一箱子子弹上去都不知道给谁的。所以志愿军过江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换枪，这个师集中，要么全是“汉阳造”，要么全是“三八大盖”，这样子弹上去全都能用，否则的话打仗的时候乱哄哄的，子弹上不去再崩着自己，这就是当时中国军队的现状。

另外，除了陆军，其他的几乎都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特种部队没有，就是四野好点儿，缴获了几门大炮，弄点儿装甲车，还不会开。所以朝鲜战争首先把陆军换装了，中国一下买了六十个师的装备，后来四个师给了朝鲜，给了金日成，其他的全弄回来。朝鲜战争中国通过轮番上阵，到边界就换武器、换装，学会怎么用了就再换一拨，所有的陆军就是这样换装。跟着我们建空军，空军从飞行员到地勤，整个照搬苏联。海军开始还不行，因为斯大林这个人比较抠门，会算账，他给中国的基本上都是淘汰的，就是不用的，部队换完装之后剩下的，要不也就废了，他按半价就卖给中国了。飞机也是淘汰的，军舰也是淘汰的，有的发动机来的就不能用，就是坏的。彭德怀最生气的就是这样，说斯大林太抠门。

到赫鲁晓夫的时候全变了，根据1954年《海军协定》，苏联给的都

是现役装备，就是现役装备的图纸给你，就是苏联用的什么给你什么，当时的海军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海军一建立起来以后，跟当时苏联的海军从装备上是一样的。当然，苏联后来又发展很快，中国又要（后面讲到分裂的时候会说到），那会儿赫鲁晓夫就不大想给了，开始的时候特别大方。

再有就是特殊兵种。高炮部队、装甲部队、伞兵部队、探照灯，等等，所以整个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从装备武器到条例、建制全是学苏联的。过去讲得不多，但是一讲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自己讲，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全盘学习苏联？横竖什么都不懂，不学人家学谁？美国人又不给你，只能学苏联。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所以1954年到1958年这段时间，苏联主要是在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各个方面来帮助中国。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中国也帮了苏联很大的忙，特别是帮助赫鲁晓夫个人。

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捅的这个娄子，中共中央写文章调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苏联非常重视，《真理报》一抢而空，然后印小册子，全党学习，学习中共中央这个文章。当时很多东欧国家也很佩服，再加上毛泽东显得特别开放。中国搞的叫“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苏共二十大要开放多了，毛泽东说什么？说两党制也可以考虑。应该听不同的意见，工人罢工是允许的。那会儿毛主席讲群众有意见罢工怎么了？就应该这样来反对官僚主义，还让新华社去考察，为什么美国总统卸任以后还能教大学，我们干部就只能往上升不能往下降，讲得多好！所以东欧，特别是匈牙利很多知识分子，说中国搞得真好，毛主席民主、英明。

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威望特别高，本来一个朝鲜战争已经显出了中国天不怕地不怕，美国人都敢打，那会儿谁敢动美国人？世界第一强国。我看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至少没有人主动去挑事。中国敢，而且是刚建国，不满周年。所以这个事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影响非常大，跟着就是苏共二十大，各国全慌了，全乱了，只有中国稳如泰山，毛泽东发表声明，发表两篇文章，让人一看真有理论水平，很佩服。

跟着波匈事件爆发。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动乱。波兰和匈牙利这个事很多人，包括现在有些国外学者都认为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错！绝对的错误。我在波兰开会，在匈牙利开会，我在美国都跟他们讲，你们真的小看毛泽东了。你们知道波匈事件最后弄了一个什么结果吗？咱们先谈这个过程。主要是赫鲁晓夫无能，这个赫鲁晓夫确实缺乏政治经验。赫鲁晓夫是1950年才调到莫斯科，之前他一直在乌克兰管农业的，什么对外政策这些事他都没有接触过，后来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写了，他承认都没有接触过。结果突然当了第一把手，面临这么多事，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处理。波兰一闹事，他是听风就是雨。

波兰是这么回事，哥穆尔卡原来跟斯大林闹矛盾，后来被斯大林打压下去了，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杀掉的总书记。东欧共产党的书记都被斯大林杀掉了，就是哥穆尔卡没有杀，为什么？因为威望太高，不好下手，后来就开除党籍，关进了监狱。斯大林一去世，就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了，苏共二十大一开，声名鹊起，你看多英明！赫鲁晓夫现在才批，人家1948年就反斯大林了。而且正好赶上我刚才讲的总书记贝鲁特死在莫斯科了，华沙无人接替，很多人就推举他。

波兰对苏联的重要性谁都清楚，几次外国入侵打苏联走的都是波兰走廊。你到东欧去开车转一圈就知道，我上次从波兰一直开车到德国，车道一马平川，两边都不行——这边是海，那边是山，就在波兰，所以叫“波兰走廊”。希特勒打苏联走这儿，拿破仑打莫斯科也走的是波兰走廊。所以对于波兰，苏联人非常警惕。苏联大使就给赫鲁晓夫写了一个秘密报告，说现在哥穆尔卡上台了，很危险，他很可能要摆脱苏联，摆脱社会主义阵营。当时苏联控制波兰，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手段，军队的军官全是苏联人，国防部长就是苏联人，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但是从小就逃到苏联去了，那会儿干革命，没事就往苏联跑。后来就入了苏联籍，“二战”的时候成了一个元帅。战争结束斯大林就跟他说，你必须回波兰。他不干，说在苏联多好，为什么让我回那个地方去。斯大林说给你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他说那我保留苏联国籍，本来斯大林不想，因为你保留苏联国籍，外面听着很不好，好像苏联控制，但是他这么要求，没有办法，就保留了，所以整个波兰的国防军都在苏联的控制下。

赫鲁晓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给哥穆尔卡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们中央全会要推迟召开，因为中央全会一开就要改选，一改选哥穆尔卡就当总书记，所以不能开。波兰那会儿不听他，怎么不能开？赫鲁晓夫说可以开，等我去你们再开，我们要参加。人家也没有答理他，这样赫鲁晓夫就急了，说哥穆尔卡要反苏。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了，赶快给中国打电话，说你们赶快来一趟，咱们得商量，这是重要的事情。这边他又打电话通知波兰的苏联军队，立刻包围华沙，悄悄向华沙进军，他自己坐着飞机就去了。10月18日，人家都开上会了，飞机在华沙上空转了两圈，人家不让他降落，说没有接到通知不让他降落。赫鲁晓夫说是我，苏共主席团都在这儿呢。两架飞机结果就降下来了，下来了以后哥穆尔卡带着波兰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到机场去迎接。赫鲁晓夫下来以后破口大骂，说哥穆尔卡什么东西。后来人家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不是哥穆尔卡，那个才是，他人都没有认出来。这样矛盾就激化了。

后来他们静下心来一谈，哥穆尔卡也不是那样的人。哥穆尔卡说，不错，波兰是有反苏情绪，但是我要是做了首脑，肯定会压制这种情绪，因为波兰离不开苏联，波兰怎么能离开苏联呢？所以谈着谈着，赫鲁晓夫感觉情报有误，哥穆尔卡不是那样的，不是说要摆脱苏联。正在这会儿，苏联红军到了华沙城下，这一下矛盾就激化了。哥穆尔卡一听，苏联这边跟我谈着，部队悄悄来，马上通知全城工人发武器要反抗。军队是指挥不动了，但是波兰还有一支内卫部队，调过来跟他对

阵，说怎么办吧，后来赫鲁晓夫说我们撤。军队停止前进，他坐飞机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苏共中央开了会，大家一商量，主要是开始的情报有误，认为波兰要脱离苏联阵营，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就把部队撤回来了，和平解决。正好这个时候刘少奇到了，毛泽东跟刘少奇说，你去有两件事：第一，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事都是斯大林那会儿干的坏事引起的；第二，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能让大家都散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维持的。所以他去有这么两项任务，结果他去了以后波兰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到的当天晚上，匈牙利出事了，匈牙利群众上街闹事，也是对政府不满，对苏联不满。结果苏联也是派兵，就给镇压了，23日夜到24日凌晨的时候暴乱就平息了。平息了以后苏联才跟刘少奇讲，和波兰的问题不一样，我们已经派兵镇压了。这个时候中国就开始批评苏联，说你们处理问题不尊重别国的主权，大国沙文主义了，一顿批，说你们要发表一个声明，就是后来登了报的那个，叫《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表达苏联要平等对待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驻军都要撤回。赫鲁晓夫也听进去了，就说服所有政治委员、军事委员发表这么一个声明，把这个事赶快平息了。正在这个时候，匈牙利内部的事闹大了，详细情况将来你们看书，我就不细说了，主要是纳吉上台，政府比较软弱，社会动乱越来越大，以至于解除了秘密警察的武装，打开监狱大门，释放政治犯，整个社会秩序就乱了。

所以29日米高扬专门去了一趟，回来一汇报这个情况，毛泽东先反应过来了，就给刘少奇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匈牙利形势已经变了，是反革命政变，必须镇压。刘少奇就跟赫鲁晓夫讲，说主席来电，现在性质变了，必须镇压。赫鲁晓夫说，我刚劝政治局委员在《平等宣言》上签字，说要撤军，怎么又要派兵去？刘说主席是这么说的。赫鲁晓夫说要不您去政治局会议上解释解释？刘少奇就跟着赫鲁晓夫进了克林姆林宫。开会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档案记录很简单，刘少奇就把毛泽东的话说了一遍，邓小平就说得比较严重，说决定是由你们来做，反正你们好好想想，你们要对历史负责任，我们先走了。

会议第二天，31日，苏共中央讨论了一天，主席团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本来苏联就是两派意见，一派比较强硬，一派准备放手让匈牙利自己处理，结果强硬派就占了上风，通过了镇压的决议。赫鲁晓夫紧忙给刘少奇打电话，刘少奇已经到了机场，赫鲁晓夫说，你别走，我马上就到。开着车赶到机场，说我们政治局已经通过，决定派兵镇压。刘少奇说这就做对了，还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第二，要让他们发出邀请，请你们出兵，你们不能自己去。赫鲁晓夫说是，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谈得挺好，就回来了。后来苏联就出兵镇压了。

镇压了以后，结果苏联弄得非常的被动。首先是西方各国一致谴

责，说苏联太不像话了，哪里还有公道，说侵犯一个国家，一天派军队就把政府就给解散了，那还行？这样的话世界哪里还有秩序，所以一致谴责。苏联是11月4日出兵，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按惯例苏联大使馆都要举行宴会。我看一个报告，驻北欧的一个大使发了200个帖子，和夫人在门口恭候，一晚上都没有人来，全是空的，就来一对夫妇，说我们来还这个帖子来的。这么重要的场合没有一个人参加，苏联非常孤立。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家都提心吊胆，说苏联今天能侵犯匈牙利，明天搞不好就轮到我们了，所以大家都很不满，包括波兰，包括匈牙利的新政府，包括南斯拉夫的卡德尔。卡德尔也不敢按着苏联的要求去处理匈牙利的问题，所以苏联是腹背受敌。国内也是议论纷纷，包括中国，《新华社内参》报道了很多，就是中国基层干部，包括很多党员、民众的反映，很多人都认为苏联不应该出兵，不应该用武力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就特别希望中共能帮他一把，中共不出来说话他很难渡过这关。正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又给他解了围，就讲波匈事件的起因。毛泽东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包括又对斯大林的问题做了一番阐述。苏联各党又学习，新的一轮学习中共文件。当时大家都感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确实马列主义水平高。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招收博士，要填表先填看没看过《矛盾论》和《实践论》，如果没有看过就没有报名资格。

当时东欧国家经常辩论，党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经常辩论，往往到最后双方谁也说不服谁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句话，说咱们不谈了，咱们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当时中国人也很骄傲，我看了很多内参的报道，说我党干部骄傲得不得了，咱们一个省委书记去任何一个国家当总统没有问题。现在苏联已经完全失去了领导资格，社会主义阵营哪能靠他们来领导，什么都不懂，什么事都处理不了，哪像毛主席、周总理高瞻远瞩，指挥若定。赫鲁晓夫后来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说您到莫斯科来一趟，好歹露个面，救救驾。毛主席说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就把周恩来调去了。周恩来真的是“穿梭外交”，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一走，全摆平了，所以赫鲁晓夫特别感激，又渡过了一个难关。

这时到了1957年初，过了不到半年就出一件大事。什么事呢？苏联共产党发生了一次上层政变。赫鲁晓夫跟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矛盾比较深，而这些人都是元老。最晚的，像卡冈诺维奇，也是1932年就进入政治局了，莫洛托夫是跟列宁一块儿搞十月革命，当时就是中央委员，全是老资格。他们跟赫鲁晓夫的观点有些冲突，赫鲁晓夫想改革，要变这个变那个，而且赫鲁晓夫提拔了很多年轻干部，新的中央委员都是他提拔的。1957年面临一个问题，主席团要改选，就相当于中国的政治局，所以这些老人就担心，这一选就得全部被选下去。这不行，要先把赫鲁晓夫给搞下去。

那天突然召开了主席团会议，把赫鲁晓夫叫过来了。本来都是赫鲁晓夫坐在这儿，他是总书记。他进来一看布尔加宁坐在他的位置上了，他说您怎么坐在这儿了？他说是，今天我坐这儿，你就坐在那儿。布尔加宁说今天会议的议程讨论罢免赫鲁晓夫总书记的问题。赫鲁晓夫一听就傻了，然后一个一个发言，长篇数落他的罪行，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才知道他们都商量好了。赫鲁晓夫没有大智慧，但是有小聪明，坚决要求检讨。其他人也不能不听，晚上下班了还没有检讨完，第二天接着检讨。

他夜里就给朱可夫打了一个电话，朱可夫是何许人也？“二战”名将，后来为斯大林所妒忌，朱可夫确实是功高盖主。“二战”几个重大会战，斯大林本不想调他来，最后没有办法，把朱可夫调来处理了，列宁格勒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几大战役都是他指挥的。后来朱可夫也是过于骄傲，结果斯大林就找了一个碴儿他把给一撸到底，从苏军总司令最后弄成个军区副司令。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一手就把他给提拔起来了，这个时候用得着他了，马上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动用所有的直升飞机，把全国的中央委员都给我叫到莫斯科来。第二天一早，200多人到了克里姆林宫，把门给堵上了，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说主席团没有资格罢免总书记，除非召开中央全会，这帮老人也傻了。没有办法，就开会，这一开会，他们成了“反党集团”了。

但是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可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秘书，莫洛托夫是列宁的战友，全是反党集团？怎么可能呢？没有人信。有的基层组织写的报告，说坚决要求马林科夫同志在电视发表演说，我们想看看他是怎么反党的。这不是跟赫鲁晓夫叫板吗？而且中国和东欧国家不表态，这个事也很让赫鲁晓夫头疼。1957年7月2日他就通知了中共，说我们出了这么一个事，我们就是这么处理的，您看怎么办？3日又派人送了文字的东西，因为4日就要见报了。如果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得不到各共产党支持的话，那么苏联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包括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地位都受到了威胁。所以现在就看中共能不能支持他，能够带头发言，但是中共默不作声。

苏联登出来以后中国没有表态，赫鲁晓夫就急了，立刻派米高扬马上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杭州，米高扬就去了，晚上7点半到了杭州，谈了八个小时，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苦口婆心地解释。最后毛泽东听完了，他说我已经听懂了，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说赫鲁晓夫做的是对的，莫洛托夫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跟着斯大林没少干坏事。后来米高扬说不是，您跟我说没用，您得赶快公开发表个声明，这样我们才能挺过去。毛泽东说你放心好了，我们已经起草好了，阎明复念给他听，阎明复翻译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获悉什么什么，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对，我们全力支持。米高扬听了很高兴，说我就不等了，我得连夜回去汇报，坐飞机回去。但是那天天气不好，飞机抖得厉害，我听当事人阎明复跟我讲的，阎明复说，米高扬同志您不要惊慌。米高扬说，我不惊慌，我把此事办成了，咱就是摔下去我也心满意足了。阎明复心里说，我才二十多岁呀。

这说明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看来，在赫鲁晓夫看来，确实是一个当务之急。到什么程度？他是凌晨三点钟交给他这个电报的，中国刊登这个是在195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苏联在7月6日的《真理报》上就给登出来了。一般的转载都在第二天，但是这次同一天发，为什么？因为迫不及待，需要让各国共产党都知道中共的态度，这样这一关又过去了。

这样三番五次的几件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毛泽东的威望确实是大大地提升了。赫鲁晓夫也是自愧不如，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原来斯大林曾经跟中国共产党说过，在1949年7月的时候，斯大林说以后我们负责欧洲的事情，亚洲的革命就都交给你们中国共产党。说你们有经验，长期斗争，将来亚洲的问题交给你们处理了。当时毛泽东挺高兴，领导亚洲革命也不错。所以1949年中南海就办了学习班了，把亚洲各国共产党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全叫来培训，怎么搞革命，怎么拿枪杆子武装斗争，还有妇女工作、统一战线……

1956年，苏联处理不好欧洲问题，所以不得不请中国去帮助处理欧洲问题，毛泽东就上了一个台阶，亚洲革命我管得不错，现在欧洲出事，你管不了得我来管，这就是波匈事件一个最大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介入欧洲的事情。

苏联反党集团事件又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不但开始介入欧洲的事情，而且管起苏联的事情来了。苏联共产党自己搞不定，得中共来搞定。所以到了1957年底，你们知道毛泽东是什么心态？好得不得了，心情舒畅。1957年11月召开莫斯科会议，世界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主席、总书记出席。赫鲁晓夫就盼着毛泽东去呢，毛泽东就一直没有答复。两年前就开始策划这个事，毛泽东说不去，开始的理由是说，我1950年作为国家元首已经去过一次苏联了，但是你们没有相应的国家元首回访，所以我再去不合外交礼仪。

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来了一趟中国，这个理由就没了。后来米高扬来的时候，就是7月5日到杭州见的时候，他又说，你是不是能到莫斯科来一趟，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赫鲁晓夫同志特别希望你来。毛泽东说，好吧，看看有没有时间，不过总的来说，那会儿你们那里太冷。

后来是什么事让毛泽东答应了？就是7月中旬，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核爆炸的技术，10月双方就签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所以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也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搞起来的。这个消息一传到，毛主席就说行，可以去，赫鲁晓夫特别兴奋，做了精心的安排。没有一个人像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这么无微不至的关怀。

到了什么程度？毛泽东去了，飞机在伊尔库兹克加油，刚进苏联境内，苏共中央书记就到机场，到伊尔库兹克去迎，毛泽东说天冷我就不下飞机了，苏联人说没事，我们上来。到了莫斯科，苏联要铺红地毯，

来道欢迎。毛泽东说不行，天冷，我坐不了敞篷车，取消。赫鲁晓夫没有办法，就给取消了。所有的代表团都安排在列宁山，列宁山有好多别墅，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为什么？说您住这儿主要是怕您感冒，这有一条走廊直接通会场，您去会场就不会着凉了。

而且赫鲁晓夫还知道毛泽东不睡沙发床，给换成木板床。因为毛泽东1950年的时候去，那会儿条件不行，就是住一般的旅馆，斯大林就安排一般的旅馆，都是沙发床。毛泽东多年战争中形成的习惯，睡不了那个，腰疼，睡不着，气得把沙发床垫给扔了。还有一条，毛泽东不用马桶，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气得没有办法，沙发床垫子可以拆，马桶没有办法拆。赫鲁晓夫有办法，弄一堆沙子砖头，把马桶给埋起来留一个窟窿。所以说，赫鲁晓夫确实是无微不至。

到了1957年底的时候，中苏两党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是苏联高高在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归他指挥，归他领导。斯大林去世了以后，赫鲁晓夫比较看重中国共产党，就是1954、1955年的时候，帮助中国。1956、1957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又在政治上帮助苏联，帮助赫鲁晓夫，显现出中共的领导能力。所以到了1957年的时候，是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指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

到了1957年底，毛泽东准备“垂帘听政”，他在背后指挥，出面的是苏联，但是什么事得问我。包括莫斯科会议都是这样，苏联搞《莫斯科宣言》，都起草好了，拿到中国来给毛泽东看。他一看说，总的来说写得不错，90%都同意，但是太啰嗦，删掉一半。还有什么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谈，这个改改，那个改改，回去改去吧。在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关于以苏联为首，因为过去所有报纸上登的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后来苏联人觉得不能再这么说了，明显的不符合事实，应该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人说不行，我们还差得很远。苏联人说至少也要提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说不，就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是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不行，帝国主义只怕你，不怕我，你有原子弹，你们经济实力雄厚。当时赫鲁晓夫一直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大方，非让我们为首，后来1959年明白了，是让我们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有原子弹，核保护伞得我们提供，我们实力雄厚，哪儿出的困难得我们出钱，得负这个责任，中国不能负，负不起，但是主意得我们中国出。所以说服所有的国家，都要提“以苏联为首”这个口号。但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说，我给你讲一个道理，中国有句古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什么意思呢？一个好汉得有三个人帮助才行，才能成好汉，一个篱笆怎么能立住呢？得有三个桩子支着才能立起来。说你赫鲁晓夫这朵红花再好，也得靠我绿叶来帮衬。

所以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表现出来一种超然的架势。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苏联反党集团这事。原来苏共写的《莫斯科宣言》里有一段话，说最近苏联发生了“反党集团事件”，毛泽东让他们给删了，

说那是你们党内的事，就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谈了，删掉，人家回去就给删了。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即席演讲，讲着讲着突然一拍桌子，说同志们，下边我讲讲团结的问题。他说苏联共产党发生了一次反党集团事件，什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这些人怎么怎么样，说这是苏联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是我们的同志要懂得团结，特别要团结那些犯过错误，又知道改正错误的同志。比如说像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把王明留在了中央委员会。苏联人一听，再也憋不住了，米高扬本来坐在毛泽东对面，突然站起来，全场鸦雀无声看着这个场面，他瞪着有一分钟，在边上来回走。苏联人是心里不服，你说了党内的事不能在国际会议上谈，我们给删了，然后你说，还说谁对谁不对。你现在俨然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评判谁对谁不对，都由你来说。

关键是，王明这个事让苏联人特别反感。为什么呢？王明在苏联养病呢，而且在7月4日的时候，当时苏联大使馆给刘少奇送苏联文件的时候，问过中国的态度，当时刘少奇就说，对这些老同志，都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太过分了？就说了这么一句。后来他跟毛泽东谈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米高扬还专门了说这么一句话，说原来中共中央的同志们不同意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来才同意的。现在毛泽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中国共产党还把王明留在中央委员会，明摆着是指桑骂槐，所以米高扬能不生气吗？

南斯拉夫代表团是卡德尔去的，卡德尔就写了一张纸条，说现在苏共和中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苏联不能忍受这个，听你指挥也要有条件：第一，前台的人很弱，后台的人很强，前台的人必须服从后台；第二，他们俩没有分歧，在原则上、在重大方针政策上没有分歧。但是，1957年底到1958年的时候，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了。

第一，苏联开始强了，原来斯大林时代，苏联是问题很多，特别是农业落后，但是1955、1956、1957连续三年的农业丰收，苏联解决了粮食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到1953年的时候苏联都没有解决粮食问题，现在解决了。还有，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年底核动力潜艇下水，这在科技领域都超过了美国。再加上赫鲁晓夫新选出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地位全部都稳定了。所以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开始跃跃欲试，要做出他的事业的时候，怎么能够容忍有一个背后指挥者？

第二，中苏分歧开始出现。分歧最初表现就是在莫斯科会议上。莫斯科会议对国际形势做出一个判断，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这个大家都认可，毛泽东在会上还讲了一番话，说大家读过《红楼梦》吧，其实没几个人读过。说王熙凤说过一句话，赫鲁晓夫心说谁是王熙凤呀。毛泽东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看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苏联人还是没有听懂。当然后来搞明白，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就是现在社会主义力量很壮大。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现在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帝国主义，那我们就不需要再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了吧，我们通过和平谈判，通过制度的优势，就

可以战胜帝国主义，何必还要用战争呢？

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说既然我们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还跟他谈什么？打就是了。所以他在18日的即席演说中又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现在有人就是害怕战争，战争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死人多一点。核战争又有何惧？全世界二十七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呢，我们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我怕谁？此话一出，全场愕然，全都没听懂他说什么。

后来我问李越然，因为是李越然给他翻译的。我说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吗，他说差不多，他说一句我翻译一句。结果这话一说完，底下全乱了，不知道毛泽东要干什么。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后来回忆录也写了，他说听完的感觉认为毛泽东就是一个战争狂人，好像马上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毛泽东不是那个意思，他是讲战争是有残酷的一面，但是不能怕战争，这个道理他在党内经常讲，所以中国人听完了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欧洲人听完了傻眼了，后来他们茶歇的时候在一块儿议论，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说，刚才毛泽东讲什么，他们六亿人，不怕，我们一共才两千万人，大家都不理解。这也是后来中苏分裂的时候，很多东欧国家就没有跟着中国走的原因。原来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时候，很多东欧国家都非常推崇中国，但是毛泽东关于战争的言论，他们听不懂，也不爱听，欧洲人不愿意打仗。中国人老是讲战争不可怕，欧洲人就不爱听，苏联人也不爱听，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发生分歧了。

这个分歧到了1958、1959年越来越大了，因为双方的基本方针不一样。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外方针上反映出来就是炮击金门。1958年炮击金门，万炮齐轰，现在的材料都比较清楚了，原来都不清楚，不知道炮击金门是怎么回事，光看报纸，报纸上登的都是最表面的。其实中共原来的想法是什么呢？收复金门是早就在计划当中，只不过是因为朝鲜战争给耽误了，朝鲜战争一结束就是1954、1955年，就打了舟山群岛，也就是浙江沿海岛屿。

收复浙江沿海岛屿中遇到了一个事，就是要打大陈岛的时候，蒋军就自动撤离了。所以在打金门的时候，开始中共设计的一个方案就是万炮齐轰以后蒋军会自动撤走。但是又担心万一美国人要参与进来怎么办，所以毛泽东曾经跟林彪、叶飞讲，说你们想一个办法，这个炮打过去，只打蒋军，不打美军。他说这怎么可能呢，炮弹又没有长眼睛，见着美军也不可能拐弯。林彪想了一个主意，说咱们通过华沙的秘密渠道，把炮击的消息告诉美国人，让他们避开，就全剩下蒋军了。后来没有实行，因为担心美蒋勾结，你告诉美国人，他就可能告诉蒋介石。

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毛泽东不想惹美国人，他想解决金门的问题，但是又不想惹美国人，至少不要让美国人干预这个事。怎么办？他想到有一个力量可以制约美国人，就是苏联。但是这个事不能跟苏联说，跟赫鲁晓夫说我们要打金门了，他肯定不干，这不是惹事吗？所以还不能

跟他说，但是还得让美国人认为是他跟咱们商量好的，这就得动脑筋了。他就动了一个脑筋，把赫鲁晓夫找到北京来了。

通过什么事呢？本来7月14日已经下令国防部组织炮击金门，下面的事就你们管了，几十万发炮打完就完了。结果突然19、20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从莫斯科回来了，说提了一个联合舰队的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讲苏联要跟中国搞个联合舰队，在中国港口加油，大概这么一个事。毛泽东发火了——还要搞国防“合作社”？我们管你们要点儿帮助，你们就要搞“合作社”，想要侵犯中国的主权是不是？想要中国的海岸线，好，我把中国一万公里的海岸线都给你，我上井冈山了！说得尤金汗都下来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事您就上井冈山？回去就给赫鲁晓夫打了一个电话说，不得了，中国出大问题了，毛主席要上井冈山了。赫鲁晓夫也纳闷，说：你说什么了，惹得毛泽东生那么大的气？你是不是把话说错了？算了，还是我去一趟吧。其实，毛泽东就是让他来一趟。

赫鲁晓夫就来了，来了以后，我看会谈记录，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话，这个问题就说完了，没得说了。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没有那个意思，我们那个舰队都是核潜艇，续航时间非常长，不可能走一半再回来加油，我得到你那里加点油，毛泽东说没有问题，那有什么问题。这个事就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两个人就东扯西扯了，谈了两天，赫鲁晓夫说该走了。毛泽东说行，明天我到机场送你，我让所有在京的外交使节都送你。赫鲁晓夫说，主席呀，我是悄悄来的，谁都不知道。毛泽东说，你可以悄悄来，但是可以公开走，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搞一个公开的宣言，公开的声明。赫鲁晓夫傻乎乎地说行，挺好。声明怎么说的？说中苏领导人就当前国际紧张局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讨论，赫鲁晓夫还特别积极，当天中午莫斯科电台停止播送节目，就广播这个联合声明。

赫鲁晓夫前脚走，毛泽东随后电话通知彭德怀，现在可以炮击金门了，所以他前边刚走，这边万炮齐轰金门。你们看看蒋介石日记，还有美国人，都认为这边开炮一定是赫鲁晓夫跟毛泽东商量的。后来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讲，大家都以为炮击金门这个事是我和赫鲁晓夫商量的，其实我一个字都没有告诉他。所以你想想，赫鲁晓夫心里多憋屈，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出了什么事，炮击金门一个星期，苏联没有反应，他不知道怎么反应。除了报纸上报道，政府也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评论员文章，没有一个正面的报道。9月4日美国发表《新港声明》，因为美国也观察了一段到底怎么回事，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这边根本就没有闹清楚金门的情况。

我去了三趟金门，专门看了看，我原来就纳闷，几十万发炮弹，台湾工事竟安然无恙，原来全都是钢筋水泥的地下通道。放了那么多的炮弹，没有炸掉一个弹药库、油料库，指挥所没有受到一点的损伤，就是岸边多了一堆炮弹坑。所以你想把人家赶走、挤走，人家不走，用不着走，后期双方争斗的主要是运输的问题、补给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共

这边就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本来想着他撤了就完了，原来没有准备登陆部队，就没有打算登陆。在这个时候事件老不平息，蒋军也不走，共军老打炮，美国就发表了一个《新港声明》，说中国要是这么没完没了地打，美国就要插手，也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做法。

这一下子苏联就紧张了——如果这样，远东危机就升级了，于是马上派葛罗米柯到中国来了。9月6日打了一个电报，9月7日就来了。葛说，你们中国究竟想干什么？你们是不是要解放台湾？周恩来说没有，解放台湾还早。那你们是要攻占金门？说这次金门也不取。葛罗米柯说你们不解放台湾，也不攻占金门，打的哪门子炮？中国怎么回答的？说就是为了让他紧张紧张，帝国主义，不能让他老那么安静，得让他紧张，每闹一次危机，就是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扣个枷锁，大家一拉他就死了。

赫鲁晓夫说，美国紧张不紧张我不知道，我反正是很紧张，美国要扔原子弹。毛泽东讲，这个你们放心，中国不会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了，也不会拉苏联人下水。这么着赫鲁晓夫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如果美国向中国使用原子弹，苏联就向美国使用原子弹，他要负这个责任，发表了以后毛泽东也表示感激。但是后来中苏之间又发生了矛盾和分歧。

因为美国给了蒋介石很多新式武器，像响尾蛇空对空导弹，8英寸的大炮。8英寸大炮打过来，坑有大礼堂那么大；还有F-104飞机。所以中国也管苏联要导弹部队，要米格-19。这回赫鲁晓夫长心眼了，说飞机可以给，但是我们得跟着飞行员去，导弹也可以给，但是我们跟着导弹部队去。意思就是装备不能给你掌握，因为他担心，你手里什么都没有还想打就打，再给你装备还不一定干什么呢。这样毛泽东就很不高兴了，本来周恩来都答应可以考虑苏联的方案，但是毛泽东说不行，飞机可以来，人就不要来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闹得双方很不愉快。蒋介石用了响尾蛇导弹，响尾蛇导弹是美国刚研究出来的空对空导弹，我到台湾专门看了一下，两米来高，是刚研究出来的。温州一战用了五发，结果一下打落四架米格飞机，有一颗没打中，掉地上了没炸。苏联得到消息了，那会儿中国军队都有苏联顾问，说这个导弹对苏联非常重要，说我们正在研究空对空的导弹。

中国就不愿意交给苏联，也不说不给，一会儿说道路交通问题，一会儿又说别的问题，总而言之老不给人家。最后苏联就急了，赫鲁晓夫非常不高兴，说中国的所有武器，从手枪到飞机全是苏联给的，我们就要一颗导弹，还不是你们的，美国人的，你都不给，咱们还算盟友吗？最后没有办法，给苏联吧。等到箱子运到莫斯科，技术人员打开箱子一看，中国人把导弹拆得乱七八糟，装不上才给运来，所以你说赫鲁晓夫能不生气？

危机之后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停止向中国再供应核武

器资料和原子弹的样品，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就进入了要核试验的阶段了。我看他在回忆录中写了，中苏关系现在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越晚掌握核武器越好。他现在已经完全不相信毛泽东了。他这个决定一做出来中国这边就生气了，这不是撕毁合同吗，所以中苏关系就越来越恶化。这个问题毛泽东没有怎么发火，就是底下人发火，张爱萍、聂荣臻都很生气，说苏联出尔反尔，所以咱们要争气，自己干。

毛泽东发火是另一件事，是“大跃进”。大家都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特别在咱们河南，你们都应该听父母说过，河南那会儿最积极。中国说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实际上就是要赶超苏联。因为如果在经济上，中国不能超越苏联，不能达到相当的水平，毛泽东总认为他是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提高生产力，人民公社是改变生产关系，所以总体上要超过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不明白，后来明白了。毛泽东在党内讲什么？他说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那套过时了，斯大林那套也不灵，什么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也过时了。就是我们这套行得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总路线，“多快好省”，社会主义这么干就行，我们一定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那年金日成来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两个人就开始安排，大家都到了共产主义谁先进谁后进，毛泽东说苏联老大哥先进，我们跟着进，金日成说我们再跟着你们进。

毛泽东还讲斯大林一直说向共产主义过渡，四十年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所以他很想通过人民公社来打造一个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但是没想到1959年人民公社办不下去了，后来就闹大饥荒。其实这个问题1959年初已经显现出来了，全国各地都出现问题了。那会儿就是一个大炼钢铁，全国都在折腾。那会儿我上小学，也一天到晚跟那儿炼钢，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地里挖金属的东西，只要挖出来就是立功，一天到晚就是挖，恨不得把窗户给拆了，真有把锅给砸了交公的。农村更是，反正大锅饭也用不着锅了。本来庐山会议毛泽东是要降温的，大家都冷清一下，清醒下来，重新调整。彭德怀上了一个《万言书》提意见，还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

彭德怀的万言书没有几天，赫鲁晓夫在波兰发了个言，他到波兰一个农庄去参观，后来人家递了一个条子，问赫鲁晓夫同志，现在中国人民公社搞得红红火火，您怎么看？赫鲁晓夫心想也没法说中国。他没说中国，就说说苏联，他说，我们20年代就搞过公社，没有搞成，为什么，就讲了一大堆道理，什么物质条件不够，精神条件也不够，文明也不够，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说过渡就过渡的……讲了这么一番话。外交部就给送上庐山了，结果毛泽东一看，所有的气就撒在赫鲁晓夫头上了，当时就写了一个批示，此件印发大会所有代表，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苏联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做不到，马列主义到底在哪里……讲了一大堆。第二天把刘少奇叫来，要求把赫鲁晓夫的讲话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我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赫鲁晓夫是反人民公社的。还

让胡乔木他们下去找材料，要向全世界所有怀疑和反对人民公社的人宣战。过几天气消了，文章也没写，也没宣战，赫鲁晓夫那个讲话也没有登，他登不出来。毕竟你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搞砸了，所以毛泽东心里憋着一肚子火没有发出来。

最后碰上了一件事，终于把火全给发出来了，就是赫鲁晓夫到美国搞了一个戴维营会谈。他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有一个谈话，所谓“戴维营精神”，就是要缔造美苏缓和，就是要给世界一个和平的时代，这是赫鲁晓夫讲的，所以赫鲁晓夫非常兴奋，在美国游走几个大城市。正好赶上共和国十周年大庆，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了，赫鲁晓夫又得来一趟，各国领导人都来，赫鲁晓夫能不来吗？所以9月30日他从美国回到莫斯科，没有歇着就往北京跑。

但是这时毛泽东心里已经很不高兴了，对赫鲁晓夫的言谈举止就已经显露出来。赫鲁晓夫在飞机上还非常兴奋，说下了飞机要发表演说，本来没有这个安排，但是赫鲁晓夫这个人就是头脑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提出来也不能不让他说，就在机场临时安排了一下让他演说。结果赫鲁晓夫讲了不到五分钟，断电了，拿着麦克风，没声了，扯着嗓子讲了一会儿，而且讲的过程当中毛泽东脸看着天，一插手，从来没有答理他。苏联大使都看出来了，给中国提抗议，说你们这不是戏弄我们领导人？人家讲着讲着话把麦克风给掐了。赫鲁晓夫当然知道毛泽东不高兴，庐山的这个事他不一定知道，但是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这个事，他想中国一定很不高兴，所以老想解释这个事。但是毛泽东不给他开口的话茬，刚说出口就说不谈了。核武器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不给，没有什么，容不得他说话。9月30日晚上宴会也闹了一档子别扭，就是阎明复拿着赫鲁晓夫准备作的报告看了以后，突然发现赫鲁晓夫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讲的是现代是和平的年代，还是讲的和平共处。他说我们不要用武力去试探帝国主义的耐心，意思就是不要到处惹事。毛泽东一看就不高兴了，说这不是指桑骂槐吗？本来是毛泽东要致欢迎词，他说我不讲了，换周恩来。再加上赫鲁晓夫这个人一讲起来就脱稿，所以弄得中方特别不愉快。

10月2日，两党正式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要杀杀赫鲁晓夫的气焰，就找了十个人来跟他会谈，包括彭真、陈毅、林彪，有很多人，苏方是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三人，这个会议记录也解密了，双方一上来就谈崩了。赫鲁晓夫也不会说话，因为他从美国来，当时中国扣了五个美国间谍，美国总统当时就跟赫鲁晓夫说，你能不能劝劝毛泽东把人给放了。赫鲁晓夫也不看看气氛，本来毛泽东心里就憋气，他上来就讲这个。说我刚从美国回来，讲得眉飞色舞，说你们是不是扣着五个美国人，也没有什么用，放了算了，我们处理这些事都是放了，扣着有什么意思。讲得正痛快，毛泽东来了一句：是不是美国人让你来做说客呀？他说是，美国总统跟我说的。这里可能有文化的问题，翻译没有完全表达出毛泽东的言外之意。毛泽东的语气其实是在暗讽他，就是你替美国来说话，他还说是，毛泽东就更生气了，大家就群起而攻之。赫鲁晓夫专讲毛泽东不爱听的，讲达赖喇嘛的事。

所以毛泽东当时就很不高兴，说这事用得着你来教训我吗？西藏平叛以后，达赖跑到印度，中印关系开始紧张，后来到9月，中印就打起来了，打死两个印度人，赫鲁晓夫就说你们不应该跟印度发生冲突，咱们好不容易把印度从美国的阵营拉出来，拉到社会主义这边来，这么一打又给打回去了。林彪说是他们先开枪的，我们反击。赫鲁晓夫说，但是你们没有死人，人家死人了。双方越说言辞越激烈，陈毅说你纯粹就是一个机会主义。气得赫鲁晓夫说陈毅，你不过就是一个元帅，我是总书记，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赫鲁晓夫刚说一句，一会儿彭真来一句，一会儿陈毅来一句，赫鲁晓夫急得直拍桌子，说不能这样，你们十个人，我们就三个人，不带这么玩的，不公平。毛泽东在旁边坐着，看着他们在那里吵，说好了，不要吵了。光看会谈记录就能想象出那个场面，毛泽东在那里运筹帷幄，大家都耍赫鲁晓夫，真的把他气坏了。听说赫鲁晓夫回来气得饭吃不下去，觉睡不着，半夜在院子里转圈子，警卫员秘书也不敢睡，都跟在后面兜圈子，第二天一早提前回国了。

从那以后，中苏关系就没有缓过来，1959年10月2日，那次会谈中苏两党彻底撕破了脸皮。原来还都比较客气，有分歧、有问题，大家都掌握一个度，但是这次我想毛泽东是有意为之，设了这么一个阵势，要给赫鲁晓夫点儿颜色，因为他觉得赫鲁晓夫到了1959年有点太忘乎所以了。从那以后中苏关系就再也没有缓过来，1960年是最激烈的，跟着就是世界工联会议，中国批评苏联；然后是布加勒斯特会议，苏联围攻中国。赫鲁晓夫没招了，就想了一招，撤专家。因为当时中国各大企业完全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搞起来的，所以赫鲁晓夫认为一撤专家中国就得软，没有想到毛泽东说撤得好，撤了就别回来了，我还不欠你的债呢，这个很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所以赫鲁晓夫特别后悔，找周恩来，说要不然我再派回来，周恩来说不用了。

1960年底，刘少奇去了一趟苏联，双方又谈了谈，有些缓和。因为谁都知道，如果中苏分裂就是两败俱伤，得利的只有共同的敌人——美国。当年中央情报局就是这么分析的，所以中央情报局一直不认为中苏关系会破裂，他们有分歧、有矛盾，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文化、历史都不相同，但是这个同盟不会破裂，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可中苏就是分裂了，而且是越走越远。1960年底到1962年上半年，有一年多的时间有点儿缓和，中国正好是困难时期，饭都吃不上，没劲吵架，苏联也想卖好，给点儿贷款。结果1962年下半年又崩了，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双方谁都不支持谁，随后就开始大论战，就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双方互相指责。这个时候指责主要都是来阐述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比如说战争、专政、和平、过渡问题，等等。这个时候从1963年到1964年，其实中苏两党争的就是话语权，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争来争去，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赫鲁晓夫下台又是一次上层政变，但是这次人家都设计好了，赫鲁晓夫又像1954年时那样检讨，人家说您别检讨了，下台休息就完了。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中央就想借这个机会能不能跟中共改变改变关系，所以就发了一个通知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下台了，搞不好中苏关系有可能缓和，就派周恩来去了一趟。周恩来去当然规格就很高了。毛泽东授意：你去，但是有一点，中苏关系缓和的前提是苏联要公开认错，公开宣布放弃赫鲁晓夫的路线，放弃苏共二十大路线。

其实苏联是放弃了赫鲁晓夫的路线，但是人家不能公开说这个事，这样国家威望、党的威信何存？本来中共要是正式提出这么一套说法，其实对中共很不利，你们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苏联说咱们不吵架，有事先坐下来慢慢谈，不要公开吵，让帝国主义看笑话。毛泽东还不干，说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一定要公开吵。

结果出了一个事，倒让毛泽东抓住了把柄，就是“马林诺夫斯基事件”，马林诺夫斯基是苏联国防部长，1954年朱可夫帮着赫鲁晓夫对付反党集团以后，赫鲁晓夫非常担心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一夜之间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调过来了，他能帮我，将来也能帮别人，不行，这个人要除掉，所以没有几个月就把朱可夫给除掉了。跟朱可夫说，你劳苦功高，去南欧修养。朱可夫挺高兴的，就去南欧修养，两个月后回来了，刚下飞机，就直接到克里姆林宫开会，宣布罢免他的国防部长职务。

谁接替了呢？就是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个军人，文化水平不高，说话比较粗，所以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他就讲话，说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苏联非常强大，再加上中国，我们一定可以打败帝国主义。周恩来说，很像我们主席的思想，说元帅讲得好。他就晕了，就喝酒，结果一得意就忘形，就跟贺龙讲，咱们中苏本来就是好兄弟，咱们应该团结起来，本来很好，就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他们俩合不来，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除掉了，你们回去也把毛泽东干掉就行了。

当时翻译都没有敢翻，就赶紧去跟周恩来讲，说马林诺夫斯基说了这么一番话，周恩来一听脸就白了，赶紧带着所有人撤，全撤走了。勃列日涅夫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那里祝酒呢，一回头这人怎么都没了，一问，马林诺夫斯基搞了这么一档子事。第二天一早，他带着所有政治局委员登门谢罪，找周恩来，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马林诺夫斯基来参加这次酒会，他就是个粗人，这个人从来不参加决策，也不参加政治局会议，不要听他的，喝多了胡说八道，酒后失言。周恩来说哪里，这是酒后吐真言，你们苏联共产党就是这么想的。

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已经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了这个事，毛泽东非常高兴，说可抓住了一个把柄。所以后来就不谈了，就回去了。后来史学界有人讲这是中苏和解的一个机会，其实不是机会，就是没有这个事也谈不成，只不过那个结果就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了。因为你提出了一个让别人无法接受的条件，但是马林诺夫斯基这么一闹，结果就是苏联担了一个罪名。当然，中苏关系最终走向分裂双方都有责任。

第一，毛泽东要指挥苏联，让苏联听他的，苏联不干，主要是双方政策有分歧，对问题的看法不同。赫鲁晓夫当然有问题，他做了很多很荒唐的、很不冷静的一些错事，但是他改得也很快，包括撤专家，包括停止原子弹样品的援助。所以苏联总是扮演一个承担责任的角色，但是真正不想和解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不能跟苏联和解，因为跟苏联和解，反修、防修，说了半天苏联如果不是修正主义，你反什么？这个台阶下不来。特别是到1962年到1964年，它跟国内的政治问题连接起来了。

到1964年以后，中苏就彻底的分道扬镳，一直到“珍宝岛事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本来中国还一直想跟苏联争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但实际上中苏分裂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都跟了苏联。1964、1965年的时候，东欧的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都跟着苏联。越南、朝鲜和日本，就是亚洲的几个共产党还是跟着中国的。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1967年，越南也跑了，朝鲜也跑了，日本也跑了，中国越来越“左”，谁都不相信，说越南也是修正主义，朝鲜是“朝修”，日本共产党是“日修”，就剩一个中国，还有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就是太远。

到了1970年，这盏明灯也灭了，因为1969年以后中苏打起来了，毛泽东就觉得腹背受敌，北边有苏联，南边是美国势力范围，所以觉得中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于是想跟美国联手来抗击苏联。但是他跟美国一联手抗击苏联，谁都不理解，阿尔巴尼亚也不理解了，怎么能跟帝国主义联手，革命性哪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就遇到了一个理论上的难题。一个革命领袖，一个共产主义领导人，怎么突然跟美帝国主义联手起来了？所以当时中国就讲苏联是比美帝国主义还坏的帝国主义，叫社会帝国主义，这是一个解释。

再有，他后来想改变争夺的对象，这几个国家就不争了，也争不过来，还有一拨人，就是第三世界，比他们还穷的还有一拨人，拉着这拨人一块儿走，所以毛泽东那会儿想建立一个第三世界。他去世比较早，还没有完全搞成就去世了。然后中国就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市场经济，渐渐就走到现在这种格局。

这就是中苏关系的大致状况。过程基本上是这样，有的地方说得详细一点，有的地方说得复杂一点。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我提个头，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因为今天重点不想讲理论问题。一个同盟当中出现分歧和矛盾这个并不奇怪，所有的同盟，所有的家庭，都有这个问题，时间长了闹点儿分歧，吵个嘴是正常的。但是西方同盟没有分裂，现在北约东扩，蒸蒸日上，哪有分裂？但是你看社会主义同盟，自打建立的第二年就发生苏南冲突，苏联调了七个师要打南斯拉夫，后来没打，是因为美国的牵制。然后就是波匈事件，镇压匈牙利，出兵华沙。再有就是中苏分裂，接着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所以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部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分歧，就不能坐下来谈，就不能协调，就不

能解决，就不能化解这个分歧？关键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同盟他们之间的分歧，说来说去归结于一个利益，而利益是可以谈判的，利益是可以划分的，利益是可以分割的，利益是可以让步的，大不了多让一点就完了，他们根本的利益还是一致的情况下，这个同盟就不会分裂。但是社会主义阵营争的都不是利益，苏联跟南斯拉夫争的是利益吗？苏联进攻匈牙利是利益吗？中苏之间的分歧是利益的冲突吗？都不是。为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就一步一步让你去深入思考，把所有这些现象给它归纳一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含糊不清的，它们搞不清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不成熟的国家关系。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都是从党际关系过渡过来的，原来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双方之间也有关系，但是那个关系是党和党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之间最大的区别：

国家关系的前提是平等的。如果不平等，那就不是现代国家关系，而是殖民地是宗主国的关系，要不然就像中国原来那种朝贡体系，那个是不平等的。但是进入现代国家关系，都是平等关系，互相承认主权，联合国投票都有一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不讲主权，从来不讲平等，原则不平等，原则上就不可能平等，不可能承认你的主权。哪个国家的共产党党章上没有这一条“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就是共产党的党际关系。毛主席讲了，“总有一个为首的”，所以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关系，本质上是不承认主权的。这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别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含糊不清。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大家就明白了，七八十年代就明白了，所以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在中苏关系和解的时候。邓小平说，当年，就是《九评》的时候，我们说的都是空话。可不都是空话吗？吵来吵去是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我提出来，我写过文章，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在《中苏关系史纲》里面，完整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出来，是希望同学们也能自己思考思考，像中苏关系这么大的历史问题，这里到底包含着什么道理。用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中苏同盟的分裂解释不通，所以里面一定有一个内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恰恰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学者应该去探索的，应该去掌握的。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2011年4月在河南大学研究生院的演讲）

第十讲 中苏同盟的建立及其后果

沈志华： 今天讲这个题目，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做《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大概就是前两章的内容吧。为什么叫无奈的选择，其实我也想了很久，有人说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问题。我自己研究中苏关系有十七八年，关于中苏同盟的起源，有这么一个总结，主要就是讲中苏同盟的建立，其实本来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选择对方，是随着1945年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关系，国际上美苏的关系，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变化的过程当中，中共和苏共才走上了联盟的道路。然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过程。

我研究这些历史事件或者是一些历史人物的思想，主要依据的是中国和苏联双方的档案文献。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如果没有档案文献，一般来说这个题目是不能做的，因为它就没什么意义了，历史就存在于档案文献之中。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史料，比如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也可以做，还有一些当时的新闻或者是照片，电影等等也都是可以利用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档案，你比如现在朝鲜那么紧张，天天电视演，报纸上登，但是谁说得清楚呢，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就是猜呗，也可能猜对了，也可能猜错了。这个就不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是档案到了解密期，一般是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档案可以解密了，然后你才能把这个事情背后的运作的过程，怎么设计的，怎么讨论的，才能把它复原出来，这就叫历史研究。所以我想我今天讲的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描述这段已经发生，在六七十年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当然这里头也有一部分是推测，这个我想大家或许也能理解，就是涉及到动机的时候，档案文献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有的可以，比如美国的决策，西方的决策，因为他这个决策程序规定的，他都有那个记录在案，谁提的什么意见，为什么这么提。比如美国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还有中情局，什么国防部、国务院，都有自己的意见然后表述出来，再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辩论，最后总统拍板，这个过程非常清楚，所以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很清楚。但是苏联、中国的就不清楚了。第一，他很可能就没有记录，就我知道的有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根本不记录，当时为了保密，一个字没有。有的有记录，他现在不让看，没解密呢，所以涉及到这方面有些就得推测这个决策的动机。当然，推测就没有对不对的这么一说，只是合不合理，这是我想事先解释一下在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也便于大家听的时候知道哪些就是档案当中，我只不过把它给总结出来了，抽象出来了，但是有一些就是我根据这些史实做的一个推断，比如斯大林为什么发动朝鲜战争，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参与这个朝鲜战争，这些都是推测，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自己的那种推测，那你就要检验一下它是不是合理。所谓合理第一就是要合乎逻辑，合乎整个历史发展的逻辑，第二要合乎我们

已知的史实。如果有任何出入，说明这个推断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不太合理的。

最初斯大林并不想跟中国共产党保持紧密关系

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大概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讲就脱离了共产国际，那个时候他跟共产国际从组织关系上讲已经没有关系了，那么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了，大概有这么六七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六七年当中，非常曲折。首先一点就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并不想跟中国共产党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就是一帮农民，是民族主义分子，这是斯大林基本的观念，因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走的道路跟苏联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那么1943年为什么斯大林突然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个是和苏联战后，他要搞的外交政策是有关系的。因为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以后，欧洲战场的局势开始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在这个时候苏联和西方都开始考虑战后的国际格局的安排问题，那么苏联、斯大林主要考虑就是战后要和西方，特别是跟美国合作。跟美国合作就有一个前提，就不能搞世界革命了，因为世界革命就是要挖帝国主义的老根嘛，要埋葬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跟人家合作？所以他突然下令，就是1943年5月解散了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解散的时候，连季米特诺夫都非常吃惊，事先没有跟他讲，也没有开会商量。为什么这么急，主要是因为当时丘吉尔要去华盛顿，要跟美国商量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对共产党国家，对苏联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因为丘吉尔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我如果在战争当中过早的帮助苏联，让他把实力保存下来，战争一结束，他就会来对付我们，就会来对付西方国家，所以最好是让苏联和德国在战争当中都消耗掉，他基本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就在丘吉尔马上要去华盛顿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

在1943年11月份，美国要求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就是“二战”中美国跟日本打的这场仗，在历史上叫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就涉及到在中国的东北的100万日本关东军，当时美国人希望苏联人出面解决掉这批日本人。因为美国人估计，美国人直接跟日本人打的话，大概要牺牲100万人，他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希望苏联能出面，于是斯大林就提出来，我们打日本没问题，但是我能得到什么呢？罗斯福讲你可以提条件，当时斯大林没提，说现在还早。一直到了1944年下半年，苏联才逐步地把他们的想法告诉美国人，最后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搞了一个秘密协定，这个远东的秘密协定就反映了苏联战后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基本的战略要求，战略利益。

第一就是控制日本海，控制日本海主要就是要收回千岛群岛，南库页岛，也叫萨哈林岛，萨哈林岛南半部（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该岛北纬50岛以南部分割让给日本），这两个地方是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被日本夺去的，现在苏联要收回，收回这两个岛，就可

以控制日本海和保护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外蒙古，一定要让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看地图）这个地图没有了，再往那边去你就看，它紧挨着就是西伯利亚，就是苏联欧洲到亚洲这个连接的一条生命线。如果要是外蒙古还保留在中国的手里，那么对苏联的威胁非常大，这个边境线太长了，而且正好在它的腹部，所以要求外蒙古独立。第三，最重要就是东北，苏联要求长期占用旅顺港和大连港，旅顺是个军港，大连是个商业港口，都是长年不冻的港口，条件非常好。然后还要占用这个叫中国长春铁路，就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战后合并就叫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那么有了中长路和旅顺口、大连港，这样子苏联就能得到一个到太平洋的出海口，这个是特别重要，因为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人在经营俄国发展的时候，主要就是三个出海口，一个是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往北，出波罗的海以后跟大西洋连接，再一个就是黑海，通过土耳其海峡然后到地中海，再一个就是中国，通过中国的辽东半岛然后到太平洋。所以这三条加一起就构成了苏联在远东地区，或者在东北亚地区的基本的战略要求。

雅尔塔会议确定了苏联这个要求，当然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日本问题，对日本的要求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嘛，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但是中国是一个战胜国，也是同盟国成员之一，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得到什么利益，领土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反而出让了主权，这个怎么跟中国人讲呢？所以斯大林要求美国第一先不能跟中国人讲这个事，他说，你跟中国人一讲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最不会保密了。第二，他说你美国也帮助我去说服蒋介石，得接受这个，中国要不接受，他也很难实现他的这个目标嘛。所以，战争结束，就是欧战结束大概两个月，到6月底的时候，苏联开始跟中国人就谈这个中苏友好条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跟苏联曾经反复交换过意见，苏联斯大林一直讲，说你们要劝蒋介石，我只跟国民政府打交道，我绝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且他们也不是真的共产党。到了中苏条约谈判的时候，果然就谈不下去。那蒋介石当然不干了，谁愿意当这个千古罪人？将来历史上得留一笔，谁签的这个。像宋子文开始代表中国去的，到中间不是回来了？中间休会，因为波茨坦开会，斯大林就走了，到德国去了，然后宋子文就回来了，回来他就不去了，干脆把外交部长都辞了，他不愿意去签那个字。后来换了个王世杰，傻乎乎地去了。

在第二轮谈判的时候就出了个新的情况，就是美国扔了原子弹在日本，8月6号一扔原子弹以后，这个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原来斯大林讲的是如果中国人要不签这个条约的话我就不出兵，我看谁来收拾这个关东军，他要拿一把。结果美国一扔原子弹，斯大林着急了，万一日本要投降了就不需要苏联出兵了嘛，如果苏联不出兵，他所有的要求都很难实现，当然日本是没问题了，他能收回来，但是关于东北和蒙古的问题怎么办呢？他就没有借口跟中国人张嘴说这个事，所以8月8日他就突然下令，立刻出动，苏联红军150万人分三个方向攻击日本关东军。原子弹一扔，苏联一出兵，这个日本就顶不住了，这个时候斯大林就有点着急了，如果要是日本突然投降了，中国就不跟他签这个条约，中国不跟他签这个条约，他占领东北是问题不大，已经去了150多万人，但

是没有合法性了，长此以往下去怎么办？其实蒋介石也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苏联出兵已是既成事实，万一斯大林要赖在这不走怎么办？双方都有点担心，所以这个时候谈判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斯大林提了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让蒋介石非常顺当地就接受了这个条约。

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要签订这个条约，我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我承认蒋介石你是中国唯一的领袖，苏联绝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个蒋介石当然很高兴了，因为在蒋看来，什么俄国人、日本人这都不是心腹之患，心腹之患是共产党。所以这第一条就正中下怀。第二条也很厉害，斯大林讲，说如果你要签这条约，新疆问题我就给你摆平了。当时新疆什么事情呢？就是1944年11月7日，苏联策动新疆的少数民族暴动，然后打垮了政府军，到1945年8月的时候，民族军已经马上要拿下迪化了——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人家“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也成立了，那“国徽”也挂出来了，“国旗”也出来了，整个新疆北部已经独立出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么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条约能把新疆局面稳定，能把新疆收回来，对于中国来讲当然也是一个幸事了。因为外蒙古不管怎么讲是一匹死马，外蒙古实际上当时已经独立了，只是名义上主权还在中国，从1921年中国就完全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都在苏联的控制下。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如果要是中国签了这个条约，苏军三个月以后撤军，否则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日子撤了，所以这三个条件都很诱人，蒋介石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况且他自己也很着急。那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签订了。条约一签订，也就确定了能够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的，就是跟国民政府签订的这个条约，所以苏联必须要保持跟蒋介石的友好的关系，否则的话谁来保证他的利益呢？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共产党并不重要，共产党不但不能保证他这个利益的实现，反而可能会起反作用，可能会破坏苏联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曾对美国寄予极大希望，认为美国是学习的榜样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毛泽东的选择，其实毛泽东也没有选择苏联，也没有选择斯大林。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时候，最高兴的就是毛泽东，三呼万岁，可算自由了，原来都在苏联的领导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很多重大的事情对错咱们不讲，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决定，最后苏联一道指令你必须改。西安事变是这样吧，中共支持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本来的主张是要公审嘛，这是共产党的宿敌，你想想。结果《真理报》大篇文章的讲张学良是大汉奸，中共怎么能跟大汉奸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嘛，最后弄得没办法，只能跟蒋介石谈判，后来张学良也给软禁了。皖南事变也是，蒋介石设计消灭了新四军主力，叶挺他们也被俘了。毛泽东听说以后非常愤怒，召集政治局会议，说一定要大举反攻，不惜跟顽固派撕破脸，一个是公开批判蒋介石，再一个是军事上全面反击顽固派。政治局做了决定以后，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罗夫紧急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说谁让你们这么干的？你们还要不要统一战线了，还要不要抗日了？不能这样，这个不合适，回去要改。毛泽东不得不又开会，说同志们，咱们这个决议错了，咱得改。为什么？苏联不同意。所以到1943年这个共产国际一解散，毛泽东非常高兴。

那么到1944年的时候，当时在延安地区，解放区，那时不叫解放区，叫特区，中共八路军就开始跟美国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美国派了一个军官团到延安访问，前前后后小一年，从1944年夏天一直到1945年春天。谈了很多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跟美国人，现在美国把这个记录都给解密了。中国是不是烧了，不知道，听说是延安撤退的时候都给烧了，反正中文的记录我没有看到。但是美国有，因为美国人每次谈完了都有电报发回国务院，后来，到现在，所有的谈话记录都解密了。从这些谈话里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当时对美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跟美国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就这句话，美国人印象非常深，马上打电报回去说毛泽东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中国人才重要，所以中国共产党真的就是民族主义。在西方的概念当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俩概念，因为共产主义不要国家利益，不要民族利益的，是要求世界革命，搞世界大同，要消灭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民族主义是从国家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所以他跟西方是可以合作的，是可以谈判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在英文里头把国民党就叫民族主义分子，共产党叫共产主义分子，所以美国人理解毛泽东的话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所以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后来，毛泽东的讲话就越来越明确，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搞的所有的政策没有一样是美国企业家不能接受的，我们的根本目的和美国总统林肯一样，那就是解放黑奴。美国人一听，是啊，没有什么区别嘛，而且毛泽东还讲，说美国不但经济发达，政治也很先进，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将来能够帮助中国的只有美国。美国这批人，主要是在华的当时的外交官，很多年轻的像谢伟思、戴维斯这些人，他们都是传教士的儿子，从小在中国长大，对中国的国情也比较了解，他们比较倾向共产党，包括当时美国的大使高斯也是对共产党印象不错。那么这些军官团的军官来了以后，看到延安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官兵一致，艰苦朴素等等，他们写的报告都非常好。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可能是中国的一支比较有生气的新生的政治力量，可以将来跟国民党竞选的，这样子就能实现美国人的价值观，就在中国实现两党制，把共产党扶起来，共产党、国民党两党轮换制，这是当时至少在华的这一批美国人，大概有这么一种倾向。所以越到后来我看毛泽东和周恩来就越兴奋，甚至谈到1945年1月要去到华盛顿访问。周恩来还说，说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在延安建个领事馆——这样办签证就方便了嘛。

但是，所有这些报告到了白宫都被束之高阁了，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右倾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特别在议会，反共势力比较强大，他们怎么看中国共产党还是不顺眼，再加上国民党院外集团在那游说，所以在国内，对在华的这批外交官反而有了很不好的印象。当时史迪威跟蒋介石矛盾冲突也很大，史迪威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是他跟蒋介石意见经常发生冲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认为美国租界物资到中国你不能光给你的部队，八路军你也得给，八路军也是国军，也是抗日的部队。这个蒋介石就不干了，说美国的租界物资到中国归我管，别人没权过问，我想给谁给谁，这不俩人就吵吵起来了。当然还有滇缅作战指挥权等等一些冲突。结果后来罗斯福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他只能依从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当时要辞职了，说你这么干我就辞职了，你自己来吧，看你怎么折腾中国。当然美国人也不敢，所以派了特使来，赫尔利来了，赫尔利是比较反共的，比较右倾的，最后把美国大使高斯给撤了，那几个年轻的外交官也给撤回国了，有的最后被逮捕，然后送上法庭，说他们是共产党间谍，给判了刑。

这样子，到了1945年的春天的时候，毛泽东对美国人开始失望了，觉得美国人不行，说了半天，好话说尽，什么事也没干，所以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又回过头来，你看七大那个总结报告，毛泽东怎么讲的，说同志们，其实苏联也是我们的朋友。但是苏联还真没拿他当朋友，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苏联在战后的基本战略利益的保证，得通过国民政府才能实现。日本一投降就出了个事，就是8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就是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军队都在什么湘西，都在云南，都在四川，那整个华北平原、华东地区不是沦陷区就是游击区，离得最近的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所以当时毛泽东特别兴奋，连下六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向大中城市进军，马上在当地接受日军投降，立刻占领上海、南京，让新四军包围上海，然后这边鼓动上海工人起义，里应外合拿下上海。让粟裕赶快进军南京，地下党已说服周佛海投降，然后拿下南京。只要上海、南京一拿下，半个中国就是共产党的，然后跟国民党再谈判。共产党甚至任命了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还有江南五省省长。所以蒋介石就着急了，在山上看着，就

是下不去，他军队运不过去嘛，所以只能采取缓兵之计，给毛泽东写信：润之兄，中国的未来就在你我之间，请你上山咱们谈谈。美国人也写信，魏德迈——后来替换史迪威那个将军，也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没搭理他们，命令八路军、新四军赶快采取行动。这个时候，8月20日左右，斯大林来了封信，说不行，你所有的命令马上撤销，立刻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你要以合法的手续，合法的手段来参加政府，不要搞武装斗争，因为搞武装斗争中国就会内战，中国一打内战就完了，中华民族就要灭亡了。

所以8月23日，政治局讨论了一天，怎么办？最后还是屈服了，苏联的意见，那当然得听。实际上他也遇到一些困难，在接收的时候，比如蒋介石命令所有日军只能向国军投降，不能让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另外又跟周佛海，跟汪伪的军队勾勾搭搭，所以实际上也很难实现，就是采取军事手段也不是那么顺利。再加上斯大林这个电报，最后毛泽东没办法，就撤销了原来的命令，就退出，也不是退出，就放弃大中城市，小城小城镇能占则占，不能占就算了，咱主要还是在农村待着。毛泽东这边去了重庆，然后刘少奇开始重新计划，就是抢占东北，因为东北是个好地方，背靠苏联、朝鲜，这边是蒙古，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好的地方，所以决定就抢占东北，关内就缩小，建立点根据地就算了。但是在东北，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就是苏联军队是8月进入，一直到1946年的5月撤出，在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苏联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实现他的战略构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里头有那么一条，就是苏军三个月之后撤军，撤军以后把主权交给国民政府。所以从苏联来讲，不敢明目张胆把沈阳、长春等一些大城市交给中共，因为不是政府的军队。但是，他如果要是跟国民党谈判谈得不好，因为他在整个东北还有很多问题要跟国民党、国民政府处理，比如他要求东北第三国不许来，不许参与东北的投资，什么都不行。而且苏联投资，苏联的股份要占到51%，这些当时蒋经国去谈的，谈得非常艰苦，所以苏联人在需要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启动一下共产党、八路军，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你轰走。所以你看，关于东北内战时候的很多回忆录，这个说法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苏联对我们多好，我们到了苏联以后把仓库打开，服装、枪支弹药任你拿。有没有这事？有。但是也有到了东北就被缴械了，苏联就给缴了械，而且东北局到了沈阳以后，被苏联司令给轰出来了，说你要不走拿坦克把你赶出去。为什么？共产党不能进城，距离沈阳50公里以外，你爱去哪去哪，反正不能进城，因为这个城市他是要交给国民政府的。

国共内战斯大林作壁上观，三次拒绝毛泽东访苏请求

到1946年5月之前，苏联就是需要中共的时候就用他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甩在一边，成为他在外交上的一张牌，主要精力还是要跟国民政府打交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刚才我说的他在远东地区的这些设想。一直到苏联要撤军了，他这个谈判都没谈成，但是由于国际压力，他又必须撤了，这个时候他才跟中共讲，说你们可以接管所有的大城市，我们要走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指望国民党了，国民党都谈不下来了，所以他希望如果中共能够控制东北，那是最好的，他再控制中共，都是共产党好说话嘛。所以跟毛泽东讲说，现在你可以占沈阳了，长春我也交给你，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全是你们的，但是为时已晚，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早已经进入东北了，那新一军、新六军马上就到沈阳了。四平街那一仗，明摆着打不过人家，林彪那么能打仗也不行，他的部队就是不行。所以说，沈阳中共都没敢要，说不去了，就交给国民党了，长春倒是进去了，没几天，一看这架势不对，就撤出来了，怕被人包围，最后一直撤到松花江，这才稳住脚。当然南满留了一块根据地，因为南满你看地图能看出来，邻接着一个是大连，一个是朝鲜，朝鲜那会儿其实也是在苏联控制下，所以这个南满的部队打不过就往朝鲜跑，国民党就不敢追。

这个时候，苏联是真的想帮助共产党了，但是毛泽东已经对苏联很不相信了，我那个书里写的比较详细，因为他翻来覆去好多事，毛泽东都给弄烦了，不知道斯大林到底是想干什么。所以苏联撤退了以后，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口号，要建立东北自治共和国，当然也是顺从了苏联的意思，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当时美国人也劝蒋介石不要去东北，为什么呢？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美国人承认苏联在长城以北的势力范围，所以美国人也曾经劝过蒋介石就算了，东北丢了就丢了，但是蒋介石不干，这“二战”刚打完，这么大一块地成中共的了，所以蒋介石不干。国内战争这样就打起来了，至于苏联给中共的帮助到底有多大，这个争论非常大，但我个人看法，我觉得内战取得胜利，主要还是靠中共自己的力量。从军事上说，苏联撤退的时候确实留了很多武器，但都是日本关东军的，这些东西要跟美国运来的武器相比，那可就差远了。当然到底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现在没有具体的材料，也没有统计数字，中国没有，俄国现在也没找到。我大体认为，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肯定没有美国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援助多，因为他租借物资这个数量非常大，而且武器装备的质量也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在中国内战开始的时候，中共跟苏联没有什么正式关系，不要说结盟的意向，甚至没有建立公开的直接的关系。苏联也非常避讳这个问题，暗地里当然希望中共能帮他一把，中共也希望苏联能帮他一把，但是公开的关系是没有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1947到1949年，在这个时期苏联基本上是采取坐

山观虎斗的态度，这个跟美国差不多，美国是等待尘埃落定，现在看不清形势，到底跟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看不清，咱们就都先不支持。还有一点，美国文件里面也这么写，就是美国人说为什么他不跟蒋介石结盟，我不能直接支持你，援助你，因为我要援助你，苏联就援助共产党，那就不是你们俩打，是我们俩打了。苏联跟中共也是这么解释的，说我们不能公开支持你，我们公开支持你们，美国就公开支持蒋介石，那不成美苏在中国打仗了。所以在1949年，这个局势明朗化之前，美国和苏联都躲在后边，我看了那个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他有一个目录，194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或者做出的决议一共有400多个，差不多一天得做一个多决议，涉及到中国的几个？四个。1946、1947、1948年都是五六个，就这么几个，而且还都是跟政府有关的，比如新疆的石油问题，什么东北什么，都跟国民政府有关的，跟共产党的几乎没有。一直到1949年，突然就上升了，一下就有70个决议涉及到中国问题，到1950年那就更多了，不算朝鲜战争，就120个决议。所以你从这个苏共中央做的这个决议就可以看出来，在苏联眼中，中国问题的分量，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重点不在这儿。包括1947年冷战爆发，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时候，那个报告提到中国共产党就一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还有希腊共产党，他们也在开展革命斗争，完了，没了。中国内战当时打得多厉害，不提，那个时候的主要关注在欧洲，所以1947、1948年毛泽东三次要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让去。1947年春天，开始苏联答应了，说你来一趟吧，我们派飞机去接你。然后八路军赶快在山西一个县的打麦场，铺平了，弄了一个简易的机场，飞机就落这儿吧。什么都弄好了，斯大林又说别来了，你太忙，先忙你的吧。

到1948年5月，毛泽东又提出来，说我今年必须得去莫斯科，因为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要取得胜利了，取得胜利以后我们究竟怎么办，我要跟斯大林商量，我要向“大老板”汇报。斯大林说那行，你来吧。这边毛泽东准备了四大木箱文件，买了新帽子、新大衣、新皮鞋，什么都准备好了，斯大林突然来个电报，说还是别来了，我们这个政治局委员都要下去收麦子了，莫斯科没人。就是躲着毛泽东呗，所以毛泽东气坏了，说我就不相信苏联收麦子比中国革命的命运还重要！他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11月20日，那时你再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忙过了，有空闲了。其实，斯大林就是摸不准中国局势的变化，还不定会怎么着，毛泽东到莫斯科来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他怕惹麻烦。结果毛泽东那就等吧，等到11月19日了，还没消息，毛泽东自尊心受不了了，所以他先发了个电报给斯大林，说明天20日，原来约的20日我不去了，说我太忙。所以你看，其实就是这样，在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没有真的下决心和对方建立一种关系，毛泽东这时候倒是有这个想法，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毛泽东越接近胜利的时候，心里越没底，他不是说打天下没底，他是坐天下没底。

辽沈战役结束的时候，我看到林彪和高岗联名给斯大林发一个电报，就谈论一件事，就是请苏联顾问来帮助管理沈阳，因为突然占领这么一个大城市，他没见过，共产党几十年都是在农村，分个土地，斗个

地主，非常在行，但是一进大城市就晕。你看那个专家名单，100多名专家，各行各业，什么都有，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国民党留下的人他都不敢用，这个我看陈云、周恩来他们跟苏联大使都有谈话记录，都讲的是说这些人不敢用，不可靠，怕他们破坏革命，怕这个技术员给你破坏一下，把机器给你弄坏了，还是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其实很多事也不是这样，你想刚解放的时候，北京发生一次大爆炸，当时就是按照反革命破坏追查的，最后实际上就是安全操作违规，跟那没关系。主要就是过去的官吏也好，技术人员也好，都不敢用，新的无产阶级的专家又没有培养出来，怎么办？只能靠苏联人，靠苏联专家。

斯大林答应全面帮助中共，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

中苏同盟到1949年的时候就开始加快了建立的速度，这个主要因为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因为1948年12月28日，苏联驻华大使馆给斯大林发了一个长篇的情报评估报告，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他们认为，那个时候解放军已经打到长江边上了，说话就要过江了，所以苏联大使估计说，现在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但是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很大，比如他们要扶李宗仁上台，然后促进国共和谈，以此来掌握中国的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斯大林就有点着急了。为什么呢？就是出了个问题，本来原来设想的是，长城以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现在共产党已经打到长江边上，那么整个北方都是共产党统治了，能不能打过长江是另一回事，但是长江以北全是中共的天下。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人要插手，跟中共要是挂上钩怎么办？苏联大使馆那个报告里面说，据悉，美国人正在秘密和中共接触，斯大林就更着急了，所以苏联这个时候必须要关注中国问题了。

恰在这时，提出了国共和谈的问题。就是1949年1月8日，国民政府发出了照会，要求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大国调停内战，国共和谈，于是斯大林就抓住这个机会。1月8日接到的照会，1月10日他就给毛泽东发了个电报，说我现在接到了国民政府发的一个照会，要求四大国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他说，你是知道的，苏联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中国需要调停的话，只有苏联有资格，美国他们在背后捣鬼，英国他们都不行。但是最终这个态度要取决于你，中共掌握着主动权，国民政府是跟你谈的。所以他说，如果有人要问你，你应该这样答复他们……他就替毛泽东起草一个回电，就刚才我说那个意思，什么苏联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是如果需要调停只有苏联有资格，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就给毛泽东发过来了。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是最讨厌人家说和谈的，我这跺跺脚就过了长江了，过了长江天下就是我的了，谈什么谈。所以他就给斯大林回信，说和谈这个问题已经嚷嚷了很久，他说那是美国人和蒋介石的阴谋，是人都看得出来，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要谈，我只跟下边将领谈，傅作义、程潜，这个我可以谈，就是让他们投降嘛。

所以你应该这样回答国民政府——他又给斯大林起草一个回电，弄得斯大林很下不来台。那么多年了，哪有这样的，都是他指挥别人，这个毛泽东也太厉害，居然替我起草了一个回电。斯大林又发了一个电报，他说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非要你去和谈，我只是说，这个和平的旗帜你要抓在手里，不要被别人利用了。他说，你完全可以提出让对方不能接受的条件，这样谈谈不成，要打你还可以打，但这个时候你就有理由了。说了那么一番话，铺了个台阶。毛泽东一看，也就下了台阶，既然这样，那我和你的意见是没什么区别的，其实我早就提出这个停战和谈的条件了，八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惩办战犯，

第一个战犯就是蒋介石，第二个就是李宗仁，我想他们一定不会接受的。后来他们俩来来回回，斯大林又来电报，这样咱们俩没有什么争论的怎么怎么样。最后，15日斯大林说，算了吧，你也不用来莫斯科了，斯大林很生气嘛，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怎么这样，说你不用来了，我派人去吧。

所以1949年2月，米高扬就到中国来了，到了西柏坡，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和米高扬前前后后谈了十二次，这十二次会谈记录也都公布了，也都解密了，所以你看，当时有俄国档案，中国还是没有，如果有，其实应该解密，因为很多谈话，要双方对着看才比较准确，因为俄国人有时候记录不全，翻译也不准。讲的什么意思呢？我看了这十二个谈话记录，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向苏联表示，说我们将来要走的道路就是苏联的道路，我们将来什么外交政策，什么国内政策，我们都要向苏联靠拢，接受苏联的领导，按照苏联的方式什么什么，基本上讲的都是这种话。你像毛泽东讲说，我就是斯大林的学生，至少说了有三遍。但是米高扬基本上没有讲话，因为他就是来听，其实斯大林让他干吗来了，就是你看看这帮人究竟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到底跟苏联是不是一条心，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十二次谈话前前后后大概有七八天，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什么都谈到了。回去一汇报，斯大林非常满意，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对中国到底什么态度，因为米高扬基本上不讲话，他说我来就是作为代表来的，斯大林同志让我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的想法，所以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6月秘密访问莫斯科。

在这个时候，解放军就已经过了长江了。解放军一过长江，美国人做了个决定，这个大使留在南京没走。说要留一条线索，看看中共怎么夺取这个政权，然后将来伺机能够建立一些关系，后来美国国务院就批了，说那你就先留着吧，别走了，结果他没走，英国、法国等几个西方国家大使都没走，国民政府迁广州去了，只有苏联大使跟着走了，西方这几个大使全留下了，就是要看中共。周恩来一得到这个消息，他也觉得有点意思，就找黄华（因为黄华原来在燕京大学上学，是司徒雷登的学生），说你就到南京市委外办去负责这件事，跟这个司徒雷登接触；还通过别人传话给司徒雷登，说你可以到北平来一趟，如果你到了北平，中共中央会接待你。

这个事情过去史学界争论特别大，就是说中国是“脚踩两只船”，说共产党这会儿“脚踩两只船”，不知道这边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这边跟美国保持一种关系。当然现在随着这个材料越来越多，看档案文献，其实他也不是这样，留着这条线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退路，就是万一跟苏联搞不好，不能把话都说绝了，但是从现在看到的材料上，其实他基本上已经决定要跟苏联建立一种特殊关系，跟美国（保持联系）只不过就是不要把事情做绝。

司徒雷登当时也比较谨慎，又有些傲慢，他也没有太看中这件事，一直到6月23日。6月23日的时候，司徒雷登给中共中央传了个话，说他

要回国了。这个时候黄华就给周恩来发了个电报，说司徒雷登说他要回国，那么在回国之前是不是要提醒他一下我们曾经邀请他上北平的这件事。当时周恩来就犹豫，就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是毛泽东亲自在电报上加了一笔，说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告诉他，还有北上来跟中共谈判的这件事，就提醒司徒雷登，所以司徒雷登一看到这个，马上给国务院打电报，说现在中共邀请要去北平，去还是不去？

这时国务院还没有答复，那么回电他说的很含糊也很傲慢，他说我们要去是可以，但是你得答应我的条件：第一，不坐火车，我只坐飞机去。第二，我只坐美国的专机去。你们同意不同意，这就耗时间嘛，等家里答复嘛。这是哪天呢？这是28日。但是就在前一天27日，刘少奇就到了莫斯科，而且刘少奇一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早就准备好了，你看6月27日他们俩会谈，看这个谈话记录，斯大林说少奇同志，你到莫斯科有什么事情吗？刘少奇拿出一个大单子，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要钱，要枪，要炮，要钢铁，要海军，要空军什么什么，一列。斯大林马上回答，这个我全给你准备好了，一件事一件事给他说，这个钱给你多少，枪怎么回事儿，海军办军校，包括上海排雷等等好多事，苏联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个刘少奇一看当然高兴了。斯大林是你要什么就给什么，不要的都给。刘少奇那个单子里面没有新疆问题，是斯大林主动提出来的，说这个新疆你们怎么不赶快占领，说新疆又有石油，又有棉花，都是战略物资，刘少奇说我们倒是想去，可怎么去？大老远的，那好几千公里呢，我们又没有这个交通工具。斯大林说这个怕什么，汽车我给，我还可以提供飞机嘛，你们可以坐飞机去。

后来一野的部队进疆，一个军全坐的苏联飞机去的。所以28日早晨刘少奇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心里就踏实了，这斯大林表态了嘛，要什么给什么，这还不是表态了，这事就着实了。正在这会儿黄华的电报来了，说司徒雷登什么又要坐飞机，又要坐美国的什么专机，毛泽东拿过来又批了一笔，告诉他爱来不来，来了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跟着两天以后发表一边倒的宣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

到了7月1日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露了中共的这种态度，从政治的角度上看，中苏结盟是没有大问题了。双方都需要对方，中共肯定需要苏联，没有苏联的帮助，拿天下问题不大，但是坐得住坐不住就难说了。所以越是在接近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越感到需要苏联的帮助。对斯大林来讲，他也是这样，眼看中共要占领全国，能不能拉住中国那就要看他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来一个大转弯，全面援助中国。你看这个苏联档案就能看得非常明显，1949年4月以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不管是金额还是项目，一路上升，而且过去从来不通过政府做决议，现在部长会议主席也做决议了。部长会议做决议，就说明他这个行为带有政府性质了，带有公开的性质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双方还没有解决，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夺取了这个全国的政权，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会不会继承1945年那个条约呢？这个斯大林心里没底，因为苏联的利益都在那个条约上，1945年的条约才能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他就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会怎么想这个

事，说毛泽东你要继承原来那个国号，这个问题不大，是吧？你中华民国换个总统而已。这玩意儿你要不继承，新开一个国号，就不好讲了这个事情。最早，当然毛泽东其实心里也在想这个事，他也在琢磨斯大林会怎么处理，所以1949年2月的时候，双方就开始摸底，就看看你怎么想。你看毛泽东怎么讲这个话的，有一次，大概2月2日，谈到将来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怎么管理的问题，毛泽东突然冒了一句，他说中国共产党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当时是为了革命，因为我们要革命嘛，革命就是要推翻旧的统治，那么旧的统治、旧的政权越分崩离析，我不是越容易取而代之吗？是吧。但是我要真的取而代之了，你们都分出去那哪行，那我管谁去。所以毛泽东说，但是，现在革命成功了，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为了蒙古民族的统一，是不是能够让外蒙古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把这事提出来了。当时米高扬答复，说这怎么可能呢，外蒙古已经公投了，宣布独立了。然后他就赶快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一听，立刻写了一个回电。

这个斯大林比毛泽东还聪明，斯大林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现在有很多人在谈论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他们想把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说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对中国不利嘛。当时我看在旁边谈话的那个谁，好像是任弼时，说不可能，不可能，说我们内蒙古300万人，外蒙古100万人都不到，要统一肯定是他们统一过来。但是毛泽东听懂了，说咱们就别提这个事了，你再提这个搞不好内蒙古再出去，所以毛泽东就把旁边的人给拦住了，一摆手，哈哈一笑，说中国共产党以后再也不提蒙古问题了，这事就过去了。但是任弼时还没有搞清楚，蒙古问题苏联态度特别强硬，这个毛泽东心里明白了，但是这1945年的条约能不能动动呢，他不知道。所以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又提出这个问题，7月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有一个书面报告，很长，其中有一段就是讲中苏关系，说到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面是这样写的，说中共中央考虑有三种办法来处理：第一，宣布废除，另立新约，其实这就是中共的想法。第二，宣布保留，中共新政权继承这个条约，这就是斯大林的想法。第三，暂时保留日后修改，这就提出一个妥协的办法，三种。请问斯大林同志，您同意哪一种？我看那个报告上斯大林画一个大圈，这个问题等毛泽东同志到莫斯科来再谈。没谈，刘少奇就回来了。所以毛泽东就心里打鼓了，说这么个大事，还是尽早解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毛泽东就开始策划去莫斯科，去之前，他还是在试探斯大林的底牌，给他写信，说这次我要去了，我要去一方面给你祝寿，另一方面我想跟你谈谈这个同盟条约的事，你看怎么样。斯大林没有答复他，过好几天斯大林不回电，他让驻苏联大使又转弯跟苏联人讲，说这次主席来，就是要谈同盟条约的事，苏联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他就说，你要是同意谈判我和周恩来我们俩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同意谈判我一个人去，你就告诉我是我一个人去，还是我跟周恩来一块儿去。苏联还是没答复，所以毛泽东到莫斯科之前他不知道这次去能不能谈这个事，谈成什么结果都不清楚。

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乘兴而去但遭遇冷落

毛泽东就只能只身前往，带着陈伯达、汪东兴就去了。12月16日到了，当天晚上就跟斯大林举行了会谈，一谈就谈崩了。你看那个会议记录，毛泽东上来就问，说我来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认为关于1945年的条约……这话没说完，斯大林就打住了，说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必须保留，然后就开始解释，什么涉及到雅尔塔体系，日本问题，英国问题等等说半天，这毛泽东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折腾来折腾去，谈来谈去，快谈完的时候，毛泽东又突然提出来，说斯大林同志，你看周恩来同志想到莫斯科来一趟，你看行不行。斯大林想，又来了嘛，说，你找周恩来有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反正不找他。所以毛泽东回来以后立刻给刘少奇发了个电报，他说今天跟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不好，说斯大林态度非常强硬，这件事以后怎么办，请你和在京政治局委员商量一下。两天以后刘少奇回电，说我们商量了，既然苏联态度这么强硬，就算了，以后就不谈了，给他祝寿完了你就回来吧。

祝寿的时候，斯大林七十大寿，来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国家的，这个斯大林把毛泽东地位抬得非常高，毛泽东是跟斯大林两个人站在中间，旁边是苏联的政治局委员，再旁边才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以毛泽东地位非常突出。当然他也是最大的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了，除了苏联，中国那会儿是最大的一个共产党。但是就是不跟他谈实质问题。所以庆祝会开完了，各国领导人都走了，毛泽东不走，每天给斯大林拨电话，说要跟你谈，斯大林开始躲着，后来说算了，谈一次吧，24日谈吧。对这次会谈结果，毛泽东寄予很大希望，又给刘少奇发个电报，说斯大林同志终于同意和我谈了，估计这次就有结果。没想到24日那次谈话——这个谈话记录现在没有看到，只是看到当时的翻译《师哲回忆录》里讲，谈了日本问题，什么朝鲜问题，越南问题，扯了一圈，就是没谈中苏同盟条约的事，然后就散了。这下毛泽东气坏了，就待在屋里不出来了，原来安排的什么参观地铁、集体农庄，不去了，头疼，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斯大林着急了，说毛泽东你怎么能这样呢？现在英国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王稼祥想了个招，就是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来出场，因为毛泽东跟他说病了嘛，既然病了，就以这个笔答的方式，后来是1月2日登在《真理报》上了。毛泽东是怎么答的，人家记者问，毛先生，你到莫斯科来干什么了？意思是人家祝寿完了都走了你怎么不走。毛泽东答，我到莫斯科来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以外，还要和苏联政府讨论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一下就把这个事给公布出来了。第二句话，人家记者问，那您什么时候走啊？毛泽东答，那就看谈判的结果了——谈不好还不走。当天晚上斯大林就派莫洛托夫来见毛泽东，说斯大

林同志答应废除1945年的条约，跟您签个新条约。这下毛泽东满意了，一个电报打回去，周恩来，马上准备，五天以后到莫斯科来。然后他就去参观了，什么冬宫了，去看芭蕾舞了，剩下事不归他管了，就是周恩来的事了。

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想到，斯大林在这个半个月的期间可没闲着，因为路上就得走十天嘛，你想想。1月6日苏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委员会，把这个新的条约从头到尾整个搞了一遍，包括中苏同盟条约，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贷款协定，专家协定，商贸等等，一共十三个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协定，基本上照抄了1945年那个条约的内容。所以到周恩来到了以后，1月23日双方一谈判，苏联把那个文本往桌上一放，这中国人才愣了，这不是还是1945年那个吗？就是换了个名字嘛，所以毛泽东就很生气，给扔了，告诉周恩来咱们自己搞一个。原来那个条约是讲中长路双方共同占有，共同经营，但是这个管理是由苏联管中国长春铁路，整个旅大地区是苏联租借区（条约区），旅顺港是苏联租用三十年，军港，这是1945年的。那么1950年苏联改的，除了把旅顺港三十年改为签订对日和约以后归还，其他的基本上没动。

那么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协定是什么呢？就是此协定签字之日起，苏联立刻归还大连的行政权，和所有的，无偿归还所有的财产，然后，对日和约签订到1952年底，苏联要无偿的归还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港。因为对日和约能不能签订，什么时候签订，谁也不知道，所以中国又加了1952年底，就是两年以后，你就得都还给中国。1月26日，中国就把这个方案交给了苏联，译成俄文，斯大林看完了以后气坏了，我看了斯大林批的那个文件，翻译成俄文给斯大林，一共四页纸全是横杠，要不然就是叉子，不是叹号就是问号，没了，就剩三行字，最后签了个字，斯大林，不同意。

但是1月28日，就是两天以后，当苏联把这个修改完的文本交给中国的时候，所有修改的痕迹都没了，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就改了几个字。为什么？这个旅顺、大连港，就是关于东北的这个协定，其实是最核心，就是苏联在远东最核心的利益，就是这个协定保证的。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还会同意中国的这个方案呢？主要是美国人在这里头起了作用。因为美国——刚才我们一直没讲美国的态度，在国共内战的时候，美国就是奉行一个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那么到1949年底，这个尘埃已经落定了，是不是？国民党12月8日到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个中国大陆已经被共产党占领，再清楚不过了，那美国怎么办？其实美国原来一直两种意见，军方是想支持蒋介石，但是国务院就是要坐山观虎斗，看最后结局再说，你不能过早出招。

那么到了1949年底，现在出了个问题，毛泽东已经到了莫斯科了，所以这个艾奇逊就提出一个想法，说军方要支持蒋介石，保护台湾，是非常愚蠢的想法，为什么呢？他说你得想想美国的敌人是谁？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人，是俄国人，如果美国在远东，把他远东的力量这个兵力

财力都来对付中国人，让苏联人坐山观虎斗，咱们傻不傻。所以他说美国现在政策的出发点是分裂中苏，不能让中苏结成同盟，就是你得把共产党拉到我们这边来，或者最少你也让他保持中立。这个美国总统一听，说有道理，这想法比较合理，但怎么办呢？现在毛泽东都已经去了莫斯科了。艾奇逊说这很好办，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他说现在毛泽东最想要的就是台湾，你把台湾让给他，他一定对美国感恩戴德，他就不会跟斯大林了。他说苏联给了中国什么？中国土地都是俄国人给弄去的。杜鲁门说有道理，但是怎么告诉毛泽东呢，毛泽东已经写了《别了，司徒雷登》，在中国也没有美国的代表了，没有渠道。杜鲁门说我来吧，1月5日杜鲁门发表公开声明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内战的继续，跟我们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艾奇逊还怕他没说清楚，过了几天，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又发表一个长篇讲演，讲什么，讲中美友谊史，自古以来中美的关系多好多好，在多么困难的时候美国援助中国，说美国在中国没有租界，你看列强在中国都有租界地，有美国的吗？没有，“二战”的时候谁帮助中国的，不是我们美国吗？还有什么租借物资、远征军等等。

中国同胞，你们再想想，谁在欺负你们，东北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哪去了？外蒙古谁给鼓捣出去的？还有新疆谁在给你们捣乱？公开发表的，所以这个斯大林一看，气坏了，立刻把毛泽东叫来，说艾奇逊这个讲话你看过没看过，毛泽东说我还没看到。斯大林说我都给你翻译好了，你赶快看。除了这些，美国还到处散布谣言，现在美国档案都解密了，当时他们怎么去散布谣言，这个艾奇逊给美国驻法国大使发个电报，说鉴于毛泽东现在被困莫斯科，你要通过适当的渠道散布如下消息，第一就是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第二就是斯大林向毛泽东要几个战略城市，什么天津、青岛，中国不给，所以谈判陷入僵局。第三就是向中国要300万劳工什么什么，中国现在拿不出来。还有最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长期不在国内，朱德跟刘少奇打起来了，什么刘少奇是亲苏的，朱德是亲美的，到处散播流言蜚语。所有这些，包括苏联当时也收集到很多情报——包括从中国上海，什么民主党派对苏联不满等等，所以斯大林受到很大的压力，他就面临一种选择，或者接受毛泽东的方案，或者让毛泽东空手而归。如果让毛泽东空手而归的话，那自然美国计谋就得逞，所以面对这样一种被迫的选择，斯大林只能吞下这个苦果。

中国出兵朝鲜后中苏同盟才真正建立起来

那么这样中苏同盟条约是签订了，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斯大林对毛泽东是极其的不信任，说这人太难对付了，过去老说他是亚洲的铁托，他比铁托可厉害多了。你想想，1948年苏南冲突的时候，斯大林就是让铁托到莫斯科来一趟，谈个话，缓和一下气氛就完了，铁托没做什么事，就是瞒着斯大林要往阿尔巴尼亚派了两个师。结果铁托是死活不敢到莫斯科去，去了被扣下怎么办？毛泽东胆多大，来了就不走了，而且逼着他签这么个新的条约。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我仔细看了后边所有的档案材料，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苏联的谈判，整个外交谈判全部翻盘。原来答应给中国专家的，就是派到中国的苏联专家，所有的费用中国只负责给他相当于中国的同等人员的工资，其他的所有费用都是苏联自己承担，现在都改了，全部是中国承担，还有什么汇率的问题等等，就是苏联做了很多手脚，原来条件都非常优惠，后来都不行了，心态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也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发动朝鲜战争。我们刚才讲的是1月28日斯大林把这个中国条约文本批回来了，30日他就突然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他的计划，但这件事要做得非常周密，请他到莫斯科来，我与他当面谈。两天以后，2月1日又发了一封电报：我昨天说的那件事十分机密，不得告诉任何人，括号——包括中国人。

从1949年3月金日成就想发动这场战争，就想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祖国统一，但是斯大林一直捂着，一直不同意，但是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突然开了绿灯，为什么？下边就是我的推断。我分析，必定和中苏同盟条约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文件到1949年底的时候，斯大林还在责骂苏联大使，说你们没有把朝鲜的事情管好，现在朝鲜出乱子，不能让他酿成大祸，一直在压制这个金日成。一个月后，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那么你就要仔细想一想，这一个月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就两件事，一个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逼着他签了一个条约，再一个就是美国公开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说，不就是这两件大事嘛。所以我判断这件事必定跟朝鲜战争有关。这个关联在哪？就在出海口和不动港上，因为看地图可以看出来，如果苏联失去了辽东半岛，那么能够替他们在亚洲保留一个出海口和不动港的就是朝鲜半岛，就是南朝鲜。这个苏联人早知道——不是苏联人，是俄国人，尼古拉二世的时候，俄国的考察团就对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进行了水文地理的考察，最后写报告给尼古拉二世，说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都可以作为俄国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都有不动港，就是看您选择哪一个了。后来沙皇御笔一批，选了大连，名字都是尼古拉二世给起的。所以到这个时候，辽东半岛要是失去的话，那么用朝鲜半岛来顶替辽东半岛的这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谁都能想到。其实1945年9月，苏联外交部也给斯大林写过报告，也是讲朝鲜半岛几个港口的重要性。

如果到1952年要是中国逼苏联太平洋舰队撤离了旅顺港，南朝鲜就可以替代，但是万一不顺利怎么办？万一不顺利，真的在战争的这种状态下，中国一定会把苏联海军舰队留在旅顺，对不对？因为中国没有海军，你能让他走吗？他走了，旅顺港不就空了吗？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运输线的问题，就是中长路的问题。所以2月2日，米高扬找了周恩来，说要签一个补充协定，什么内容？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有战争的危险，苏联军队可以无偿地使用中长路，后来经过谈判周恩来也同意了。那么这样子斯大林的设想就是，如果朝鲜战争进展不利，在这样一种战争危急的情况下，中国必定请苏联军队，苏联海军留在旅顺港，同时，苏联军队可以控制中长路，仍然把辽东半岛这个出海口留在苏联的手里，这样，苏联整个战略利益，在东亚的这种战略安排，还可以照旧实现。我想，这个就是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一个根本的目的。

那么再一个，就不讲这个过程了，这个过程很长，包括战争到底怎么爆发的，弄来弄去，但是这个时候中苏同盟还是一种形势，还是纸上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并不相信毛泽东，所以他开始跟金日成讨论的时候，才要背着毛泽东，对不对？提前给你说了你再给我添一些问题，再给我来一个什么“你应该这样回答”就麻烦了。一直躲着，一直等到5月，马上就要开战了，他才对金日成说，你到北京去一趟，你找毛泽东去，为什么？说如果万一出了事，苏联是不可能向你提供帮助的，到那个时候就得找中国人。后来果然就出了问题，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其实从7月开始毛泽东就想出兵，那个时候金日成打得非常顺利，一直打到釜山，90%都解放了，当时毛泽东就讲了，说你现在最危险的就是后方，被人抄后路，你应该把重兵调过来，如果你调不回来，我调兵上去给你守后方。金日成觉得也是，他也确实觉得很危险，斯大林死活不同意，我看这个档案材料，至少从7月到9月有三次，中国提出要出兵，斯大林就是不让去。什么道理？你得想想他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是苏联要控制朝鲜半岛。对了，中国派几十万人去，仗是打赢了，这朝鲜半岛归谁了？不是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吗？所以他一直压着，不让中国出兵，但是到了10月，就是仁川登陆以后，局势急剧下滑，朝鲜人民军全军覆没，没人了，这个时候如果美国要是越过三八线的话，控制整个朝鲜半岛，那就不仅威胁到中国东北，还要威胁到苏联整个远东地区，看地图就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时候斯大林要求中国立即出兵，他给毛泽东说，说你不是一直想出兵吗，我看现在是时候了，你赶快去吧。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这个过程也很复杂，没有时间细讲。到最后一步是什么，就是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因为毛泽东之所以最后说服了彭德怀让他挂帅出征，就是因为原来斯大林答应苏联出空军，中国出陆军，这么着，咱们联合跟美国人打。但是周恩来和林彪到了莫斯科以后，后来又到了黑海，跟斯大林一谈，斯大林含糊了，说要不然你们先去，说陆军，中国陆军先去两个月，我最迟两个半月以后苏联空军就上。周恩来当然不干了，两个半月这仗不知道打成什么样了，说要不然我们再等两个半月。斯大林又不高兴了，说再等两个半月金日成早就完了。周恩来说要去咱们一块儿去，斯大林坚持中国先去，苏联空军后去。就是不相信你

嘛，你真是要去吗？你扯一帮人过了鸭绿江，我们飞机一上，你掉头回来了怎么办？这苏联出兵成了既成事实了，也改不了了，他主要是不相信中国人。

最后，那拉倒，你们也不去了，我们也不去了，牺牲了北朝鲜，让金日成到沈阳建流亡政府。林彪又不干了，说你把金日成弄沈阳去，这不是引火烧身吗？本来美国人没想打我们，你把金日成安到沈阳，这不是找事嘛。他说斯大林同志，我建议咱们把金日成留在山里打游击牵制美国人怎么样？这个当然斯大林没答应，最后就达成一个协议，放弃北朝鲜，中国也不出兵了，苏联也不去了，然后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发了个电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放弃北朝鲜，建立流亡政府，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要琢磨了，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结果，他就得想想是不是斯大林真的要放弃，还是斯大林生气了。开始毛泽东说，既然如此，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然后晚上9点50分，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给斯大林，说我已经下达了撤销出兵的命令。但是第二天他又改主意了，当然，他怎么想的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很显然，他是琢磨斯大林还是要让中国出兵的，他说不出兵那是赌气，我想他一定是这么判断的。所以13日他又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我们还是决定出兵，而且他告诉周恩来，说政治局再次讨论，还是决定出兵，但是你要跟斯大林讲，就说我们先去是先去了，但是苏联空军两个月，最迟两个半月一定要出动，你不能涮中国人。好，15日斯大林答复，说苏联空军出动是可以的，但是苏联空军不会越过鸭绿江，我们只保卫中国的领空。周恩来一下就愣了，说我们在朝鲜打仗，你不过鸭绿江你算出兵吗？17日回来跟毛泽东一汇报，彭德怀先发怒。因为这事决定了以后，我看十三兵团给中央军委写了几个报告，都讲的是空军的问题，说现在，因为中国打仗从来就没有空军嘛，这次要跟美国人打，美国空军多厉害，没空军这仗怎么打，就老问，跟中央问这个事。所以毛泽东也知道，这事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出兵，出兵成败与否的一个关键问题。武器装备是解决了，苏联都答应提供没问题，但是空军怎么办？

现在就是最后关头了，就是你自己去，你去还是不去，18日毛泽东就面临这么一个选择，你去可能就被人打得稀里哗啦，为什么所有的中国军事将领都反对出兵呢？就是他没有胜利的把握。你出兵干嘛去，你不是出兵要打胜仗吗？没有谁说我们决定发动一场战争，我们一定要打败，你脑子有问题，除非战术上诱敌深入，那叫诈败。所以所有中国领导人，他不愿意出兵他就是没有取胜的把握嘛。武器装备又不如人，人家海陆空三军，你只是陆军，而且这陆军还没有打过现代战争。当然，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打过现代战争，头两仗才赢了。所以大家心里都没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还决定要出兵，这就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我的判断，因为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打败了也要去，那我想，他一定是对这些军人说的，就是你都怕打败仗，但是打败了也得去，你琢磨一下这话是什么话？意思就是军事上的胜败不是主要的，关键就是去还是不去。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是要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一员，中国共产党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所以我想，毛泽东对中

国的安全的保障，对新中国共产党新政权是否能巩固下来，他寄希望于中苏同盟条约，而不是寄希望出一支军队来保卫鸭绿江，那是一个小的安全，大的安全是在朝鲜战争这种背景下，可能会导致共产党刚夺取的政权得而复失。蒋介石蠢蠢欲动，准备反攻大陆，国内什么国民党散兵游勇，到处活动，反革命分子也跳出来，经济一片衰败，共产党又没进过大城市，上海1950年是最乱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然后整个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形势非常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单单靠一个志愿军出兵能够保证安全？所以我想，毛泽东他一定会这样想问题，真正能够帮助中国，帮助中共巩固这个政权，帮助中国保障安全的，是中苏同盟这样一个政治框架，是苏联对中国巨大的援助。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的信任的基础上。所以他一定要做这件事，做了这件事或许就能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跟着就是中国想要的东西都来了。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推断，毛泽东也不写日记，他也没写为什么这么考虑，但是咱们根据前前后后发生这些事进行推断，可以证明的是，中国出兵以后，19日出兵，25日就跟美国人打起来了，28日斯大林就下了命令，苏联空军立刻出动，而且可以过鸭绿江。以后，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朝鲜战争空军基本上都是苏联打的，志愿军空军1952年才参战，而且都是外围作战，主战场都是苏联空军打的。而且苏联的援助就开始大批地到中国，光米格-15B式飞机（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就给了390多架——白给的。网上传说斯大林感动得流了眼泪，我在材料里没看到过，但是我看那些电报能感觉到，斯大林确实被感动了，就是毛泽东会在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明知道出去要打败仗还去。后来打了胜仗那真是纯属侥幸，我就说，一个是双方谁也没想到，美国人没想到中国会来人，放心大胆往前走，麦克阿瑟圣诞节要回家，让步兵往前赶，结果正好志愿军过来，两边走乱了，美国人怕乱，中国人可不怕乱，原来就都是乱的嘛，所以穿插、包围，一下把美国人打懵了。包括国内的经济援助也是大量的到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这个判断还是正确的，因为达到了他的目的。至于人们说的代价，因为现在对出兵、中国出兵还有一个说法，最后朝鲜战争中国损失太大，代价太大。代价太大这也是一个事实，确实有点得不偿失。其实你到第二次战役打完或者第三次战役打完就结束就完了，完全有可能，那会儿中国是全胜，而且没什么损失，除了冻伤的。但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你知道到了1951年1月毛泽东给斯大林打电报写什么，说美国人不过如此，美国人不怎么样，还不如日本人呢，说我一次消灭他一个军没问题——头脑发热，最后才造成这个结局。所以我说，我们不能用三年以后战争的结果这个代价来评估出兵朝鲜的这个决策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是中国出兵以后，中苏同盟才真正建立起来。在此以后到斯大林去世之前这一段时间，就是1950年到1953年，斯大林在各个方面非常支持中国。当然，也是因为毛泽东在朝鲜掌握了主动权，因为中国100多万军队在那嘛，所以基本上是毛泽东说了算，斯大林都是支持的态度，而且中国提出的要求斯大林基本上都满足了。也就是说，中国出兵朝鲜才最后奠定了中苏同盟建立的这个真实的基

础。

（2013年4月21日在季我努沙龙学术讲座上的演讲）

附录：沈志华主要学术成果

论文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对中国与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合作），《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三八线”的由来及其政治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成败》，《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档案材料》，《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

《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及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1958—1959年）》，《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2004年秋季号）。

《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2004年秋季号）。

《1956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

《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

《1956年初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6期。

《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

《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冬季号）。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中共高层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争论》，《史林》，2009年第1期。

《美国中央情报局眼中的中国——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情报评估综合性文件概述》，《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3期（2009年3月）。

《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

《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

《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

《中朝边界争议的解决》，《二十一世纪》2011年4月号。

《东北朝鲜族居民跨境流动：新中国政府的对策及其结果（1950-1962）》，《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

《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主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

《维护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试论朝鲜战争起因与斯大林的决策动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

《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

《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期。

《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华东师范的学报》2014年第1期。

《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再述：国外篇（1919—1924）》（合作），《韩国研究论丛》第27辑（2014年7月）。

《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二十一世纪》2014年6月号。

《事与愿违：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的结果》，《二十一世纪》2014年8月号。

《还原一段历史真相——对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

《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再述：国内篇（1925—1935）》（合作），《韩国研究论丛》第29辑（2015年4月）。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

《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著作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主编），九州出版社，2010年。

《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案例研究》（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

《冷战的转型——中苏同盟的建立与远东格局变化》（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

《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

《冷战中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

《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三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文献资料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总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年）》8卷（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

《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编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12卷（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